

中國教父

*China's Godfather,
Xi Jinping*

余杰



開放出版社



攝影：陳思維、Rebecca Chang

作者簡介

余杰

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一九九二年進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冊，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一代年輕人。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活動家於一身，多方面的才華與旺盛的創作力，在華人文化圈中獨樹一幟。先後出版各類著作超過四十部，如長篇小說《香草山》、近代思想史論文集《彷徨英雄路》、傳記《劉曉波傳》以及多卷本「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等獎項。

二〇〇四年，余杰因為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人權報告，遭到北京警方傳訊，從此被中宣部列入「黑名單」，被禁止在中國內地發表作品。此後，作品多在香港、台灣和北美的華文媒體發表。二〇一〇年十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余杰被非法軟禁數月，並遭到黑頭套綁架及酷刑折磨。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攜妻兒從中國出走，獲美國政府政治庇護。

此後，余杰在華盛頓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宗教信仰自由與公民社會等議題的研究。同時擔任香港《開放》雜誌、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美國「民主中國」網站、台灣《醒報》等媒體的專欄作家。兩年來，出版《劉曉波傳》、《河蟹大帝胡錦濤》、《解毒國民教育》、《流亡者的書架》、《大地上的麥子》、《我聽見斧頭開花》及《螢火蟲的反抗》等著作。

中國教父習近平

余杰 著

China's Godfather, Xi Jinping

by Yu Jie

OPEN

開放出版社

China's Godfather, Xi Jinping

By Yu Jie

P.O. Box 20064,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 8th Mar, 2014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 14 Apr, 2014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國教父習近平

著 者：余 杰

發行人：金 鐘

出 版：開放出版社（OPEN BOOKS）

電話：(852) 2893 9197

傳真：(852) 2891 5591

E-mail：open@open.com.hk

網址：http://www.open.com.hk

通訊處：香港軒尼詩道郵箱 20064 號

P.O. Box 20064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總 經 銷：田園書屋

電話：(852) 2385 8031 傳真：(852) 2770 2484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印 刷：遠東設計印刷公司

電話：(852) 2274 1314 傳真：(852) 2244 5929

出版日期：2014 年 3 月 8 日初版 2014 年 4 月 14 日第 2 刷

定 價：138 港元

國際書號：ISBN 9627934-33-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開放出版社調換

目 錄

	金 鐘	出版說明	7
序一	鄭宇碩	威權式改革已經無路可走	8
序二	夏 明	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13
序三	戴耀廷	習近平和他的時代	21
自序	余 杰	認識習近平，認清中港矛盾的癥結	28
		中國教父習近平（全球媒體圖片集錦）	37
第一章	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		1
	魔教換教主，屁民難翻身		3
	他從黃土地中走來		11
	——從地域文化看習近平的文化取向和心理結構		
	馬戲團必須以小丑為中心嗎？		22
	——對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十個人		
	習近平有幾個推心置腹的朋友？		34
	——側評中俄、中美、中朝、中越、中南、中德關係		
	習近平真的「看上去很美」嗎？		46
	——剖析奧巴馬、拜登、李光耀、吳伯雄、星雲和尚對習近平的評價		
	你的美夢，我們的噩夢		57
	習近平與習仲勳同床異夢		66
	夢斷香江，血洗中環		73
	——習近平的治港策		
第二章	南柯一夢：論法西斯之迷狂		81
	「習家軍」為何而戰？		83

「習胖」學「金胖」，「強軍」仿「先軍」	91
黨已腐敗，軍又如何？	97
對日開戰是習近平的「速效救心丸」嗎？	103
習近平的「刀」與「劍」	113
從「希特勒的孩子」到「習近平的孩子」	119
「紅衛兵」空降香港，「紅社會」隱然成形	127
「黨人治港」終結「一國兩制」	133
劉進圖被斬：香港版的江南案	139
第三章 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	147
「毛」病不改，惡「習」難除	149
知青時代的習近平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嗎？	156
擒賊不擒王，去薄不去毛	164
毛澤東愛游泳與習近平愛踢球	171
那個演戲的人，你是叫不醒的	177
——評習近平主導的「整風」運動	
習近平為何重提「楓橋經驗」？	186
習近平不妨改名「習禁評」	192
惟有偽造歷史，才能壟斷未來	200
第四章 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	209
習近平比拿破崙三世愚蠢一百倍	211
解析習近平的智商與情商	217
空談從來不誤國，實幹未必能興邦	224
誰在為習近平抬轎子？	229
——從「公知捧習」看文人奴性	
是望梅止渴，還是飲鴆止渴？	241
——中國的傳統道德和傳統宗教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何不食肉糜？	247
——看習近平如何深入基層	
人話乎？鬼話乎？	258
——透視「習近平語錄」	
彭麗媛能代表中國的「軟實力」嗎？	265
第五章 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	275
夏俊峰是習近平手上沾的第一滴血	277
軍機處、中央文革小組與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283
習近平向知識份子宣戰	290
玩火自焚的「類人孩」	297
——讀矢板明夫《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	
習近平不是蔣經國	304
不學不丹國王辛格，偏學滿清攝政王載灃	311
習近平要走安德羅波夫的老路？	319
遠看是暴君，近看是小丑	330
習近平為什麼要對王功權下毒手？	338
「康師傅」下架，暴力維穩不改	345
附 錄	351
做一個持自己政見的公民	353
——余杰、陳小平對話錄	
存謙卑的心與天安門母親風雨兼程	374
——在華盛頓紀念「六四」二十三周年集會上的發言	
牛犢可以頂開橡樹	378
——在紐約「公民勇氣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	
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	382
——我所認識的姚文田	

出版說明

《中國教父習近平》原由作家余杰與香港晨鐘出版社姚文田先生協議出版，2013年10月，姚先生在深圳被拘留，失去自由，出版作業中斷。余杰沒有放棄，繼續修改書稿，重新尋找出版社。幾經周折，二月中旬，終於和本社洽談，決定由開放出版社完成本書未竟之編輯出版業務。

本社早在2003年、2005年先後出版過余杰著《拒絕謊言》與《天安門之子》，他也是開放雜誌的特約作者。他對周永康治川的劣跡，早有抨擊；對薄熙來神話，也洞悉其奸。在此遭遇阻難之際，我們放下既定出版計劃，接手出版這本讀者期待的新著，感到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余杰是中國「七〇後」一代新銳作家。1998年以《火與冰》雜文集成名。其後，著述不斷，終以「牛犢頂橡樹」的不屈風格，成為一名異議作家，遭到軟禁與酷刑後，於2012年離開中國，攜家出走而定居美國。這時，他已完成「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的《中國影帝溫家寶》（2010）與《河蟹大帝胡錦濤》（2012秋），深受讀者歡迎。余杰為長期受中國黨文化浸染的作家轉化為獨立的政論作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示範。

《中國教父習近平》是「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的終結篇。作者以優異的文字功力和史學積累，剖析中國新朝統治者習近平「以毛為父、以鄧為師」的權力實質，及其人格模式，指出這個末代王朝必然終結的趨勢。他希望這本詛咒黑暗的書，對正在爭取光明追求自由的香港朋友們認識中共有所啟示。

金鐘（開放出版社總編輯）

2014年3月1日 香港

威權式改革已經無路可走

鄭宇碩

余杰兄邀約為其大作《中國教父習近平》寫序，感到有責任為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說幾句話。

香港社會雖然尚未爭取到真正的普選，但大體上仍然能夠享有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商業服務中心，各方面包括中國領導人和本地的大財團均明白法治和資訊自由的重要。

然而，近年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斷受到侵蝕。香港記者協會每年的報告均指出媒體的自我制約已成趨勢；香港電臺遭受到的壓力由暗轉明，因為親中陣營不能忍受公帑支持的媒體去批評政府。

最近一年，因為特區政府要面對政改的民眾運動，干預媒體的事件變本加厲。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商業電臺李慧玲的節目被調動，《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撤換：在香港人眼中，這顯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

接著是二零一三年十月底，原來要出版本書的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在深圳被拘捕。

余杰兄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姚文田是一位出版社編輯，他們都不過是說了真話，或是幫助了一些說真話的人，就受到了當局的迫害。尚能有機會說話的香港人，有責任支持他們，因為這是人類的共同責任，這是捍衛普世人權的共同責任。

對於香港人來說，履行這項責任就更為迫切，因為當本身的自由和

人權受到威脅的時候，挺身而出捍衛受迫害者就是保護本身的自由和人權的最佳方法；只有人類社會共同努力捍衛共同的普世價值，人類的自由和尊嚴才能得到保證。相比於中國國內的公共知識分子，香港要發聲的市民尚算是幸運的人群，因為我們只是受到一點壓力，基本的自由和安全仍然得到保障。

在香港爭取民主，市民都明白決定權操於中國領導層之手，最後還得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拍板。針對中國領導層一念之間，香港民主運動的基本立場如下：首先，沒有建立民主的、有競爭的、符合國際標準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特區政府在市民眼中就沒有認受性可言，市民不會認為行政長官是向他們問責的政府領袖，行政長官的管治將會舉步維艱，香港難有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

其次，香港沒有民主，中央政府的對臺政策將沒有什麼吸引力和可信性可言，更難望促成兩岸達致政治對話、和平協議。二零一六年是臺灣的總統選舉年、二零一四年底臺灣有「七合一」選舉，兩岸政策是重要議題（特別是針對總統選舉而言），而有關香港政府的決定會成為臺灣兩岸政策爭論的一個環節。

最後，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派與國際社會均在觀察中國的新領導層特別是習近平是否屬改革派，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是答案的一部分。

就香港政改的決定，中國領導層一定會考慮到香港有真正的普選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相當一部分香港人相信「中國有真正的民主，香港方能有真正的民主」的原因。目前的情況是，中國領導人大概明白沒有民主的選舉，香港政府很難有效管治；但是習近平似乎對互聯網的封鎖、對異見人士的打壓等更加嚴厲，香港市民對爭取民主難以樂觀。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未見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有關改革只是停留在行政層面。胡錦濤、溫家寶年代，中共政權維持政治穩定的方程式是：經濟增長加一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網再加沒有民主的良治。胡錦濤無

意推動政治改革。

到了習近平，他到方程式未見有什麼重大突破。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已成強弩之末，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就沒有民主的良治，習近平的新戲是大力打擊貪汙和遏止奢侈之風。後者應該受到國民的歡迎，有助提升習近平的名望。不過以運動的方式去打擊貪汙，不能持續，連放寬媒體自由和各級人大批評政府的尺度都不願意接受，又怎會有什麼有效的制衡機制去持續打擊貪汙呢？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內容相當豐富，看來像是一份施政綱領。但由於《決定》的涵蓋面太廣泛，小至高考減少科目、漸進式延遲退休等也包括在內，外界的問題是如何開展推動。改革的內容爭議性不大，代表着過去討論所達成的共識，嚴肅的政治改革不是重點所在。

雖然經濟改革大方向有共識，但改革中觸動到眾多的既得利益，後者擔心「沒了能幹的事，少了能賺的錢，斷了升遷的路」。各級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不能從本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自然意味着改革政策的執行會遇到不少阻力。

另一方面，習近平視察山東，提出推進改革要「正確、準確、有序、協調」；評論者認為中國領導層擔心各地改革很可能出現一窩蜂上馬的現象，例如各地興起「自由貿易區熱」。急於求成、追求政績工程自是中國國內地方政府的通病。

中國領導層近年一貫重視「頂層設計」，要推動這次大規模、大範疇的改革，中央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似乎習近平有意從地方集權到中央，再集權到個人。官方智囊的非正式解釋是「收穩定權、放發展權；但是要先通過收權的形式實現放權，打破過去『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病。現階段中國的改革自是一種典型的威權式改革」。

政府向社會和市場放權，壟斷行業向民營經濟開放，政府職能轉變，

精簡機構，這些大原則沒有什麼人敢非議。但面對一個龐大的特殊利益群體，習近平很可能以「強人政治」的方式去提高政策實施的效率。但「強人政治」的弊端和風險很明顯，過去中國也飽嘗其苦果。

中國目前主要存在四大違反社會公義的利益集團：壟斷國企利益集團、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和身份血緣利益集團。以整風的方式去打擊這些利益集團，短期可能暫時取得一些效果，但長期的效能成疑。

政治精英一致同意維持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領導層對政治改革就難有共識。西方民主國家政府很多時候拒絕處理累積的預算赤字，因為節約措施往往開罪選民，導致大選失敗，因而希望把問題拖延，留待下屆政府去處理即將出現的危機。而中國所謂「擊鼓傳花」的困境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既然「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那就以打擊貪污、改善經濟稍為舒緩社會矛盾，不過連這些措施也要以「強人政治」的方式去落實。

「擊鼓傳花」可以苟延殘喘多少年，有不同的估計。過去三十多年，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總算有大幅改善；展望未來五年，多數國民就改善生活仍有一點憧憬。中國國民因而怕變，且仍未見到可以取代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中國領導層因而對群體性事件的處理一般採取懷柔的手段，但是就不惜一切代價去鎮壓可以威脅其政權的挑戰者。

然而，公民社會的發展不是中國領導層所能阻擋。北京的李凡對此有頗為樂觀的估計。他認為目前中國有七、八百萬個社會組織涵蓋三億人口，這就是「進步的公民社會人口」。這個比例尚不足以對中共政權施加足夠的壓力去從事有意義的政治改革；但如果這個人口的比例在十年至十五年左右提升至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就可以超越關鍵的門檻了。

就質的突破而言，跨越更廣泛地域的公民組織不斷增加、鞏固和發展，特別是省一級的組織是重要的指標。前幾年姚立法組織中國農民協會，在湖北省有一定的影響力。維權律師和家庭教會已有很不錯的全國

中國教父習近平

性網絡。二零零八年五月汶川大地震，民間組織參與救援工作就顯示出相當的動員力量。像劉曉波、許志永等人亦成為全國性的精神領袖。

總體而言，未來的四、五年很難看到重要的走向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公民社會正處於積蓄力量的階段，期內未必能見到突破性的發展。但趨勢是明顯的，中央政權正面對不斷增長的要從事政治改革的壓力。

今後數年，習近平無疑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中國人眼中，他選擇的似乎是普京強人政治的道路，而不是戈爾巴喬夫民主改革之路。余杰獨具慧眼，對習近平的心態和價值觀有深刻的探討，從而分析他的政策綱領以及其侷限。對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這是一本不會令你失望的書。

鄭宇碩（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香港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香港公民黨前秘書長）

本性難移、惡習不改

夏明

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學術高人告誡我做中國政治學學問的護身之法：可以談具體問題，甚至可以籠統地批判官僚體制，但不要觸及黨、軍隊、情報安全機構和具體領導人。最大的忌諱是：絕不點名批評最高領導人。

從文學領域走進社會政治評論的作家余杰少了這些羈絆，以極大的勇氣破除心獄、蔑視成規，完成「中共惡人三部曲」：《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和《中國教父習近平》。如果說，前面兩部評論集是在胡溫執政行將結束時完成的，所以多少有點蓋棺定論的總結意味，但這部新著《中國教父習近平》在習李全面執政的一年內面市，則帶有更多的政治預言色彩。儘管對習近平我們還必須抱著發展的眼光，但豐富的文學和社會學想像力使得作家余杰已經能夠見微見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習近平和他執政的本質。對許多盼望中共主動改革、鍾情習李新政的良善中國人來說，余杰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

認清中共本性，放棄對習幻想，這恐怕是余杰在本書中給讀者最大的告誡。從習近平還在浙江和上海做書記時，我就開始關注習近平的言行、政策和升遷軌跡，並發表了不少文字和採訪。我很高興地看到，我與余杰有許多共識和共鳴。尤其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在習近平全面執政僅僅一年的時間裡，余杰就完成了一部翔實的習近平政治評傳。所以我

很樂意受好友之邀，把我的一些觀察與讀者分享，以此表達我對余杰新作的支持、欣賞和推薦。

「黑馬」習近平

二零零七年圍繞李克強、習進平能否入常的問題，在李克強受到胡錦濤力挺、被普遍視為「王儲」和「太子」的背景下，我認為習更可能會成為搶頭標的「黑馬」。今天，習近平已經順利地全面接班，成為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大權轉移過程也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從社會網絡分析理論來看，習近平的穎出是必然的。在中共的領導人選拔體系裡，中共中央委員會是選拔團。裡面的權力板塊形成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未來接班人的權力基礎。當中國的強人政治逐漸向弱主政治過渡時，一人佔據頂端、一言九鼎的等級金字塔決策模式演化到了權力核心為主導的網絡化結構和磨合決策模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在有許多小集團（或派系）組成的權力網絡中，佔位得當，不僅成為連接各個小集團的橋樑型人物（也是網絡分析所說的「結構性橋樑」），而且，積聚了最高的中心性，理所當然為選拔團所青睞。

具體說來，習近平享有一些先天的優勢。例如，他是「太子黨」中的佼佼者；同樣托父之福，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派係都維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作為清華的畢業生和「博士」，容易被作為工程師治國核心的「清華幫」所接納。他也享有許多地利：例如，沿海大省（從廣東、福建到浙江、上海，再到河北）或因他父親早期建特區的關係，或他自己的工作經歷，都會把他視為寵兒。「上海幫」對習的接納尤其重要。最後，作為政治局常委裡唯一一位真正穿過軍裝的，而且還有軍旅引以為豪的軍級「唱紅」歌唱家為妻（很長一段時間，習近平是被人們以「彭麗媛的老公」而記住的），軍隊自然把習近平看作自家人。縱覽中央委員會的重量級板塊：「太子黨」、「上海幫」、軍隊、「省級利益集團」，胡、

趙期間培植的勢力和「清華幫」，習近平獨占鰲頭，就再也自然不過了。

以「黑馬」身份衝進並主宰中南海的習近平，讓許多人在他身上投射出主觀願許。一個重要的期盼是，他能成為一個開明、樸實的改革領導人，開創一代民主新風，完成中國民主轉型。這或許是習近平軟實力的巨大蓄水池。但我們很快看到圖窮匕首見，習近平上台伊始即拔刀亮劍，倒行逆施。

「弱主惡政」

中共十八大落下帷幕、習李開始全面接班後，海內外期盼政改的熱情再度升溫。剛經歷過「高期盼、大失望」的胡、溫十年，中國再次進入《等待戈多》式的荒誕劇角色中。從「胡溫新政」落得個「弱主惡政」。胡、溫的「弱主惡政」的局面與鄧小平強人下的「開明專制」（所謂「硬國家、軟經濟」）形成一對矛盾。其實，運用理性選擇的理論，我們很容易解釋這一矛盾，民主轉型的博弈第一種可能發生在強人專制政權下。以鄧小平時期為例，博弈雙方是「強人政權」和「弱勢反對勢力」。從一個有自信的政治強人視角來看，為了持續統治下去，適度的自由化並不會導致翻船，適當給人民鬆綁會一舉兩得。「寬鬆的專制」局面就會隨之出現。

隨著「強人政治」進入到「弱主政治」（比如說從鄧小平演進到胡錦濤），由於反對力量的強大，弱主可能試圖進行部分的自由化，但反對勢力可能想往前走得更遠，弱主擔心失控，可能反而會放棄部分自由化，龜縮到「收緊的專制」，以避免喪失政權。這解釋了為什麼胡溫起初擺出了「新政」的架勢，但很快擔心失控翻船（尤其是劉曉波的《零八憲章》後），走到「維穩為上」，反而強化了專制政治。

同樣的道理，未來習、李任期，反民主的專制傾向可能成為主色調。在完全的理性原則支配下，要指望一對已為強弩之末的專制者主動進行

民主轉型幾乎是與虎謀皮。期盼「青天明君」橫空出世，給中國人帶來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恐怕最終又會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歷史給了習近平一個成為偉人的機會：如果他有勇氣、遠見、責任和智慧，順應民主潮流，避免塗炭生靈，成全中國民主化轉型，他就一定能超越蔣經國，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偉人，甚至兩千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偉人。或者，他也可以得過且過，繼續「抱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如果習近平不作為，並不能因此可以減少民變的發生，他極有可能最終淪為「蘇哈托第二」、「薩達姆第二」或「穆巴拉克第二」。當然，他也可以加大維穩力度，增加對社會的鎮壓，走向「收緊的專制」。這種「法西斯主義」傾向似乎愈發清楚地成為習近平執政主旋律。但這並非是沒有風險的選擇。今天中國的形勢已經出現風雲變幻。仔細分析，維權運動、地下教會、法輪功、訪民團體等都游離出了共產專制體系。《零八憲章》運動、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組織、維權律師等都明確提出了要推動共產黨政權解體、國家民主轉型。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也是反對力量的大本營。如果習近平尋求反動，刺激矛盾，激發革命，他極有可能落得「齊奧塞斯庫第二」或「卡扎菲第二」的結局。

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分裂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

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生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水平。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習近平的「憲法政變」

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越來越少的中國人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它的《決定》而歡呼雀躍，而越來越多的人卻對習近平獨攬大權憂心忡忡。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從設立的目的和

方式來看，都是一場「憲法政變」，它全面顛覆了中共自己確立的「八二憲法」。中共完全繞過人大程序，由黨代會包辦改變了國家機構的設置，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而且，「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機構，由國家主席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職務，不僅加劇了原來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帶來的黨政不分的弊端，而且還進一步削弱了人大和總理的權力地位，把內政、外交、文化、經濟的大權統統集中到了國家主席手中。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安全」的概念已經涵蓋國家安全、人類安全和經濟安全等諸多「新安全」領域。正如中共明確宣示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也就是身兼總書記、黨和國家兩個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安委主席的習近平大權獨攬，而政府、人大、政協、工青婦組織和社會團體都成為被協調的一方。這樣的機構變更，遠遠要大於普金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玩把戲，不能不說是一場「憲法政變」。

大權集中的習近平有可能成效法另兩個搞憲法政變的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或日本的東條英機。為什麼習近平的憲法政變有如此的危險性，可能把中國引向全面的寡頭化和法西斯化？這主要有現今的中共意識形態、領導人的意志和他們的素質所決定的。現今中國的意識形態大辯論絕然不同於七十年代末期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當時是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今天是左傾僵化保守勢力抬頭，宣傳機器用蒙昧主義、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來抵制啟蒙、反對普世價值、壓制民主自由。領導人也絕沒有讓人民自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政治意志。習的「兩個一百年」把建設民主中國放在了未來兩、三代領導人的時間表上，也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全面抵制民主化。沒有人會相信一個把兌現時間定在他死後的承諾人。

更讓人不安的是，從王立軍、劉志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人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不義之人。他們像是一群蝗蟲，把過去改革取得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在胡趙治理下取得

的政治和社會進步，把法制、人大建設（包括評議、信訪、司法監督等制度）都可以頃刻間糟蹋得乾乾淨淨。現在，他們又在拋棄公民社會、憲政和普世價值。從吳邦國的「五個不搞」到習近平的「七個不講」，再到今天的政黨違憲，踢開人大制度和政府職權，大搞個人專權、黨國暴政，中共黨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邪惡的帝國。

習近平的權術秘笈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時間裡，習近平左右開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寧左勿右，讓國內官民和國內外觀察家感到撲朔迷離。其實靜靜地觀察和思考，不難發現，六十多年中共權力學從毛鄧江胡再到今天習以為常，都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這裡涉及的根本問題就是「核心」。其實質是，中共最高領導在殘忍的權力鬥爭中，為了獲得、鞏固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核心地位，運用左右兩手，把左、右派玩弄於自己的掌股之間，讓雙方互鬥，通過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間斷政治清洗，使「左」、「右」兩派都處於永遠的恐懼狀態和對最高領導的感恩狀態，來營造個人的權力安全堡壘。人們都知道，暴風眼經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領導慣於在自己身邊製造狂風暴雨，自己卻穩坐釣魚台、避風中南海。

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格局下，習近平佔據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統治定制成型。習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廢相後又一位「乾綱獨攬」的專權者。中國歷史自秦漢以來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權力分開、輔佐、制約的關係。到了明太祖，「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於一身，獨攬國家一切權力，親理天下軍政事務；大小臣工俯首聽命。」這一套權力配置構架，其精髓是「事皆朝廷總之」，「乾綱獨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基本廢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後，總理的權力上交給國家主席。習近平成為朱元璋第二。

中國教父習近平

總之，從鄧小平的「小康社會」，到胡溫的「和諧社會」再到習近平的「中國夢」，無非都是一個痴迷暴力權力、踐踏人權民權的黨國玩的政治忽悠。余杰會在他的新著中詳細為你指點迷津，從而認清識別癡人說夢、避免再次聽信夢話。只有告別對黨國的期盼，我們才能明白中國諸多問題的總根源就在黨國身上，才能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當然，我們也應有足夠的樂觀，不要忘記，儘管中共本性難移，儘管近平惡習不改，中國古人的智慧還有另一面：「江山易改」。

夏明（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習近平和他的時代

戴耀廷

余杰在《中國影帝溫家寶》及《河蟹大帝胡錦濤》兩書，為中共胡溫政權的兩位主事人作了深入剖析，亦為中共的管治之術及前景，寫下了他的「判決書」。《中國教父習近平》是這中國當代領導人系列的第三部。余杰希望這是他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的終結篇，但一日中共專政的局面不變，余杰可能還要為這系列繼續寫下去。

繼用「影帝」和「大帝」來概括兩位上一代中共第二及第一把手的特性，余杰今次用上「教父」來描述新任中共第一把手習近平。當中也涉及了他對中共的特性的判斷。余杰說：「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黨魁習近平自然是中國的教父。」

余杰身受其害，自然感受良多。如他所記述：「二零一零年，當我寫完並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影帝溫家寶》之後，厄運便降臨了。當時手握政法大權的周永康，親自指示秘密警察對我發出『活埋』的威脅，中共政權的『黑幫化』進入了圖窮匕現的階段。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和酷刑折磨之後，出走中國。」「比起紐約黑幫的教父來，『習近平』無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控制之人口與資源，也不知擴大了多少倍。」

余杰長年觀察及分析習近平，深具洞察力，故他對習近平的評論是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按余杰的分析，習近平的性格、思維、及策略可總結為多點：

一、習近平的「夢」，雖叫作「中國夢」，實際上是「中共夢」，就是要讓中共保持一黨長期排他性執政的「夢」。

二、習近平深明蘇共亡黨的慘痛教訓，故絕不會讓中共步蘇共的後塵。

三、而要實現這「夢」，習近平選擇了毛澤東的路線，也希望能與毛等同。余杰認為習近平雖在肉身上是習仲勳的兒子，但在精神上卻是毛澤東的兒子。這是指習近平希望如毛澤東一樣，採用多重手段去建立起自己及重建中共的威權。

四、在黨內，習近平利用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領導人道德感召力來整頓執政黨團隊，並透過集權去確保自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

五、對普羅老百姓，習近平就透過行使威權反腐來重拾民心，並作親民秀，講動聽的話來麻醉民眾，騙取他們的效忠。

六、習近平會壓制輿論，及重佔「思想陣地」來奪回話語。這是在意識形態上變守勢為攻勢。他亦會變本加厲地暴力「維穩」。

七、習近平以高速提升軍費為開始，為對外擴張做好部署。他的目的是要利用軍國主義來為中共的專政提供所需要的民眾支持基礎。

不過，按余杰分析，習近平的「夢」不可能成功。首先，以中國現在的政經狀況，低人權、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管治或發展模式是無以為繼的。畸形的市場經濟亦已走到盡頭，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將無法調和。另外，毛澤東的那種政治思想模式，在中國社會不可能有大的市場，因沒有人能逃得出全球化的影響。在互聯網時代，人們再不是那麼容易被騙的。現在人們只是假裝向中共效忠而已。

因此，習近平在他的十年任期內，必會面對極嚴峻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挑戰和危機。余杰認為習近平及中共已是病入膏肓，卻又諱疾忌醫，甚至殺害良醫。他相信「火山終究會爆發，黃河終究會決堤」，故習近平及中共難逃敗亡的結局。

我對習近平的分析，肯定不及余杰深刻，我也沒有更多資料以助判

斷。我所能依據的，只是一些不用爭辯的事實、中國社會發展在未來十年一些相當大可能的趨勢、一些理性的推論及一點兒常識。我的分析，有一些可能是進一步論証支持余杰的結論，但有一些可能會與余杰的結論有點不同，但希望它們都至少可讓大家從多一個角度思考習近平、中共以至中國的前境。

我的觀點可以總結為四個「不是」和三個「是」。

先談「不是」。第一、習近平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我想這一點是不容爭拗的事實。這事實有甚麼意義呢？習近平個人或應說當代中共的整個領導層的任何一人及以後的領導人，因他們都未有直接經歷過「解放」戰爭，都不可能在黨內及黨外，享有與毛澤東或鄧小平相近的政治權威。即使習近平想摹仿毛澤東或只是鄧小平，他也不可能如毛或鄧般在黨內及黨外，運用個人的領袖魅力去整合黨內外的不同政治力量。也即是說，習近平即使想當「中國教父」，他也只能是「黑道」中各個「堂口」多個「教父」中較大勢力的那一個。

習近平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人與鄧小平及之前一代的中共領袖最大的分別是他們都不是以革命鬥爭起家。即使鄧小平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務實的，但他的血液裏仍是流著革命家的血。對習近平及他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來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只是用以維持中共專政統治的其中一種手段，而這些政治思想實質上對他們沒有實質的規範功用。

這帶進到第二個「不是」。現在的中共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時代的中共。這一點也是不會有太大爭拗的事實。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尤其是經過文革的慘痛教訓及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轉變，中共其實已不再是一個「共產黨」。

如上述，在中共手中，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經歷多重的「中國本土特式化」，已經面目全非，指導中共的意識形態是更符合中國文化的「實用主義」。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和「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其實已經把中共由一個共產黨轉化為一個純然的「執政黨」。這是指中

其所要重看的並不是要維護甚麼意識形態如馬克思主義，而只是想盡方法去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而已。

第三、當代的中國社會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社會。這也是一點不用爭拗的事實。尤其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由經濟改革所帶來對中國社會的改變，已不單是中國人民在經濟生活層面有了大幅的改善，亦已為中國社會文化帶來深層的轉變，尤其是在年輕的一代之間。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人尤其在城市及年輕人，對政治權威、個人自由、身份認同，對群體的依賴及權利的性質等都與上一代的中國人有不同的取態。

這些文化轉變是否產生足夠動力或壓力去迫使中共改變其管治模式甚或促使整個中國的管治制度都要改變來適應，尚待觀察；但肯定一點的是中共若妄想用毛澤東時代的統治模式來管治中國當代的社會，那是注定會失敗的。另一點可肯定的是中共不可能不轉變其管治模式，且要不斷去轉變，才能維持其執政地位。若中共走回頭路，或只是掩耳盜鈴地繼續以現在的統治模式而不作改變，終有一天必會發現時代及社會已轉變至一個他所不能明白的地步。那時候，要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無異是緣木求魚。

第四、現今的世界不是毛澤東或鄧小平時代的世界。這同樣是一點是不容爭拗的事實。現今的世界，所經歷的全球化的程度，把不同國家、文化及人類群體拉得緊密異常。互聯網、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尤其重要。這一方面讓不少國家的人民採取抗拒的態度，拒絕普世價值的同化，而要力保其本土的價值。但這其實已經見證了全球化把一些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所能領悟得到的價值如法治、人權、平等、公平、公義普世化的趨勢。

在這個普世價值的全球化時代，中共即使對互聯網有嚴密的管制，但全球化的影響已在不知不覺間，以各種方式及媒體，滲透進中國社會內。連中共內部包括了高級的黨員，也逃不脫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全球

化的影響且會是持續、累進及極難抵消的。難說全球化的影響對中國社會到甚麼時候才足夠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也難說中國文化會否有相當頑固的部份可減慢甚或對消全球化的作用，但肯定一點是習近平與中共所面對的中國及世界，與毛澤東及鄧小平所面對的，會是很不一樣。

這四個「不是」，某程度是論証支持了余杰的觀點。習近平是要利用中共的老一套，也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套，以意識形態為工具及壓制自由的手段，來建立起其本人及重建中共的權威，但因著世界及中國社會的轉變，習近平及中共都不可能成功。

但我還要談三個「是」，都是與習近平有關。這三個「是」，可能會令最終的結論有點不同。但三個「是」，不像「四個不是」是基於一些爭拗不會太大的事實，而要用上一些以常識為基礎的推論，故大家未必有相同的判斷及看法，也不奇怪。

第一、習近平是聰明人。我想這推論能成立的機會應不會小。習近平若不聰明，他不可能坐上現在的位子，即使他再不是如上一代的中共領導人般擁有無尚權威，而只能是在眾多「教父」中最大勢力的一人。要坐上這位子，也不可能只靠小聰明，習近平起碼有能力讓中共內部的不同政治勢力都願意暫時以他為首，他的親和力應也是不錯的。他可能還會是一個有一點智慧的人，視野是能夠超越當前的有限境況，或許能看得遠一點、闊一點及深一點。

第二、習近平是官僚。如上所述，習近平與其他當代的中共領導人一樣，他是執政政權的官僚更多於是革命家。官僚處理問題多是依靠理性分析及利益計算，而非意識形態的鬥爭思維。這會影響習近平以甚麼為作決定的指標。對一個務實理性的官僚來說，意識形態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只在於它能否有助維持政權穩定。保守或改革也不太重要，重要是那種方向才能維持政權穩定。

關鍵點是要計算利益得失的大小。按這思考進路，官僚的判斷是要增大自己或執政集團所能得的利益，這也是為何習近平會採取現在的手

段和策略。但若他是聰明人，他不可能看不見中國社會及世界發展的趨勢，到他見到現有方法不可能令利益最大化，甚至反會令中共的執政地位更加不穩，那時候他的選擇就不再是利益最大化，而只能選擇如何減少損失。換句話說，他變了要想如何損失令最小化。

第三、習近平是共產黨人。上述我說中共已不是共產黨而只是執政黨，現又說習近平是共產黨人，是否自相矛盾呢？我的意思是中共或許不再奉行共產主義，但因中共掌有話語權，那麼它所奉行的主義，無論是甚麼，按中共的理解，也是共產主義。更重要是中共作為一個統治集團，無論其主導思想是否純正的共產主義，中共仍是共產「黨」。重點是在於一個黨，而不是以甚麼主義為主導的黨。

那麼習近平是共產黨人所強調的是習近平視自己為這「黨」的人，故會看重「黨」的利益更重於他個人的利益。習近平是以自己個人利益為先還是以黨利益為先，分別的重要性是在那裏呢？一個手執專政政黨最高權威的人，當然有最大機會去透過自己的權位去為自己、家人及依附在他身上的利益群體謀取最大的利益。從理性官僚的思維，若自己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沒有衝突，能共存是最好。但若在最大化自己的個人利益時，會損害「黨」的即時或長遠利益，習近平會如何自處呢？

對一個以專政方式統治的執政黨來說，最大的利益就是能繼續這種專政的執政地位。但若這種專政的執政地位是難以維持，一個聰明和理性的黨人，就得思考如何令損害最小化。一個可能性就是進行改革去讓這黨雖再不能專政，但卻可以維持其執政地位。引進憲政的政治改革是其中一個選擇。

若習近平視自己及其集團的利益是優先於中共整體，那麼即使他能見到不改革不單不能令中共的利益最大化，更會把損失擴大，他也不會採取行動進行憲政改革去把損失最小化，因他所著眼的只會是在執政的十年為自己、家人及依附的利益集團準備好後路。一旦中共的執政地位難以維持下去，他們也已經作好準備走到外國過其富裕的退休生活。

但若習近平是一個以黨為先的「共產黨人」，他應會把黨的利益放於個人利益之上。他不可能只求自己能於在位的十年為自己賺取最多，而會為黨謀求最大的利益，即使這會對他個人的利益有損害。這一點推論所需要在邏輯上的跳躍會遠一點，因此出錯的機會是最大的。我並沒有足夠資料去支持我認為習近平必然是一個黨人。

但假設這四個「不是」及三個「是」的推論能成立，我與余杰對習近平的結論就會有不同。余杰會認為習近平不可能推動憲政改革，他是從習近平的本質是中國教父而得出這結論的。我卻認為習近平仍有可能推動憲政改革，不是因他從理念上認同憲政，而單純出於為了讓中共能維持執政地位，而無奈地推動憲政改革。當然以這種心態去推動憲政改革，也不會是真心誠意，結局也很可能是好像滿清末期的憲政改革一樣，來得太遲及來得不夠徹底，最終也是以失敗告終。這可能性當然存在，故我才說還得看習近平有多聰明、多理性及對黨的忠誠有多強。

當然這推論也是建基於在習近平的任期內，中共所面對的管治危機已到達一個相當嚴峻的程度，令習近平及中共看到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再不可行，而必須改變去思考如何令損失最小化。假若在未來十年，中國內部及全球化的發展未足以推到這一個臨界點，那麼習近平或許能在風雨中捱過十年，把權力交到下一任的中共領導人手中，也就是下一任的中國教父。對習近平的下一任中共領導來說，所要面對的，是再經十年折騰的中國社會，他的境況將會更加不堪。

又假設他也是如習近平一樣，都是聰明人、理性的官僚及忠於共產黨的人，那麼在下一任的中共領導人的管治時期，中共極大可能要把選擇由利益最大化轉為損失最小化。那麼中國在走向民主憲政的路上，或許能見到一點兒的曙光。

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認識習近平，認清中港矛盾的癥結

余杰

二零一二年二月，習近平以副元首的身份訪美，剛剛逃離中國的我，是白宮門口眾多的抗議者當中的一員。習近平的車隊從旁門溜入，避免了與抗議者們正面相遇。

此後，習近平赴愛荷華州小鎮馬斯卡廷，與二十七年前招待過他的美國房東德沃切克夫婦茶敘。習近平說道：「我記得你們還有個可愛的女兒，她問我很多好奇的問題，比如你們有沒有看過美國電影呀，當我說我看過《獵鹿人》、《上尉的女兒》、《教父》後，她感到非常詫異。」

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好萊塢電影《教父》是習近平的政治教材，這部電影對他的影響力不亞於《資治通鑑》和《毛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教父》不可能在中國的戲院裡公映，習近平應該是在高幹子弟圈子裡看到「特供片」，從此念念不忘。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宣佈設置權力熏天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此舉也許是受到《教父》的啟發，《紐約時報》評論說：「習近平曾承認自己看過《教父》這部電影，他證明了他從電影的一個主題中精明學來的東西：在一個男人的秘密小圈子裡集中與運用權力的藝術。」

一九七二年問世的電影《教父》，憑藉恢弘的結構與精湛的鏡頭語言，榮獲第四十五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及最佳改編劇本三大

獎項，成為電影史上不朽的傳奇。導演科波拉將紐約黑手黨柯里昂家族代際傳承的故事拍攝得動人心魄：紐約五大黑勢力集團之一柯里昂家族採用多種極端手段，實現了在美國黑勢力團體中的獨尊地位。在這場鬥爭中，有宴席上的運籌帷幄、決策千里；有街頭上真槍實彈的追逐和射擊；有欲擒故縱的計謀；有單刀直入的對決……人性幽暗，權力如春藥；生命卑微，殺戮如便飯。黑手黨如此，共產黨亦如此。

「習近平主義」呼之欲出

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黨魁習近平自然是中國的教父，比起那個紐約黑幫的教父來，無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控制之人口與資源，也不知擴大了多少倍。我從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進入軍機處、成為接班人的那個時刻，便開始了對他作觀察、分析和評論。

習近平執政以來，「習近平主義」已經隱然成形。一切熱愛自由、關注中國問題的人士，都不能對此視而不見。在《中國教父習近平》中，我從五個面向論述了「習近平主義」的特質：

第一章《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指出，習近平「中國夢」的「基本色」是「教父夢」：既實現國家富強，又保持一黨長期排他性執政，在中共建黨一百年時，畫一個從毛到習的完美圓圈。由此，習與毛並肩而立。

但是，此夢不可能實現。低人權、高污染和高能耗的「中國模式」已經無以為繼，畸形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習近平不可能安然度過他的十年任期。

第二章《南柯一夢：論法西斯之迷狂》指出，習近平執政以來，法西斯之路初露端倪：經濟上加強國企尤其是央企的壟斷地位，意識形態上變守勢為攻勢（敢於「亮劍」），內政上變本加厲地暴力「維穩」，

軍事上高速提升軍費（以「強軍」為「強國」之先聲），外交上拋棄鄧小平「韬光養晦」之遺訓而走向對外擴張。

然而，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和日本嘗試過的法西斯主義霸權夢，早已灰飛煙滅。在此覆轍之上，習近平能夠帶領中國締造「輕舟已過萬重山」、「帝國霸業萬代傳」的奇跡嗎？

第三章《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指出，習近平「在肉身上是習仲勳的兒子，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這一結論是我最早提出來的，逐漸被很多中國問題觀察家接受。習近平「打通兩個三十年」的設想，即「以毛為父，以鄧為師」，如學者李偉東所說：「用如何避免垮臺的視角總結蘇聯亡黨教訓，用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領導人道德感召力來整頓執政黨團隊，用威權主義的反腐來重拾民心，用壓制輿論、重占『思想陣地』來奪回話語權。」

但是，習近平的這一狂想不可能實現。今天中國真正的毛派寥寥無幾，口頭上的毛派，實踐中都過著「走資派」的生活，習近平也是如此——彭麗媛不就隨身帶著新款的蘋果手機嗎？所以，即便習高舉毛旗，也無法忽悠互聯網時代世事洞明的民眾；而若不實現「非毛」化，中國就邁不出民主憲政的關鍵一步。

第四章《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指出，從中樞到地方，整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都進入一種香港學者周廉所說的「裝睡」狀態，或者中國學者溫克堅所說的「腦死亡」狀態。中央欺騙地方，地方欺騙中央，執政黨對人民實行「訓政」，人民則假裝向執政黨效忠。

習近平作親民秀，講動聽話，並引用毛的名言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以此麻醉民眾。然而，就連習近平的女兒也在美國念書，習近平根本就是半個「裸官」，最好的種子都撒播在大洋彼岸，何來「三個自信」？中國民眾怎麼會相信這個裝睡的人呢？

第五章《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指出，習近平上臺後，拼命集權，軍國主義和新權威主義是其左右兩翼，用智囊王滬寧的話來說就

是：「沒有集中的權力，或是中央權力減弱，國家就會四分五裂，陷入混亂。強大的中央集權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以較低代價實現穩定增長的一個基本保證。」習近平廢除了「集體總統制」，儼然就是獨斷專行的「毛二世」。

然而，火山終究會爆發，黃河終究會決堤，習近平的命運，如果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參照系，類似于隋煬帝、崇禎皇帝、晚清攝政王載灃；如果在世界範疇內尋找參照系，則類似於納粹德國的希特勒、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伊拉克的薩達姆和利比亞的卡紮菲，哪一個有好下場呢？

中港矛盾的實質是獨裁與民主的衝突

我在書中梳理了習近平的人格模式和思維方式的形成過程，習近平的個性特徵與中國專制體制的互相影響，習近平的治國方略和目標及中國未來的變局與走向，希望提供給華人世界的讀者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系。我也願意這本書成為香港讀者認識習近平、認識「中共國」的入門讀物。

二零一零年，當我寫完並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影帝溫家寶》之後，厄運便降臨了。當時手握政法大權的周永康，親自指示秘密警察對我發出「活埋」的威脅，中共政權的「黑幫化」進入了圖窮匕現的階段。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在遭受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和酷刑折磨之後，出走中國。在自由的美國，我重新安置書房，寫完了《中國影帝溫家寶》的續集：《河蟹大帝胡錦濤》。

當時，中共當局的駭客攻擊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先生的電腦，植入病毒；進而通過各種管道對我發出製造「中國版的江南案」的死亡威脅。但是，我難道要繼續在「伏地魔」的陰影下生活嗎？言論自由是我生命中不可剝奪的一部分。二零一二年秋，我按照原來的計畫，在香港由晨鐘書局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與合作多年的姚文田先生一起編輯我的成名作《火與冰》，這本十五年前在中國出版的雜文集，曾經影響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當年，這本書被刪改得傷痕累累，我希望有一本未刪節版在出版自由的香港問世。同時，我們也在討論下一本《中國教父習近平》的出版。就在《火與冰》的書稿完成三校、即將送入印刷廠之際，我突然聯繫不上姚先生了。然後，我收到了姚太太的來信，她說，姚先生十月底在內地出事，失去自由。再後來，我知道了姚先生在深圳被中國當局誘捕的消息。七十三歲的姚先生，患有心臟病，在被關押期間多次暈倒。

姚文田先生的被捕，與香港電視牌照事件和《明報》撤換總編輯一樣，是中共當局對香港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社自由的嚴重威脅。每一個敢於說真話的香港媒體人和出版人，倘若赴內地探親訪友，都有可能遭遇到姚文田的命運。達摩克利斯懸劍隨時都有可能落下來，你能假裝它不存在嗎？

然而，我不能放棄。即便面臨死亡恐嚇，我仍然繼續修改書稿，重新尋找出版社。《中國教父習近平》的寫作和出版，經歷了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艱難過程，我能夠體會到當年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的決絕心態。

二零零八年，我訪問香港的時候，詢問香港朋友，港獨是否成為一種思潮？有多少人支持港獨？朋友告訴我，港獨是一種非常邊緣的思潮，只有寥寥無幾的香港人支持。沒有想到，短短五年之後，中港矛盾針尖對麥芒，香港本土意識驚濤拍岸、風起雲湧，港獨成為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許多港人認同和嚮往的、未來香港的選項之一。從佔領中環到衝擊解放軍軍營，一向溫文爾雅、政治冷感的港人，為何如此熱血沸騰、奮不顧身？

這跟習近平鐵腕治港的政策息息相關。習近平的對外政策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來更加咄咄逼人，對香港是一副君臨天下的派頭，連最後一道面紗也扯下了。習近平本人不是由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即便在共產

黨內的、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他也曾經叨陪末座，因此對選舉畏之如虎。他又怎麼能容忍香港民眾自己選舉特首呢？特首只能由他來任命，而不能由港人自己選擇。習近平不能讓香港的民主成為內地的榜樣，他決意讓香港變得跟萬馬齊喑的內地一模一樣。

所以，中港矛盾不是內地人與香港人的矛盾，而是獨裁與民主的矛盾。習近平命令中聯辦的嘍囉發出在香港實施緊急狀態的威脅，宛如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人民日報》發表殺氣騰騰的《四二七社論》。此時此刻，港人何去何從？是忍辱偷生、甘做奴隸，還是奮起反抗、奔向自由？

但願《中國教父習近平》是「獨裁者系列」之「終結篇」

從習近平的言談舉止、行事為人可以看出，中共極權制度對人的智性和良心造成了多大的戕害。習近平被恐懼所吞噬，同時又是更大的恐懼的製造者。他本已病入膏肓，卻諱疾忌醫，甚至殺害良醫；他不願意聽到噩耗，便下令割掉信使的舌頭。

因報導中共最高層的家族貪腐（包括習家），《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路透社等國際媒體的中文網站先後被中共封鎖，《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的二十多名駐華記者的簽證不獲延期。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三度獲得普利策獎的湯瑪斯·L·弗里德曼，憤而發表一封致習近平的公開信，信中直接譴責「您的一些同事及其子女胃口巨大的貪婪之心」，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紐約時報》和彭博社對此類事件的曝光極大地幫助了您的領導工作。這是心臟病發作前的一種警告。縱觀歷史，中國政權滅亡的頭號原因就是貪婪與腐敗。」若習近平一意孤行，弗里德曼亦發出警告：「這還將迫使我們驅逐中國的記者。你們既然要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也不會讓你們享受我們的開放。」最終，習近平退步了，給那些他不喜歡的外國記者頒發了證件和

簽證。不是因為他害怕弗里德曼的文章，而是因為他還沒有做好向全世界攤牌的準備。

作為一名中國知識份子，我更責無旁貸地，要像弗里德曼那樣向大獨裁者習近平發出「當頭棒喝」。當年，自稱「萬王之王」的利比亞獨裁者卡紮菲，在接受了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之後，後悔地說，「任何讀過她寫我的文字的人，都會降低對我的評價」。這也是我的志向所在：揭開皇帝的新裝的秘密，讓每個獨裁者都醜態畢露。習近平的獠牙既已露出，我看到了，就當發出示警的吶喊。為了說真話，我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險些失去生命，並長久地告別故土。但是，我無怨無悔，我更堅信：真話必須大聲說出來，否則它無法對抗和戳破謊言。

我更期盼，《中國教父習近平》是我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之「終結篇」。我對黑暗的詛咒將劃上一個句號，而我對光明的呼喚剛剛開始。

此刻，我的耳邊想起了黃家駒《光輝歲月》那激動人心的歌聲，這首歌不僅是唱給曼德拉的，也是唱給姚文田、程翔、劉曉波、李旺陽、丁子霖、司徒華……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香港人和中國人的：「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經過彷徨的掙扎，自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這歌聲必將響徹中國大地，這歌聲就是共產黨和習近平的喪鐘。

2014年1月21日

美國 弗吉尼亞

家族 知青



■ 父親習仲勳（1913-2002），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為周恩來所倚重。習與齊心（左）的四子女 50 年代之全家合影，右下習近平。



■ 習仲勳 1962 年在『小說反黨』案中被誣陷，文革中被殘酷批鬥，1978 年獲平反。



■ 習近平是習家二代中，唯一從政者，具有追求權力的慾望，也得到父親的力捧。攝於七十年代末。



■ 習仲勳復出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倡建特區，不滿開槍鎮壓六四學運，晚年住深圳。習家子女多有『海外關係』，經商而富有。



■ 習近平是幹部子弟中，下鄉當知青努力改造思想的樣板。陝北農村熬了七年，1975年10月與歡送他入讀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的知青朋友合影（前排中習近平）。



■ 習近平當知青時居住過的窯洞，當地政府計劃裝修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權力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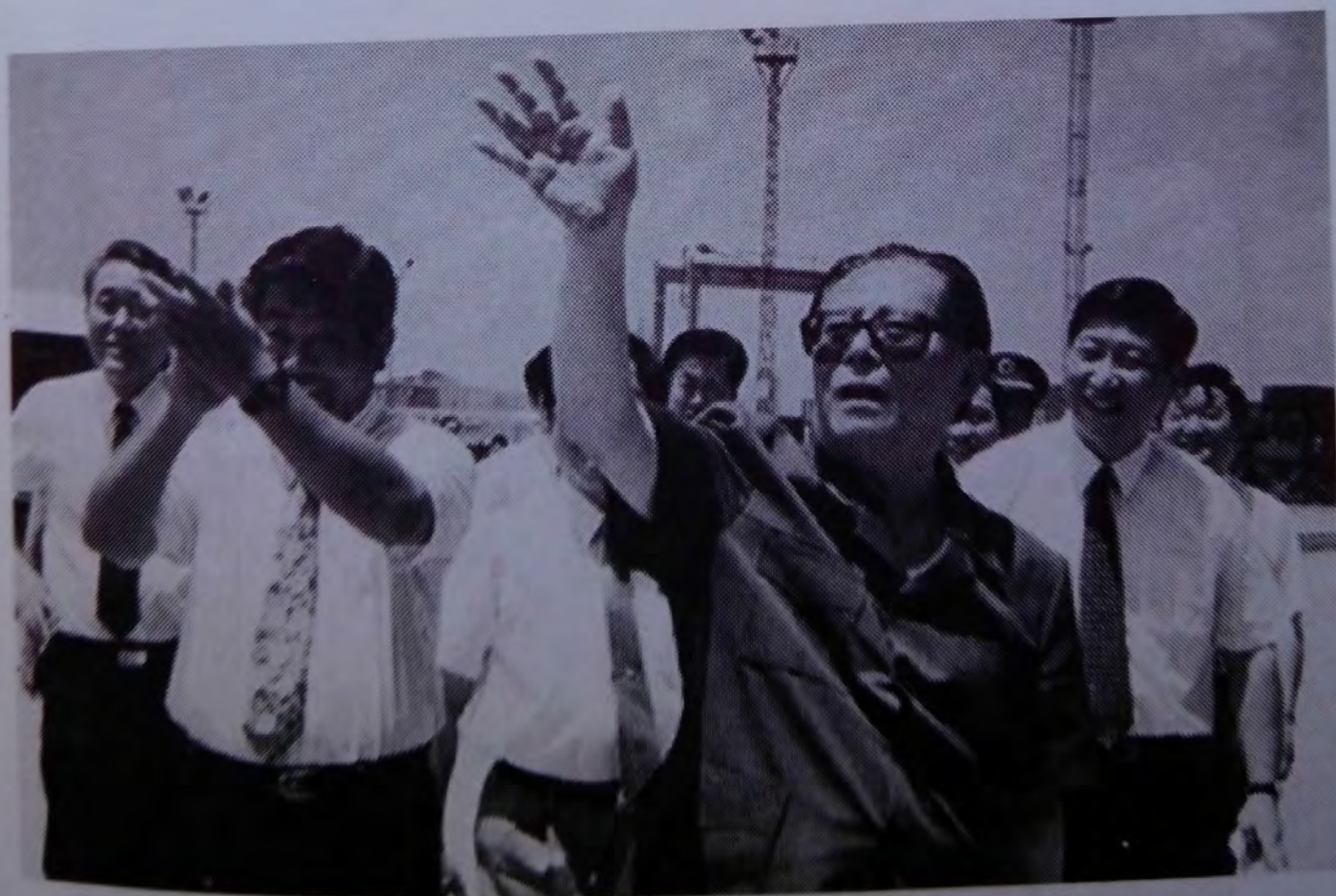
■ 1982年習近平踏上中共官宦之路，下基層，任河北正定縣副書記，83年任書記（右），留下扛鋤勞動的鏡頭（左）。



■ 1985年32歲習近平調升到廈門市任副市長，從內陸到了沿海，出國到西方考察，打掃土氣。邁出官途一大步。



■ 習近平在福建省當官 17 年。1988 年調寧德任地委書記，1990 年升福州市委書記，1993 年重訪陝北當知青時的梁家河窯洞留影（右三）



■ 江澤民是習近平陞官的支持者。1994 年江視察福州馬尾集裝箱碼頭，由福建省委書記栗戰書（左）和習近平（右）陪同。



■ 2002 年習近平從福建遠華案全身而退，調任浙江省委書記、代省長。進入獨當一面管治一個大省的層級。和江澤民並排到祖安千島湖有機漁場視察。



■ 2003 年主政浙江的習近平，為浙江育英教育集團大學生簽名。



■ 習近平為準備上京高就，拓展公關，和一群太子黨合影。前排中陳元，左3 彭麗媛，二排右2 王岐山，右3 習近平，後排右1 劉源。



■ 江澤民系的力挺，是習近平接班的重要支柱。習在江面前，極盡晚輩之卑躬。



■ 2010年9月，上海世博會舉行時，習近平已是國家副主席的儲君身份，駕臨上海，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右），參觀新科技產品的「酷照」。



■ 2007年調上海市委書記，不足半年，即在中共十七大進入政治局常委。和上海市長韓正（左2）一起視察上海長江大橋。



■ 習近平在權力之路上攀爬 30 年，終於在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當上總書記，成為 13 億中國人的統治者。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形容習近平如皇帝般黃袍加身。



■ 習近平帶領新科七常委在十八大上第一次露面。



■ 習近平在2013年人大會上，成為國家主席，大權獨攬，凌駕於黨國之上。



■ 習近平喜歡美國描寫黑社會的電影《教父》（右），如今，他成了中國的教父。

毛的 傳人



■中國民間掀起對習近平的偶像崇拜，宛如文革重現。



■習近平上臺伊始，大捧毛皇帝，率領全體政治局委員拜祀毛堂毛屍。

抓槍桿子



■ 習近平上臺高調鼓吹強軍備戰的槍桿子主義，視察三軍，大抓軍權。



■ 『六四』屠殺之後，軍中歌唱家彭麗媛慰問戒嚴部隊。



■ 習近平深入女兵宿舍。



■上任軍委主席一年，多次視察檢閱部隊。大樹軍威。



■在東海領土領空之爭時，習近平特地登上遼寧號航母閱兵。習近平重視海軍，有成為海上霸權之野心。

維穩



■ 習近平步步為營剷除周永康（左）的政法系、石油幫。但貪腐無法根除。



■ 薄熙來案發之前，習近平視察重慶。與薄熙來（中）、王立軍談笑。

劉曉波妻子劉霞 致習近平的公開信

習近平主席：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劉霞。自2010年10月起，我就失去了全部的人身自由，被軟禁在家中至今。沒有人告訴我軟禁我的理由。我想來想去，可能在這個國家，我做為劉曉波的妻子就是一種「罪」吧。

2013年6月9日，對我弟弟劉暉的判決結果，我認為是完全不公正的。我質疑司法機關乃至整個公權力系統是否在正常地行使權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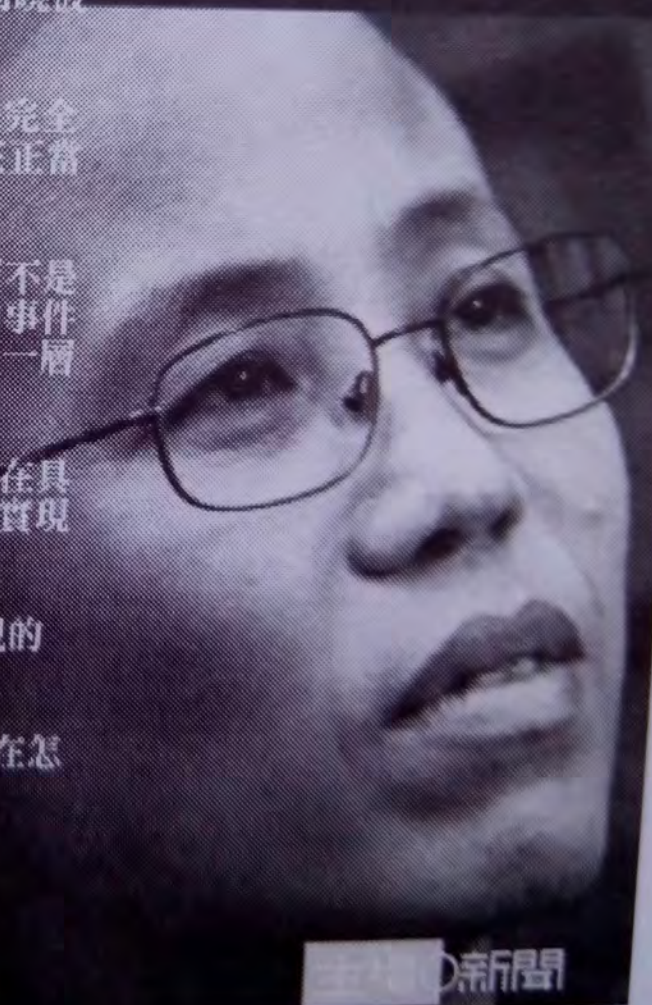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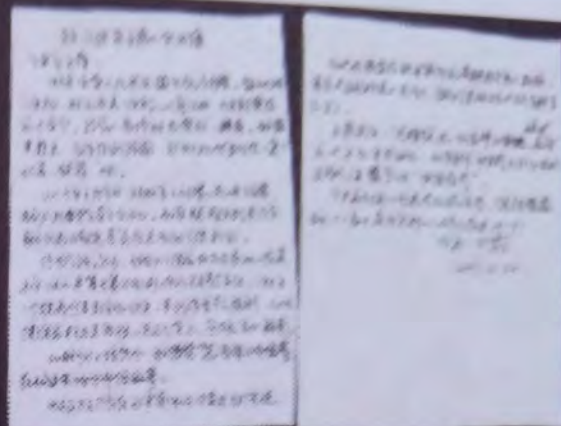
在當今法治中，我們從國家權力中看到的應是正義，而不是基於暴力而形成的無情鎮壓；任何一個抹殺個體權利的事件，都可能導致悲劇，從而使國家權力正當性的光環塗上一層暗淡的陰影。

刑事正義只有在具體案件中才真正獲體現，我無法想像在具體案件中漠視被告人權利，甚至無視被告人權利，能夠實現我們所期待的正義。

主席先生，您提出的中國夢，是要通過每一個公民來實現的，我期待中國夢不要讓我們這些個體變成「中國噩夢」。

今天是中國的傳統節日端午節，您能想像我們一家人是在怎樣的心情下度過的嗎？

公民劉霞
2013.6.12



主新聞

■ 關押劉曉波軟禁劉霞，這樣的例行逆施，習近平沒有絲毫鬆動。
被非法軟禁三年多的劉霞給習近平的公開信。

香港



■ 習近平擺出一幅正襟歪坐的姿態見香港特首。



■ 習近平會見國民黨兩位榮譽主席連戰（左）
（1936-）吳伯雄（下）
（1939-）國共再度握手言歡。





■ 習近平以副主席身份訪美，重訪當年做客過的美國家庭。



■ 習近平在訪問英國表演踢足球。



■和俄羅斯強人普京套近乎，有意聯俄抗美。



■習近平延續30年的中美交往，2013年6月訪問中美洲後，特地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和奧巴馬總統會晤。



■中國耗巨資推廣孔子學院，污染世界，已引起許多國家反感。



■中國勢力滲入中亞，獨裁國家聯盟隱然成形。

親民秀



■毛澤東有過類似的鏡頭，農村視察，習近平有樣學樣。



■習近平在慶豐包子鋪吃包子，作秀成功，轟動全國。

暴力污染



■ 2013 年 11 月天安門爆炸事件標誌著暴力維穩政策的失敗。



■ 霧霾籠罩中國大地成為世界奇觀。習近平有何對策？

明報

明報前總編輯 劉進圖遇襲受傷

主場新聞



■ 2014年2月26日，解除職務風波未平的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暴徒砍殺6刀，送醫脫險。激起香港維護新聞自由示威熱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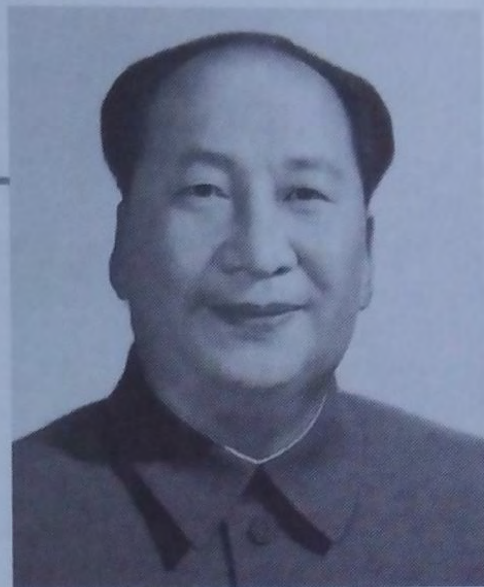
■ 中共大力维稳，恐怖案件仍此起彼伏。2014年3月1日夜晚，十多名来自新疆的暴徒在昆明火车站大兜杀，33死，百余人伤。全国震驚。



■ 習近平突破中共傳統，打出靚麗的「第一夫人」牌。



■ 新華社拍習近平與夫人在美洲聖何塞訪問，二人呆坐照片。



第一章 痴人說夢： 論「中國夢」之難圓

魔教換教主，屁民難翻身

歷史擺錘把他托到了最高峰，也把他拋入了最低谷。一味相信暴力威力的人祇會犯下一樁又一樁的罪行。獨裁者用他的「榮譽、智慧、遠見、受尊敬」搭起的布景遲早會倒塌。

——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屁民」是個不雅的詞語，卻比任何詞語都更準確地描述出中國人的生存現狀：這個國家沒有公民，沒有人民；魔教當道，你連個屁都不是。

中共十八大宛如魔教的武林大會，延期舉行，分贓完畢，波瀾不驚，「勝利閉幕」。魔教換了教主，以及左右護法、四大長老，七個小矮人依次登場。

習近平當然高票當選。比起一九九七年中共的十五大來，十五年後的習近平未必就脫胎換骨了，但此次他獲得的選票已今非昔比。一九九七年，時年四十四歲、擔任福建省省長、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首度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結果，在按照得票數高低公佈的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習近平在一百五十一人中排名倒數第一。有內線爆料說，在這一次選舉中，習近平實際上並未當選，但當時的領導班子已將他內定為接班人中的一員，臨時決定增加應選席次，硬是讓習近平進入當選名單。那麼，即便以中共僅有的一點「黨內民主」而論，習近平的上位亦「名不正、言不順」。

為什麼黨內大佬們會選中知名度不高、能力平庸的習近平呢？日本

《產經新聞》駐華記者矢板明夫在《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一書中，一語道破天機：「太子黨之間最大的一個共通點就是，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共產黨政權垮臺的政治改革，他們的政治立場也都趨於保守。事實上，太子黨的這一特性，正是習近平被推上胡錦濤接班人位置的重大原因。」換言之，共產黨元老們之所以放心交班給習近平，習近平的才能高下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我們的孩子」。習近平的上位，是中共各派系妥協的結果，他不是候選人當中最能幹的人，卻是各方都能勉強接受的人，故而出線成為黑馬。

習近平「無縫接軌，沐猴而冠」

自從在十七大上被確認為接班人之後，僅僅在政治局操練五年，習近平便順利接班。從二零一二年年底之中共十八大，到二零一三年年初之「兩會」，習近平先後從胡錦濤手上接過黨、政、軍「三位一體」之全權。胡錦濤交權不是因為「高風亮節」，而是因為醜聞纏身，焦頭爛額，不得不退。西方媒體評論，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相比，習近平是「無縫接軌，快速上位」。

江澤民在「六四」屠殺之後被上調北京，取代被罷黜的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江本無太大能耐，以為上海市委書記算是仕途到頭，從沒想過君臨天下的滋味，哪知晚年居然「范進中舉」。鄧小平起初並不屬意江澤民，但因自己挑選的兩個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落馬，只得勉強接受陳雲、李先念等元老欣賞的江澤民。

上位之初，迫於「六四」屠殺之後的肅殺氛圍和左派之淫威，江澤民在經濟上附和胡耀邦主持的「治理整頓」，導致市場蕭條、米珠薪桂。鄧小平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甚至中國整個跌回毛時代，遂打起精神，南巡廣東，發起「思想北伐」。其間，鄧發出一句狠話，「誰不改革就讓誰下臺」，鋒芒直指江。江澤民恐懼戰兢，趕緊跟隨鄧小平，



號召全民「向錢看」，發展市場經濟，總算避免被換掉的厄運。可見，江上臺三年之後，在元老眼中仍是不名一文之傀儡，隨時會被責令卷起鋪蓋走人。

胡錦濤是鄧小平選中的「隔代」接班人，一九八九年即與江一起升任常委，有了儲君之身份，在軍機處演練。胡在此位置上如履薄冰，度日如年。江湖兩人，性情及履歷迥異，不會有共同語言，更不會成為心心相印的朋友。江長期在最富饒的上海任職，有「上海小開」之派頭，看不起胡錦濤這個來自邊陲的鄉巴佬。但是，江又無權將這個鄧親自指定的儲君廢掉，進而自行指定接班人（如曾慶紅）。於是，江只好肆意折磨胡，對胡頤指氣使；胡則曲意奉承、逆來順受。

在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上，胡被正式「扶正」。江執政時，以黨中央之「核心」自居；胡上臺後，只能稱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不能加冕為「核心」。江不顧中共內部之「潛規則」，在卸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後，繼續擔任軍委主席兩年之久，使胡錦濤又多當了兩年「兒皇帝」。那段時間，天有二日，國有二君，亂象叢生。胡的接班「路漫漫其修遠兮」，陪江唱了十五年「婆媳二人轉」。長期任共青團幹部的胡錦濤，最大的功夫就是隱忍。履歷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胡執政後遂無所作為，空轉十年。

兩屆任滿，胡錦濤本想繼續把持部分權力，甚至像江澤民那樣「垂簾聽政」，卻因大秘令計劃與周永康結盟，肆意弄權乃至企圖篡權，激起黨內其他派系的強烈反彈，胡不得不以「裸退」謝罪，徹底退出政壇。

這樣，由於敵人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習近平白白撿了便宜，在接班之後幾個月，就成為鄧小平以後中共最強勢的領導人。那些退休的元老們，雖然還能對政局發揮一些影響，卻沒有一個人可以盛氣凌人、指手畫腳了。習近平心滿意得地將權力的魔戒戴在粗粗的手指上，一夜之間，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如聖經所說，性情乖張的君主，連臉上都充滿

暴戾之氣。一個平庸者佔據強勢位置，就好像公牛闖進瓷器店，能不胡作非為嗎？

七常委宛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作為「領頭羊」的習近平是庸庸碌碌之輩，圍繞在習周圍的護法、長老們，個個都劣跡斑斑、眼高手低。他們的才智、學識、胸襟和品性，並不足以處理中國目前嚴峻的社會危機。

習家班的第二號人物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李擁有北大法學博士的顯赫學歷，就學識而言，在七常委中首屈一指。李長期在團中央任職，經過體制的打磨，青年時代的理想與激情蕩然無存，早已蛻變成麻木不仁、見風使舵的技術官僚。李曾被外放到地方歷練，主政人口上億的中原大省河南，卻對愛滋病氾濫成災的情形視若不見。衛生部前官員、中國健康教育所原所長陳秉中，多次實名舉報李克強，因掩蓋疫情導致至少三十萬人感染愛滋病及至少十萬人死亡，河南產生數百至上千個愛滋病村，幾十萬愛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屬因得不到國家賠償，加之投訴無門，在死亡線上掙扎。然而，這樣的舉報只能石沉大海，舉報人還受到國保警察的死亡威脅。後來，李克強調任工業大省遼寧，亦是政績平平、敷衍塞責而已。

第三號人物是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張畢業於朝鮮金日成大學經濟系，是七常委中惟一一名「留學生」。然而，眾所周知，金氏家族統治的北韓，實行計劃經濟，哀鴻遍野、艱難竭蹶，在那裡能學到什麼樣的「經濟學」呢？張在地方上任職時，聲稱「一定要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打壓民營企業和私有經濟不遺餘力，顯然是他的「朝鮮經驗」在作祟。當薄熙來垮臺後，張奉命赴重慶處理善後事宜，大力清除薄的殘餘勢力，卻從不否定「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拒絕平反薄當政時期製造的迫害民營企業的冤假錯案。這樣的人物，倒是可以「借給」金正恩當副手。

政協主席俞正聲來自一個從晚清起就十分顯赫的世家，其家族中有多人在清王朝、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中任重要的職務，而被共產黨政權迫害致死者亦不在少數。其父黃敬（俞啟威）是江青的前夫，在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任上受毛澤東當眾斥責，肝膽俱裂而亡；其親兄弟俞強聲為叛逃的國安高官，至今生死未卜。俞正聲卻對中共的邪惡和殘忍毫無反省，在其任職湖北和上海期間，打壓維權人士從不手軟。上海靜安區特大火災致使五十八人身亡，俞正聲阻止深入調查，打壓民眾自發的悼念活動。馮正虎、鄭恩寵等人長期遭到上海國保警察的非法監控和軟禁，俞正聲縱容此類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惡行上演。

第五號人物劉雲山，從內蒙古一名基層宣傳幹部一步步爬升到黨國領導人的高位上。劉在胡錦濤時代掌管宣傳部，牢牢把持「筆桿子」，鉗制輿論、整肅媒體。其主持中宣部的十年，是「文革」之後文字獄的高發期。師濤案、《南方都市報》案、劉曉波案、朱虞夫案……因言治罪、積非成是。北大新聞學院教授焦國標憤而撰文《討伐中宣部》，之後北大卻奉中宣部之命將其解聘。另一方面，劉雲山家族在傳媒界貪得無厭、驕奢淫逸、大發橫財。習近平無視劉的種種惡行，卻樂得有一條忠實走狗，讓這頭前朝惡犬替自己看家護院。劉雲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老祖宗不能丟，大道理還得講。」他說的「老祖宗」就是馬列主義。而網民則評論說：「我們是中國人，馬列不是我們老祖宗。」

王岐山是「半個太子黨」（「女婿黨」）出身，個性張揚、能說會道，是「七人幫」中最具才幹的佼佼者。八十年代，王岐山曾躋身「改革四君子」之列，擔任「走向未來叢書」編委。「六四」之後，王迅速轉向，在體制內得以繼續攀升。「走向未來叢書」主編、思想史學者包遵信，「六四」後一度下獄，病重住院期間，連支付醫藥費都很困難。位居高位的王岐山不聞不問，冷酷無情可見一斑。王長期任職於金融部門，被視為打理經濟的一把好手，也被西方認為是一個可以打交道的人物。在新一屆常委會內，王卻被委以主管中紀委、掀起反腐風暴之重任。然而，

在舊體制內，王縱有三頭六臂，亦無法完成「打老虎」之大業

七常委中排名最末的張高麗，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充作李克強經濟改革的副手。但是，張並非經濟領域的行家裡手，其能力有限、視野狹窄。張在任職天津期間，號稱要將於家堡打造成「中國的曼哈頓」，最後卻虎頭蛇尾、不了了之，天津與北京、上海的差距更加拉大。對這一「中看不中用」的「政績工程」和「面子工程」，《紐約時報》評論說：「於家堡工程清楚證明，張高麗支持政府引導的大型投資項目，這種項目非常符合那些雄心勃勃、急於在現行權力結構中得到擢升的中共官員的需要。」後來，在擔任山東省委書記期間，張縱容臨沂地方官員執行暴力計生政策，成為陳光誠事件的導火索。

「情智雙殘」的紅衛兵一代將把中國帶向何處？

這七個「魔教中樞」的決策者，無一為良善之輩，無一人對民主憲政有基本認識和認同。在中共黨內，「好人」或「改革者」早已被逆向淘汰。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出現，只能算是「撥亂反正」時期的「異數」；而今の共產黨體制，已然杜絕了此種「例外」出現——惟有臉皮足夠厚、心腸足夠黑的人，才能「過五關、斬六將」，「生入中南海，死入八寶山」。

在心智和人格上，這是一群殘缺和扭曲的人。在青年時代，他們的思維方式已凝固，他們的視野已定格。網友葉恭默在微博上發文說：「一體制內同學問我，為何這幾年的領導越來越噁心了？答：現在從廳局到省部乃至頂層，正是紅衛兵一代全面掌權的時代。他們這代人，青少年時期智力和人格都沒發育，無論有沒有參與打砸鬥，都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殘酷歲月的烙印，除了鑽營有術和富有感染力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治國齊家，基本都是情智雙殘。」這就是七名新科政治局常委的「共性」，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們從未有過掙扎著脫離或超越那個時



代的念頭。

他們面對的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無可挽救的「衰世」，難怪電影《大明劫》引起那麼多觀眾的共鳴。晚清詩人龔自珍如此描述「衰世」的景象：「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駟，戴澤無才盜。」龔自珍指出，在此類社會，有才華的人遭到迫害，野心家層出不窮，從衰世轉變成亂世，幾乎就在眨眼之間：「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眈然眈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向之倫，聒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這不正是今日中國的寫照嗎？

不能遴選優秀人才，說明現有體制缺乏吸納力。歷史學家許倬雲指出，朝代剛起來的時候，似乎滿地都是人才；朝代結束的時候，人才都不見了。這並不是說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分佈，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國家的管理機構之中。在開國之初，功臣將相來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複雜的。一代、兩代過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紈袴，只知享樂，不會辦事。皇室集團本身是一個非常狹小的團體，皇權本身是不容挑戰的，於是，依附在皇權四周的權貴代表皇權統治整個龐大的國家。這個團體延續的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當外部環境發生改變，新的挑戰出現時，這些新領導人就不能應付了。

沒有人才，只有庸才，他們只能「蕭規曹隨」地維持原有體制。習近平唯一的思想資源，就是毛澤東的統治術。他做的夢，十有八九都是「回延安」，又怎麼可能改旗易幟，融入世界民主大潮？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曾被東方不敗暗算、囚禁的魔教教主任我行，掃除叛徒、重新坐上教主之位後，卻繼續沿用東方不敗實行的舊制度。書中寫道：「令狐沖這時已退到殿口，與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遠，燈光又暗，遠遠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頗為朦朧，心下忽想，坐在這位置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甚分別？」是啊，習近



中國教父習近平

平與毛澤東，越來越讓人分不清了。

在此背景下，即便中共內部已如癌變腫瘤般潰爛，習近平也不會橫刀切腹、刮骨療傷。「黑木崖」的制度不改，教主、護法和長老是誰並不重要。

所以，與其守株待兔地巴望魔教中人良心發現而啟動改革，不如群策群力、眾人拾柴，早日驅趕他們下臺。

——從地域文化看習近平的文化取向和心理結構

即使在他當權的最初時期，即使在他利用人們的錯覺把自己裝扮成真理的衛士時，他已經讓我感到厭惡，就像他當權的最後階段一樣。在他開始在恐怖戲中露出猙獰的牙齒之前，我對他有一種來自直覺的懷疑和憎惡。

——諾曼·馬內阿《論小醜》

一九七五年，在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當了六年半知青的習近平，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到清華大學讀書。離開的那天，全村人排起長隊為他送行。村民孔正富的弟弟多年後回憶說，離開梁家河前，習近平向孔正富贈送了一本毛選。書上還寫有四句話——「暴風雨中見雄鷹，暮色蒼茫看勁松。革命烈火識真金，平凡小事出英雄。」這幾句打上「文革」烙印的、如今讀來甚為可笑的套話和大話，是被毛語言所毒化的語言體系的衍生物。當年的習近平身在醬缸之中，不能免俗，值得同情和諒解。但是，三十多年之後，時空已經發生劇變，習近平的文化取向和心理結構仍然停留在寫這幾句話的那個節點上，並未「與時俱進」，不得不讓人「莫名驚詫」。

習近平多次強調延安是其生命的「原點」。習近平並非出生於陝西，而是出生於北京；值得玩味的是，他在諸多場合自命為陝西人、延安人。二零零八年「兩會」期間，習近平與陝西代表團座談，激動地說：「我

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培養了我，陝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賀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詩裡所描繪的：我曾經幾回回夢裡回延安。我期盼著在一個合適的時候，能去陝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區人民學習，向陝西的各級幹部學習。」這番話既是他的政治表態，也是他的心聲——延安的歷史積澱與政治傳統，是他可資利用的思想資源。有人說，這是習表明自己「不忘本」，這個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番話更透露出，習骨子裡只有「黃色文明」和「紅色文明」，而沒有「蔚藍色文明」——儘管他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福建、浙江、上海等多個省市任職十多年，對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兩重天」有切身體認，但其心靈底色並未被「染藍」。他對流動、變化、充滿挑戰的海洋心存疑惑與排斥，而對凝固、沉穩、亙古如一的內陸卻有「如家」的感覺。

延安是「黃色文明」和「紅色文明」的交匯點

當年，少年習近平從首都北京來到延安梁家河村時，被安排住進一間半山上的窯洞，窯洞中僅有土炕、灶台等物，吃的是玉米團子，點的是煤油燈，習近平跟同學哀歎：「你們有沒有感覺像山頂洞人啊？」這句話生動地描述出西部農村的貧瘠與困苦，更表明中共的農業政策全然失敗。

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諾，收攬了千百年來渴望擁有土地的農民的心，在內戰中打敗了未能實現「耕者有其田」許諾的國民黨。而共產黨一旦奪取政權，對農民的壓榨和盤剝卻更為殘暴。經過若干政治運動，尤其是「大躍進」，農村可謂「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原本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基礎薄弱的西北地區，更是雪上加霜，數千年文明的積累化為烏有，被打回習近平所說的「山頂洞人時代」。看看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就清清楚楚了。那時的習近平還沒有學會謹言慎行，敢跟同學開這種「反動」玩笑，一不小心可就「禍從口出」了。

三十多年後，日本《產經新聞》記者矢板明夫為探尋習近平的崛起之路，親身到習近平當年下鄉的梁家河村採訪，他寫道：「玉米田裡可以見到牛隻的蹤影。觸目所及，盡是和經濟發展或機械化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中國農村景色。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已經超越日本，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內陸的陝西、甘肅等省份，還是有許多像這樣發展落後的地方。」可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並沒有為西部帶來進步和富裕，當地農民仍然沿用數千年如一日的「人牛共耕」的生產方式，貧困依然是西部地區的首要問題。

黃土和黃河的背後是「黃色文明」。「黃色文明」與「蔚藍色文明」的對立，是作家蘇曉康八十年代末在《河殤》中提出來的一對概念。萬人空巷的電視片《河殤》，是當時改革派知識份子的一份文化宣言。在《河殤》激情澎湃的解說詞中，「黃色文明」代表著農業文明，「蔚藍色文明」代表著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黃色文明」代表著內陸文明，「蔚藍色文明」代表著海洋文明；「黃色文明」代表著固步自封、閉關鎖國的心態，「蔚藍色文明」代表著開拓進取、兼收並蓄的精神；「黃色文明」代表著集體主義與專制政治，「蔚藍色文明」代表著個人主義與民主政治。直到今天，我認為這對概念仍然是對東西方文明差異的最為精準的概括。

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那些居住在遼闊大陸中央的人，接觸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機會很少，這是俄國和中國最後走向專制的重要原因。反之，島國居民更容易擁抱海洋文化，「促進文明的進步一向都是從航海民族開始的，像腓尼基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義大利人、荷蘭人、英國人以及美國人」。蘇曉康由黃河談到黃土高原，進而勾勒出中國人「追求和諧安寧、講究理性秩序、重視人倫傳統但卻封閉、保守的心靈結構」。這段話恰恰是對習近平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最佳描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彭麗媛跟習近平「相親」，第一次見面就嫌習近平「土」；而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在回憶文章中說，她在中南海初次露

面時，人們都說「這個副總理夫人也太土了」。這裡的「土」，不僅僅是指衣著打扮上的落伍，也不僅僅是指氣質和風度上的欠缺，更是顯示在精神狀態上的守舊與僵化——儘管他們身居高位，仍不是城市人，而是農村人。如同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筆下毛身上的那些農民的生活習慣——如不刷牙、不洗澡、隨地大小便等，即便成了人神不分的「紅太陽」，依然終身不變。這種由農業文明和專制文化浸潤而成的狹隘、猥瑣、自私、貪婪的人格心態，為歷代中共領導人所共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就是「農民進城」的過程。農民進了城，生活環境變了，骨子裡仍然是農民。毛澤東終其一生，一直極度敵視象徵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文化的城市文明。習近平對城市文明雖不至仇恨，至少持疏離的態度。

延安不是中國的出路，延安只是中共的圖騰。延安是「黃色文明」與「紅色文明」之交匯點。在井岡山、瑞金、遵義等共產黨的「革命聖地」的序列中，延安一枝獨秀、備受尊崇——儘管在鄧小平時代經濟發展的浪潮中，位於西部的延安成了「棄嬰」，但在意識形態的排行榜上，其榜首地位無可爭議。既然延安是共產黨脫胎換骨、起死回生的「龍興之地」，習近平當然要利用知青時代在延安的生活經歷強化其「紅色血統」。為延安精神唱讚歌，他向來是見縫插針、「誨人不倦」。

僅舉一例便可證明：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會見赴上海推介「紅色旅遊」的延安黨政代表團一行時說：「我對延安的感情很深，對延安精神的理解也很具體。在延安，我明白了做人一定要有理想和信念，要有進取精神，特別是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對群眾有真感情。延安精神要求我們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實的東西，是很具體的，已經融入了自己的血液當中。」這些話不可輕視為官場的普通應酬，從中可以發現，身為上海這個中國最資本主義化的國際大都市的封疆大吏，習近平在價值取向仍然是「定睛於延安」。



延安精神的核心就是毛主義。毛掌握共產黨最高權力，不是在井岡山、瑞金或遵義，而是在延安。歷史學家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毛在延安如何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有細緻的梳理。毛首先獲得軍隊將領的擁戴，然後建立起密不透風的特務制度和人事組織制度，這才放手發動延安整風，清除異己分子。通過製造「紅色恐怖」的氛圍和水銀瀉地般的洗腦宣傳，終於造成「烈日當空」、全黨擁戴的事實，進而贏得蘇聯老闆斯大林之認可，並最終黃袍加身、南面稱孤。可以說，沒有延安，就沒有毛的崛起；沒有在延安整風中呼風喚雨的經驗，毛在中共建政之後就不可能如法炮製「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

習近平對延安頂禮膜拜，說到底就是對毛主義俯首稱臣。評論家楊光在《評習近平整風》一文中指出，一般人低估了習近平所中之「毛毒」，所以才會對習近平上臺之後一系列向左急轉彎的舉動感到詫異。實際上，以習近平和薄熙來這一代人的教育經歷和人生歷程而論，「在他們相對貧乏的知識與價值構成之中，毛澤東思想大概是唯一結構化、系統化、凝固化的承重基礎，而其它的知識和價值——如果他們有的話，充其量只是東鱗西爪、支離破碎的殘磚斷瓦。除了毛澤東，他們其實什麼也不太懂，什麼也不大信——連別人普遍信奉且視之為底線價值的東西他們也通通不信。」套用毛澤東的話，習、薄等人的知識結構是「學毛為主、兼學別樣」的畸形結構，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綱、其餘都是目」。如此，習以延安人自居的言行就很容易理解了。

極權制度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

習近平緊緊依附於延安及其象徵的政治傳統，除了「政治正確」之精心考量，除了父親是在中共黨內長期備受打壓的「延安本土派」，除了他本人在延安度過六年半苦不堪言的「知青」生涯，除了他的知識結



構和思維方式已定型等原因之外，更是其內心深處的恐懼的驅使所致。習近平缺乏安全感，只能將安全感建立在鞏固與延安之間的紐帶上。

《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在《〈習仲勳傳〉透露「紅二代」成長歷程》一文中披露說：據官方傳記記載，習近平和其他三個兄弟姐妹從很小的時候就寄宿上學，習近平是穿姐姐穿過的衣服和鞋子長大的。「習仲勳家風之嚴，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有點不近人情」，習仲勳的傳記如是說。習仲勳曾告誡一個女兒，「夾著尾巴做人」。經過延安的肅反、整風以及高饒事件的衝擊，習仲勳自己何嘗不是「夾著尾巴做人」？在早期延安根據地的肅反狂潮中，習仲勳險些成為刀下亡魂，連活埋他的坑都挖好了；習仲勳長期與高崗共事，在五十年代初的高饒事件中，他好不容易才平安過關。雖然習仲勳後來升任國務院副總理、成為周恩來的助手，但毛並不信任他，周恩來也未必器重他，最後仍然不能逃避飛來橫禍——被毛親口冠以「利用小說反黨」的罪名隔離審查。

時運不濟的習仲勳很早就成為恐懼的俘虜，他也將恐懼遺傳給每一個家庭成員。「從習近平兄弟姐妹的傳記和回憶錄來判斷，這是一種既慈愛又嚴苛的培養方式，其中還帶有一種徹骨的恐懼，因為在毛氏王朝的統治下，生活永遠也得不到保障。對習家來說，這種恐懼曾經變成現實。」習仲勳遭到整肅之後，「一家人不僅生活艱辛，還忍受著『反黨分子』家屬、『黑幫子女』的精神壓力」，官方傳記如此寫道。

在官方大張旗鼓地紀念習仲勳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了習仲勳夫人、習近平母親齊心撰寫的文章《憶仲勳》，文章透露：一九七二年，齊心給周恩來寫信，要求見習仲勳。在信中提幾點請求：「一，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勳了，請求總理讓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二，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請求解決居住問題；三，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很快作出批復，他們終於見到監護中的習仲勳。「當仲勳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一生堅強的他流下了眼淚，連連說：『這是高興的，這是高興的。』由於多年分離，他分不清哪個



是橋橋哪個是安安，更認不出已經長成小夥子的近平和遠平了。」此一場景，真是人間慘劇。父親被囚，母親下放幹校勞動，九歲之後的習近平過著「無父無母」的生活，心智之殘缺可想而知。

「文革」結束之後，劫後餘生的習仲勳得以複出，輔佐鄧小平、胡耀邦推動改革開放，但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讓他感到鄧跟毛並無本質的差異。「六四」屠殺更讓習仲勳對共產黨體制失望，在與鄧小平等保守派元老發生爭執之後，他淡出了權力核心，晚年在寂寥的心境中，精神再度失常。為了避免其在公共場合作出不合時宜的言行，當局特意安排習仲勳晚年隱居深圳。根據一位熟悉習家的人士透露，一九九零年代末，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喬石代表黨中央去看望習仲勳時，習仲勳突然哭了起來，喊叫「我不是反革命」、「不要逮捕我」——習近平不可能對父親晚年處於崩潰邊緣的精神狀況一無所知。

在極權主義體制下，獨裁統治的秘密是用恐懼轄制人的身體與靈魂。斯大林就是這樣的典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中寫到，斯大林一貫輕視全人類的道德價值，鄙視憐憫心、同情心和慈悲心。同時，斯大林在政治中也沒有為道德的價值找到應有的位置。

斯大林命令貝利亞逮捕了他最親密的助手波斯克列貝舍夫的妻子索洛蒙洛芙娜。不管丈夫如何懇求挽救妻子，斯大林只有一個回答：「這不取決於我，我無能為力。內務人民委員會審理這件事。」當局把這位可憐的婦女、兩個孩子的母親冠以間諜的罪名，關押並折磨了三年之後槍斃了。與此同時，這兩個孩子的父親每天都在斯大林身邊連續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送文件、準備材料、叫人、傳遞領袖給各個部門的命令。斯大林故意以此測試波斯克列貝舍夫是否對他絕對忠誠。

斯大林心理和性格上的畸變，並非獨裁者中的孤例。毛澤東也是如此。毛澤東清洗高崗、彭德懷、羅瑞卿、劉少奇、鄧小平、林彪以及習

仲勳等「老近衛軍」的過程，如同在玩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下一個被清洗的人，往往是清洗上一個人時最積極的打手。少年習近平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卒子——如果他不是躲進黃土高原的窯洞中，說不定早就橫屍北京街頭了。

這就是極權主義之可怕，在此體制之下，每個人都可能是犧牲品，沒有任何人是安全和自由的。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說：「恐怖制度不僅僅是物質的行為，如逮捕、酷刑、處決，而且首先是心理行為。」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年僅九歲的習近平遭遇父親一夜之間從高級幹部變成「人民公敵」的打擊，然後是沒有盡頭的歧視、羞辱和打擊。在血統論的籠罩之下，他不再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而是作為習仲勳的兒子的「狗崽子」。

十六歲時，「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習近平想去陝西富平父親的老家投靠親友，卻遭到所有人的拒絕——在極權體制下，每個社會成員都被原子化，他人就是陌生人，他人就是地獄。所以，「古道熱腸」成為一種極為稀缺的品質。習仲勳一旦倒臺，立即引發「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的連鎖效應。於是，這個少年人不得不獨自面對殘暴而猙獰的世界以及漆黑一片的未來。孤獨、痛苦和挫敗如鋸齒一般，在他心靈中留下難以癒合的創傷。

如今，習近平擁有了與毛澤東近似的地位，卻再也無法驅散少年時代封存於心靈深處的恐懼。恐懼將與之一輩子如影隨形。

從恐懼者到恐懼的制造者

受害者與害人者的轉化，在這個國度如同翻烙餅一樣習以為常。與所有「紅二代」以及「知青」一代相似，習近平是在鬥爭、強烈的階級激情、毫不妥協的處世哲理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在其個性形成的關鍵階段，他完全喪失了最基本的人道素質，而這些素質在他身上本來就十



分稀缺。即便沒有遭到整肅，習近平的父母也是不稱職的——既然父母可以因為工作繁忙，而將孩子們全部送入寄宿學校；那麼，若干年後，作為兒子的習近平，也會拿出「工作繁忙」的藉口，缺席父親的壽辰。但是，所謂「工作」，他們真是在「為人民服務」嗎？

所謂「工作」，不過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極權主義絞肉機上的一顆螺絲釘。由於極權體制的壓抑，由於家庭的劇變，由於教育的缺陷，習近平從少年時代就不知道同情、仁慈和愛為何物，他也絲毫不理解什麼叫善良。他領悟到，在這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鱷魚潭」中，惟有足夠的殘酷、冷血、狡詐，才能倖存下來。而他的父親習仲勳以及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黨內鬥爭的「失敗者」都是不足為訓的——他們所堅持的理念和價值是那麼迂腐可笑。在「成王敗寇」的生存哲學之下，失敗者與崇高、尊貴等名詞無緣。在習近平的語彙裡，在習近平的政治辭典中，充斥著「打擊」、「粉碎」、「消滅」、「根除」、「取締」等一類詞彙，它們貼切地反映出他精神上的重大缺陷。

延安的經歷是習近平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在那時就發誓，再也不能第二次經歷此種「山頂洞人」的生活。既然不能改變毛澤東一手制訂的遊戲規則，就要適應和熟悉「鬥獸場」中的遊戲規則，並竭盡全力成為獲勝的一方。美國心理學家弗蘭克·富里迪在《恐懼》一書中指出，人們的個人經歷決定了他們的想像和恐懼，而當恐懼形成一種主流文化的時候，這個社會就變得不正常了，「恐懼文化使人與人之間變得陌生，助長社會形成一種懷疑的氛圍，使人們不能專心面對社會面臨的各種挑戰」。在不正常的時代長大的習近平，執掌權力之後，立即搖身一變，從卑微的恐懼者成為專橫的恐懼製造者，從悲慘之極的「被吃者」成為洋洋自得的「吃人者」。

在極權體制下，沒有人是全然無辜者。在延安那幾年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大大強化了習近平的反智主義立場。當年，毛澤東在掌握了對知識份子生殺予奪之大權之後，就露出血盆大口，用不堪入目的



粗話謾罵之：「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麼用處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八一九講話」中，習近平也赤裸裸地宣稱，要「嚴肅打擊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無知階層對有知階層始終心懷嫉恨。這個妄圖控制別人的夢的人，哪裡會容許存在獨立思考和言論自由的空間？

毛澤東和習近平都將知識份子當作是對其政權的潛在威脅。據習近平自己的解釋，「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思想防線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很難守住。」這反映了習內心深處真實的恐懼。少年時代的習近平，害怕成為毛澤東暴政的犧牲品；而登基以後的習近平，則害怕紅色江山在他手中喪失。習的恐懼感，折射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新南巡講話」中，折射在令天下大嘩的「九號文件」中，也折射在聲嘶力竭的「八一九講話」之中。對異見的恐懼以及對異見者的仇恨，使習近平「胸有成竹」地發動了一場學者章立凡所說的「網絡反右運動」。

胡錦濤將政權「擊鼓傳花」送到習近平手上，習近平接到之後才發現，傳的不是花，而是「燙手的熱山芋」。面對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批評，面對每年數十萬起群體性抗議，習近平做了一個美夢：「如果北京變成了延安，或者說今天整個的中國都像昔日毛的延安那樣唯唯諾諾、逆來順受，我的統治豈不固若金湯？」這個美夢有可能變成現實嗎？

紅色恐怖勝過其他顏色的恐怖，當年的延安就是紅色恐怖的大舞臺。滴在黃土地上的鮮血，一夜之間就被黃土和黃沙覆蓋了，一點痕跡都不會留下。「既然毛太祖可以這樣做，那麼我為什麼不能呢？」——這是習近平的心裡話。評論家未普在《恐懼者製造恐懼》一文中指出：「習近平當局擔心喪失政權的恐懼，在政治、思想、輿論等各個領域，幾乎無所不在。他們擔心多黨制取代一黨專制；擔心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擔心公民社會成為對抗中共的政治力量；擔心自由主義改變



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擔心新聞自由挑戰黨對媒體的壟斷；擔心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等等。正是這些無所不在的恐懼，導致當局用製造恐懼的手段治國。」習近平的這一心態，也符合漢娜·阿倫特對極權主義者的概括，製造恐懼是極權體制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動力——「根據極權主義的內在法則，他們只能做殺人者或者被害者。極權統治在指導它的臣民的行為時，所需要的只是準備將每一個人同等地歸入殺人者角色和被害者角色。」基於這個原因，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上推出的首要舉措就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他來說，「安全」是第一位的。

在「黃色文明」的轄區內，一切都是黃色，或以黃色為尊。不僅習近平的膚色是黃色，他的精神底色也是黃色。對此，參與過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旅英學者張煒評論說，習近平「回到共產黨駕輕就熟的專制之道，為了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回避制度變革，在危機和挑戰面前目光短淺地、蠅營狗苟地得過且過」。習近平最看重他的「紅色接班人」的地位，放棄了引領中國政治改革的機會，「正是這種自我定位決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傾向」。

然而，當全中國都變成寸草不生的黃土高原，當「不是整風、而是整人」的政治運動將全體中國人裹挾其中，身處風暴眼的習近平，能像毛那樣睥睨天下、舍我其誰嗎？

習近平身邊的智囊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那些共產黨高官迷信的風水大師和氣功大師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最終的答案，習近平正在親自一筆一劃地書寫。

馬戲團必須以小丑為中心嗎？

——對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十個人

在他向饑餓的聽眾發表的長篇大論中，我們看到了馬戲團的未來，這個未來是快樂的奴隸在嚴厲的幼稚園老師揮舞的皮鞭下建成的。小丑在他的馬戲團裡只保留了被催眠的侏儒，他們的任務是為他喝彩，還有一些肌肉發達的巨人，他們組成了他的國家安全系統。

——諾曼·馬內阿《論小丑》

對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國」之「開國元勳」而言，「暴君」的一面強於「小丑」的一面；對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中共黨魁而言，「小丑」的一面則強於「暴君」的一面——而且，「小丑」的成分越來越高：如果說江有七成是小丑，胡有八成是小丑，那麼習則有九成是小丑。

今天的中國是作家冉雲飛所說的「比傻帝國」，這個帝國的統治階層是馬戲團。馬戲團裡面，僅有當主角的小丑是不夠的，在小丑的周圍，還要有一個與之如影隨形的團隊——就像電影開幕的時候，有一張長長的演職員工名錄一樣。另外，無論防範如何嚴密，在觀眾席上一定會出現喝倒彩的「不服從者」。

作為小丑的習近平，有親人、同僚、下屬，還有「敵人」。在這四類人物當中，究竟哪些人對習近平最具影響力呢？

——齊橋橋

一九六二年，習仲勳被毛澤東整肅時，習近平年僅九歲。此後，習仲勳失去自由十六年，直到習近平二十五歲，一家人才得以團聚，父子倆已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很難說思想開明的習仲勳能對兒子有多大影響。父母對習近平的影響有限，反倒是姐姐齊橋橋與弟弟關係親密，在其生命歷程中長期扮演亦父亦母的角色。

齊橋橋支持改革開放，曾撰文回憶「文革」之後父親任職廣東省委書記期間推動成立特區的功績。在齊橋橋筆下，劫後餘生的習仲勳遙望香港的萬家燈火，而自己這邊漆黑一片，不禁扼腕長歎；看到逃港失敗被抓的民眾個個衣不蔽體、骨瘦如柴，更是潸然淚下。習仲勳當年未能進入權力最核心，對推動全國範圍的改革有心無力；那麼，齊橋橋如今會勸說「弟弟，你大膽地往前走」嗎？

習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由美國彭博新聞社蒐集的資料表明，齊橋橋及其夫婿鄧家貴、女兒張燕南，坐擁巨額財富，包括在總資產達三點七六億美元的在眾多公司的投資、在一家資產十七點三億美元的稀土公司百分之十八的間接股權、在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兩千多萬美元的股票以及在香港的豪宅。過去二十年，齊橋橋、鄧家貴、張燕南的名字，以股東、董事或法人代表的名義，出現在中國和香港至少二十五家公司申報的文件中。據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記者同盟調查公佈的一份文件顯示，習近平的姐夫、齊橋橋的丈夫鄧家貴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了一家地產公司，擁有其巨額股份。要證明這些財富合法或非法都很困難，那是一個不為一般人所知的隱秘的地下王國。研究中國政治的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說：「如果你是中國某個要人的手足，人家會認為你可能是潛在的權力代理人，拼命巴結你，希望與權貴搭上關係。」

從目前海外媒體披露的數字來看，習氏家族擁有的財富比不上溫家

實家族。但彭博社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報導，讓習家標榜的清廉不再被人們所相信。習近平本人及齊橋橋迄今未對此報導作出回應，而彭博社的網站以及英國《衛報》的網站卻立即在中國遭到封鎖——習近平已經敢於拿外國媒體開刀了。所以，在今日中國「屁股決定腦袋」的潛規則之下，富可敵國的齊橋橋大約不會期許弟弟成為像父親那樣思想開明且嚴於律己的改革者。

——彭麗媛

作為一名家喻戶曉的歌手和解放軍的少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彭麗媛的知名度比習近平高出甚多。一九九九年，鳳凰衛視主持人竇文濤採訪彭麗媛，竇問：「你的丈夫老被人介紹說是彭麗媛老公，是不是壓力很大啊？」彭回答說：「在中國女人的傳統觀念上來說，特別是咱們山東孔孟之道這種觀念上來說，永遠不能說男人嫁給女人。就是你再是一個女強人也應該是嫁給丈夫，好像我覺得我永遠在一個從屬的位置上。自己感覺，可能是從小受的教育不一樣。」竇又問：「那你覺得你找到的是不是按照你的標準是很成功的人呢？」彭回答說：「我想這個問題你就不要問我了，我嫁給他十幾年了，那你想想吧，肯定是很成功的，所以我才會充滿了幸福。」如今，彭麗媛貴為「國母」，人們再回頭斟酌她當年的回答，更是饒有趣味。

彭麗媛陪同習近平訪問各國，其優雅大方的姿態讓愛國者們頗為興奮，中國人總算在國際上有「面子」了。夫唱婦隨的彭麗媛，不可能像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的夫人埃列娜那樣，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之中。彭麗媛有如下一段名言：「女人只要管好自己，已經很了不起，幹嗎要去管男人呢？聽話的男人不用管，不聽話的男人，要管也管不到；對你好的男人不用管，對你不好的男人，不會讓你管；愛你的男人不用管，不愛你的，輪不到你管。努力去做這樣的女人！」所以，習近平往左轉、中國政治繼續潰敗的趨勢，即便彭麗媛有所感知，也不會向夫君有所諫言。

彭麗媛響應習近平整頓軍隊房產的號召，退出了一套北京三環附近軍隊大院內的公寓，受到官媒的讚揚。其實，在「家天下」的體制之下，多一套房子或少一套房子，對「國母」而言有什麼差別呢？更何況，即便不沾夫君的光，彭麗媛自己早已腰纏萬貫。同樣是軍旅歌手的韓紅，在微博上不經意間透露其身家上億；比韓紅地位更高的彭麗媛，身家何止上億？

習近平喜歡作親民秀，彭麗媛也要竭力配合。於是，中國媒體時不時地報道一點彭麗媛的花邊新聞：日前，彭麗媛跟普通人一樣排隊進場聽音樂會，沒有享受特殊通道的待遇。如此佳話，簡直要跟對岸的馬夫人周女士坐公共汽車上班相媲美了。

彭麗媛對夫君政治行為的影響力有限，倒是她的軍人身份可能讓習近平更受軍方之信賴，也許她會兼任習近平與軍方之間的「傳話人」和「潤滑劑」。

——習明澤

習明澤是習近平與彭麗媛唯一的女兒，官媒曾發表一張習近平騎自行車載著女兒玩耍的照片，以顯示領袖家庭亦有天倫之樂。《華盛頓郵報》曾發表一篇題為《習近平之女習明澤讀哈佛用假名，誰支付學費、生活費？》的長篇報導，提及一個有趣的細節：當學者們聚集在哈佛大學對薄熙來風暴舉行研討會時，在報告廳最後一排坐著一名嫻靜的女本科生，她就是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習明澤於二零一零年起入讀哈佛大學，使用的卻是假名，大部分同學和老師都不知道其真實身份。

習近平上臺執政之後，有海外媒體報導說，主導反腐的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下令，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一級的高官在海外留學的子孫必須歸國。習近平和李克強等人的子女不得不中斷學業，處理房產和帳戶，相繼回國。後來，又有海外媒體闢謠說，習明澤在西方生活多年，接受了個人主義價值觀，拒絕服從父親的命令，仍然在哈佛大學學習，習近平亦無可奈何。

在二零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中，習明澤以志願者身份赴災區慰問，深獲民眾好評。一般來說，女兒對父親有著相當的影響力，但習明澤在西方的經驗能在多大程度上讓習近平向西方靠攏，目前還看不出端倪。

不過，在歷史上，有作為女兒的莎樂美唆使希律王斬首施洗約翰的故事，卻沒有善良的公主成功阻撓父王作惡的先例——在共產國家的陣營裡，最為戲劇性的故事，是斯大林的愛女斯韋特蘭娜不堪極權體制對人性的戕害，毅然流亡美國，並撰寫回憶錄揭露父親的殘暴無情。斯韋特蘭娜在西方的生活一直不幸福，輿論認為，共產黨的殘酷內鬥，斯大林的暴虐和怪異，以及伴隨一生的暴君和劊子手女兒的標籤，造成了斯韋特蘭娜悲劇一生。那麼，未來有一天，習明澤會成為「斯韋特蘭娜第二」嗎？

同僚

——李克強

「團派」出身的李克強本來是胡錦濤挑選的接班人，卻被習近平這匹黑馬後來居上，不得不屈居第二、出任總理。這不是因為李克強的能力和聲望不及習近平，而是因為胡錦濤敗於江澤民之手。團派在卡位戰中一敗塗地，本來如日中天的李克強，只好忍氣吞聲充地當習近平的副手。

從教育履歷上看，李克強比習近平更為完整。李克強是一九七七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在北大上學期間，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畢業後在職繼續深造，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中國法學泰斗龔祥瑞曾指導李克強完成譯著和論文，但李克強對憲政和法治並無太深的體悟，他在仕途的各階段都交出了不及格的答卷。

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與中共的歷屆總理一樣，工作重點在於經濟領域及日常政務管理，在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方面不可能有所作為。



即便擔任總理時間最長、權力最大的周恩來，在毛的面前，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大管家。性格剛毅的朱鎔基，受江澤民制約，最後亦一事無成。李克強能例外嗎？

李克強與習近平之間，似乎很難達致毛澤東與周恩來、胡錦濤與溫家寶之間的「默契」。習近平不能容忍西方媒體大肆宣揚「李克強經濟學」，命令官媒不准跟風宣傳；而李克強力推的上海自由貿易區，在出臺時亦大大縮水，已然顯示習李二人心存「瑜亮情結」。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推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深化改革小組」這兩個新的權力機構，並親自掌舵，讓李克強的權力被全面架空。李克強能隱忍到何時？

面對中國這艘千瘡百孔的破船，船長與大副是同舟共濟，還是各行其事？

——王岐山

在新科七常委中，能力最強者，不是習近平，也不是李克強，而是王岐山。習李在地方任職期間政績平平，拿出的成績單遠不如王岐山亮麗：一九九七年，王岐山以金融專家身份調赴廣東，成功處理廣信、粵海等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事件，逐漸為公眾所知。二零零二年，又調任海南，處理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後遺留下來的難題。薩斯爆發後，北京市長孟學農因防疫不力、瞞報疫情被免職，王岐山臨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長，果斷發佈多項命令，並主動接受國際媒體訪問，成為中共獨當一面的「危機處理專員」，由此聲譽日隆。

人們原本以為王岐山會成為負責經濟的常委和第一副總理，結果他卻分管中紀委和政法口。看似失去了在經濟領域重要的發言權，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實際權力而論，在政治局常委會排名倒數第二的王岐山，掌控了中紀委、公檢法等強力部門之後，其權力之大僅次於習、李，比人大、政協的負責人更為吃重。

王岐山對當下中共的處境頗有危機感，曾向高級幹部推薦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稱「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

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王岐山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比起溫家寶推薦奧勒留的《沉思錄》，更有眼光和見識。此書描述的法國在舊制度崩潰前夕的情形，與今日之中國驚人地相似。但是，讀了此書之後，中共的高官顯貴們會受到怎樣的啟發呢？有可能是「反作用」：既然改革導致政權崩潰，那麼我們決不改革！

王岐山沒有子女，人們認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他更有反腐的決心和意志。二零一三年十月，王岐山對一批省部級幹部發表講話說，查處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對黨組織的傷害遠大於其個人付出的代價」。日前，香港《鳳凰週刊》發表了一篇稱頌王岐山的文章，透露了王岐山的一些生活細節，比如拒絕所有人的宴請，在家中親自做飯接待老朋友。自江澤民時代以來，海外媒體很少如此報導現任政治局常委的個人生活。這篇文章的出籠顯然是親王人士有意為之。

王岐山能否在反腐及整頓吏治上大有作為，除了他個人的手腕和勇氣外，更要看他能從習近平那裡得到多大的支持。若中共當局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邁出大步，單單期望王岐山之「鐵腕」，終究是望梅止渴。

下屬

——范長龍

中共向來標榜「黨指揮槍」，但就黨魁而言，若不能如臂使指地掌握「槍」，「槍」就會反過來打倒黨魁。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輕易被元老幫罷黜，就是因為「槍」並不掌握在他們手中，而掌握在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手中。江澤民和胡錦濤上臺後，由於與軍隊並無深厚淵源，只能悉心籠絡軍隊。軍費的高速增長及軍隊的高度腐敗，江、胡均聽之任之。

習近平與軍隊的關係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為密切，但也很難說他獲

得軍方的絕對效忠。習選擇范長龍作為其在軍中的「看門狗」，捨棄像劉亞洲那樣有思想、有抱負的強勢人物，再次驗證了習求穩的性格。范長龍並不是一名強悍的軍頭，卻以濟南軍區司令員一職，在快要退休時，突然躍過副總長、總長、軍委委員，直升到軍委第一副主席，堪稱一匹黑馬。

范長龍沒有實戰經驗，甚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其應變能力、教育程度、知識結構均存在嚴重缺陷。他在民眾中知名度也不高，唯一被公眾所知的事件，是率部參與四川地震的救災，表現尚可。范長龍的長處在於對習低眉順首，剛一上臺就發表擁護講話，反復強調「確保槍桿子可靠」，言下之意是說，自己是幫黨魁掌管槍桿子的、絕對可靠的人。

習近平任用弱勢的范長龍，也說明習近平不可能在整頓軍隊上有大動作，他對軍隊發佈的一系列講話都是毛時代的老調重彈。日本《產經新聞》駐華記者矢板明夫分析說，習近平即便想著手進行軍事改革，也很難作出真正縮減軍方權利的大改革，因為「中國各地現在經常發生抗議貧富差距問題、民族問題的暴動，中國政府今後將更加倚重軍方的力量，軍方的發言可能也將變得更有力量」。外媒報導，解放軍的體制將有近二十年來最大的改革，主要是將目前的七大軍區改編為五大戰區，並且裁軍三十萬。雖然削減軍區會衝擊部份人的利益，但軍隊高層在習近平的壓力下已經統一意見。但此種改革並不涉及將「黨軍」改為「國防軍」，所以軍隊依然是牙齒鋒利的專政機器。

——陳希

目前，中共核心部門中組部由趙樂際執掌。趙祖籍陝西，多年在青海、陝西任職。有人據此分析，自認為是陝西人的習近平信任和器重作為「家鄉人」的趙樂際。其實，這是「過度解讀」，趙為團派出身，被視為胡錦濤的人馬。習暫時用趙，不過是安撫失意的團派。

習近平真正的人事總管，是中組部副部長陳希。習近平大量啟用親朋故舊，一方面表明，他對中共高層的派系鬥爭心存恐懼，不敢輕易使

用來自「五湖四海」的、面目不清的人；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幾乎無人可用，只能「在矮子中挑將軍」——他本人也是一個「矮子」，不能用他自己「高」的人。

陳希是習近平在清華念書時的同學，兩人不僅同班，而且同一宿舍，睡上下鋪，知己知彼、知根知底。畢業後，兩人各奔前程，陳希留校，一路攀升成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而習近平則在地方打拼，雙方的聯繫從未中斷。習近平從清華取得博士學位，就是當時任清華黨委書記的陳希的私相授受。習近平任職浙江期間，清華大學與浙江簽訂多項「產學研」合作專案，是陳希主動幫助習近平積累政績的結果。

所以，儘管陳希有一定的團派背景，但他與習近平有過「同居」的生活經歷，是一筆任何省部級高官無法比擬的「財富」。習近平成為王儲後，陳希以教育部副部長調任遼寧省委副書記，然後再任科協黨組書記，都是習近平一手安排，使之履歷更為完整和豐富。二零一三年，陳調任中組部副部長，表面上是趙樂際的副手，但趙知曉陳的來頭，不會將其當作副手來輕慢對待，必定會將主導權拱手相讓。

陳希將掌握人事大權，為習近平打造自己的隊伍。不過，陳希只是技術官僚，充當習近平團隊中的一顆螺絲釘綽綽有餘，在意識形態上不會對習發揮使之傾向政改的正面影響力。

——劉鶴

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實際影響力遠比其擔任的職位要大。雖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員，但其實際地位高於一半以上的政治局委員。

二零一三年五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Tom Donilon）前往北京安排中美高峰會晤時，習近平指著劉鶴對多尼隆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這一罕有的介紹方式，讓一向低調的劉鶴名聲鵲起。此前劉鶴已為三任中共總書記起草經濟講稿，媒體稱其為「財經文膽」和新一輪「經濟改革的設計師」。

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上學時，劉鶴就與習近平相識、相知。雖然此後兩人在仕途上少有交集，但他一直被視為習近平圈內的核心成員。二零一二年年底，劉鶴陪同剛剛就任中共最高領導的習近平南巡深圳，近在咫尺、亦步亦趨。可見，劉鶴獲得了習近平的全部信任，成為習近平插手本來屬於李克強主導的財經領域的「馬前卒」。

劉鶴有過多次赴美訪學的經歷，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獲MPA學位，兼梅森項目研究員。這些經歷使得其能以國際化的視角來看問題。據傳，劉鶴參與起草中國改革路線圖，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鬆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劉鶴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直言：「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必須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努力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而使經濟轉型順利推進。」儘管劉鶴的關注點偏重在經濟領域，但中國的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已密不可分，經濟改革若要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再處於停滯狀態。

劉鶴是市場經濟堅定的支持者，也是民主政治謹慎的同情者。但是，在習近平急劇轉向「習近毛」的大背景下，劉鶴的觀點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習近平所採納，進而成為中共高層的決策，人們不得不抱懷疑態度。

「敵人」

——美國總統

表面上，習近平上臺後外訪的第一站的俄羅斯，並低眉順首地與普京套近乎說，「我與您很相似」，似乎中國最親密的朋友又成了「北極熊」；但實際上，習近平與中共都不得不承認，真正得罪不起的是「美洲豹」，美國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美關係才是中國對外關係中的首要環節，而且中美外交必然波及中國內政。如同當年的胡錦濤一樣，習近平還是王儲時，就像趕考一般赴美「拜碼頭」——獲得美方承認，是

其鞏固黨內權力的前提。可見，中共雖然視美國為「敵國」，卻也要看「敵人」的眼色行事。

二零一三年夏，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加州舉行兩國元首史無前例的「不打領帶的會晤」。習近平提出中美之間是「新型大國關係」，並用三句話加以概括：一是不衝突、不對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贏。其實，這三句都是大而無當的廢話，中美雙方心中都很清楚：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兩國不可能成為值得對方信賴的朋友。換言之，中國不民主化，不可能成為美國以及所有西方國家的盟友。

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與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差不多重合。奧巴馬的對華政策極為軟弱，這並非美國國家實力下降的表現，而是奧巴馬個人能力有限、缺乏願景所致。即便如此，面對中國在東亞咄咄逼人的攻勢，奧巴馬迅速啟動美國重返亞太地區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將美國的戰略重心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美國剛一發力，中美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巨大差異頓時凸顯出來：美國是「得道多助」，中國是「失道寡助」；美國的處境是「眾星捧月」，中國的境遇是「孤家寡人」。

習近平如能順利展開其第二個任期，將面對奧巴馬之後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若美國下屆大選能選出一位如雷根那樣性格堅定、目標明確的「偉大總統」，接替作為「平庸總統」的奧巴馬，在對華政策上，將人權問題放在中美關係的首位位置，勇敢地對專制中國的惡行「說不」，必將讓習近平難以招架，讓中國的民間社會深受鼓舞，從而大大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劉曉波

二零零九年耶誕節，劉曉波在法庭上的最後陳詞中，以「我沒有敵人」回應中共當局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為以暴易暴、冤冤相報的中國政治傳統注入了一股清泉。然而，胡錦濤、習近平和中共政權仍以劉曉波為敵人，且為最危險的敵人，尤其是在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更是惱羞成怒、恨之入骨。

「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公民運動陷入低潮。長期以來，中國的民間社會是一盤散沙，沒有出現一個標誌性的、象徵性的反抗極權的領袖人物。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劉曉波成為這樣的人物，處在與昂山素季、達賴喇嘛、曼德拉、瓦文薩、薩哈羅夫等並肩而立的位置上。劉曉波是當今世界唯一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論習近平有多麼不喜歡劉曉波，他再也無法忽視其存在——即便他繼續將劉曉波被關押在獄中，剝奪劉曉波的妻子和妻弟的自由，也無法阻止劉曉波的地位在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不斷提升。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為民主、自由、人權奮鬥多年的劉曉波，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說，習近平的未來究竟如何，取決於他怎樣處理與劉曉波及劉曉波所代表的生機勃勃的民間社會之關係。習近平是順應歷史潮流，還是繼續倒行逆施？

擺在習近平面前的，有兩個迥然不同的榜樣：一為德克勒克，一為齊奧塞斯庫。南非最後一屆白人種族隔離政權的總統德克勒克，在主政之後，毅然啟動民主化進程，釋放曼德拉並與之共同推動國家的轉型。德克勒克與曼德拉雖為政敵，卻在同一張圓桌上展開友好談判，為著國家和平與和解的願景而互相妥協，並一起攜手分享諾貝爾和平獎。而羅馬尼亞共產黨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抱殘守缺，剛愎自用，堅持一黨獨裁，用暴力手段消滅民間一切異議的聲音和健康的力量。最後，齊奧塞斯庫被一場意想不到的人民起義推翻，並與妻子一起死於亂槍之下。

如果習近平效仿德克勒克，就必須及早釋放劉曉波並與之合作，甚至謙卑地充當劉曉波的助手，把中國打造成民主、自由的國度，那麼，他或許能像劉曉波那樣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歷史上的地位也將堪比德克勒克。但是，如果習近平執意效仿齊奧塞斯庫，那麼，他就是自掘墳墓，自作孽，不可活，以後想有安穩的晚年而不得——子彈穿過頭顱的疼痛，將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記憶。

習近平有幾個推心置腹的朋友？

——側評中俄、中美、中朝、中越、中南、中德關係

二十一世紀給我們兩種選擇：獨裁者繼續存在或獨裁者被消滅。我們需要加深對以下這一情況的理解：獨裁者會使二十一世紀比二十世紀更加腥風血雨。

——馬克·帕瑪《粉碎邪惡軸心》

論及對外關係，習近平在十八大閉幕式上「就職演講」的最後部分，說了一句低調而懷柔的話：「中國需要更多地瞭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提出「各自的夢想」概念，英文同聲翻譯很準確，為「our respective dreams」。北京奧運時中國鼓吹「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習近平似乎退卻了一步，允許「同一個世界，各自做夢」。

然而，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實際上比胡錦濤更加強勢。在亞洲，與日本、印度僵持不下，對東南亞各國不惜使用武力威懾；在美、俄之間，繼續玩弄毛時代就已嫻熟的平衡術，但更傾向於聯俄抗美的拙劣伎倆；對歐洲各國，則繞過歐盟，採取各個擊破的政策；對非洲，赤裸裸地推行新殖民主義，掠奪能源，破壞環境，激起眾怒。然而，強勢歸強勢，儘管中國的資金和中國的產品席捲世界，但環顧全球，中國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



誰是習近平推心置腹的朋友？是俄國的普京，還是美國的奧巴馬？是北韓的金正恩，還是越南的張晉創？甚至習近平屈尊攀附的新南非國父曼德拉？

中俄關係：習近平與普京有多像？

習近平把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看作是「亡黨亡國的千古罪人」，與胡錦濤如出一轍。但是，這並不減弱他對蘇俄共產制度的熱愛。習近平上臺後的首次出訪地，便選擇莫斯科，甚至在會談中諂媚地向普京表示，「我跟您的性格很相似」。

中共官方媒體如此闡述習近平與普京之相似性：「習近平與普京間存在著高度互信的價值觀基礎。普京的父親是蘇聯的模範共產黨員，他堅信共產主義並試圖將它應用於日常生活，並當過核心黨員的秘書。而普京自己也曾是蘇聯共產黨員，他把蘇聯解體視作『二十世紀最嚴重的地緣政治災難』。習近平則來自一個知名的革命家庭。兩人分別生於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青年時代自然深受共產主義教育的影響，也自然會繼承父輩的一些優良作風。雖然世事變遷，兩人的思想會有一些變化，但他們一定不會忘記中蘇兩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深厚友誼。」

此一論述破綻百出：普京並非共產黨的忠誠黨員，在蘇共崩潰之前便決然退出前程似錦的克格勃，此後為民主派的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服務，然後被共產黨的叛徒葉利欽選中作為接班人。普京試圖恢復俄國的大國地位不假，但其政綱傾向右翼威權主義，視俄共為首要政敵。俄羅斯各左翼政黨與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如俄羅斯共產黨和比俄共更加親近斯大林主義的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全聯盟共產黨、俄羅斯民族布爾什維克黨等，基本上都很反感與厭惡普京，稱普京是「葉利欽的親西方、賣國和對本民族進行種族滅絕政策的延續者」。

習近平對普京的友善，不是因為兩人都對共產黨忠誠，而是普京的

個人魅力對習近平的吸引，以及出於自身利益對俄國的投懷送抱——中共依然深陷「聯俄抗美」之夢。一百多年來，中俄之間流血的時候多，友好的時間少，北極熊對中國的野心從不掩飾。俄國侵佔中國最大面積的領土，屠殺中國民眾的數量僅次於日本。習近平偏偏要與虎謀皮，真是愚不可及。

習近平自以為跟普京相像，他的那點裝模作樣地踢足球的本事，哪能與特務出身的普京相比？夢想當現代沙皇的普京，開飛機上天，駕潛艇下海，精通柔道和拳擊，甚至親自獵殺猛虎。整肅金融寡頭毫不手軟，改善民生亦有相當成績。雖然鐵腕治國，卻也有不少真心誠意的粉絲。習近平有這樣的能耐、政績和人氣嗎？在精悍敏捷的普京面前，肥胖臃腫的習近平，妄想成為「普京第二」，簡直是浮生若夢。

俄國確實不把中國放在眼中。習近平訪俄，俄國媒體反應冷淡，幾乎沒有頭版報導；俄政府派去接機的官員，是職位低微的遠東發展部長。中國的央視欣喜若狂地報導兩國簽署兩份重大軍售框架協議，這廂話音剛落，那邊立即潑上一盆冷水：俄國政府所屬的國際廣播電臺「俄羅斯之聲」澄清說，此為假新聞，軍售合同與習近平來訪無關，是在胡錦濤訪問俄國時簽署的。中方只好打落牙齒往肚子裡吞，不敢向國內民眾公佈此正本清源的報導。

普京根本就看不起習近平，習近平的單相思還能持續多久？

中美關係：習近平與奧巴馬有多親？

在訪問北韓四年之後，直到二零一二年春，習近平才以王儲的身份訪問美國。習近平在訪美時的表現，優於十年前以同樣身份訪美的、呆板木訥的胡錦濤，卻比不上昔日在美國掀起旋風的鄧小平。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開啟了此後中美長達十年的蜜月期。正如李慎之指出的那樣，什麼時候中美關係良好，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就有希

望；什麼時候中美關係不好，中國國內的政治改革就沒有希望。鄧小平訪美之後的十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摧毀了美國對中國的浪漫想像，美國人認識到，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共產黨不會變成「不咬人的老虎」；同時，也使中共對美國和西方的定位回歸毛時代——他們永遠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企圖搞「和平演變」的「帝國主義」，而不是親密無間的「戰略夥伴」。

當前的中美關係堪稱世界上最複雜的雙邊關係，比冷戰時代的美蘇關係還要棘手。於是，中美雙方想出「莊園峰會」的方式，先從兩國元首培養個人感情做起。二零一三年六月，不顧加州熱浪炎炎，奧習舉行了為期兩天的「不打領帶的會談」。兩人單獨會談的時間長達八個小時，這在中美外交史上前所未有。

第一天的晚宴持續時間比較長，一直到晚上十一點。據一位參加宴會的美國官員講，習近平興致很高，還開了一瓶茅臺酒，向奧巴馬祝酒。不過，不清楚奧巴馬是不是喝了茅臺酒——他多半不習慣喝這種中國烈酒。

在記者會上，習近平反復提及「新型大國關係」，「我們需要創新思考，積極行動，這樣才能通過合作來建立一個新型大國關係」。習近平宣稱，在中美兩國建交四十年之後，今天是「新的歷史起點」。這些談話反映出他希望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外交舞臺上成為美國的平等夥伴。

然而，美方的反應相當謹慎。從一開始，白宮就表示，此次在私密的加州莊園內舉行週末會晤，並不是要宣佈新的協定或共識——用外交術語說，就是「有望達成的成果」——而是為在奧巴馬和習近平間建立更融洽的關係，從而在問題和爭端出現時能產出切實的成果。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不像冷戰時代的蘇聯那樣被攔截在「鐵幕」的另一邊，而是深切地加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之中。但是，中美之間至多是「利益攸關者」。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以及美國外交政策中現實主義一翼的影響，美國不得不與中國打交道，奧巴馬在朝核、



伊核等國際議題上也需要中國幫忙。但這並不意味著奧巴馬與習近平能成為朋友、美國與中國也能成為盟友。

中國是一個獨裁的共產黨國家，獨裁意味著不透明和非理性，對內獨裁必然導致對外擴張。毫無疑問，中國是亞洲乃至全球最不穩定的因素。再加上習近平好大喜功的性格，中國外交的走向必然趨於強橫和野蠻。美國方面高調宣揚重返亞洲的政策，目標明顯針對中國。中美的對立，在未來幾年將愈演愈烈——果然，奧習會之後數月，習近平即縱容軍方在東海和南海主動出擊，引起美方及其亞洲盟友的強烈反彈。

訴諸人類歷史，此一事實清清楚楚：從來沒有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成為穩固的盟友。「中美共同主宰世界」是習近平閉門造車的狂想與迷夢。自從共產主義這個怪胎誕生以來，美國就是這個邪惡意識形態的敵人，這是由美國的立國根基決定的。中美之間友誼的開端，不是習近平與奧巴馬把酒言歡，而是中國實現民主化、步入民主國家之林。

中朝關係：習近平與金正恩有多「鐵」？

北韓是中國最後一個「難兄難弟」。早在二零零八年，作為王儲的習近平便奉命訪問北韓。新華社評論說：「這是中共十七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首次訪朝，充分顯示了中國對中朝傳統友誼的高度重視。」習近平在北韓表示，「中朝傳統友誼是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和培育，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所以將出訪北韓當作到中央工作後出訪的第一站，以此籠絡金氏王朝。

當年，胡錦濤在給中宣部的批示中寫道，宣傳部門要向北韓和古巴學習。在毛澤東時代打下思想底色的胡錦濤，對金氏家族鐵板一塊的統治術羨慕不已。習近平也要以北韓為師嗎？

習近平的北韓之旅，乃是「汙名之旅」，乃是他交給政治局的「投名狀」。他首次以「第四代領導核心」的身份出訪，第一站不是歐美，



而是北韓，再次坐實了「主人愛惡犬」之真相。中共的國際戰略是為其一黨獨裁的內政服務的。習近平默認並分享了「朝鮮是朋友、美國是敵人」的毛澤東的世界觀。

北韓卻日漸飛揚跋扈，連主人也不放在眼裡，孤注一擲走向核武化，不斷製造事端，讓中共分外難堪。二零一三年四月，習近平在出席博鰲論壇時，罕有地指出，「不能為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雖然任何人都知道這是指責金三世在朝鮮半島製造衝突，但習近平還是忍著沒有說出批評對象的名字。

二零一三年六月，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加州莊園會晤時，似乎願意接受美方的建議，對北韓施加更大的壓力。《紐約時報》評論說：「朝鮮戰爭結束六十年來，這是第一次有一個美國領導人讓中國人相信，其盟友的野心所造成的威脅，比它崩潰造成混亂的風險還要嚴重。」然而，這個看法過於樂觀。習近平未必有如此聰明。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金正恩突然清洗了姑父張成澤，而且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處決，讓習近平大吃一驚並大為震怒。張成澤是北韓政權中的溫和派，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過去兩年裡一直充當金正恩與中國的聯繫管道。張成澤及其陣營被連鍋端掉，意味著金正恩的內政和外交都將更為僵化與強硬，中國則更難以對其施加影響。習近平未能挽救多次與之會談的張成澤的生命，簡直就像是被金正恩迎面給了一個大嘴巴。

金正恩不把習近平放在眼裡，習近平卻要繼續籠絡金正恩。雖然中國的媒體大肆報道如宮廷劇般的北韓政治鬥爭，但中國和北韓的關係仍然是不能探討的禁區。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呼籲放棄朝鮮，「中國那種基於地緣政治而與朝鮮建立起來的戰略盟友關係已經過時了。此外，一種靠建立在意識形態上的關係是很危險的。雖然中國和朝鮮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兩國之間的區別甚至大於中國和西方社會。」文章剛一發表，外交部就向中共黨校興師問罪，鄧聿文的副編審的職務被解除，遭到「無限期停職」。

這位體制內學者的遭遇表明，在習近平眼中，批評金三世，就是批評他本人。雖然主人與惡犬之間未必有多麼深厚的感情，但打狗還要看主人面。習近平不會放棄對金家王朝的支持，儘管饑荒和獨裁每天都奪走無數朝鮮民眾的生命，他仍然要維持此政權的存在。這一政策是由中共的本質決定的，也是由習近平的世界觀決定的。什麼時候，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啓動了；什麼時候，北韓就不是中國的「鐵哥們」了。

中越關係：張晉創不是習近平的「同志」

中國官媒報導說，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廣場為第一次對中國作國事訪問的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舉行「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歡迎儀式」。鳴響過二十一響禮炮，在檢閱三軍儀仗隊時，隊長改用「同志」而不是「閣下」稱呼張晉創。還有八十名北京小學生列隊，手舉兩國國旗，用越南語喊歡迎口號。這樣的環節，在最近幾年中國接待國外領導人的歡迎儀式中非常罕見。

這一改口，顯然不是儀仗隊隊長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習近平團隊的精心策劃。中方稱習近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雙重身份邀請張晉創訪華，凸顯出中國和越南不但是鄰國，而且信奉同樣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以「同志」的稱呼才脫口而出。除了越南、北韓、古巴、老撾之外，習近平還有幾個「同志」呢？

不過，張晉創未必對這一耳熟能詳的稱呼感到悅耳，因為越南與中國早已「志不同、道不合」。共產主義在越南日薄西山，越南正在試圖洗去舊有的意識形態色彩，以迎接普世價值、融入世界潮流。越南已逐步開放黨禁和報禁，還準備修憲，改國名，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改成「越南民主共和國」。那樣，「同志」一說就無從談起了。

就黨內民主而言，從二零零七年以來，越南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黨的總書記一職出現兩人競選的格局，這在共產黨國家中前所未有。雖

然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但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四個職位由不同的人出任，權力有所分割和制衡。僅有國家主席這個單一職位的張晉創，遇到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習近平，不知是羨慕還是鄙夷？胡錦濤幾年前對越南「背叛共產主義事業」的指責言猶在耳，吳邦國的「四不搞」和習近平的「七不講」更是鏗鏘有力，張晉創能對一意孤行的「老大哥」有所建言嗎？

近代以來的中越關係，「剪不斷，理還亂」。越共創始人胡志明長期生活在中國，從中共的成功中找到經驗。越南抗法和抗美的戰爭，背後既有蘇聯的影子，更是得到中國的援助。到了七十年代末，越南為保護僑民，揮師柬埔寨，清剿紅色高棉政權，由此與支持紅色高棉的中共鬧翻。響徹雲天的「同志」的稱呼，不能阻止「本為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慘劇上演。鄧小平剛一上臺，為轉移國內矛盾，悍然發動對越戰爭，損兵折將、貽笑國際。而胡志明所說的「同志加兄弟」頓成仇讎，二十年後兩國關係才恢復正常化。

如今，中越在南海的爭端漸成死結，習張二人的會晤至多是暫時降溫，而無法徹底解套。面對中國咄咄逼人的壓力，越南一面枕戈待旦，一面投入宿敵美國的懷抱。美國樂於接納越南為亞太地區的新夥伴，並推動越南的民主化步伐。二零一一年，美國海軍戰艦三十多年來首次停靠越南金蘭灣海軍基地，美越海軍舉行以中國為潛在敵人的聯合軍演。

張晉創訪華，只是例行公事；習近平無論怎樣傾心結交，也無法讓越南再度投懷送抱。

中南關係：習近平不配哀悼曼德拉

曼德拉的去世，讓人聯想起一年前捷克前總統哈威爾的去世，全球民主化第三波的英雄們日漸凋零。

一個時代落幕，另一個時代啟幕，全球民主化第四波的代表人物還

在奮鬥不止。緬甸的昂山素季重獲自由並準備投入大選，中國的劉曉波還在獄中備受煎熬。

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並以個人名義，對曼德拉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習近平指出，曼德拉是中南關係奠基人之一，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為中南關係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這個新聞的荒誕程度超過愚人節的笑話。無論多有幽默感的人，也無法欣賞習近平的「冷幽默」。中國網友如此議論說：「一現任非民選首腦向一民選前總統致意，真不知道他如何感想。」、「一個到處關押著政治犯良心犯、正義人士、不同政見者的政權，對另一個被關押過幾十年的政治犯表示哀悼，亦不知作何解釋？」、「一個搞戶籍制度，實行種族內隔離的政權，對另一個為反對種族隔離終身奮鬥的戰士表示哀悼，不知如何理解。」、「一個竭力剝奪和壓制本國民眾自由的政權，對自由戰士曼德拉的去世表示哀悼，這可能世界上最荒唐可笑的事情了。」

此前，「六四」屠夫李鵬訪問南非，特意去關押過曼德拉的羅本島監獄參觀。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對「天安門母親」竭盡侮辱、抹黑之能事，殺人子女，還不准父母公開悼念；又將數百名所謂「六四暴徒」長期監禁，百般折磨，少數熬到出獄的人，身心皆遭受重創。對比後來被中共虐殺的「六四鐵漢」李旺陽的悲慘遭遇，曼德拉和難友們的監獄生活宛如天堂。

那時，我心裡詛咒李鵬這個假冒偽善者，黃鼠狼總是要用給雞拜年的方式給自己臉上貼金。如今，看到習近平對曼德拉家屬和南非人民「情深意切」的哀悼，更加感嘆：中共的領導人當中，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

曼德拉不是習近平的朋友，儘管曼德拉在總統任上，出於國家利益考量實現了中南建交，但他對中共的暴政並非毫無認識。曼德拉與達賴喇嘛有過多次會面，承受過種族隔離苦難的他，對西藏人民在中共殖民統治下的苦楚心有戚戚焉。

果然，曼德拉的葬禮上，各國元首、政要雲集，習近平偏偏派遣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作為代表出席，李源潮成為葬禮上唯一遭遇人們噓聲的貴賓——習近平避免了遭受此一羞辱，但中共政權的國際形象由此暴露無遺。

「中國的曼德拉」劉曉波被中共關押在冰天雪地的錦州監獄，他是世界上唯一仍然系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也被非法軟禁在家三年之久，與世隔絕的非人生活讓她患上了重度抑鬱症，卻不敢去看醫生，害怕中共借此將她送進精神病院。劉霞向同樣也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籍醫生組織發出求救信號，其遭遇催人淚下。無國界醫生能否突破中共的封鎖，派遣醫生與劉霞會面，不得而知。而在曼德拉坐牢時，他的妻子和子女仍然行動自由，他們之間的通信也暢通，且當局保證了其家人合法探監的權利。兩相對比，中共暴政的酷烈程度，遠遠超過當年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白人政權。

習近平不僅關押劉曉波，一年多以來又先後逮捕了一百多名良心犯。中國人的嘴巴，只能吃飯，不能說話。獨裁者習近平不配向曼德拉的家屬和南非人民表示哀悼。這種消費曼德拉的手段，不能讓習近平改善自己窮凶極惡的國際形象。善與惡是兩條永遠不會匯合的平行線。

中德關係：默克爾為何拒絕習近平參觀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

習近平計劃訪問德國時，以參觀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的策略擠兌日本。中國甚至建議德國派官員到日本去，告訴日本政府該怎樣看待歷史。此類招數溫家寶早已用過，溫家寶曾到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獻花，表示發動過戰爭的國家必須以史為鑑。

然而，企圖故伎重施的中共當局這一次遭受了挫敗。一名熟悉習近平訪問計畫的外交人士說，中國安排習近平參觀柏林歐洲猶太人受難者



紀念碑的提議，遭到德國的拒絕，德國人的回答是：「絕對不行」。

默克爾政府為何如此斬釘截鐵地拒絕習近平的作秀，甚至不惜損害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因為，在戰後痛定思痛、走向民主、重視人權的德國人眼裡，習近平就是名副其實的威脅世界和平的新納粹。有過在東德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經歷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心中對習近平是何許人也一清二楚：習近平是希特勒與昂納克的綜合體。德國是最關切中國人權狀況的歐洲大國，德國人當然不願習近平這個膜拜毛澤東的獨裁者打擾猶太死難者的靈魂。

習近平執政以後，仿效希特勒，鼓動民族主義，積極對外擴張，挑起與多個周邊鄰國的領土爭端，將更多的導彈對準臺灣，東亞局勢如同一個隨時引爆的火藥桶。

習近平的對內鎮壓更是變本加厲。那一百二十多名悲壯地自焚的藏人，跟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有什麼差別呢？被中共謀殺的「六四義士」李旺陽、維權人士薛明凱的父親薛富順等人，跟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有什麼差別呢？在譴責日本之前，中共當局何曾為其暴政懺悔過？若要紀念那些被中共殺戮的中國人，建立一百個柏林的猶太受難者紀念碑也不夠。

被關押在監獄中的劉曉波，命運比被受希特勒迫害的奧西茨基更加嚴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之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被德國當局釋放。希特勒痛恨挪威將諾獎頒給奧西茨基，下令此後所有德國人都不得領取各項諾獎；不過，希特勒允許諾貝爾委員會來到奧西茨基的住處給他授獎。然而，在劉曉波的頒獎典禮上，只有一張空椅子，劉曉波的親朋全部禁足，諾委會更不可能到中國的監獄頒獎給劉曉波。不僅如此，劉霞在丈夫獲獎之後，一直遭到野蠻的軟禁，百病纏身、缺醫少藥。習近平及中共極權體制之殘酷，讓希特勒亦望塵莫及。

德國方面應當安排習近平去柏林的那尊奧西茨基的銅像面前「思

第一章 癡人說夢：論「中國夢」之難圓



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奧西茨基在《世界舞臺》上發表了一篇針對希特勒的政論文章，希望喚醒國民對法西斯的警惕，文章中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這句話，有超越時空的力量，說的不僅是昔日的希特勒，說的也是今天的習近平。



習近平真的「看上去很美」嗎？

——剖析奧巴馬、拜登、李光耀、吳伯雄和
星雲和尚對習近平的評價

你們卑賤地把當權者奉為偶像，雖然你們私下裡鄙視他們。

——羅伯特·達恩頓《催眠術》

在家喻戶曉的童話《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中，我最欣賞那面永遠「實話實說」的鏡子。當蛇蠍心腸的王后詢問鏡子「誰是世界上最美的人？」的時候，鏡子總是回答說「當然是白雪公主」，這個答案氣得王后七竅生煙。如果鏡子刻意奉承說「是你，是你，就是你」，那就不會有王后挖空心思謀害白雪公主的下文了。鏡子為什麼不聰明一點、變通一點、世故一點呢？

在童話世界，總是美好和純潔的事物占上風；在現實世界，則常常是黑暗和邪惡的事物占上風。習近平明明是體胖心「窄」、施政能力低下、知識結構殘缺、思維方式僵化的獨裁者，偏偏有人把他當作一代明主、萬世救星來讚美、歌頌、膜拜。王朔有一本小說名叫《看上去很美》，我想反問那些熱情擁抱習近平的大人物們：難道你們真的以醜為美嗎？難道巧言令色是一種高貴的品質嗎？

奧巴馬看習近平：「魄力」其實是「無知者無畏」



在美國公共電視網播出的名人訪談節目「查理·羅斯秀」中，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主持人查理·羅斯進行了四十五分鐘的訪談對話，有大約八分鐘談及中國，包括與習近平在加州的會談。奧巴馬說，他對習近平的印象是：和以往中國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更為年輕、有魄力、有活力和自信。

跟謹小慎微的胡錦濤相比，習近平或許更有「魄力」。但是，獨裁政權的領袖有「魄力」，對本國人民和全世界而言，往往是禍非福。希特勒很有「魄力」，聽過希特勒演講的人，十有八九都會感到如醉如癡。希特勒剛剛上臺便提出「將征服東方的『生存空間』並加以無情的『德意志化』」作為其終極的對外目標。在德國擴軍備戰尚未完成之際，就敢「唱空城計」，進軍《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非軍事化的萊茵蘭地區。希特勒回憶說，那是他一生中最緊張的時刻，如果英法真的出兵干涉，當時的德軍根本不是對手。所以，那不是一場軍事實力的戰鬥，而是一場「魄力」或意志力的戰鬥，希特勒的「魄力」戰勝了英、法的那些患得患失的政客。

如今，習近平擁有的「魄力」，也是此種賭徒式的「魄力」。習近平放棄鄧小平留下的「韜光養晦」、「不出頭、不爭霸」的外交遺訓，煽動國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挑動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爭端，擺出一副不惜與萬國開戰的「頑主」架勢。

對於美國，習近平有一番打算。習近平亦揚言，以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仿佛其他國家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藩屬國。那麼，他的「魄力」真能讓西方列強退避三舍，由此成就超過毛太祖的不朽霸業嗎？

習近平的「魄力」，來自於極端的無知，無知者才無畏。與習近平有過交往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指出，目前這一撥當權的「紅二代」所受到教育非常有限。他回憶說，「『文革』之後，任何



書都沒有了，想學也沒有的學。書店除了毛主席選集，毛主席語錄，甲種本、乙種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學藝術科學教育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連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都沒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毛澤東焚書坑儒的政策造就了整整一代隔絕於人類文明的愚民，用胡德華的話來說就是「我深感十年「文革」，毀了我們一代或幾代人，幾乎成了文盲。」最後，他不忘幽一默：「當然這只是說我，我們的領導還都是博士碩士。」習近平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但他的學位名不副實，並不能遮掩他實為半文盲的真相。

習近平的自信是裝出來的，是一種「人莫予毒」的妄自尊大，奧巴馬豈能信以為真？「知青」一代的知識結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社科院近代史學者馬勇認為，紅二代錯過了讀書的最佳年齡，是無法彌補的先天缺陷。這個缺陷決定了中國既無法往前走，走向民主憲政；也無法往後退，退回專制集權。往前走，必然發生困擾；往回走，能力不足，因為專制集權更需要知識、能力和智慧，僅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魄力」是不夠的。

當年的納粹德國，是西方民主國家「慣」出來的；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用同樣的方式縱容中共在國內和國際上作惡。在處理國際事務上低能的奧巴馬，錯看了習近平，誤判了中國的情勢。奧巴馬的綏靖主義外交，終將自嘗苦果。

今日之中國，船已破敗不堪，又沒有好的舵手，只能臨深履薄、原地打轉、無法靠岸。馬勇認為，「這是歷朝歷代沒有出現的困局」。僅有外強中乾、虛張聲勢的「魄力」，實際上卻手腳無措、左支右絀的習近平，敢問路在何方？

拜登跟習近平談了劉曉波嗎？

在國家副主席任上，習近平從來沒有在一周內與任何一位西方國家



領導人會晤五次。二零一一年八月訪華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做到了。中美一九七九年建交至今，不論是對歷任美國副總統，或是中國國家副主席來說，這都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記錄。拜登稱讚說，作為未來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務實而強勢」，是個「很有魅力」的人。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拜登再度訪華，希望利用跟習近平之間的「私人關係」，軟化北京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的立場。拜登在日本時，稱習近平正處於「起步的艱難期」，「我不能給他添麻煩」。一到北京，拜登就表示，中美關係必須建基於互信，又讚揚習近平是直率的人。

然而，這一次時勢迥異：習近平登基一年之後，權力鞏固，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場。而拜登和奧巴馬在國內的民調猛降，處理國際事務亦錯誤不斷。因此，習近平沒有給拜登面子：經過五個半小時馬拉松式的長談，兩人仍是雞同鴨講、各說各話。

習近平執政以後，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工作環境持續惡化。《紐約時報》和彭博社有將近二十四名駐華記者的簽證將於二零一三年年底到期，但中國方面拒絕為他們辦理續簽手續。拜登在會見《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駐京記者時說，他已在正式會議和晚餐期間警告中國領導人，如果中國迫使記者離開，就會面臨種種後果，尤其是美國國會的反應。但他又說，習近平似乎對此無動於衷，並堅稱中國官方是依照中國法律來對待記者的。

拜登此次訪華的唯一「亮點」，是在駱家輝大使的陪同下，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領事部，與申請簽證的中國民眾短暫見面。拜登向數以百計的輪候者揮手打招呼，他說：「只有在自由空氣中，才能創新。」他鼓勵中國民眾挑戰政府、師長和宗教領袖。

美國使館是美國領土，拜登在美國領土上說什麼，跟中國並沒有太大關係。正如有中國網民諷刺的那樣，這些申請簽證的中國人，是要到美國去挑戰奧巴馬的，他們才不會留在中國挑戰習近平呢。劉曉波、許志永、王炳章們都在監獄裡，這就是挑戰中國政府的下場。



而拜登此前在美國賓州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辭，批評中國沒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遭到一群不是憤青就是五毛的中國留學生簽署聯名信抗議。這一次，他學乖了，對這群渴望得到簽證、脫離中國這個爛泥潭的中國人說話，他們總不敢冒著簽證申請被拒的危險，當面反駁他的建議吧？

拜登沒有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當面呼籲習近平釋放劉曉波夫婦。拜登臨行前，國際特赦、人權觀察、美國筆會聯合發表公開信，希望拜登要求北京釋放劉曉波並停止騷擾他的妻子，重申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責任感。這三個組織寫道：「我們明白，您去北京時會討論大量重要問題，但我們希望，這件事也在您的討論之列。請繼續在每一個可能的時機提出劉曉波的問題，要求中國當局結束對他家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壓迫和恐嚇，包括解除對劉霞超越法律之外的軟禁。」

然而，拜登至少沒有公開談及這個中國戕害人權的惡劣案例。奧巴馬和拜登都是二流政客，他們看到了中國的商機，卻不知道商機背後的陷阱；他們看到了習近平的微笑，卻忘記了這是一個笑裡藏刀的獨裁者。

當年，雷根在柏林牆前高聲呼籲：「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假如你真地愛好和平、假如你真地渴望給蘇聯人民和東歐人民帶來繁榮，假如你真地是要開放，那麼，請你到布蘭登堡來！戈爾巴喬夫先生，請你打開這道大門！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那是何等勇銳和堅定！

多年以後，雷根的撰稿人彼得·羅賓遜回憶說：「那篇講話的基本點是道義上的呼籲，是對戈爾巴喬夫在道義上的一個挑戰。在整個爭論的過程中，雷根總統把國務院和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的反對意見都否了，堅持把話說出去。」羅賓遜說：「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業外交官們，都有很好的學歷、受過很好的訓練。但是，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已經養成了按規矩和慣例辦事的習慣。至於正義與非正義、自由與強權的對立，都被忘到一邊去了。從道義的角度考慮問題，讓他們感到不自在，不符合他們一貫的思維方式。」反之，當雷根總統對戈爾巴喬夫說



「推倒柏林牆」的時候，他說出了普通民眾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說的話；他的這番話拓展了人們的想像力，引發了人們對自由和民主的遐想。

我期盼今天的美國再次出現雷根那樣有願景、有智慧、有勇氣的政治家，一語道破習近平是一個暴君的本質——而暴君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情實意的朋友。

李光耀為何將習近平與曼德拉相提並論？

據說，習近平青睞威權主義的「新加坡模式」，希望引進「新加坡模式」以挽救中國危局。

習近平還身為王儲的時候，曾在前總書記江澤民的支持下，領導一個團隊研究新加坡的執政模式；如今，中央電視臺正在攝製一部關於新加坡政治和社會管理體制的十集電視紀錄片，被認為是在習近平的授意下進行的；主管組織人事的李源潮，安排了數以千計的中國官員到新加坡學習管理方面的課程，新加坡似乎成了中國政府的人才培訓基地。

登基之前，習近平已數次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建立起較為親密的個人關係。在二零一零年訪問新加坡時，習近平對李光耀說：「鄧小平先生生前多次提出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這種學習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也還需要。」固步自封、自以為是的中共領導人，很少這樣公開表示願意向別人學習，聽到這樣的話，李光耀何其榮耀。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李光耀在講話中高度評價習近平：「我會把習近平視為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同一層次的人物。一個曾有過不幸遭遇，但不會因此影響判斷的高度情緒穩定之輩。」

李光耀的這句話宛如焚琴煮鶴，唯一的目的是討習近平的歡心。李光耀這個「蘇伊士運河以東最親英的政治家」，內心未必看得上膠柱鼓瑟的習近平，也從未將中國看作是「母國」、「上國」和「盟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新加坡始終向西方靠攏，與英美結盟。李光耀的

兒子李顯龍訪問日本時，明確向日方表示，不信任中國的擴張主義外交，願意與日本展開各種合作。

所以，李光耀將習近平與曼德拉相提並論的讚譽之辭，堪稱巧言令色、荒謬已極。習近平與曼德拉的相似之處，並不比希特勒與羅斯福的相似之處多。說到「不幸遭遇」，曼德拉為爭取廢除族隔離制度坐了二十七年黑牢，出獄之後以寬恕和仁愛的精神推動社會轉型與族群和解，無愧於諾貝爾和平獎之殊榮。而習近平在十六歲時，背著「反革命的兒子」的沉重包袱，被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政策席捲到西部山村當「知青」，兩者毫無可比性。

習近平確實過過苦日子。長達六年半時間，他在農村每天挑糞堆肥、荷鋤耕田，還得在村子裡的政治集會上嚴厲批判「叛徒」父親。然而，他對那段歷史並無深切反省，反倒說「吃苦」的經歷讓他繼承了「延安精神」，並對黨更加忠誠。

承受過苦難的人，未必能蛻變為心胸開闊、愛人如己的偉人。希特勒曾在一戰戰壕中受苦和負傷，也曾因發動政變被捕入獄，但苦難並未讓希特勒趨向於熱愛自由、保護人權，反倒讓他心靈扭曲、思想邪惡，成為扼殺民主的劊子手。習近平也是如此，用思想史學者錢理群的話來說，習近平雖然經歷過苦難，卻並未「將苦難轉化成精神資源」。

習近平沒有資格與曼德拉相提並論。與曼德拉最為相像的中國人，不是習近平，而是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位是達賴喇嘛，他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一直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另一位是劉曉波，他被共產黨關進了監獄，並連累妻子及家人也失去了自由。

二零一三年夏天，「記者無疆界」組織在巴黎街頭張貼出當今世界嚴重戕害新聞自由的幾名獨裁者的頭像，有一幅就是習近平炫耀鐵腕的照片。是的，與其相信李光耀的誑語，不如相信「記者無疆界」的獨裁者名單：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記者無疆界」發佈了「扼殺新聞自由者排行榜」。習近平成為榜單上的「新秀」，與北韓的金正恩、



伊朗的內賈德、敘利亞的阿薩德和俄羅斯的普京一起名列前茅。

「記者無疆界」秘書長克里斯多夫·德魯爾（Christophe Deloire）指出，這些獨裁者對殘害媒體與記者負有責任，而且「他們變得越來越有效率」。關於中國的情況，該組織的亞洲部主任本傑明·伊斯梅爾（Benjamin Ismail）評論說：「二零一二年是中國媒體自由和資訊自由最糟糕的年度之一。……更令人擔心的是，習近平上臺之後，這種趨勢未見改變。相反地，從中共十八大及全國兩會期間的媒體控制看，當局對新聞自由的打壓加強了。」可見，儘管劉曉波不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習近平卻把所有熱愛自由的人當作敵人。

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獨裁者「看上去很美」——那些熱愛獨裁者的人們，是可憐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吳伯雄看習近平：情人眼裡出西施

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與習近平見面之後，對習大加讚賞，形容其「腦筋清楚、態度非常誠懇、言語委婉」。是不是吳伯雄在中南海裡喝茅臺喝醉了，醉眼朦朧之際，「情人眼裡出西施」？

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再度上臺執政之後，放棄了蔣介石時代「漢賊不兩立」的兩岸政策，向中共政權卑躬屈膝、低首下心。馬英九的副手吳敦義公然對王丹表示，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朋友，所以不支持中國的民運人士。

表面上，兩岸關係似乎走向緩和，貿易迅速增長，臺灣的親中政商聯盟利益均沾。實際上中共仍將臺灣看作「不服從家長管制的浪子」。在軍事上，超過兩千枚的導彈對準臺灣，比瞄準蘇修、美帝的還多，足以將彈丸小島夷為平地；在政治上，中共的半官方機構即將在臺灣開張，由此展開統戰和招安工作，實現對臺灣社會各界的遙控將易如反掌。

如今，兩岸問題的焦點已由統獨對立轉移為民主和獨裁的制度差異。

某些臺灣政客故意回避中國與臺灣在制度上的根本差異，自以為有虎口奪食的本事，從對岸撈到巨大的好處。吳伯雄就持此種想法：讚美習近平幾句，就能從北京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好處，何樂不為呢？

吳伯雄偏偏忘記了：習近平是何許人也？習近平未經選舉而執政，民意基礎薄弱，僅代表中共權貴階層的利益。習近平是獨裁政黨之黨魁，是綁架十三億中國人的綁匪集團之「老大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就是身披龍袍的習近平手上端著酒杯、臉上帶著神秘微笑，一副顧盼自雄的模樣。

習近平向吳伯雄灌了多少蜜糖，才使吳伯雄對其讚不絕口——「腦筋清楚、態度誠懇、言語委婉」，如此評語，習近平擔當得起嗎？未能登上臺灣最高權力寶座的吳伯雄，大概讓北京的紅地毯晃得心花怒放，便情不自禁地吟起辛棄疾的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在臺灣，像吳伯雄這樣未曾確立國家歸屬和公民身份的政客比比皆是。也許吳伯雄在臺灣太寂寞了，到北京才發現「知我者，二三子」——不過，他對習近平的態度太過親昵了，會讓習夫人彭麗媛吃醋的。吳伯雄是日本人的孫子和兒子，這是他無法選擇的身份；但是，他對中國的熱愛和對臺灣的厭棄，卻是他自己的選擇。彼岸有金山銀山、美女美酒，既然吳伯雄不願做臺灣人，不妨移民去北京。北京空氣清新，高朋滿座，滿漢全席，天天伺候。

在中共統禦的「八大民主黨派」中，既有「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有「台聯」（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對於吳伯雄來說，到中國當「民革」或「台聯」的名譽主席，比當偏安一隅的國民黨的名譽主席更有派頭。至少可以乘坐藩王大轎，巡遊神州江山，比在海外孤島氣派得多。

華人，是就種族、血統和文化而言的，不同地方的華人有不同的家國認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過：「我不是中國人，就如同甘迺迪總

統不是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他們有中國人的血統，他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他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李光耀也曾對中共領導人口出美言，但他不會將中國的利益置於新加坡的利益之上。然而，在臺灣，有多少要錢不要自由、要面子不要尊嚴的政客與富豪，不是「以臺灣的立場思考，關心臺灣的權益」，反倒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獨立而自信的新加坡，才是臺灣的願景。藏人自焚的火光，理應照亮「中國奴」們內心深處的幽暗。

星雲和尚：習近平也是追「星」族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傍晚，習近平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連戰一行。訪問團成員包括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習近平在與其見面時特別表示：「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都讀完了。」星雲則回應，「中國夢」帶給中國更偉大、富强的發展，令人激賞——習近平的「中國夢」裏，會把國師的位置留給這位名揚四海的大和尚嗎？

這是習近平二度與星雲見面。兩次衆「星」雲集的「習連會」，星雲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男配角」。星雲送給習近平一幅題為「登高望遠」的書法，表達對習總的期望：「身處高位，遠望到國家、人民的未來，看到整個國際形勢的未來；增強中國的國力，讓中國和世界上的強國並駕齊驅。」然而，不知道星雲敢不敢在習近平面前說出他在《台灣，請聽我說》中那篇訪談的畫龍點睛之筆——「大陸一定是台灣的大陸，不一定台灣是大陸的台灣」？

星雲對媒體透露，習近平是他的「書迷」，曾讀過他的新作《人間佛教何處尋》。這可是「泄露國家機密」的罪行：共產黨黨魁不讀馬列

毛選，偏偏讀你這怪力亂神的閒書？說到對習總的印象，星雲面露喜色，贊賞道：「他很開明、質樸、進步，非常睿智。」出家人不打誑語，大和尚却謊言連篇：當劉曉波、許志永等數百名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公民都被關押在監獄中之時，當天安門母親群體依然遭受殘酷打壓之時，當中共拒絕放棄武力威脅台灣之時，習近平何來「開明、質樸、進步」之有？八十八歲的星雲和尚，是否老眼昏花了？

不是老眼昏花，而是利令智昏。星雲跟連戰訪問團的其他成員一樣，都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星雲經營的是一個如同郭台銘的鴻海集團那樣的龐大企業，而中國則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超級大市場。當年，六四屠殺之後，星雲以為中共必將垮台、民運必然成功，將寶押到流亡學生和知識分子身上，招待吃住、噓寒問暖。誰知，押寶押錯了，二十多年後，中共不僅沒有崩潰，反倒修煉成縱橫天下的伏地魔。星雲可不是食古不化的法海，他讀了千卷萬卷的佛經，最後只相信一條人生準則：如果你不能打敗他們，那就加入他們吧。

然而，甘當權力附庸的人，不配稱之為「大師」。儘管習近平欽點星雲為「大師」，但習近平骨子裏並非星雲的追「星」族，習近平想要效法的終極目標是希特勒和毛澤東。星雲和尚只是他統戰台灣時可資利用的一枚小卒子而已。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一個小故事：五代十國的時候，一個和尚挖出一隻眼珠呈現給前蜀皇帝王建作為祝福。王建大受感動，下令招待一萬名和尚進餐回報。翰林學士張格諫言說：「小人物無緣無故傷害自己的身體，應該給他嚴重的處罰！現在赦免他、不處罰他，已經够他幸運的了，反而對他褒獎，就更傷風敗俗了。」王建遂停止行動。

獻良心跟獻眼睛，其實是一樣的。



你的美夢，我們的噩夢

我夢見中國遍地都開著美麗的罌粟花，隨處可聞見芬芳的阿芙蓉氣味。

我夢見中國捐稅名目繁多，連撒屁都有捐。

我夢見中國四萬萬人都叉麻雀（打麻將），最旺的時候，有麻雀一萬萬桌。

我夢見中國要人都生病。

我夢見中國監獄裡充滿了犯人。

我夢見中國到處都是匪。

——夏丏尊（開明書店編譯所所長），一九三零年

中國社會千瘡百孔的現實，需要的是操刀必割的領導者。缺乏啓動政改的魄力和智慧的習近平，不是這號人物。習近平沿用的智囊是服侍過江澤民、胡錦濤的王滬寧一班人馬。王滬寧是一個才華平庸的政治學研究者，在江澤民時代貢獻了多少有點料的「三個代表」學說，在胡錦濤時代又推出成色差了許多的「科學發展觀」及「和諧社會」的理念，到了習近平時代則黔驢技窮，只能挖空心思勾勒出「中國夢」的海市蜃樓忽悠百姓。不過，面牆而立的習近平，照單全收，一時間，「中國夢」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

習近平的「中國夢」有上、中、下三個層次。上者，在其任期內實現「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共產黨

中國
永遠一黨專政，十多億民眾俯首貼耳，習近平之功勛不亞於毛澤東；中者，十年後中國與美國併駕齊驅，各自瓜分一半太平洋，中國雖然不再像毛時代那樣輸出革命，但可以輸出立竿見影的「中國模式」，打破全球獨尊的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下者，中國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但強力維穩，硬著頭皮往前走，至少讓手中的定時炸彈，延遲到下一代領導人那裡再爆炸。

剩下的疑問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究竟有多美、究竟可以做多久？

是復興之路，還是毀滅之路？

中共十八大之後，新科七常委的首度集體活動，是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有趣的是，七人都著便裝，五人為深色夾克，著西服的劉雲山和王岐山未打領帶，大概要營造某種輕鬆自如的氣氛。

所謂「復興之路」的展覽，其實是共產黨黨史展覽，以此教育人民對「給你飯吃」的共產黨感恩戴德。對中共的「博物館造假學」深有研究的香港學者洪長泰指出，民主國家的博物館是讓觀眾體悟到公民社會的內在價值，繼而肯定現代民主國家的意義；而在中共的博物館內，「展品依照共產黨的歷史來分期，加上毛澤東的神聖語錄和精心挑選的戰場場面，編制共產黨必勝的神話，它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展品只是單方面宣揚共產黨的光輝歷史」。此種展覽，當然不會有「土改」、「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中共禍國殃民的斑斑劣跡。

七常委不會愚蠢到真心相信他們一手編造出來的謊言，「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只是說給愚夫愚婦聽的謊話。連太子黨內部，都無法達成關於「復興之路」的共識——少數人的「復興」，正在變成多數人的「毀滅」。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談到太子黨內部嚴重的分裂：最引人注意的一幕，是原中信集團董事長孔丹與原招商局董事長秦曉就改革與憲政問題的交鋒。

孔丹和秦曉都曾是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四中的學生，「文革」初期共同發起組織「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西糾），然後「上山下鄉」，鄧時代都在大型國企任職高管。如今兩人的政見卻南轅北轍。

根據胡德華轉述，在北京四中這批老三屆的一次聚會上，一邊是普世價值派，一邊是正統派的各級官員，後來大家就吵起來。

正統派說：「你們這些普世派別給我們領導來添亂了。」

秦曉說，「百姓的呼聲你們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沒聽見？聽見了也還能那麼平靜、那麼無動於衷嗎？」

孔丹說，「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臺嗎？」

秦曉說，「同學啊，你怎麼連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的話都聽不進去？」

孔丹大怒說，「你他媽還是共產黨員不是了，你還有信仰沒有了？」

秦曉反駁說，「那你有信仰沒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國去，那你有信仰嗎？」

最後，孔丹就掛不住了，直接上粗口，說「我操你媽的」……

胡德華自稱，「這個事對我刺激非常大，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說，不能商量，否則就老拳相加。」

在太子黨中，秦曉是少數，孔丹是多數。上臺前，習近平面目模糊，還故意說幾句跟秦曉相似的、諸如「把權力裝進籠子」的話；上臺後，不足數月，其言行越來越像孔丹，或者更準確地說，越來越像毛澤東。

頗為吊詭的是，孔丹的子女在美國定居，習近平的女兒在美國念書，但他們決不讓中國走美國的道路。他們的「復興之路」，乃是專制之路、壟斷之路、鎮壓之路、鯨吞之路。這條路，必然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沒有放心奶粉，哪有強國夢想？

二零一三年十月六日，中國官方媒體上的一則頭條新聞是《習近平會見紐西蘭總理：希望新方把好乳製品品質關》。記者寫道：「上半年，中國首次成為紐西蘭第一大交易夥伴。紐西蘭總理約翰·基向習近平通報了新方處理恒天然集團乳製品品質問題情況，表示將採取嚴格措施確保產品品質。習近平強調，食品安全問題事關人民身體健康，希望新方把好品質關。」

習近平一定沒有讀過聖經，不知道聖經中有這段話：「你不見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此，他施施然地扮演了「假冒為善者」的角色。

官方以為是正兒八經的新聞，常常成為民間苦中作樂的笑料。在微博上，@美駐上海總領事館評論說：「希望美國開放黨禁報禁，徹底走向民主自由！」@賀江兵評論說：「希望北歐、西歐把福利搞上去。」@河山千萬朵評論說：「希望澳大利亞做好空氣淨化。」

就在習近平「不掃自家門前雪，偏管他人瓦上霜」地關心紐西蘭的奶粉品質時，世界各國紛紛對中國人的「海外奶粉搶購兵團」制訂嚴格的「限購令」——即便是一些崇尚自由經濟的國家，也不得不借來計劃經濟的手段「水來土掩，兵到將迎」。就連在中共遙控之下的香港，也迫不及待地出臺類似的法令，引發中國高官王光亞嚴厲譴責特區政府「不顧及內地同胞的感受」。

那麼，所謂「內地同胞的感受」是什麼呢？一個可以把神舟送上天、把蛟龍送下海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生產的嬰兒奶粉卻不能讓本國的媽媽們放心，使她們舍近求遠到海外為下一代找奶吃，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深思的事情。而這樣的問題不在習近平操勞的軍國大事之列。



二零一三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楊剛就奶粉問題接受採訪。楊剛稱，國產奶粉的標準不低，甚至有些標準高於國外。據質檢總局的資料顯示，中國乳制產品百分之八十六合格，出口產品百分之九十八合格。在被問及為什麼國內和出口的奶粉合格率不同時，楊解釋說，當局對出口產品有一整套標準，而國內與國外標準有所不同。至於公眾為何仍不相信國產奶粉品質，楊則說：「我親戚朋友家中的小孩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吃國產奶粉。」

消息引發民眾譁然。有民眾稱，前幾天政協發言人呂新華還說國產奶粉百分之九十九合格，怎麼到了質檢總局長口裡就變成國內奶粉百分之八十六合格、出口百分之九十八合格，這叫我們該信誰？中國老百姓「老不信」，原因就是政府官員從來不講真話，信口胡來。有民眾責問楊：「都在中國生產，憑什麼出口奶粉的合格率比國內高十二個百分點，是中國人好忽悠，還是抗毒能力強？！」更多網民要求楊公佈親友買的是哪家奶粉，好讓大家「有福共用」。

有習近平，才有楊剛。這群無能鼠輩，偏偏大話連篇。學者張鳴指出：「中國當然不是沒有能力生產出合格的奶粉，但是三聚氰胺事件，大國企帶頭生產毒奶粉，質檢部門得錢買放。公檢法迫害喝毒奶粉死亡的家人。三箭齊發，中國奶業的信譽就崩潰了，確切地說，是中國政府的信譽沒了。」沒有信譽的中國政府，卻旁若無人地在國際社會上、在眾目睽睽下自信地裸奔。

習近平公諸同好的「中國夢」裡面，可有堆積如山的毒奶粉，以及受毒奶粉之害而哀哭切齒的孩子父母？

「中國夢辦公室」有多麼怪誕？

「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人傑地靈、物華天寶的好詞彙都被江澤民和胡錦濤用光了。學問有限、力有不逮的習近



平，如何締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論？「中國夢」成了習近平的名片。連「夢」都能成為「新理論」，可見中共高層的理論創新能力已經歸零。

習近平一聲令下，全國各地都爭先恐後地展開「中國夢」的宣傳活動。四川成都、綿陽、瀘州等地更是率先成立「實現偉大中國夢，建設美麗繁榮和諧四川」領導小組辦公室。相關宣傳甚至進入宗教領域，四川各地佛教協會舉行交流會，召集佛協所有成員、各大寺廟負責人「認真學習中國夢的重要講話精神」。

人們把這個新成立的辦公室稱作「中國夢辦公室」，簡稱「夢辦」——可以跟美國好萊塢「夢工廠」相媲美。

本來，在中共原有的機構設置中，已有宣傳部、文化部、新聞出版署和「精神文明辦公室」等，它們撒謊和騙人的本領各領風騷。造夢亦能成為這些老機構的「新任務」。但是，地方官員認為，惟有將「夢辦」作為一個新機構單列，才可顯示對習近平命令的重視。如此，四川官員「敢為天下先」，掛出「夢辦」的牌子。若看到「夢辦」誕生的新聞，習近平還不心花怒放，將當事人連升三級？

我不禁想到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東方雜誌》發起過「夢想中國」徵文。後來，數百篇徵文彙集成書。歷史學家洪業說，他的中國夢是「全國的人有飯可吃，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愛」；文學家林語堂說，「我不做夢，希望民治實現，人民可以執行選舉，人民之生命財產，不致隨時被剝奪」；學者馬相伯說，未來的中國，「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大學教授梁園東說，我夢想一個政府，「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讀者張傑說，夢想未來的中國，「是突然生出來一個甘地，艱苦卓絕，領導群眾，和橫暴勢力奮鬥」；讀者張競波說，「中國人，在太陽底下生活的人，都能很自由，很平均地各做其事」……這些中國夢，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辦公室」，能幫助這些夢想早日實現嗎？

然而，「夢辦」的功能不是為實現老百姓的夢想，而是為官僚子



弟提供「鐵飯碗」。中共建政以來，其機構之臃腫，可謂「前無古人，舉世無雙」。如今，連幫助人民做夢，都要設置專門的辦公室，不知又有多少「官二代」如沐春風地進入「夢辦」，當上吃財政飯的公務員？

二零零三年，溫家寶剛剛當上總理時，在一次記者會上透露，有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口，吃財政飯的多達五千七百人，平均每二十八個老百姓就要養活一個公務員。一九八七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一書中，公佈中國歷代官民的比例為：西漢，七千九百四十五比一；唐朝，兩千九百二十七比一；明朝，兩千二百九十九比一；清朝，九百一十一比一；當年為六十七比一。一九八八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難怪溫家寶承認，公務員隊伍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機構臃腫，他將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溫家寶當了十年總理，黨政機關公務員如野草般瘋狂膨脹，由四千萬增長到七千萬。

「夢辦」是中共機構膨脹的又一例證。「夢辦」是一個打著「習近平特色」的新單位。從江澤民時代設置負責維穩、如同納粹「蓋世太保」的「六一零辦公室」，到習近平時代專司「造夢」難題的「夢辦」，中共對民間社會一手大棒、一手紅蘿蔔，兩手抓、兩手硬。

民眾的眼睛卻是雪亮的，習近平盡可在中南海的牙床上美夢連連，民眾在網上的順口溜，卻無情揭示了「夢醒時分」的真相：「經濟最虛，文化最爛。外交最弱，軍事最熊。房價最高，醫藥最貴。教育最差，就業最難。犯罪最凶，假貨最多。污染最重，環境最劣。工人最苦，農民最窮，學生最累，股民最慘。旗幟最紅，理論最好。口號最響。」

生活在這樣的國家，你還有夢嗎？

這樣的統治者在你的頭上作威作福，你能無動於衷嗎？

「中國夢」與「美國夢」南轅北轍

習近平在加州與奧巴馬會晤期間，宣稱「中國夢與美國夢相通」。這句話堪稱本年度最冷的「冷笑話」，也顯露出習近平「沒有不敢說的話、沒有不敢幹的事」的「猛人」性格。

也許，習近平真有本事讓十三億中國人都跟他做一模一樣的「帝國夢」，人人都在夢中向習主席三跪九叩、跳忠字舞、敬獻祥瑞。要達到這一目標，用負責意識形態的劉雲山的話來說，就是把「中國夢」的內容「植入」年輕一代大腦中。一個接一個打開人民的腦顱，塞進一碗豆渣，或者安裝一個晶片，這是他們最輕車熟路的活兒。

不過，習近平無法將美國夢「同化」為中國夢。何為美國夢？美國歷史學家希梅爾法布指出，正是在自由——宗教自由——的名義下，很多最早居民來到美國；也正是在自由——政治自由——的名義下，他們後來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美國開國之父約翰·亞當斯描述對未來美國的憧憬時說，「一個自由的國家」，「一個兩千萬或三千萬自由人組成的國家」，「他們中沒有一個貴族或國王」。今天，美國的人口超過三億，是約翰·亞當斯估計的上限的十倍；但美國的本質一如既往，「自由」是美國夢中最絢麗、最美妙的部分。

那麼，哪裡可以找到活生生的美國夢？《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文本，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無畏地揭露「水門醜聞」的新聞記者，挺身與恐怖分子搏鬥的美國航空77航班的乘客……都是美國夢的體現。反之，美國夢與野心家的獨裁格格不入。獨立戰爭勝利之後，華盛頓的威望臻於頂峰，老部下路易斯上校寫信勸其加冕為「美國國王」。華盛頓回信痛斥說：「我認為這個請求孕育著可能使我蒙受最大災難的陰謀。假若我沒有利令智昏、自欺欺人的話，你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比我更不同意你的陰謀的人了。」

只有心懷如日月星辰般的美國夢的人，才能如此鏗鏘有力地表達對野心、私欲和專制的厭惡與反對。

習近平並不具備如此的胸懷和覺悟。習近平的夢想是成為「毛澤東二世」，如果他是華盛頓，收到那封勸進的信件，還不心花怒放，立即黃袍加身？習近平對華盛頓放棄觸手可及的獨裁權力，一定感到不可思議，甚至嘲笑華盛頓是個「傻帽」。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確實大於人與禽獸之間的差異。

「中國夢」與「美國夢」之差異，是信仰和價值的差異，是人心和民情的差異，也是政體和政府的差異。有網友調侃說：美國沒有組織部，所以沒有買官賣官；沒有國土部，所以沒有強拆；沒有鐵道部，所以沒有黃牛倒票；沒有宣傳部，所以記者可探究真相；沒有文化部，所以文化繁榮；沒有廣電總局，所以能拍出大片；沒有科技部，所以科技發達；沒有國家民委，所以民族相處和睦；沒有宗教局，所以宗教能濟世利民！在此意義上，中國民眾最大的夢想，是拋棄像大山一樣壓在人民頭上的中共政權，換一個像美國政府那樣的民選政府。

如果硬要說「中國夢」與「美國夢」有相通之處，有聰明人為習近平總結出「中美兩國的五大共同點」：

- 一、中國到處都是中國貪官，美國到處也是中國貪官。
- 二、中國喜歡罵美國政府，美國也喜歡罵美國政府。
- 三、中國在壓榨中國勞動人民血汗，美國也在壓榨中國勞動人民血汗。
- 四、中國富豪生活在美國，美國富豪也生活在美國。
- 五、美國官員都是美國國籍，中國官員很多也是美國國籍。

習近平不妨命令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立即將這「中美五大共性」以特大字型刊登在頭版頭條位置。那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本國民眾，還敢不心悅誠服？

習近平與習仲勳同床異夢

高踞廟堂的紅二代帶著權力的傲慢炫耀這種「自信」，透露出來的是他們在思想知識方面的嚴重缺陷，是他們的雙重無知，也就是對當今世界人類文明大趨勢的無知和對自己這種無知的無知。只有陷入這種雙重無知的人們，才會將自己鎖定在極權主義的陳舊世界裡自我陶醉，才會繼續嚮往蘇聯帝國那樣的大國夢幻，才會否認蘇聯帝國以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納粹德國那種「德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專制精神紐帶。

——馮崇義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中共當局大張旗鼓地紀念已故元老習仲勳，紀念規格超過了習仲勳生前的職位，明顯是「父以子貴」。《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出醒目的消息：「紀念習仲勳百年誕辰座談會舉行，習近平作為親屬參加。」官方媒體和網站連篇累牘發表各方人士緬懷習仲勳的文章。各大網站都刊登了《習仲勳傳》的節錄，並將習近平的話用作標題：「我堅信我的父親是一個大英雄」。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習仲勳文集》、《習仲勳紀念文集》、《習仲勳畫冊》。中國郵政發行《習仲勳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一套兩枚。

耐人尋味的是，當日，當局將毛澤東紀念堂關閉一天——毛是戕害習仲勳的始作俑者，紀念毛與紀念習如何「兩全其美」？看似木訥實則精明。看似溫和實則剛硬的習近平，找到了一個「毛習兼顧」的秘訣——

這就是我此前對習近平的概括：習仲勳固然是習近平的肉身之父，毛澤東卻是習近平的精神之父。如此，習近平自以為做到「忠孝兩全」。

猴子爬到高處，尾巴就露出來。在地方上做官時，習近平不像薄熙來那樣乘堅策肥、飛揚跋扈，而是藏器待時、深藏不露。即便上調中央、成為儲君的那五年，他也不聲不響、陳陳相因。最後，習近平勝出，薄熙來落馬。一旦順利接班，習近平如猴子一樣盤踞在旗杆頂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習澤東」和「習近毛」的長尾巴。

當代楊康，認賊作父

習近平對老毛的尊崇勝過對老爸的親情，他就像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楊康，為了榮華富貴，不惜認賊作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半武俠小說的主題都是兒子苦練武功、誅殺強敵、為父報仇（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也是如此）。共產黨卻遵循相反的倫理準則：唯有出賣靈魂、出賣親友者，方能鐘鳴鼎食。

習仲勳說過，江山是江山，人民是人民；毛澤東說，江山是老子的，人民也是老子的。習近平認同後者，彭麗媛的那首《江山》唱出了「打天下，坐江山」的「盜賊主義」的真相，說的正是習近平的「心裡話」。所謂「讓歷史告訴世人：共產黨人能打下江山，也一定能坐好江山」，這就是習近平的信仰。

習仲勳開明和開放的思想觀念對習近平的影響有限，日本記者矢板明夫分析說：「在習近平人生人格形成最重要的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習近平一直與父親分隔兩地，因此他並未繼承到父親的政治立場。或許因為本身被下放農村的慘痛體驗，加上後來以太子黨的身份成功的經驗，讓習近平長大後，成為一個與父親截然不同形態的政治人物。」可見，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開明的父親，未必養育出開明的兒子，「虎父」常常生出「犬子」，不是「虎父」的過錯，而是「犬子」的背叛。

習近平剛一上臺便公開宣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齊彪，立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兩個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義》的文章，文章寫道：「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鄧小平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意義……樸實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澤東必然造成的嚴重後果。」於是，左派彈冠相慶、聞聲起舞，官媒上「文革」陰風猛刮、沉渣泛起。

習近平的「兩個不否定」，根本就是精神錯亂。中央電視臺推出六集大型文獻紀錄片《習仲勳》也是左支右絀，如旅法學者張倫所指出的那樣：這片子讓人看來，是很有趣官方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味道的。前三十年幾乎未得到多少肯定（見第三集「國事春秋」），後三十年高調肯定（見「主政南粵」、「勤政歲月」兩集）。最後一集「海納百川」中，是講習仲勳如何以真誠、理性、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態度與各少數民族交往的往事，這顯然也是與中共在對待少數民族問題上的主流尤其是前三十年的主流相悖的。而在「國事春秋」那集當中，主體部分是肯定習仲勳實事求是地抵制毛的主流路線，如反對修黃河大壩、在全國瘋狂拆城牆時保護西安古城牆、對「大躍進」持批評態度、廬山批彭德懷時所保持令人敬佩的沉默等。這實在不能說不是一種很大的諷刺。

不能否定毛，如何為習仲勳平反？習仲勳與胡耀邦關係良好，八十年代在工作上彼此配合，推動改革。當習近平執意轉向毛主義之際，胡耀邦的次子胡德華忍不住點名批評之。胡德華說，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後十年「文革」，他回顧「文革」時期的種種災難和黨內鬥爭說：「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們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懷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如果說都不能否定，那我們否定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三中全會以來的撥亂反正，否定的是改革開放，我但願它不是真的。」胡德華還引用了毛對習仲勳的那句有名的誅心之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

如果連這句話也不能否定，那麼習仲勳就當被囚禁至死。若習仲勳是黨國叛徒，習近平又如何能黃袍加身？

習仲勳的中國夢是從此不再有文字獄

當年，習仲勳被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的罪名隔離審查、非法監禁。習近平本人連帶深受其害。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回憶說，習仲勳投入冤獄長達七年，家人一直不知道是死是活。後來，習家人冒險給周恩來寫信求援，在周恩來的特別「關照」之下，習仲勳與分離多年的習近平和習遠平兄弟頭一次見面，慘境中的習仲勳一下子分不出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在那次見面之後，習仲勳又繼續蹲黑牢將近十年。

習仲勳在「文革」結束後複出，期望在有生之年推動民主法治建設。可是，經歷了鄧小平時代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運動，以及血肉橫飛的「六四」屠殺，最後與鄧小平分道揚鑣。被排除出決策層之後，習仲勳晚年陷入精神分裂，常常在公開場合發表一些出格的言論，當局安排他避居深圳，從公共生活中消失。最後，習仲勳痛苦而絕望地死去。

曾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在一篇訪問中提及習仲勳晚年提出制訂《不同意見保護法》的往事。八十年代後期，習仲勳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鮑彤是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和政治局常委會秘書，兩人在工作上有交集。一九八八年，習仲勳退居二線，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並兼任內務司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鑒於自己遭受的殘酷迫害，習仲勳對黨內的個人獨裁和偶像崇拜等現象深惡痛絕，對法治建設念茲在茲。在此期間，習仲勳提出了制訂《不同意見保護法》的建議，卻遇到種種阻力而無法實現。

習仲勳的中國夢是不再有人因言獲罪，但是這個夢想直到其去世依然是水月鏡花、海市蜃樓。鮑彤感慨說：「不應該讓習老的遺志湮沒無聞。」

中國不能沒有不同意見。中國太需要不同意見了。不保護不同意見，就是不保護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活力！……一切珍愛和踐行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活力的公民，一切拒絕摧殘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活力的幹部，一切堅守憲法第三十五條的法律工作者，都是習仲勳老人這一遺囑的執行人。」

然而，同樣經歷了毛時代的血雨腥風，習仲勳和習近平父子倆獲得的啟示卻迥然不同：習仲勳晚年痛定思痛，倡導民主法治，建議制訂《不同意見保護法》；習近平則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自居，對苦難的締造者毛澤東頂禮膜拜，一心想成為「毛二世」。

習近平要全體中國人都跟他做同樣的「大國復興之夢」，他卻不知道，人們更願意各自做各自的夢，甚至有很多人早已沒有夢了——他們看透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在毛時代受盡折磨、英年早逝的思想家張中曉，以「無夢樓」命名自己讀書寫作的小閣樓。張中曉在《無夢樓隨筆》中寫道：「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發現他真正是怎樣的。只有作為個人，才會感到歡欣和痛苦，才會負擔責任，才會做出好事或壞事。」所以，自由才是中國人的中國夢的核心內容。

習近平會把習仲勳關進監獄嗎？

法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用其簡潔而犀利的文筆，闡述了在他心目中，「母親」與「主義」孰重孰輕。他認為，即使為了達到獨立、自由、正義等崇高目標，也不能犧牲無辜者的生命：「我的母親就可能在一輛有軌電車上。假如（通過炸毀電車來謀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是正義，我還是更想要我的母親。」加繆的這句話早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普世價值觀的一部分。

然而，共產黨的價值觀與之相反：共產黨要求其黨徒為了主義、為了黨的利益，不惜拋棄父母和孩子。「文革」期間，父母與孩子、丈夫與妻子「劃清界限」、彼此為仇，乃是毛澤東的要求。習近平繼承了這

樣的「黨性原則」：「主義」必須高於「親情」。

如果今天習仲勳還活著，或許忍不住對時局發表不同意見，這樣的意見一旦上網並被點擊和轉發一定次數，習仲勳會像劉曉波、許志永、王功權那樣鋸鐐入獄嗎？既然薄熙來曾親自對父親薄一波拳打腳踢，習近平未嘗不會「大義滅親」地將父親習仲勳再度送入監獄。當年，毛澤東給習仲勳冠以「利用小說反黨」的罪名；如今，習近平則要給習仲勳扣上「利用網絡顛覆國家」的罪名。習仲勳在兩個時代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從來沒有容許言論自由的共產黨政權

對於斯大林的恐怖統治給蘇俄民眾造成的毀滅性損傷，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戈夫在《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書中指出：斯大林的遺產的首要成分是不自由。隨著禁止、限制和強制等一套精心設計的辦法的日益廣泛運用，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產生了社會被動性、漠不關心和因循守舊的心理。大量使用強迫勞動和放逐，對社會思想實行普遍監督，對任何一點異己思想的表現作出懲治的威脅——用這些辦法來「美化」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的不自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人們不能談論自由，連想一下也是危險的。於是，蘇聯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死亡一般的停滯。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在重蹈昔日蘇聯的覆轍。《北京日報》在社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要敢於亮劍》中，直接引用習近平的一段講話：如果意識形態工作這一手不抓、不硬、不強，如果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抓而不緊、抓而不實、抓而不常，最後必然會出大問題，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習近平還提到「當年蘇聯亡黨亡國、東歐劇變，這幾年中東、北非國家動盪戰亂、政權更迭」，他從這些事件中汲取的經驗是：必須高壓，再高壓，才能維持現有的專制制度。所以，既然習仲勳是毛



澤東的敵人，那麼習仲勳也是習近平的敵人。

習近平不是要把包括自己在內的掌權者關進籠子裡，而是要把老百姓關進籠子裡。鮑彤在《一言國之夢》一文中指出，習近平的政策，估計會替「一言堂」平反，替它恢復好名聲，估計會繼續召開一系列的「一言會」，估計會組織全國共做一個夢——「一言國」、「一嘴國」、「一腦國」之夢。這個「具有習近平特色」的「中國夢」裡，當然不會有習仲勳的位置。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作家巴金在被問及關於未來的夢想時說，在一片血淚的海上，無論如何不能夠建立理想中美麗的天堂。他的夢想是「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願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靠著自己的兩隻手生活，在眾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奪人，也不被掠奪。」八十年之後，這個夢想對中國人依然遙不可及。

夢斷香江，血洗中環

——習近平的治港策

一條狗對著一條鏈子說：沒有鏈子你什麼都不是！一個奴隸對另一個奴隸說：沒有奴隸主你什麼都不是！一個太監對另一個太監說：沒有皇帝，你想做太監都不行，更什麼都不是！請朋友們用「沒有……就什麼都不是」來個造句大賽。

——冉雲飛

一份疑似是香港初中的通識試卷在網上瘋傳，問題包括中國歷史及香港時事。其中一條問題為：哪位法律學者發起「佔領中環」行動，爭取特首普選？

試卷提供了四項選擇，其中三項為黃毓民、戴耀廷及習近平。結果瘋傳中的試卷，答題學生選擇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媒體對此評論說：「最近稍為有留意時事的人，都應該會選擇香港法律學系副教授戴耀廷。這位學生卻高瞻遠矚，明白香港是否有真普選其實主宰於中央領導人，因此佔中運動最終會爆發，很大程度上的確取決於習總。說他是佔中發起人，也不算全錯呢！」

此前不久，習近平在印尼巴厘島會見香港特首梁振英時，重申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改的立場是「要依法辦事」。親北京的「星島環球網」評論說：「本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強調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至本港社會各界都必須依法處理政改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說明了反對派鼓吹違反本港法律的『佔領中環』及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公民提名』，不會動搖中央政府依法落實香港普選的決心。」親北京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金融界別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示，習近平「依法辦事」的言論，是針對反對派「占中」行動和「公民提名」建議。習近平是次強調依法辦事，反映中央政府立場十分堅定，「不會因為香港有人做了什麼運動，用了什麼手段，例如『佔領中環』，便有所動搖。習近平的訊息已經很清楚帶出來了，反對派不要再浪費心機，他們應該收手」。

真是賊喊捉賊，視憲法為玩物的習近平，有什麼資格說「依法辦事」？而那些不經選舉產生的「豬仔議員」，原本就是香港「偽議會政治」之奇葩，又有什麼資格大言不慚地代表香港市民發言？

習近平雄心勃勃的「中國夢」，當然要將香港圈入其中。換言之，港人必須跟習近平做同一個法西斯帝國夢，若有不從，就是亂臣賊子，就可以「人人得而誅之」。為了加速香港的「內地化」，習近平踐踏《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的決心不可遏制，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危在旦夕。

香港人為何要「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香港回歸之後，中共的黑手越伸越長，梁振英上臺，「黨人治港」成為現實。在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成為王儲，隨即執掌港澳事務，對香港的自由與法治變本加厲地蠶食鯨吞。奶粉兵團、內地孕婦以及持單程證、負有特殊使命的「新移民」如蝗蟲般湧入，若干紅衛兵風格的社團耀武揚威，中聯辦更是頤指氣使，港人固有的生活方式遭到嚴重侵蝕。在忍無可忍之下，港人終於發出憤怒的吼聲，反對運動和本土意識如燎原之火，不可遏止。連中共高官王光亞都不得不承認目前香港的現狀是：



「人心未歸，本土興起，青年反中，媒體作對。」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建議港人在中央拒絕給予普選權的情形之下，發起「佔領中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迫使北京改變立場。幾年前，我訪問香港時，與戴教授有過多次會面，也應邀到港大法學院作演講。後來，戴副教授到北京開會，也應邀到我們所在的方舟教會分享作為基督徒的信仰歷程。如今，就連這樣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也忍不住站到社運第一線，可見中共的對港政策完全失敗，中港矛盾愈演愈烈。

戴耀廷的這篇文章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喊出了香港民眾的心聲。港人已經看不到在體制內抗爭的希望：首先，特首由北京指定，再由一個小圈子裝模作樣地推舉產生；其次，在立法會，佔據決定性名額的所謂「功能組別議員」，均非民選產生，全是親北京的「名流賢達」，致使泛民議員無法形成制約力量，淪為無足輕重的少數派和邊緣派；第三，司法獨立被北京視若無物，中共官員宣稱香港從來不是「三權分立」的政體。既然體制內無路可走，港人紛紛呼應戴耀廷的建議，公民抗命成為港人對抗北京的最後手段。

在同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復活節前夕，運動正式定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誓言在香港形成「遍地開花」之勢。該運動由戴耀廷副教授、朱耀明牧師和陳健民副教授三人任倡議者，媒體稱之為「佔中三子」。其後，有十名各界人士表示參與「和平占中」，被香港本地媒體譽為「死士」。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龔立人指出：「和平佔中只是一個歷史企劃，我們無需要將一切希望押在它身上，但我們要承認，若沒有歷史企劃，我們對社會現狀的批判就欠缺想像力。」可見，「佔中」運動已經成為一個凝聚香港民心的焦點，如同當年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和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那樣，呼召一個個被孤立的「無權者」，彙聚成磐石般的集體，並迸發出驚人的力量。



「佔領中環運動」直接訴諸民意，與北京面對面地對決，準確地擊中了北京的軟肋——中共政權從未經過民選，多年來肆意操弄群眾運動，卻害怕真正脫離其掌控的公民運動。中共鎮壓零八憲章運動和新公民運動心狠手辣，就是心虛的緣故。習近平對「佔中」驚恐萬分，中國官媒稱「佔領中環」本質是「暴民抗命」，並警告港民不要成為「英美等境外勢力操縱的炮灰」。習近平以為，他的強勢手腕早已讓作為「經濟動物」的香港人卑躬屈膝，偏偏沒有想到「佔領中環」宛如平地一聲雷，使其面臨從所未有之挑戰。若佔領中環成功，習近平的「中國夢」就缺少了香江一角，他豈能甘心？

中環會變成第二個天安門嗎？

戴耀廷認為，習近平是技術官僚，對港人的公民抗命運動會作出理性的判斷，不會輕易使用武力鎮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中環也不是天安門。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判斷高估習近平的「理性」了。習近平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一代，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光棍」；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猛人」。他對若干事件的反應，很可能是非理性的、瘋狂的、自以為是的。習近平執政之後，四處「亮劍」，對香港也不例外。中聯辦宣傳文體部主任郝鐵川表示，如香港出現控制不了的情況，基本法規定中央可以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此前，習近平早已通過在香港安排的一些馬仔發出了恐嚇的信號。在立法會的一次對梁振英的問答會上，來自金融界的功能組別議員張華峰詢問說，有人倡議發起「佔領中環」，政府有否考慮過必要時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出動駐港部隊協助香港社會維持秩序？

梁振英不敢正面回應此問題，二兩撥千金地回答說，他對香港警隊的「專業性」充滿信心。

表面上，兼有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的張華峰是在詢問梁振英；實際上，他是在向「佔領中環」的倡議者及全體香港市民喊話：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繼承者都要由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當局欽定，中央要港人接受一名地下黨特首與一群小圈子的議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你們居然敢拒絕接受，甚至上街遊行，進而企圖「佔領中環」，真是自不量力、以卵擊石。解放軍駐港部隊早已磨刀霍霍，還不趁早向北大人俯首稱臣！

曾經是菲律賓華僑的張華峰，半個世紀前移民香港，大約是嫌菲律賓政府腐敗低能。如今，此一時，彼一時：當年是窮人的他，無比痛恨腐敗；如今是富人的他，卻歡迎腐敗。他在南京的房地產項目，一夜暴富，點石成金，還不是中共腐敗文化開出的「惡之花」？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北大人讓張華峰賺到金山銀山，張華峰便代替北大人放出不惜「將中環變成天安門」的風聲——不是豬仔議員要動手殺人，乃是習近平企圖學習毛澤東、鄧小平「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屠夫絕技。

港臺唇亡齒寒。香港民主派人士赴臺灣與民進黨人士會晤，民進黨重要理論家林濁水亦到香港發表演講，港臺民間社會的親密互動，讓習近平如坐針氈。中共官媒將香港民主派與臺灣民主人士交流視為「台港獨立勢力合流」，上綱上線，大加鞭撻。可以預見，日後中國會藉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新機制，加強在香港的活動和介入程度，加緊箝制香港的自由和公民社會。中港衝突將加劇，不排除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的可能性。

中共的宣傳機構開足馬力，將香港人妖魔化為「港英餘孽」，缺乏愛國心，只配當二等國民。習近平指揮五毛們在互聯網上炮製了題為《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都不是》之類的粗鄙不堪的文章，然後在新華社全文刊發，並評論說，「祖國強大穩定才是老百姓幸福自由的前提」，「愛國才是正能量」。那麼，「不愛國」的港人，都該被趕進大海裡去。

香港政治評論員林和立指出，北京打壓「佔領中環」，已決定在必

要時採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他認為，北京打壓「佔中」已達到「文革式『武鬥』的臨界點」，無論是中國的內部或公開文件，都已將「佔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以及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林和立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已經親自督師打擊「佔中」。

林和立又表示，參與嚴打「佔中」的黨政軍單位，已多達十個以上。為進一步打擊「佔中」，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佔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高於中聯辦。解放軍駐港部隊已經在深圳頻繁操練，在必要時與由「禿鷹」一哥領導的、深受北京表揚的特區警隊聯手打垮「佔中」。解放軍駐港部隊甚至已經訂製了大批香港警察的服裝，關鍵時刻他們將換上警服，魚目混珠，以武力鎮壓佔中民眾。

以習近平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毛式思維，不會屈服於香港的民意。他心中的考量是：如果不「砍掉」佔中，台灣、新疆、西藏的「極端勢力」分離分子就會視中共為紙老虎。而現時中共「財大氣粗」，不需要理會西方輿論，只要在打壓同時給予香港一定的經濟優惠，即可令大部份港人乖乖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習近平為何不向習仲勳尋求智慧？

晚清名臣趙藩在成都武侯祠題寫了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其實，豈止治蜀是如此，治理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包括香港。

習近平搞得香港天怒人怨，真該停下來反省一下何為「良治」的問題。政治並不一定就是殺人放火，政治有可能達成雙贏的結局。在處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上，習近平該向他已故的父親習仲勳尋求智慧——雖然他大張旗鼓地舉辦了一系列紀念父親的活動，卻並未認真汲取父親的

政治遺產。

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在五十年代即受到毛澤東的整肅。「文革」結束後，習仲勳主政廣東，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倡導者，也是黨內元老中少有的開明派。在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遭到鄧小平非法罷黜之時，他挺身而出為之辯護；在「八九」民運中，他反對鄧小平出動軍隊血腥鎮壓的決定。

習仲勳的女兒、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隨侍父親多年，幾年前在報刊上撰文回憶父親晚年的生活。齊橋橋談到一個細節：「文革」剛一結束，習仲勳臨危受命，南下廣東。經過十年動亂，原本富裕的廣東，民生凋敝，滿目瘡痍。很多人以命相搏，游水偷渡到一河之隔的香港去尋求「人間樂土」。但是，幸運地逃走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偷渡者都被邊防部隊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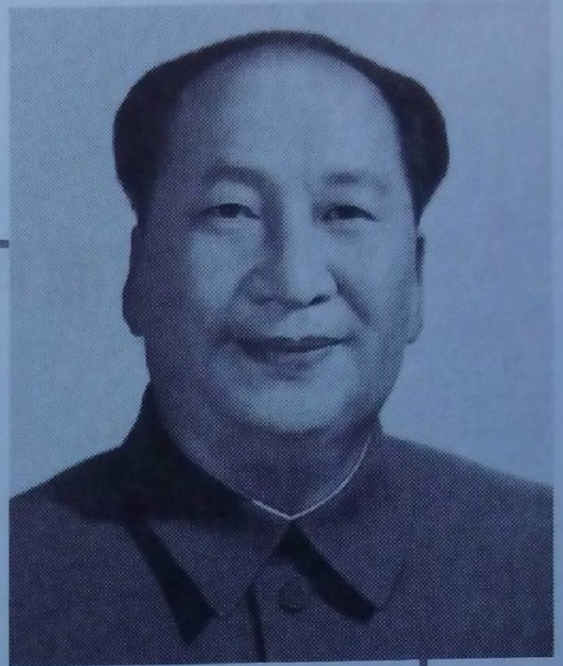
根據當時的規定，被抓的偷渡者統統送到收容站關押。當年八月，全省共發現並抓獲偷渡外逃人員六千七百零九人。鑒於事態嚴重，習仲勳多次深入到寶安和香港邊界視察。當他實地察看一個收容站時，時值盛夏，收容站條件很差，農民們被捆綁著像豬羶一樣關在一起。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骨瘦如柴的農民，習仲勳情不自禁地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用一種敵我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那一刻，習仲勳面對偷渡未果的廣東農民所流的眼淚，是真誠的眼淚。習仲勳的眼淚裡有真情、有憐憫、有愧疚、有羞恥。一個政權，無論如何高舉革命旗幟，無論如何宣揚愛國品格，如果連民眾的生存權都不能保障，又如何贏得民眾的信任與效忠呢？民眾沒有用手來投票的權利，只好用腳來投票。齊橋橋回憶說，當時習仲勳到沙頭角，看到香港那邊燈火輝煌，而大陸這邊一片荒蕪，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婦孺，感到身上的擔子更重。習仲勳由此下決心，一定要搞經濟特區，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習仲勳沒有把香港看作是反共基地，而是以香港為廣東的榜樣。習近平是習仲勳之子，聲稱從小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不知習近平是否具有乃父的淚水和乃父的遠見？習近平的地位遠比父親高，施政空間也遠比父親大。那麼，習近平願不願意順應歷史潮流，接受香港民眾雙普選的願望，在香港民眾實施「佔領中環」行動之前，即以圓桌會議的方式，以談判解決香港的政治困局，最終實現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習近平又願不願意放手讓內地向香港學習，不僅拓展經濟自由度，而且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不僅注重民生，而且伸張民權？如果習近平這樣做了，就將超越老父習仲勳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甚至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可惜，現在看不出習近平有這樣做的苗頭。

反之，如果習近平一意孤行，如同鄧小平當年下令「六四」屠城那樣，在香港中環重演血腥殺戮的那一幕，那麼，他註定了只能在地獄裡與毛澤東、希特勒、斯大林、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和卡達菲們「排排坐，吃果果」。這是他想要的結局嗎？



第二章

南柯一夢：

論法西斯之迷狂

「習家軍」為何而戰？

人們在摔倒前都有一種恐懼心理。

—— 奧新斯基

黨與槍的關係，決定中共統治的成敗和黨魁權力的有無。中共外圍媒體新加坡《聯合早報》大肆讚揚習近平治軍思維，並為中共黨指揮槍的弊政辯護：「中國『黨指揮槍』的原則顯然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來，很多發展中國家一直飽受頻繁的軍事政變之苦，政權在文人和軍人之間輪流轉。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頻繁發生軍人政變和軍人政權。但在中國，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過，這和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有關。……不管以後如何變化，在現階段，『黨指揮槍』這一原則仍然適用中國，而且非常有效。」

這番評論真是「睜眼說瞎話，滿紙荒唐言」。「黨指揮槍」的極權模式，並不能防止軍事政變的發生。林彪之橫死與「四人幫」之垮臺，不都是軍事政變？「六四」屠殺，更是一場赤裸裸的軍事政變。假如「黨指揮槍」的體制如此先進，新加坡為什麼不效仿之、將國防軍變成人民行動黨的黨軍呢？

事實上，正是「黨軍」這種陳舊不堪的制度模式和權力結構，使得解放軍陷入定位模糊、缺乏願景、喪失民心的窘境。「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盛讚軍隊為「共和國衛隊」，這支軍隊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卻跌至低谷。軍方在最近二十多年裡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經濟利益，瓜分國家財富，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卻未贏得民眾之尊重與愛戴。在越來越

頻繁的、官民對峙的「群體性事件」中，當局頻頻調動軍隊鎮壓民眾之抗議，使軍隊的名聲雪上加霜。本來是保家衛國的軍隊，成為「刺刀向人民身上捅去」的劊子手。這種「與民為敵」的處境，讓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都頗為焦慮。

中國的解放軍，不是國防軍，甚至也不是黨軍，而是私相授受的「某家軍」。這倒符合從楊家將、岳家軍、戚家軍、湘軍、淮軍、北洋軍一直到蔣介石「中央軍」的傳統。毛澤東從佔山為王的草寇煉成席捲天下這的暴君，其成功的關鍵正在於：在延安實現了對軍隊的絕對掌控——這一點，蔣介石在敗退臺灣之前始終未能做到。在毛咽氣之前，解放軍一直都是「但知有毛主席、不知有黨、遑論國家」的「毛家軍」。林彪對此一清二楚，念念不忘「槍桿子裡出政權」。毛澤東借林彪這把最銳利的「槍桿子」，一舉掀翻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技術官僚集團，卻容不下林彪這個對軍隊影響力太大的元帥。實際上，林彪雖號稱「副帥」，戰時指揮千軍萬馬、沙場點兵、多多益善，但在中共定鼎之後，卻連一個排的軍隊都無法調動。與毛攤牌之後，林彪無法組織有效的反抗，只能匆匆逃離，最後折戟沉沙、機毀人亡。

此後，中共的權力格局仍是「槍指揮黨」——鄧小平以普通黨員身份擔任軍委主席，卻可以違反黨章而罷免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可見，即便成為名義上之黨魁，若不能親手掌握軍隊，就不是擁有全權。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兩名強人實現了對軍隊的絕對控制，軍隊可稱之為「毛家軍」或「鄧家軍」。在毛澤東時代，陳雲在政治局的排名在鄧小平之前，但陳雲沒有像鄧小平那樣領過軍打過仗，故而在文革之後，陳雲只能擁戴鄧小平為一號人物，自己甘為二號人物。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任黨魁之時，他們都不是一手打下江山的梟雄，只能以經濟利益羈絆軍隊，滿足軍方不斷膨脹的欲望，故而不存在「江家軍」或「胡家軍」。再到習近平上臺，因其具備「紅二代」之背景，有過在軍隊工作的經驗，便企圖打造一支忠心赤膽的「習家軍」，使之成為其個人權力的堅實後盾。

軍頭充家丁，不保「一國」只保「一家」

軍中大佬們看到這一趨勢，爭先恐後地向新主效忠。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二炮」司令員魏鳳和和政委張海陽的聯名文章，稱要「自覺維護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的權威，做到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

司令和政委同時在一篇文章前署名，在中共軍隊中極為罕見，而且這兩人特別強調對習近平個人效忠，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信號。有評論家分析說，因為太子黨出身的張海陽一度與薄熙來接近，便借此「漂白」自己。然而，魏鳳和與薄熙來並無淵源，與張海陽亦非肝膽相照的兄弟，雖然兩人一起共事，但大可不必與之連袂行動、為之無償背書。

這篇「兩人同心」的文章，其出籠的背景決不簡單。若無習近平之授意，魏張二人斷然不敢造次。況且《求是》雜誌並非軍方的「私家花園」，不會擅自發表此類文章。《求是》發此文，顯然得到「中辦」首肯。

魏張二人供職於「二炮」，所謂「二炮」，即「戰略導彈部隊」。在解放軍各兵種當中，第二炮兵部隊掌管著所有陸基戰略、戰術導彈力量，並大力發展反艦彈道導彈。在習近平接任軍委主席後，首先將該部隊主管晉升為上將，反映出習對「二炮」的重視非同尋常。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習近平會見「二炮」出席黨代會的代表時，稱「二炮」是「中國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其地位在傳統的陸海空三軍之上。

有意思的是，在異議作家王力雄的預言小說《黃禍》和《轉世》中，企圖篡權奪位的主人公王峰，即為掌握戰略導彈部隊的副總參謀長，也是與張海陽類似的「將門之後」。王峰為了建立法西斯政權，不惜暗殺總書記，用核武器攻擊臺灣，挑動美蘇大戰，最終導致中國全面崩潰。習近平也許沒有看過《黃禍》和《轉世》，但他深知軍權尤其是「二炮」

的重要性，故而先讓「二炮」的兩名長官公開效忠，其他兵種和軍區自然群起效尤。收服「二炮」，也就邁出了收服全軍的第一步。

當下軍中已經沒有九十年代初期飛揚跋扈的「楊家將」（楊尚昆、楊白冰）——當年，江澤民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才拔去「楊家將」；習近平面前沒有桀驁不馴的軍頭，在獲得軍隊各兵種、各派系、各軍區的效忠之後，得以從容佈局，展開「整軍」運動。中央軍委作出明確規定，「軍委同志代表軍委發表講話和文章、個人發表涉及重大敏感問題的講話和文章，須報軍委批准」。耐人尋味的是，這個規定只是限定軍委成員的言論自由，對一般將領的公開發言並未作出硬性規定。

因此，某些在研究部門而非野戰軍任職的鷹派太子黨將領，如羅援、朱成虎等人，不斷在大眾媒體上就外交和軍事戰略發表「個人意見」。在涉及南海島嶼、釣魚島等領土爭端時，這些將領大膽放言，為了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不惜發動戰爭。他們甚至拋出圍魏救趙的「琉球地位未定論」，向日本和美國示威。既然要「整軍」，習近平為什麼對這些明顯「犯上」和「越界」的言論置若罔聞呢？其實，這些人是習近平刻意安排的棋子，他們並未指揮軍隊，大嘴巴怎麼放炮都可以；他們的話主要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尤其是說給東亞各國和美國聽的，這是習近平的宣傳戰的一部分。

習近平的如意算盤是：劉源、張海陽、張又俠等紅二代軍頭，在軍隊上層替他看守門戶、佔據要津；而羅援、朱成虎等地位相對較低的紅二代將領，則在公共領域為他的軍事擴張政策搖旗吶喊、逢人說項。如果說前者是鷹，後者就是犬。「習家軍」中，「鷹」與「犬」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以美為敵」和「以民為敵」

軍隊要膨脹，不能沒有「敵人」。即便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

人」來。二零一三年十月，由中國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國安部智庫）聯合推出電視片《較量無聲》，其視頻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該片總策劃是被很多人視為「改革派」的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以及國防大學校長王喜斌、總參三部部長、總政保衛部部長等將領。

《較量無聲》明確宣示軍方「以美為敵」的立場。該片指出，美國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美國和西方一直圖謀搞垮中國。美國在「五條戰線」上努力顛覆中國：政治滲透、文化滲透、思想滲透、組織滲透以及政治干涉和社會滲透。該片還宣示軍方「以民為敵」的立場。它警告說，劉曉波、茅於軾、賀衛方等知識份子「為西方服務」，還指責基督教傳播、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都是西方的「滲透陰謀」。被點名批判的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說，該片可笑之至，「充斥著冷戰思維和煽動話語，把一些國家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言行都妖魔化，甚至把因缺乏民主法治而導致的腐敗也說成美國陰謀」。

《較量無聲》沒有顯示製作時間，《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分析說，該視頻包含了習近平從二零一三年三月開始擔任國家主席的資訊，但未提及六月美國情報人員斯諾登逃離美國揭秘的內容，所以可能是在三月至六月間製作完成。

耐人尋味的是，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無聲較量》，並未在官方電視臺播出，而是以視頻形式在網絡上流傳。這說明習近平等最高領導人儘管首肯片中的觀點，卻還不敢公然力挺，而先以網絡傳播的方式，探視外界反響。

當該片掀起軒然大波之後，又迅速從網絡上消失。在優酷視頻網站和百度搜索《較量無聲》，均未顯示有關視頻。百度搜索雖列出「較量無聲標清，新浪視頻」的結果，但點選連結則出現「抱歉，你要訪問的頁面不存在或被刪除」。中國的網絡論壇上有人說，是中宣部下令刪除該視頻的。

該片的出臺和收回，暴露出習近平進退失據的心態。該片並非像海外媒體評論的那樣「發出了軍人干政的危險訊號」——在今日中國的權力運作模式中，軍隊不可能繞開中央擅作主張；恰恰相反，這是習近平對內和對外政策左右搖晃的又一例證。在本質上，習近平是個「以美為敵」和「以民為敵」的獨裁者，只是他缺乏毛、鄧的履歷、才智和霸氣，故而像烏龜一樣，時不時探出頭來窺視一下外面，若發現有利可圖，則猛咬一口；若發現危機四伏，立即將頭縮回硬殼之中。

習近平能依靠這支腐敗透頂的軍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戰、與人權意識覺醒的民眾開戰嗎？《較量無聲》看似氣勢洶洶，卻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有網友評論說：「中美較量，中共輸定了。何以見得？當年北洋水師訪日期間，日本統帥東鄉平八郎參觀北洋水師，用手一抹主炮炮管，發現全是灰，隨即判斷，北洋水師必敗無疑。細節決定成敗。《無聲較量》由國防大學、總參三部、總政保衛部聯合制作，連英文《無聲較量》都寫錯了。《無聲較量》應該是 Silent Contest，而不是 Silent Conest。大家不信再去看一次《無聲較量》的英文是怎麼翻譯的。」可見，負責制作該片的人員是多麼粗心大意、敷衍塞責——如此重要的片子，居然不請最喜歡秀英文的江澤民把關，才會錯得如此離譜。

解放軍將重蹈南斯拉夫人民軍之覆轍

習近平企圖以毛澤東「軍隊私家化」的模式治軍，其結果必然是解放軍管理繼續惡化、戰鬥力不斷下降。在未來的變局中，解放軍將重蹈昔日南斯拉夫人民軍之覆轍。

曾任南斯拉夫駐歐共體代表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塞洛布恩雅寫出了《南斯拉夫分裂大戲》一書，在論及人民軍在南斯拉夫分裂、崩潰、內戰中的無能為力時，敏銳地指出：「這支曾經意氣昂揚的軍隊最後遭到各方厭惡，變得虛弱、低靡、茫無目的，對一直曾經擁有堅強戰鬥傳統和完

好名聲的軍隊來說，簡直是個荒謬的結局。」那麼，這支人數超過五十萬、曾是歐洲最強大的作戰部隊之一的軍隊，為何淪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塞洛布恩雅認為，就像在其他所有由共產黨主宰的國家一樣，軍隊效忠黨，並且接受共產主義為其正式的意識形態。鐵托常說，南斯拉夫人民軍是塑造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和情感的真正熔爐之一。鐵托卻沒有意識到，正是「黨軍一體化」的僵化結構，使得「這支軍隊無法及時適應多黨政治的新現實，以致在衝突出現時，顯得處境尷尬，難以立即做出中立不倚的抉擇」。

由於長期接受黨化教育和洗腦灌輸，人民軍空有「人民」之名卻與人民的利益背離，就像解放軍空有「解放」之名卻從來都是黨奴役人民的工具一樣。當國家和社會的轉型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時，軍隊仍深陷在舊日體制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很快，「效忠的那個政治官僚體制瓦解之後，在軍隊中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而各共和國相繼脫離聯邦，又煽動了許多人改變其效忠對象——也可以說是叛逃，大批官兵流出南斯拉夫人民軍，加入了新共和國和民族主義的軍隊。」大部分人民軍官兵長期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不知道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盲目信奉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等訓導，當這些虛偽的意識形態隨著官僚體制一起灰飛煙滅時，他們也失去了「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目標，成為米洛舍維奇這樣的野心家的掌中玩物。所以，米洛舍維奇的垮臺，意味著人民軍的壽終正寢。

這是人民軍的悲劇，也是南斯拉夫的悲劇。如果人民軍是一支西方式的、忠於憲法和民主的國防軍，南斯拉夫的內戰未必如此血腥和漫長。塞洛布恩雅指出：「南斯拉夫人民軍的行為暴露出，在這支軍隊的本質裡，以及在這支軍隊所扮演的角色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南斯拉夫人民軍的形象和戰鬥能力之所以瓦解，正是這些問題造成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南斯拉夫人民軍所效忠的，是正在消逝中的鐵托主義南斯拉夫架構。」今天的中國解放軍不正是如此嗎？

解放軍是一支打上毛的烙印的軍隊，若重新冠以「習家軍」的帽子，它更難成為中國和平轉型的正面因素。它效忠於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利益與中國大多數民眾的利益是背離的。解放軍的槍口主要是對內，而不是對外；解放軍的僵化與腐敗使它喪失了對外作戰的能力，對內鎮壓手無寸鐵的民眾倒是綽綽有餘。

中共一旦崩潰、瓦解，解放軍會成為殉葬品。若中共無法起死回生，解放軍亦不可能鹹魚翻身。黨軍一體的關係，結果一定是：贏是雙贏，正如今天黨政軍既得利益集團對權力和財富的壟斷、對反抗者的鎮壓，使得黨和軍隊的利益高度一致；但是，輸亦是全輸，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即便解放軍武裝到牙齒，以無從拯救中共和軍隊自己走向滅亡之命運。

「習胖」學「金胖」，「強軍」仿「先軍」

北韓人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一樣，在軍事閱兵中踩著正步前進或集體表演體操來表現對領袖的忠誠。凝視著照片，我想辨識出隱藏在這些毫無表情的臉孔後面的內心世界。

——芭芭拉·德米克《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習近平在湖南考察。中新社報導，五日上午，習近平來到國防科大，首先檢閱了幹部和學員方隊。

大型閱兵式是蘇聯的發明。蘇聯通常在十月革命日這天在紅場舉行閱兵和遊行，宣傳蘇聯的建設成就和炫耀武裝力量。中共建政後，也效仿紅場閱兵，組織規模更為宏大的天安門廣場閱兵，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魁都享受過天安門廣場閱兵的快感。假以時日，習近平也會在天安門廣場過一把「閱兵癮」。

由於沒有遇到重要的紀念日，習近平只好先舉行小規模的閱兵儀式。在視察國防科學技術大學時，習近平確定的第一個節目就是閱兵。一九九二年，我作為北大新生，被強制到石家莊陸軍學院參加軍政訓練，練習閱兵式是最重要的課程，那是一個將獨立、鮮活的生命個體變成方陣中整齊劃一的、沒有面目的組成部分的過程。可以說，是千百人的痛苦，凝聚成檢閱者一個人權力欲望的滿足。

閱兵之後，習近平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強化官兵政治意識、政權意識；要努力培養造就能夠擔

當強軍重任的優秀軍事人才，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努力在前瞻性、戰略性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為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持續發展增強後勁」。先政治，再科技，從毛到習，一以貫之。

幾乎所有的獨裁者都喜歡閱兵式，以及動員大量群眾迎來送往。習近平每次接待外賓或隆重儀式，都要讓數百個小學生來充作「佈景版」——那是「文革」中盛行的把戲。此種做法跟習近平宣揚的「簡樸新政」背道而馳。香港《明報》發表了溫曉連撰寫的一篇題為《中國改革顛覆世界》的評論文章，認為「這種舊共產國家沉醉的排場，在上世紀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北韓外，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文章指出，未來十年，政治上的全面收緊可謂毫無懸念，中共的統治模式，會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寡頭壟斷，即黨內派系間有限度制衡，倒退回半世紀前的權力高度集中，近乎極權統治的原始模式。

壟斷權力，首先是緊握軍權。二零一三年年初，習近平在視察廣州軍區部隊時，登軍艦，進戰車，與基層戰士進餐時自己打飯，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與官兵「親密接觸」。官媒肉麻地稱讚說，「凸顯了一位全軍最高統帥的全新形象」。這個躊躇滿志的新科統帥，未來會自我加冕為「軍事家」嗎？習近平當然知道中國百病叢生、病人膏肓的狀況，急病亂投醫，好的不學，偏學壞的，而且學最壞的——他找到的榜樣，居然是三十歲的毛頭小子、朝鮮（北韓）金氏王朝的第三代掌門人金正恩。

對於習近平發出的劍拔弩張的軍國主義信號，極左派欣喜若狂，有識之士則憂心忡忡。有網民把習近平與金正恩的圖片並列貼出，暗示此二人沆瀣一氣、莫此為甚。兩人的相似之處包括：第一，習、金兩人都肥胖，而且都喜歡炫耀喜愛體育運動；第二，習、金兩人都是靠老子而不是靠選民的選票當上執政黨黨魁和國家元首；第三，習、金兩人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除了老調的宣傳和鐵腕的鎮壓之外，治國理念、思想和政績乏善可陳。

「中國夢」就是「強軍夢」？

習近平認為，北韓的「先軍政治」，可以拿來為己所用。所謂「先軍政治」，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金正日視察蟠松哨所時提出的「在國家事務中，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一切以軍事工作為重」，是北韓與「主體思想」並行的政治理論和指導方針。通俗地說，就是「沒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沒有子彈就不能生存」。北韓官方在二零零二年擴充、完備和全面推行「先軍政治」，使得朝鮮人民軍的地位空前提高。西方媒體評論說，這是北韓軍國主義化的重要表現。

二零一三年四月，北韓發表了一份頗能體現「先軍政治」特色的戰爭宣言，該宣言指出：「敵人應該放明白，在天下第一名將金正恩元帥的時代裏一切都截然不同。……現在，敵對勢力將徹骨地見識白頭山統帥的鋼鐵意志、無比的膽略和猛狠的作風，即沒有先軍北韓的星球是不會存在的。」該宣言恐嚇說，北韓將摧毀南韓乃至美國：「北韓革命武裝力量的首輪打擊，將摧毀美國本土和夏威夷、關島等太平洋作戰區內的美帝侵略軍基地，同時夷平霸佔南北韓美軍基地、青瓦臺等傀儡統治機構和偽軍基地，徹底殲滅侵略者、挑釁者變成灰燼。」（原文如此）這種語言，是從毛氏語言中偷學來的，如今「出口轉內銷」，成為習近平學習的楷模。難怪中國媒體上突然充滿「宇宙真理」、「中國共產黨是世界第一強大的黨」之類的奇談怪論。

「先軍政治」導致北韓政治專制，經濟停滯，發生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九十年代以來的幾波饑荒中，數百萬北韓民眾被餓死。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一書中，描述了饑荒中的百姓們掙扎著求生的悲慘故事。活下來的人只有兩種，一種是軍人和幹部等特權階級，另一種是善於從雜草和樹木裡吸收營養的強悍百姓。

如同毛時代的大饑荒並未從根基上動搖中共統治一樣，北韓的大饑荒也沒有給金氏集團帶來致命的危機。芭芭拉·德米克分析說：「北韓招來世人的訕笑。我們嘲弄北韓宣傳的誇大不實與北韓民眾的愚昧易欺。但別忘了，北韓的洗腦從嬰兒時期就開始了，每天十四個小時待在工廠的日托中心；往後五十年，每一首歌、每一部電影、每一篇報紙文章與招牌告示都在神話金日成；這個國家被密封起來不與外界接觸，人民無從懷疑金日成的神性。在這種情況下，誰有辦法擺脫呢？」當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偶像崇拜逐漸褪色乃至破滅之時，惟有北韓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繼續強化。金氏家族三代統治者都取得了某種「人間神」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習近平來說，北韓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他的夢想是將中國人變成乖乖聽話北韓人。暫時做不到這一點，至少可以先從軍隊開始。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習近平「南巡」廣東、海南。總共四天的行程，到部隊考察占一天半，去部隊基層又占三分之二。習近平特意乘「海口號」導彈驅逐艦出海，並在甲板上告訴水手們，「中國夢」對於國家來說是「強國夢」，對於軍隊來說是「強軍夢」，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據中國官媒披露，「海口號」由中國自行設計製造，是「代表中國海軍水面艦艇最高水準的第三代導彈驅逐艦，曾兩次赴亞丁灣護航，兩次榮立集體二等功」。習近平在「海口號」上宣佈其強軍政策，是刻意為之。

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當然與民主背道而馳。難怪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表示，「說習要改革是膚淺之見，改革之門正在快速關閉」。他認為目前的危險是，中共試圖通過鎮壓來保持權力，最後只能把中國搞成「巨型的北韓」。不過，小小的北韓可以通過徹底閉關鎖國而勉強生存，但中國這樣的「巨型的北韓」絕對不可能長期「政左經右」地存在下去。

對內緊抓軍權，對外伐功矜能

「槍桿子裡出政權」，是中共唯一的信仰。習近平之前的兩任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在上臺前與軍隊並無太深淵源。習近平似乎更有優勢：「文革」結束後，習仲勳安排習近平擔任當時的國防部長耿飭的秘書，耿習兩家是世交，耿飭對習近平分外照顧。在中共的軍事權力序列中，國防部虛有其名，不具決策權，但習近平由此與軍隊有了聯繫，也知曉了軍方上層的運作模式。不久，因為耿飭屬於葉劍英派系，隨著最高權力由葉劍英向鄧小平轉移，耿飭不得不退休，讓位給鄧家班。由此，習近平在軍方發展之路受阻。

山重水複疑無路，習仲勳隨即安排習近平到河北基層任職。然後，習近平空降福建，十年後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在福建任職期間，恰好遭遇二零零零年的台海危機，習近平以省長身份，兼任福建預備役高炮師第一政委，這是他再度與軍隊拉上關係。在此期間，習近平常常說：「部隊的事，要特事特辦。」以此拉近跟軍方的關係。又過了十多年，習近平熬成了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全軍上下都要齊聲向當年的國防部小秘書、如今的軍委「習主席」宣誓效忠了。

軍權是撈到手了，但軍方各大山頭、各大派系，是否心悅誠服、忠心耿耿呢？習近平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胡錦濤當年也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但軍隊與胡錦濤始終貌合神離。習近平可不願成為胡錦濤這樣的「弱主」，他需要一支如臂使指、指揮自如的軍隊。馴化軍隊，成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習近平看來，金家王朝三代世襲，鐵桶江山沒有一絲裂紋，其權力操作必有超凡脫俗之處。北韓給習近平的最大啟發，就是金家王朝的「先軍政治」——搞定了軍隊，就搞定了一切；軍隊既可以幫助肅清政敵，也可以奉命鎮壓反抗民眾。習近平不恥下問，金正恩傾囊相授。於是，習近平掀起一場「強軍運動」，提出「從嚴治軍、



科技強軍、自信統軍」的思路。

對外逞強，是振奮軍心的必要招數。柿子挑軟的捏，習近平先拿東南亞的幾個小國開刀。在東盟的十個成員國中，包括越南和菲律賓在內的四國與中國存在領海爭議。美國呼籲中國通過多邊談判解決爭議，但北京堅持雙邊談判——惟有如此，方能「以大欺小」。《華爾街日報》評論說，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正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領導人，並將接受中國軍事將領長期以來勾勒的更強硬世界觀。習近平認為美國正在衰落，中國到本世紀中葉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軍事強國。他正在為中國和鄰國更長期的緊張關係，以及與美國爭奪影響力可能引發的危險爭議做好準備。

二零一三年秋，奧巴馬趕回國內解決政府關門和美債危機，缺席了亞太經濟合作峰會（APEC）。於是，習近平看上去一枝獨秀。然而，獨霸亞太只是習近平大而無當的妄想。「德國之聲」評論說：「在汶萊召開的東盟峰會上，大家的討論很有禮貌而且符合外交規範。但在場沒有人忽視一種氣氛：中國越來越讓人覺得是被排除在這個區域之外的怪人。」比起笑裡藏刀的習近平來，東南亞各國更歡迎美國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沒有誰相信中國——一個虐待自己人民的政府，不可能善待周圍的鄰居。

強軍不一定能強國：在人類歷史上，有諸多擁有強大軍隊的國家，因為窮兵黷武、驕奢淫逸，走向衰微乃至滅亡。從羅馬帝國到拿破崙帝國，從納粹德國到共產蘇聯，這張名單的最後，是不是要添上中國的名字呢？

黨已腐敗，軍又如何？

習近平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源源不斷生產腐敗官僚的政治制度，而這政治制度，恰好是他與「紅二代」都要極力保衛的紅色政權。習近平無力改變這一龐大的官僚機器的運作慣性，他其實只是這一政治制度的奴隸。

——何清漣

近年來，中國解放軍軍心渙散，內部宴會飲酒成風，高級將領腐敗案屢有發生，軍官提拔出現老鄉拉幫結派、互相提攜。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由於缺乏足夠威望，對軍隊的腐敗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軍方則因為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軍費每年以超過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也就三心二意地向江、胡效忠。二十年間，雙方相安無事。

而習近平懷有更大的野心，他企圖以反腐、整軍來提升其在軍隊內外的威望，進而實現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然後利用強勢軍力稱霸東亞，與美國較量。二零一三年春，習近平拿到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至關重要的職位之後，多番強調「從嚴治軍」。中央軍委下發《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針對軍委的「十項規定」比針對政治局的「八項規定」更嚴，明確要求軍內宴會不得飲酒、軍委委員不得擅自題字、堅決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等等。

習近平還提出「能打仗、打勝仗」的「強軍思想」，要求軍隊加強實戰訓練。他下令禁止中國軍隊高官鋪張浪費、組織專項演出，禁止居

住豪華酒店。又大大縮減利用警燈的將軍數量。同時，剝奪軍人可以闖紅燈、利用免費汽油的特權。新華社報導，近日來，全軍和武警部隊各大單位共清退不合理住房八千一百多套、車輛兩萬五千多台，對軍職領導幹部實際使用的秘書全部清退。

毛式治軍，長官「蹲連」

值得注意的是，在習近平親自修訂的「十項規定」中，提出一項具體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五十五歲以下的團級以上領導和機關幹部、未有基層任職經歷的幹部和連職以下機關幹部必須「當兵」和「蹲連」。幹部「當兵」，要戴列兵軍銜，與連隊官兵實行「五同」（同吃、同住、同操練、同勞動、同娛樂）。「蹲連」是下到連隊，一般住在班排。

該「規定」指出，旅團級單位每季度、軍師級單位每半年、總部和軍區級單位每年至少一次「當兵」或「蹲連」，每次不少於十五天；旅團級單位的機關幹部每三年、軍師級單位的每四年、總部和軍區級軍官每五年，一般應安排「當兵」或「蹲連」一次。「當兵」重點安排在先進基層單位和駐邊遠艱苦地區部隊，「蹲連」重點安排在「小、散、遠、直」單位（指人員較少、高度分散、遠離機關的基層單位和團以上機關直屬單位）和執行重大任務單位。規定要求幹部「當兵要真當、蹲連要真蹲，切實當出感情來、蹲出好作風」。

該「規定」出臺後，《解放軍報》發表評論稱，部隊領導當兵蹲連是軍方的優良傳統，既可有助於瞭解基層實情，亦可防治庸、懶、散、奢等「機關病」。這是毛澤東挽救和平時期解放軍淪為「八旗子弟」的「錦囊妙計」：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解放軍曾興起過領導幹部下連當兵的熱潮。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提出全體幹部每年參加體力勞動一個月，軍官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毛在講話中警告老革命、老資格不能「辦糊塗事，講混帳話」。毛又說，軍民要打

成一片，幹部和士兵要能互相批評——當然，他本人是不能批評的，儘管當時大飢荒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蔓延，批評他的劉少奇後來成了「文革」的祭品。

在時勢迥異的今天，此項「規定」不過是紙上的「鬼劃桃符」，不可能迅速提升軍隊的戰鬥力。解放軍的那些養尊處優的高級將領，真的會如習近平命令的那樣，到連隊去過幾天艱苦日子嗎？比如，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肥胖如豬獾，弱智如孩童。如此殘障人士，本該到福利院頤養天年，居然官拜少將，號稱解放軍中最年輕的將軍。軍隊的人才選拔機製和晉升考核，在太子黨的面前形同虛設。普通百姓出身的下級軍官，無論才華多麼出眾，要想像毛太孫這樣獲得火箭式升遷，幾無可能。如今，習總一聲令下，毛少將會奉命到基層「當兵」和「蹲連」嗎？毛少將會與普通士兵一起操練和勞動嗎？如果毛太孫身體力行，他一定能超前完成減肥計劃。等著看幾個月後毛新宇的照片，真相就會大白於天下。若毛少將的肥胖指標沒有降下來，就表明習近平「下基層」和「蹲連」的號召是大話連篇。

昔日「毛式治軍」的策略，早不合當今之時勢。習近平刻舟求劍，愚不可及。以上規定，最終「雷聲大、雨點小」。從江澤民以來，政令難出中南海已成定勢。黨、政、軍各大系統內，已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潛規則」，習近平不可能一夜之間讓重度中風的軍隊變得生龍活虎、能征善戰。

「習總」要做元帥，「國母」不當將軍

野戰軍要嚴管，文藝兵也要整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頒發有關規定，強調加強對軍隊文藝團體的管理，其中包括高級文職官員不得稱「將軍」。據新華社報道，這份經習近平批准的《關於規範大型文藝演出、加強文藝隊伍教育管理的規定》要求，軍中文藝團體要為官兵服

務、為部隊戰鬥力服務，不得介入商業演出等活動。

如是，「國母」彭麗媛再也不能被外界稱為「將軍」了。習近平先朝老婆開刀，難道是想做大義滅親的「薄熙來第二」？薄谷開來雖不曾
在軍中服役，畢竟是將門虎女，殺人不眨眼。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薄
谷開來常常穿著將軍服裝公開露面，如此敗壞軍隊的形象，固然是罪不
可恕。與之相比，彭麗媛出身寒門，靠個人的努力與打拼，一步步地爬
到「專業技術二級」的高位，級別明明等同於「將軍」，卻不能稱呼「將
軍」，豈不是太委屈了？身為三軍統帥的習總，不讓老婆當「將軍」，
難道要讓老婆當慰安婦不成？

中共軍隊中的文藝兵，確實是誕生慰安婦的淵藪。解放軍文藝兵制
度由來已久，毛澤東和林彪都曾利用此制度為自己或兒子選美。由於當
時參軍審查嚴格，毛澤東遂放心從文藝兵中挑選後宮佳麗，不致於帶來
安全隱患。而性格耿直的彭德懷元帥，因為毛澤東在韓戰前線血肉橫飛
之際，居然召聚一群美若天仙的文藝女兵到中南海晝夜淫樂，而怒髮衝
冠、大膽犯上，結果落得「將軍百戰聲名裂」，死無葬身之地。

若對照國外軍隊的經驗，可發現中國的文藝兵編制堪稱舉世無雙。
韓國近期宣佈取消文藝兵之編制，韓國軍方認為，文藝兵不僅不能提升
軍心，反倒擾亂軍中管理體制並招致民間非議。而在美國，三軍各自擁
有名聲卓越的軍樂隊，但其成員至多被授予軍士長的低級軍銜，從來沒
有哪個人因為唱歌跳舞的本領高，而成為將軍的。

《紐約時報》報導過歌手艾弗曼從軍的故事：艾弗曼是世界上最出
名的樂隊——「涅槃」(Nirvana)的成員，退出樂隊後，隱姓埋名，參軍入
伍。執行過各種任務之後，他最想去的是特種部隊，「那裡完全是另一
個世界：能力相當的人組成小組行動；他們是精英，執行任務的範圍更
廣」。經過艱苦的訓練，艾弗曼成為陸軍特種部隊的一名普通士兵，和
其他留著大鬍子的同伴們一起，在阿富汗與塔利班作戰。

也許，手不釋卷的習總看到了這篇報導，並從中深受啟發。文藝兵

不管如何才華橫溢、功勳卓著，也不能稱為「將軍」，這是他整頓軍隊的又一個重要步驟。此前，民間對唱歌造詣不亞於彭麗媛的宋祖英，居然享受等同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頻有煩言並有諸多粉紅色的傳說；而「紅歌天王」李雙江的兒子李天一淪為輪姦案的主要罪犯，更讓這群「歌唱親愛的祖國」的軍中明星蒙塵。所以，此時再不出手，更待何時？

於是，習近平一聲令下，解放軍的文藝兵們回歸「慰安婦」的原位。但是，解放軍從此就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了嗎？

根治軍隊腐敗的妙方：化黨軍為國防軍

無論強打精神閱兵，還是逮捕一群腐敗將領；無論發佈文件要求軍官下到連排，還是取消文藝兵軍銜，習近平的種種舉措，都無法拯救解放軍的頹敗之勢。

習近平堅持認為，只要軍隊控制在黨魁手中，軍隊便能捍衛其江山不變色。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全軍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是解放軍的軍魂和命根子」。隨即，《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決抵制「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談認真學習貫徹習主席在接見全軍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代表時的重要指示》，社論指出：「敵對勢力滲透破壞花樣翻新，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企圖把我軍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在這種情況下，始終把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來把握，作為最高政治要求來落實，作為最高政治紀律來遵守，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事實是：既然社會各界都要向黨看齊，黨已腐敗，軍又如何？黨的腐敗無法解決，又怎能要求軍隊「一片冰心在玉壺」？腐敗的軍隊，雖然屠殺人民綽綽有餘，但要應付一場革命或對外征伐，就未必易如反掌了。

習近平的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中國社會正在不可遏制地走向潰敗。一個潰敗的社會，又怎麼可能擁有踔厲風發的軍隊？今天中國的問題，根子在於統治階層拒絕啟動政治改革、拒絕實行民主憲政。而一旦民主轉型開始，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官僚腐敗必能得到遏制，軍隊腐敗亦將迎刃而解。在此基礎上，方能化黨軍為國防軍，使軍隊恪守政治中立，如《零八憲章》所言：「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準。」

習近平喜歡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其實，在軍隊的性質上，毛說過與習近平的講話截然相反的言論。一九四五年，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問毛澤東：「你贊成軍隊國家化，廢止私人擁有軍隊嗎？」毛澤東答：「我們完全贊成軍隊國家化與廢止私人擁有軍隊，這兩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國家民主化。」這段話原載於《新華日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也說：「『軍隊是國家的』，非常之正確，世界上沒有一個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習近平為何不聽毛主席的教導呢？

而在彼岸的臺灣，早在一九九八年便由立法院通過、二零零二年開始實施《國防法及國防組織法》，該法規定：「中華民國國軍落實非黨化、非政治化的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服從憲法、人民以及民選總統為三軍統帥，所有的政黨組織退出軍隊。」軍隊的國家化，是社會民主化的堅實根基。

與之相比，習近平拒絕走民主憲政之路，聲稱共產黨及其黨軍可以「自我反腐」，豈非大謬不然？

對日開戰是習近平的「速效救心丸」嗎？

我們這個時代的神，就是人們所說的祖國。

——西蒙娜·薇依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防部突然宣佈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涵蓋有爭議的島嶼。中方的舉動不但激怒日本，美國方面包括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也在週末發表緊急聲明表達「嚴重關切」，並重申《美日共同防禦條約》之第五款適用於尖閣諸島，也就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

中共當局卻一意孤行。當晚，兩架中國偵察機飛進日本宣稱的防空識別圈內，其中一架飛機距離釣魚島僅四十公里，日本航空自衛隊立即出動 F15 戰機升空攔截。與此同時，中國的無人機「利劍」也亮相，成功試飛二十分鐘。分析人士認為，未來中國可能在東海應用無人機。中國還放話，若日本敢擊落中國的無人機，就會啟動戰爭反擊。中日關係雪上加霜，降到冰點以下。南韓、澳大利亞等國也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表示不能認同中國的做法。

針對美日的反應，中國的回應空前強硬，甚至不顧應有的外交禮儀。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要求日本停止發表「誤導國際輿論、製造地區緊張氣氛的不負責任言論」。楊宇軍強調，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有效行使自衛權的必要措施，符合《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楊宇軍稱，針對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表態，

已向美駐華使館武官處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美國「不要再發表不當言論，釋放可能助長日本冒險性的錯誤信號」。該發言人還說，「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的國家安全，停止對中方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正當行為說三道四」。

早些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已經為中國的做法作了辯護。秦剛稱，「目前釣魚島局勢完全是日方錯誤行徑造成的。美方應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切實做到不選邊站隊，不再發表不當言論。」秦剛重申，中方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

楊、秦之類的發言人，只是台前傀儡，他們說的，不是自己的心裡話，而是習近平的宣言書。連他們的語言風格也變得粗鄙、狂妄和蠻橫，以便更加貼近習近平。

在十一月九日，中共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一天，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突然開始僑民自願登記工作，「為在發生重大突發緊急事件時及時聯繫僑民並提供協助」，此舉充滿詭異色彩。再到「東海防空識別區」出現，習近平發出的軍事威脅的信號，有點像當年希特勒悍然進軍萊茵區。

當年，希特勒的冒險獲得了成功——軟弱的西方民主國家集體對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今天，習近平會有如此好運嗎？英國《每日電訊報》提出尖銳的追問：「北京發出威脅，任何飛行器在其新設立的防空識別區不遵守其規定將遭到擊落。這對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時刻。這個問題不容易耍技巧蒙混過關。其他國家要麼遵從北京，要麼不遵從。有一方必須退讓。」英國《經濟學人》的社論則將中方的行動跟一戰關聯起來，提到有人認為東亞現時局面一如二十世紀初的歐洲，釣魚臺則一如當年引發一戰的塞拉耶佛。

告別韜光養晦，走向窮兵黷武

香港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媒體《亞洲週刊》報道，此舉是中國

海空戰略重大突破。「背後深藏的意義在於，中國關注的焦點不再只是釣魚島，也不再只是東海中間線的油氣田，而是中國突破第一島鏈的出海口宮古海峽。」該刊還明確指出：「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作出決定而最終拍板，更提出中日之爭『由資源之爭演變為戰略之爭』的論述。」這一說法應當不是空穴來風。

在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大背景下，中共啟動領土爭端，拿日本開刀，給美國顏色，顯示其對外政策已有重大調整。有觀察家指出，這表明習近平縱容軍方鷹派勢力，鷹派將在中國外交政策領域擁有更大發言權。其實，不是習近平縱容鷹派，而是習近平本人就是鷹派的魁首。習近平的思維方式、價值理念以及維持權力的策略，都決定了他要脫離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對外的「懷柔」政策，轉而以「強硬」為標榜。當過「知青」的習近平，比「戲子」江澤民和「好學生」胡錦濤更敢於冒險。未來數年間，東亞局勢將陷入動盪不安之中。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知道毛澤東與蘇聯爭當世界霸主的夢想脫離國力、不切實際，遂決定埋首發展經濟、改善民眾生活，在外交上不出頭、不爭霸。一言以蔽之，「韜光養晦」成為鄧小平時代外交主軸。這也是鄧小平留給江澤民的遺訓之一，除了一九九六年試射導彈恐嚇臺灣選舉以外，江澤民很少用武力威脅週邊國家。到了胡錦濤統治後期，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軍費每年呈兩位數增長，「亂花漸欲迷人眼」，胡有了「大國崛起」的雄心壯志。不過，胡本性拘謹木訥，不是「一代雄主」，也缺乏慈禧太后當年「向萬國開戰」的豹子膽。胡的這個夢只做了一半，便被習近平接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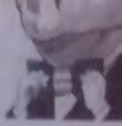
如今，中國的國內矛盾愈演愈烈，任何一點改革都會招致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彈。習近平無計可施之下，隱然有仿效當年鄧小平對越開戰的想法：「文革」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民心盡失，鄧小平以對越南發動一場有限度的戰爭來凝聚民意。儘管戰爭本身並未讓中國獲取領土及其他利益，卻讓鄧小平成功轉移了國內矛盾，從容度過統治危機。當新

的危機迫在眉睫之時，習近平未嘗不想故伎重施，發動一場對外戰爭——臺灣、菲律賓、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是其打擊的目標。尤其是近代以來與中國發生過多次戰爭、在中國人心靈深處埋下深仇大恨的日本，戰後實行「非武化」政策，又受到和平憲法的約束，似乎是中共動武的最佳選擇。

習近平的如意算盤是：首先，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未來將挑戰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美國。因此，中國必須先在東亞確立「區域霸權」的地位。那麼，誰是東亞的主人呢？要當東亞的主人，橫亙在中國面前的最大障礙，就是「挾美自重」的日本。習近平決定，中國在中日島嶼爭端中絕對不能退步，必須迫使日本低頭，才能將東海變成中國的內海，進而懾服東亞的其他國家。

其次，習近平在登基前曾親自策劃國內的反日風暴，數十個大城市，瞬間便有數百萬民眾群情激奮地上街反日。由此，習近平認為「反日民氣可用」，若順勢打出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牌來，有利於鞏固自己的皇權，乃至贏得民眾的效忠和愛戴，說不定可以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吟出「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名句。習近平認為，瞄準日本出招，可謂一石兩鳥的好買賣。

但是，這一次若發動對外戰爭，習近平未必能做到鄧小平當年那樣收放自如，一旦引火焚身，其結局將是自取滅亡。日本畢竟不是越南那麼好對付：中越之爭是兩個共產黨國家「難兄難弟」之間的「家務事」，越南實力有限，其他國家未必願意介入；而日本是亞洲最重要的民主國家，日本的經濟和科技水準遠非中國所能及，況且日本背後站著美國，一旦中日開戰，美國不會袖手旁觀。而且，今天中國在全世界的處境並無本質的改善：毛時代的中國還有亞洲的北韓、歐洲的阿爾巴尼亞等幾個「鐵哥們」；今天阿爾巴尼亞早已實現民主化，連北韓都離心離德，中國在全世界沒有一個真心實意的朋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勝負結局，早已註定。



美、日、台必將強化軍事聯盟

習近平生不逢時，此時在日本執政的，偏偏是小泉之後最強硬的首相安倍晉三。硬碰硬，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中國作出挑釁之後，日本政府立即提出強烈抗議。執政黨副總裁稱，中方的做法「毫無疑問令東海局勢一觸即發」。外相岸田文雄稱，「中國設定的防空區域是日本領土，我們不承認其單方面措施。」前防相高村正彥指出，日美兩軍必須防止中方造成局勢「爆炸」。首相安倍晉三嚴厲批評中國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升高不安，可能在當地海域及空域引發不測，是非常危險的行為。他說：「中國將日本固有領土尖閣諸島的領空標示得彷彿是中國的領空，日本完全無法接受，將要求中國撤回。日本決心捍衛固有的領土領海和領空。」

日本媒體也反應強烈。《產經新聞》稱，中國劃定防空識別區是憑藉軍事力量改變現狀，決不能容忍。中日防空識別區重複，會使得兩國緊急升空應對的戰鬥機接近，發生意外時「中國要負全部責任」。《現代東京時報》稱，中方所說的「對不配合識別或者拒不服從指令的航空器，中國武裝力量將採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無異於發動突襲「竊取」日本主權。《讀賣新聞》發表題為「中國防空識別區：單方面改變現狀不可容忍」的社論，社論指出：「習近平政權在內政方面面臨貧富懸殊等招致國民強烈批評的問題，因而處於困境。設立防空識別區的做法，難道不是通過高壓外交來刺激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以爭取提高國民對其政權的支持嗎？」

美國奧巴馬政府在長期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之後，終於從睡夢中醒來。奧習兩人在加州的那場「不打領帶的會晤」，並沒有讓奧巴馬窺透習近平的內心世界，並進而制訂長遠的對華外交政策。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任，民主國家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與專制國家

中國教文書局

黑箱產生的獨裁者之間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友誼，這是兩條亙古不變的準則。奧巴馬儘管缺乏外交經驗和願景，至少這兩條準則是知道的。

這一次，美國不再容忍中共的胡作非為。中國宣佈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幾個小時，白宮即發聲關切：「中國的舉動將惡化地區局勢。」正在日內瓦參加伊核問題磋商的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聲明中用了「嚴重關切」一詞，「這一單邊行為企圖改變東海現狀」。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一份言辭強烈的聲明中說，中國「這一單方面的行動增加了誤解和誤判的風險。」美國國防部的最新說法是，美國飛機將無視中國單方面在國際公海上空劃定的防空識別區，並將保護在那一區域飛行的美國飛機。

美國政府更是命令軍方展開相關行動。據美聯社報導，在美東標準時間二十五日午夜至凌晨三時，兩架美國 B-52 轟炸機未通知中國，飛越東海具爭議性尖閣諸島，在此區域停留一小時之久，挑戰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舉動。五角大廈發言人華倫（Steve Warren）上校表示：「我們在尖閣諸島地區進行任務，我們繼續遵循我們的正常程式，包括不提交飛航計劃、不事先用無線電告知、不登記我們的頻率。」此舉儼然是給了習近平一記響亮的耳光。

此前趾高氣揚、大言不慚的中共喉舌，要麼一言不發，要麼閃爍其詞。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聲稱，「美國飛機只是從中國劃定區域的邊緣飛過」，所以不予理會；而外交部發言人聲稱，對中國的「公告」，「有關國家不必大驚小怪，驚慌失措，對號入座」。習近平真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

美國主流媒體針對習近平的冒險舉動，措辭之嚴厲為近年來所罕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題為《中國必須將其防空識別區退出爭議島嶼》的社論，社論指出：「中國必須明白，單方面攫取空域控制權不是通向平靜安寧的正道。」《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中國的脅迫性遊戲》的社論，文章說：「鑒於中國單方面的決定，以及中國發出的有可能採取軍事行動的威脅，美國需要挺身而出支援盟國日本，捍衛國際公海和空



域航行自由的原則，支持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跟中國有領土糾紛的其他亞洲國家。」可見，美國輿論對中共的挑釁極為厭惡，中共隱然取代俄國成為「邪惡國家」的「龍頭老大」。習近平該為此感到驕傲嗎？

此次事件中，臺灣無辜而被波及。中國國防部公佈的東海防空識別區，不但跟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重疊，也和臺北飛航情報區有部分重疊，因此也涉及到兩岸關係。儘管馬英九政府對中國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但中共並不給予基本的尊重。中華民國國防部對此表示遺憾，臺灣國安會和陸委會也有初步回應。馬英九害怕觸怒中國，繼而聲稱中共的行為「不涉領空問題，更與領土等主權無關」，所以「不升高對立、自我克制」。難怪有臺灣媒體批評說：「如果不是賣台叛國，什麼才是賣台叛國？」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民進黨要求馬政府立即與美、日、韓等國採取一致行動，要求中國撤回東海防空識別區。這才是臺灣的主流民意所在。中國的舉動使兩岸關係再度蒙上一層化不開的陰影，近年來國共營造的「偽緩和」被打回原形。

習近平執政僅僅一年，便如此迅速地暴露出其狼子野心，對於利益攸關的美、日、台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面對習近平的戰爭威脅，美、日、台必然越走越近。首先，就日、台而言，儘管日、台之間對釣魚臺也存在領土爭議，但日、台關係良好，此種爭議可以通過談判等和平方式解決，不會惡化成兵戎相見的態勢。其次，美國「重返亞太」或「亞洲戰略再平衡」的實施，也需要有日、台等亞洲國家的支持。就連越南這樣一個昔日與美國發生過血戰、不共戴天的敵國，如今在中國的壓力下，也向美國靠攏，甚至舉行美越聯合軍演，更不用說像日、台這樣在二戰結束後，長期與美國保持戰略同盟關係的國家了。日本的民主是二戰之後由美國植入的，日本由此成為美國在亞洲的第一盟友。而美國早已用法律的形式確保了對臺灣的安全承諾。第三，美、日、台在價值、政體、國家利益諸多層面都有很大的共同點和交集，如果能締結成「鐵三角」，其週邊再有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泰國、印

度等國，則能形成一個亞洲地區的「准北約」，有效制約中共政權的蠢蠢欲動，從而確保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愚蠢是暴君的病歷卡，民族主義和擴軍備戰卻不是習近平的「速效救生丸」。如果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同仇敵愾，中共政權必然在四面楚歌之下知難而退。而顏面盡失的習近平，再回過頭來處理國內千絲萬縷、一團亂麻的難題時，更會因缺乏權威而步履艱難，其敗亡指日可待。

有多少中國人願意「聞雞起舞」？

對外戰爭絕不是掩蓋和轉移國內矛盾的妙方。雖然經過中共當局長期的洗腦教育，在中國民眾當中，反日情緒始終高漲；但是，一旦中共真的對日開戰，未必能像當年的對越戰爭那樣得到民眾的全力支持。因為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閉關鎖國的時代，民眾通過互聯網等各種管道，獲得了大量跟官方媒體不一致甚至對立的資訊。許多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在多元資訊的基礎上，去偽存真，進而形成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他們不會懵懵懂懂地成為官方洗腦教育和民族主義宣傳的犧牲品，不會像僵屍一樣無知無覺地走向戰場成為中共的炮灰。

一個極為生動的例子是：與習近平同屬於太子黨的鷹派人物羅援將軍，在其博文中呼籲「親愛的人民，我們應該去戰鬥！」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期待中的「登高一呼，應者雲集」，反倒遭到無數網民的反駁、諷刺和譴責，最終體無完膚、灰頭土臉。有一篇精彩的回應，說出了民眾的心聲，因而廣為流傳、膾炙人口。這既是給羅援的回答，也是給習近平的回答：

感覺到危機來臨了，歇斯底里地叫喊了，
到現在你他媽的「我們親愛的人民」了，

「我們」「我們」的，你感覺很親切是吧？

第一，養老雙軌制，看病多軌制，「我們」，不在一起吧？

第二，開著公車，遊山玩水，抱著二奶，吃香喝辣，「三公」揮霍時「我們」，也不在一起吧？

第三，高收入全保障，吃特供享特權，「我們」，還不在一起，對吧？——要打仗了，戰爭來了，你他媽的「我們」了！

還什麼「親愛的」「我們」！

對不起，「我們」，不是一夥的：

你們是你們，你們只是你們，也只能是你們；

而我們，我們，我們才是我們。

聽好了，告訴你們——我～們～不～去！

我們不去打仗，因為我們沒有多少什麼東東要保衛的，

我們不去打仗，因為我們也不想去「保衛」你們的東東。

——去招集你們的子弟兵吧，將軍！

從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商店裡，從馬爾代夫的海水裡，從瑞士雪山的滑道裡，去召集他們吧！

太遠了，是吧？而且，飛機的頭等艙太少，商務艙也不夠，

那好吧，那就近一些，

就從京都或省城的大機關裡，從CBD的寫字樓裡，從夜總會包房裡，去召集他們吧。

自己的子弟拿著槍，你們會放心：起碼他們不會掘祖墳；

自己的子弟拿著槍，保衛自己的利益，也算是盡了本分；

但願，那些個腦滿腸肥的傢伙還能拿得動槍；

但願，他們不會像祖輩那樣，臨陣怯戰當逃兵。

——我們，不去！不！不去打仗！

——我們看見過越戰退役老兵為生活艱難奔走的身影；

——我們聽見過老志願軍手捧幾百元顫抖的感謝國家的聲音。



中國教父習近平

我們會等待，等待著；我們有足夠的耐心等待，
我們會觀看，觀看著；我們會心平氣和地觀看，
觀看你們的完蛋，並且為你們的完蛋再出一把力！

習近平，你聽到了嗎？如果聽到了，你會為之兩股顫顫嗎？



習近平的「刀」與「劍」

他們傳遞的是對暴力的炫耀，是對文明價值的蓄意否定，
是對人的生命和權利的踐踏。

——安·蘭德

二零一四年剛剛開幕，習近平的首要舉措就是「從亮劍到動刀」：他將一年一度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政法工作會議」，親自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此前長達七年時間，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從未親自在此會議上講話；而習近平剛一掌權，便迫不及待地要動刀動槍了，真是「倚天屠龍，誰與爭鋒」？

對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報導，中共當局刻意製造一種「內外有別」的效果，表明其宣傳手段日漸精密和嫺熟：對外，報導的重點在於，習近平強調要揪出政法系統的「害群之馬」，不惜「壯士斷腕」、「刮骨療毒」，於是，習近平被塑造成反腐先鋒、一代青天；對內，則以一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毫不動搖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的評論員文章為主調，該文原封不動地引用了習近平講話的原話：「政法機關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機關，是黨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一個兇神惡煞的法西斯主義者，施施然地登場了。



「刀把子」是具有鮮明的毛澤東特色的語言

「刀把子」不是習近平的發明，而是毛澤東時代的語言。習近平沿用「刀把子」的說法，與其說是精心設計再和盤托出，不如說出於他的本能和本性——以他的成長經歷、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而論，他只能使用這樣的術語，他沒有別的任何資源可以援引，他的肚子和腦子裡就這麼一點「乾貨」。

媒體人錢鋼在《二零一四，開門就見「刀把子」》一文中梳理了共產黨的宣傳機構使用「刀把子」這個術語的歷史：國共內戰時期，中共黨報上的「刀把子」指權力，如關於「土改」、「鬥地主」的報導中有「貧農掌握領導權，刀把子拿到貧農手裡」之語；慶祝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報導稱「過去的刀把子拿在反動派手裡，壓迫的咱們不敢抬頭，現在把刀把子拿在咱們手裡，咱們老百姓的天下越鞏固了！」

五十年代，「刀把子」開始專指政法機構。《人民日報》的標題上首次出現「刀把子」，是在「反右運動」中。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報導《握緊人民民主專政的「刀把子」》，稱「右派分子倡狂地向人民法制進攻的目的是想奪取已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刀把子』，企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

「文革」時期，有「印把子、刀把子、筆桿子」之說，分指政權、專政機構和輿論工具。「刀把子」的語義一度涵蓋軍隊，與「全面專政」同義。《人民日報》曾發表解放軍「雷鋒班」的文章稱：「無產階級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掌握刀把子，專政對敵人。」

毛澤東常常炫耀他奪取和維持權力的「兩大法寶」：「槍桿子」和「筆桿子」，即暴力和謊言。毛是一個既可拿槍，又可拿筆的天才：百萬大兵，惟他馬首是瞻；百萬秀才，對他俯首貼耳。他污蔑習仲勳「利用小說反黨」，其實他才是揮動一支毛筆擾亂中華的罪魁禍首。除了槍桿子

和筆桿子之外，毛還有第三大法寶，即作為「刀把子」的政法系統。法學家滕彪在《馴服工具與刀把子》一文中指出，對於中共來說，軍隊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而政法則是「日日養兵，日日用兵」。所以，公安部長同時也兼任毛的貼身護衛。

在民國時期以及現今海外的漢語文化圈中，有「法政」這個從日語中移用而來的詞彙。所謂「法政」，「法」在「政」之前，政治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表明近代以來中國仿效西方民主法治國家建立「法律至上」體制的努力，儘管這種努力未能成功。而在共產黨統治的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則廣泛使用「政法」一詞，「法政」逐漸湮沒無聞。「政法」一詞傳神地傳達出中國法律和司法在公共生活中地位的最重要資訊：「政」在「法」之上，「法」隨「政」之後，法律沒有獨立的價值，法律是為政治和政權服務的婢女。

「沒有周永康卻勝過周永康」的維穩機制

繼《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發表之後，各大黨媒都刊載出「全國公安機關迅速掀起了學習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熱潮」的報導文章。其中，公安部長郭聲琨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有效解決了政法機關必須「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幹什麼、怎麼幹」這兩個重大問題，突出強調政法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機關、黨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充分體現了堅定的「政權觀念」。公安部副部長、紀委書記、督察長劉金國的「學習體會」更有引申和發揮的部分，「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非常有氣勢……既高瞻遠矚又腳踏實地，既論述深刻又語言平實。政法機關是黨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公安機關是刀把子的刀尖和刀刃。」此人一方面肉麻地吹捧習近平，一方面也塞入其「私貨」——顯示在公檢法三大家中，公安機關居首要位置，所謂「刀尖」和「刀刃」，寒光閃閃，讓人毛骨悚然。

習近平把持黨政軍大權之後，表面上鼓吹粉紅色的「中國夢」，骨子裡繼續推行暴力維穩，「小型文革」明目張膽地上演，封網抓人，國保肆虐，黑監獄遍佈全國。習近平的「刀把子」之說，等於是向全國民眾宣佈：你們不要以為周永康垮掉了，維穩體制就改旗易幟了；你們也不要以為只有周永康才是心狠手辣的屠夫，我要實行的是「沒有周永康卻勝過周永康」的維穩政策。

那些因為「康師傅下架」歡呼雀躍的人們，至此可以從幻想中醒過來。以蘇聯的歷史而論，雅戈達、葉諾夫、貝利亞等特務頭子被整肅乃至被處死，並沒有改變整個政權「克格勃治國」的本質；以中共的歷史而論，擔任過公安部長的羅瑞卿、謝富治、李震、華國鋒以及周永康等人下場都很悲慘，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的黨魁會改變政法系統是黨的「刀把子」的定見。

錢鋼對習近平仍然抱有期待，一廂情願地將習的講話與《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拉開距離。這是中國人慣有的「經是好的，只是被歪嘴的和尚給念歪了」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明哲保身之術。錢鋼苦口婆心地勸誡說，「刀把子」不是好話，「設身處地為當政者計，此舉殊為不智。強調中央權威，表明政治立場，完全可如江、胡，用有別於毛時代深紅話語的淺紅色官話，何必出此下策，使用有百害而無一利之粗鄙語言。」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剛愎自用的習近平豈能聽得進錢鋼的勸說！習近平不是李世民，錢鋼不是魏征。習近平更不是三歲孩童，知識份子給他個糖果，他就能被哄得開開心心。

習近平對打什麼旗、走什麼路，早已胸有成竹。如今，既然刀劍在手，殺氣騰騰，誰敢不跟著走！習近平從希特勒那裡學到不少成功的秘訣：當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國家元首之後，一方面承諾建立「人民共同體」，大力改善勞工大眾的生活，獲得民眾的真心擁戴；另一方面又運用蓋世太保和警察機構的恐怖統治，鉗制對手和異議分子，並讓宣傳部長戈培爾發起「反對發牢騷者運動」，統一輿論和思想。對於當時的德國普通



百姓而言，經過一戰戰敗之後的動亂及受辱的時代，他們普遍盼望秩序及安定，而這正是希特勒可以給他們的禮物。當然，接受這樣的禮物，得附帶接受「一點邪惡」，比如屠殺猶太人。於是，大部分德國人都袖手旁觀，或者假裝集中營和焚屍爐不存在。這也是目前中國民眾的心態：既然習近平敢於反腐、肅貪，那他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既然習近平輕車簡從地從中南海裡出來吃包子，他就是與人民「心連心」的「好主席」；如果習近平再給大家派發一點「改革紅利」，那麼即便他關押了劉曉波、許志永、王功權，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對內動刀，對外亮劍

習近平對胡溫十年的無所作為非常不滿，他要「有所作為」，即他所宣稱的「對內維穩，對外維權」。說白了，即「對內動刀，對外亮劍」，對內煽動民粹主義，對外灌輸民族主義。

當年，希特勒對外政策的核心是擴軍備戰，建立千年帝國。早在一九三六年的納粹黨黨代會上，希特勒就宣稱：「德國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得以應付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總理府的高層會議上，希特勒宣佈了「德國夢」的基本內容：「德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為穩固及保存種族團體，並加以擴大，因而出現空間問題。德國的問題是，如何以最低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土地。這個問題只能靠武力解決。」所以，希特勒將戰爭看成是納粹德國的出路。

與希特勒如出一轍的是，習近平的對外政策亦空前強硬，首先選擇日本作為靶子，同時也警告重返亞洲的美國。越是無能的統治者，越是要以對外擴張掩飾其自卑心態。如果說胡錦濤的絕招是太極拳，那麼習近平的拿手好戲就是鐵頭功。胡錦濤深知自己根底淺、派系弱、能力差，十年媳婦好不容易熬成婆婆，按部就班地打一組太極拳就罷了，哪敢有大開大合、大刀闊斧之革新？與之相比，習近平自恃擁有太子黨之純正

血統，況且只當五年的儲君就榮登大寶了，小人得志，豈不倡狂？不對外宣示大國崛起，如何千古留名？

習近平不曾上過戰場，卻自以為年輕時候當過國防部長耿飭的秘書，又是女少將彭麗媛之「軍屬」，自然就是精通軍事的「大帥」了。接過軍權之後，他第一個提升的上將是戰略導彈部隊司令，該在何處「畫龍點睛」，心中十分亮堂；他也親自鑽進女兵宿舍視察，對女兵動手動腳，盡顯三軍統帥之個人魅力；他視察海軍的頻率超過了其他兵種，並多次登上艦船出海巡視，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來，更有羽扇綸巾的風華。雖然中國的軍事實力遠不能與美國相比，習近平卻大言不慚地宣稱，「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仿佛「中美共治」的圖畫完全由他一手規劃。

習近平正在突破中共外交傳統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束縛。亞洲防務專家沃策爾（Larry M. Wortzel）在其新書《巨龍延伸：中國軍力走向全球化》中，評估了中國的戰略目標和軍事能力，以及對美國形成的政策挑戰。沃策爾認為，中國軍隊定位已經從主要關注直接相鄰的周邊地區向外擴大，這是對國家利益變化做出的回應。中國已經在非洲、南亞、拉美和中東等其他地區發展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些擴大的利益可能需要相應的能力去捍衛，同樣需要捍衛的還有對於中國貿易以及原材料和能源需求至關重要的海上和空中交通航線。但我認為，對習近平而言，比捍衛國門之外的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滿足他個人成為「世界霸主」的野心。毛沒有做到的事情，他要拼命一試，如果能夠逼退美國，誰能說共產主義陣營輸掉了冷戰呢？好戲還在後頭。

習近平大權在握，刀劍並用，頗有幾分毛太祖當年的英明神武，「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此言不虛。然而，習近平偏偏忘記了，《老子》中說：「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而聖經中更說：「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自古以來，那些熱衷於抽刀亮劍的劊子手，哪一個能全身而退呢？

從「希特勒的孩子」到「習近平的孩子」

告訴你，我的孩子，在你一生中，有許多事值得爭取。但，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永遠不要帶著腳鐐，過奴隸的生活。

——威廉·華萊士

當納粹政權覆滅之後，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納粹為什麼能如此迅速地崛起？那麼多睿智、博學、理性的德國人，為何全都被希特勒催眠和奴役？其實，這也是今天中共的統治看上去堅不可摧的原因——習近平執政以來，加速了法西斯化的過程，對內變本加厲地高壓維穩，對外從「韜光養晦」變成「大有作為」，中國成為全球的「風暴眼」所在。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報導中引述一名亞洲資深外交官員的看法，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所作所為，看上去似乎很聰明，但「明顯沒有讀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史」。如今，中國挑戰美國的地位，如同一百年前德國挑戰英國的地位。德國由此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那麼，今天的習近平將帶給世界何種未來？

如果能回答「希特勒是怎樣煉成的」，也就能回答「習近平是如何煉成的」了。這兩個人的上升的軌跡是兩條平行線。德國歷史學家哈夫納如此比較魏瑪共和國時期睿智的政治家拉特瑙與粗魯無文的希特勒：拉特瑙與希特勒位於現象的極端，讓群眾的幻想發揮到了極致——前者所憑藉的是令人仰之彌高的文化素養，後者所憑藉的則是讓人無法望其項背的卑鄙下流。前者來自深邃的精神領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歐亞兩

大洲於一身。後者則來自一個連最低級的廉價小說也描繪不出來的淵藪，那是一個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黴味、流浪漢收容所、軍營的糞坑和行刑室組合而成的陰曹地府，惡魔即自此向上竄升。不幸的是，前者被民眾敵視，遭到暗殺；後者受到民眾擁戴，通過選票成為帝國元首。

與之相似，「六四」之後，越發僵化的體制堵塞了優秀人才、尤其是有改革和民主思想的人才脫穎而出的管道，「比傻」、「比蠻」、「比狠」成為中共選擇接班人的標準。於是，苟合取容的習近平成了一代新君。未經選舉上臺的習近平，其統治合法性，甚至還比不上希特勒。在個人氣質上，他也比希特勒更乏味、更庸碌。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中共黨魁的品性和才能的變遷，就是一個「平庸度」越來越高的過程。愚蠢是成為獨裁者的前提，這也就決定了獨裁制度必然失敗的結局。

愚蠢者最大的理想就是讓別人變得比他還要愚蠢。這是透視納粹和中共的教育及宣傳模式的一個切入點。英國作家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指出：「極權統治賴以運轉的條件之一：對外仇恨，樹立一個長期敵人，灌注仇恨，充分利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缺了對外仇恨，人民就不生存在恐怖之中，不生存在恐怖之中自然不需要集權的保護。恐懼、謊言、仇恨是教育的唯一目的。」德國歷史學家古多·克諾普（Guido Knopp）以此為理論基礎，將目光對準那些納粹時代的青少年，那些「希特勒的孩子」，那些被牽著走的，而且是長時間心甘情願被牽著走的人。克諾普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一書中，通過諸多史料，包括私人檔案中尚未發表過的資料，向讀者指出：納粹時代，孩子們在十歲參加少年隊，十四歲參加希特勒青年團，然後加入納粹黨，再參加青年義務勞動軍以及應徵參加國防軍，這是他們必然的命運。數百名時代的見證人描述了納粹制度是如何有計劃地將他們吸引到自己一邊。在數百萬計的「希特勒的孩子」當中，超過三分之一死在戰場上；活下來的人，戰爭之後才知道，他們要為之犧牲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祖國。

「親愛的元首，我們愛你如同父母」

一九三二年，剛剛經過大選上臺、趾高氣揚的希特勒，在一次對青少年的演講中如是說：「你們作為少男少女站在這個新的德國一邊。你們對你們的德國忠貞不渝。當你們晚年回憶這一切時，你們將得到今天沒有人能夠給予你們的報答。」三年之後，對希特勒五體投地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一次大學畢業典禮的致辭中如是說：「我們尋找國家社會主義的成就、國家社會主義的特徵、國家社會主義觀點的理想體現。我們提出的任務是：德國青年開始吧。」

在還未掌握政權之時，希特勒已通盤考量過如何利用教育和宣傳攫取青年人的心靈。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德國的全部教育工作，首要的不是灌輸單純的知識，而是培養「隨時準備聽從召喚、有意志力和決斷力、自覺履行義務、發生矛盾時服從命令」的優秀分子。納粹掌權之後，大幅改組原有的教育系統、清洗自由派傾向的教職員工，不惜鉅資創辦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國家政治教養院、費爾達芬國社黨帝國學校等新式的教育機構，專門培養「作為希特勒的繼承人」的年輕一代精英。在這些學校任教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年齡不到三十歲的、狂熱的納粹分子。納粹司法部長漢斯·法拉克說：「希特勒像上帝一樣。」這是他的真心話，他要求所有學生對此堅信不疑。

希特勒十分重視對青年乃至幼童的洗腦教育。英國學者勞倫斯·呂（Laurence Rees）在《納粹：歷史的教訓》一書中指出，在一九三零年代，德國幼稚園的小孩每天早上都要念一段祈禱文：「親愛的元首，我們愛你如同父母，我們是父母的子女，所以也是你的子女，請接受我們的愛與信念。」希特勒常常親自視察從大學到幼稚園的各級教育機構，與青年和孩子們近距離接觸、親切交談。特奧佐默爾回憶說：「人們能看到的總是這樣的照片，照片上希特勒朝少年隊隊員們彎下身子，撫摩著小傢伙們的臉蛋，或者把手放在大孩子們的肩膀上。我們也希望能有

這樣的機會。我們畢竟是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學生。我們打著他的名號。」希特勒賦予年輕人以榮譽感和使命感，讓他們相信「未來是屬於他們的」，他們要「相信、服從、戰鬥」。

一九四一年，德國對美國開戰前夕，美國記者史密斯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關於納粹教育模式的報導。這篇報導指出，在學生都是百裡挑一的優秀人才的阿道夫·希特勒學校，「除了讀寫算以及被篡改了的德國歷史，還教給年輕人煤礦是怎樣運作的，怎樣建築橋樑；此外，還對他們提出了身體上的要求，這些要求使斯巴達青年的訓練相形見绌」。史密斯發現，納粹的教育目標是洗腦，讓軍國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學校給年輕人灌輸的是，相信德國人優越於其他所有的民族，向他們進行嚴格的種族思想教育。他們學習的是，憎恨以基督教作為宗教信仰和價值體系，相信『元首』的非凡力量。他們作為技術熟練、身體健壯、正派而又聰明伶俐的學生離開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但是，與猩猩相比，他們對於道德價值的理解只增加了一點點……他們一心嚮往的最高目標就是：英勇戰死疆場」。結果確實如此：活下來的人不到三分之一。

不僅要奴役肉體，還要控制靈魂

納粹的繼承人是習近平。人們原以為，胡錦濤時代已經夠左了，習近平無論如何不會比胡錦濤更糟——此前我就有這種僥倖心理。習近平上臺僅僅數月，迅速實現黨、政、軍「三權一體」，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擁有更大的權力。他並沒有使用權力來大刀闊斧地改革，而是掀起了向毛主義招魂的「意識形態之戰」。如果說此前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只是一幕裝腔作勢的舞臺劇，那麼習近平推行的就是一場驚濤駭浪般的法西斯主義狂潮。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磨刀霍霍、殺氣騰騰。他感到江山不穩，恨不得將毛澤東從水晶棺中扶

起來，讓太祖皇帝幫他坐穩金鑾殿。既然無法讓毛起死回生，只好用毛澤東思想來捍衛「江山永固」。不過，撲騰了一年多，「整風」卻整不動穩如磐石的官僚階層，「群眾運動」亦無法像毛時代那樣得心應手、勢如破竹。受挫之後的習近平，遂轉移戰場，拿出鄧小平傳下來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錦囊妙計。「七不講」、「反憲政」、「宇宙真理」，甚囂塵上；四面樹敵、封網抓人，一片風聲鶴唳。一夜之間，轉回「文革」，變臉之快，讓獄中的薄熙來亦自歎不如。

習近平在精神上是「毛澤東的兒子」，當然知道毛澤東對洗腦教育的高度重視。他要讓整整一代人都成為「習近平的兒子」，就得向毛好好討教。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訪問前蘇聯時在莫斯科大學接見中國留學生，並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習近平還是副主席的時候，訪美探路，在華盛頓中國駐美使館與中國留學生會談，引用的便是毛的這段話，顯示他與毛主義一脈相承。此後，在二零一三年的五四青年節，習近平在給北大學生的回信中，也發出了類似的「青春寄語」。

習近平一聲令下，教育部門緊緊跟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欄目播出教育部長袁貴仁的採訪，袁表態說，必須在教育工作中具體落實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的講話精神。他指出，中國教育系統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領域，學校是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課堂是傳播弘揚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管道，教育系統的領導幹部、知識份子、青少年學生，是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三大重要群體。教育部門當前將主要抓好四件事：一、著力抓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夢，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的「三進」工作；二、著力抓好習近平總書記在「六一」講話中提出的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的「三愛」教育活動；三、以勤儉節約、反對浪費為主要內容的節糧、節水、節電「三節」工作；四、著力抓好管課堂、管講座、管網絡的「三管」

工作。「要高度重視網絡在新媒體時代的作用，充分認識網絡的建設和管理工作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性。」袁貴仁還提出，要把大中小學的思想品德課的統一設計，「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

如此運籌帷幄、步步為營，宛如當年納粹周密計劃之翻版。「六四」以後，中共當局加強了對教育系統，尤其是大學的控制。江澤民時代發生過「新青年讀書會」案件——一個人數不到十人的大學生讀書小組，居然被羅織成「顛覆國家政權」的大案，四人被判八年、十年不等的重刑。胡錦濤時代發生過盧雪松案——青年教師盧雪松因在課堂上放映毛澤東時代被槍殺的自由戰士林昭的紀錄片，被停課、解聘乃至勞動教養。習近平掌權不久，敢言的學者夏業良、張雪忠、譚洪果等先後遭到解聘或被迫辭職，大學變成一言堂，「文革」幽靈沉渣泛起。

「六四」開槍殺人之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理不直、氣不壯，不敢唱左傾高調，對內縱容腐敗、悶聲發財；對外韜光養晦，不再輸出革命。直到習近平時代，中共自恃荷包鼓鼓，從軍隊、國保到城管武裝到了牙齒，在意識形態領域也「自信」起來。在文化、教育系統，不再是被動地「守」，而是開始主動地「攻」——一定要將失去的「筆桿子」拿回來，一定要把青少年牢牢掌握在手中。

習近平為何送習明澤到美國接受資本主義教育？

習近平明知中共統治危機四伏，卻被腐敗與維穩左右挾持，動彈不得。要反腐吧，一不小心就反到自己身上——彭博社報導習氏家族擁有巨額財富的事實，自詡清廉的習近平不敢給民眾一個交待，反倒下令封鎖彭博社的網站，驅逐彭博社的駐華記者；要放棄維穩體制吧，多年來，這頭怪獸已嗜血成魔，即便「康師傅下架」，它仍在高速運轉——習近平將從陰溝中爬起來的、滿身血污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提拔為公安部副部長，就清晰地表明，維穩不僅不能鬆懈，還要加強。在習近平

的主導之下，沒有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升級為荷槍實彈；沒有周永康的政法委則更加心狠手辣。

封鎖網絡與嚴控學校、尤其是大學，幾乎同步進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試圖將中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變成世界上最大的、讓納粹亦望塵莫及的洗腦工具，卻將他唯一的女兒送到哈佛大學去接受資本主義的「腐朽教育」。習近平不願女兒成為中國教育制度的犧牲品，當中國的青少年都被加工成羔羊般的「習近平的孩子」時，習近平的女兒卻是可以獨立思考的「哈佛的女兒」。中國人有句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習近平偏偏不讓國人分享他之所「欲」，而將他之所「不欲」強加於人。

在中國，推特和臉書被封鎖，在審查嚴格的微博上，發言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牢獄之災——在央視上被全國示眾的薛蠻子，就是前車之鑒，即便擁有美國護照，亦不能倖免於難，更何況天朝草民？而中國大學的校園網絡，早已被封閉成一座座孤島，學生們沒有言論和社交的自由。當局將每個學生「原子化」，將大學變成隱形的監獄，以此將學生的獨立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學生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與此同時，習明澤卻在哈佛大學享受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包括使用推特和臉書的自由——有人爆料，她甚至出現在一堂討論薄熙來案件與中國政治發展的課堂上，不過坐在最後一排，且一言不發。

然而，如果善良的人們就此認為，習明澤在哈佛的學習會讓她接受民主自由價值，並以此影響乃父，那就過於天真了。並不是所有的留洋者都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官二代」和「富二代」們不會忘記家族的權勢和財富是從哪裡來的。大多數中共高官的子女都有留洋履歷，這並不妨礙他們高度支持共產黨政權。

作為印證的例子是，《紐約時報》日前發表了一份由獨立機構的調查報導，綜合數千名旅美留學生的問卷。在被問及西方民主制度是否適用於中國時，僅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四的人贊同，卻有百分之二十五點四

的人反對，另有百分之四十一點二的人表示很難說。不少留學生認為，中國國情特殊，不能照搬西方經驗。有百分之七十二點三的人認為「君臣臣」的儒家政治觀念仍具現實意義。有百分之五十四點四的人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落實情況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七零後留學生有百分之四十五點八對政府工作滿意，八零後對政府的滿意度是百分之五十二點四，到了九零後這一數字增加為百分之五十七點二。可見，二十多年來，中共洗腦教育的成效越來越顯著，年輕一代中毒不淺，即便在西方學習、生活多年，也未必能治好「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才有這樣的「自信」：安排女兒到美國念書，乃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作為「紅三代」的習近平的女兒，其支持共產黨體制的信念，早已固若金湯。習近平不必擔心其受到西方自由化思潮的腐蝕。既然金正恩從瑞士留學回來都沒有「變壞」，那麼習明澤從美國留學回來說不定也可以順利接班呢。

希特勒沒有完成的事業，習近平正在接著幹。當整整一代「習近平的孩子」茁壯成長以後，中國的未來將是怎樣的面貌呢？

「紅衛兵」空降香港，「紅社會」隱然成形

也許，在新香港，沒有人性，才最有資格為人師表，否則怎能教學生向五星紅旗禮拜，把紅旗之下冤死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完全拋諸腦後；怎能鼓勵學生「學習毛主席的刻苦精神」，把駭人聽聞的驕奢淫逸，都美稱為「刻苦」；又怎能向學生講歷史，把六四屠殺輕描淡寫，化作「出動軍隊，平息風波」八個小字。

—— 古德明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建制派的「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舉行「一切從普選開始」論壇，邀請不同意見團體同場交流。出席論壇的「愛護香港力量」再次在論壇中大搞破壞，令論壇被迫中途腰斬。其中「愛港力」支持者更襲擊「學民思潮」成員黎汶洛，令受害者送院治療。「愛港力」與「人民力量」支持者在會場外也發生肢體衝突。

在論壇腰斬後，身為民建聯成員的「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主席周浩鼎表示，對「愛港力」的生事行為極失望，直言不會再邀請「愛港力」出席論壇。同為支持建制派的團體「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也指「愛港力」是「戲班小丑」，該會日後舉辦論壇，也會嚴禁「愛港力」支持者進場。

然而，香港警方卻選擇性執法，對「愛港力」的暴力活動縱容庇護。香港素有法治社會之美譽，這些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足以讓市民質疑港府；香港的法治何在？香港的安全何在？現實中的香港社會與杜琪峰的

電影《黑社會》相比，有何種差別？特首、保安局長、警務處長等拿著高薪卻不能保護市民，為何還不停職反省乃至引咎辭職？

「愛港力」，名為「愛港」，實為「害港」。有網民稱這種現象為「西環招安」，是北京當局利用一些一事無成的八零後去打擊九零後為骨幹的學民思潮。愛港並不意味著愛梁振英，愛國絕非愛習近平。無論是愛國者，還是愛港者，絕不是是以中共之是非為是非、以中共之好惡為好惡。恰恰相反，反對中共、棄絕西環，才正是愛國、愛港的最好方式。香港人當然要愛港，其具體表現就是捍衛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就是讓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繼續點燃。

何謂「文革」，誰在搞「香港文革」？

中港矛盾，始於胡錦濤時代末期（也就是曾蔭權的後半段任期），變本加厲於習近平掌權之後（也就是梁振英任特首之後）。

習近平成為王儲後，即執掌港澳臺事務，強勢作風，引發連鎖反應。作為「港英餘孽」的曾蔭權，戰戰兢兢，媚態十足。而香港民眾忍無可忍，社會運動愈演愈烈。於是，曾蔭權在電視上說：「當人民走到極端，就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當人民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無法管治那地方。」曾蔭權借此批評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訴求以及香港民眾對普選的呼求。

香港人確實對「文革」心有餘悸。當年，「文革」波及香港，是以炸彈襲擊的恐怖主義方式登陸的。曾特首企圖以「文革」恐嚇香港百姓，沒想到這番「曾子曰」偏偏暴露出他對包括「文革」在內的中國當代歷史的驚人的無知。

曾蔭權在會見一批中學生時，曾披露自己當年應考時，世界歷史和中國文學兩科都不合格。無知並不可怕，無知者如果持有一顆謙卑好學之心，便可將無知轉化為有知。作為特首的曾蔭權，可以效法喜歡引經據典的江澤民。江澤民為提升古典文學修養，特意派遣專車到北大接中

文系名教授袁行霈，每月到中南海講授一次古典詩詞。江學會了背誦《滕王閣序》，袁也以「南書房行走」的殊榮獲選「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不乏國學大師，如饒宗頤，曾特首不妨將其延入特首府邸，「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歷史」。

無知者的最可怕之處，乃是強不知以為知，乃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話語權傳播謬誤。當曾特首對「文革」的看法遭到主持人的否定時，仍然強詞奪理，無知而無畏，病入膏肓。「文革」與民主無關，也與人民的素質無關。「文革」不是人民的狂歡節，乃是毛澤東的整人術。從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在民眾的詛咒中死去，「文革」始終沒有脫離毛的控制。即便在武鬥肆虐、「全國大亂」的階段，軍隊仍然絕對服從毛一人的指揮。「文革」中，人民從未實踐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從未擁有過批評毛及「文革」的言論自由；「文革」中，人民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對毛頂禮膜拜的「自由」；「文革」中，人民連「生存權」也得不到保障，才有那麼多大陸客拼死偷渡到香港。

要瞭解什麼是「文革」，曾特首不妨讀一讀歷史學泰斗余英時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所寫的序言，這篇序言指出：「『文革』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行動，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階段。但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個絕對獨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結局。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有系統地進行消滅所謂『敵人』的運動，一波接著一波。正如俄國史名家派普思所指出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師法列寧、斯大林，而且也參考了希特勒的經驗。」這套光碟資料，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收藏，曾特首不妨屈尊去借閱。

用「文革」妖魔化民主派，是鄧小平以來的中共統治者喜歡用的障眼法。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使用「文革」比附民主運動，仿佛誰對他的統治有所不滿，誰就是要搞「文革」的罪魁禍首。如今，曾特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學會了鄧大人的偉大理論。可是，

重慶倒了個薄澤東，香港來了個梁澤東

薄熙來夢想當薄澤東，功虧一簣，轉眼成了階下囚。正如《紅樓夢》中《好了歌》所唱：「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

薄案爆發之後，北京不斷向國際媒體放料，將薄熙來妖魔化成萬惡不赦的惡鬼，連策劃民航飛機爆炸這樣只有本拉登才幹得出來的的事情，似乎薄熙來都有份。然而，看熱鬧的人們忘記了薄案的核心所在：薄為何能在短短數年間，便讓踐踏法治的打黑運動在重慶轟轟烈烈地展開，處死數十人、下獄數千人，牽涉數萬人？

根本原因，不是薄的個人品質問題，而是中共的制度問題：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司法獨立，毛澤東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澤東凌辱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拿憲法自保，卻被當作笑料。如今，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在邁向法治國家的道路上仍舉步維艱。

果然，重慶倒了個薄澤東，北京出了個習澤東，香港來了個梁澤東。梁振英以候任特首之身份，先後發表三個駭人聽聞的講話，豺狼本色，暴露無遺。

梁的第一句話是：不保證「雙非」嬰兒拿到香港身份證。他在說這句話之前，不可能沒有通讀《基本法》。《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享有居港權。在此法律未經修改之前，梁憑什麼「不保證」《基本法》賦予這些嬰兒的權利？儘管梁的這一表態贏得不少香港民眾的支持，但民意不能高於法律，否則「多數人的暴政」照樣導致專制。

梁的第二句話是：立法局「不要搞政治」。他儼然成了共產黨的政法委書記，不僅將公安、法院、檢察院全都一把抓，而且將立法機構視

為私囊。以美國總統號令世界的權勢，尚不敢對國會說三道四，為何梁振英這個「西環國」的兒皇帝，居然敢於凌駕於立法會之上，像老子教訓兒子那樣，教導議員什麼事情該做、什麼事情不該做？在梁的眼中，立法會如同內地的人大，不過是擺擺樣子的。

梁的第三句話是：對《蘋果日報》的報導「深表遺憾」。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是新聞自由，梁偏偏容不下新聞自由。是啊，同樣是共產黨官僚，若在內地為官，可以利用宣傳部控制媒體，耳根清淨；為何在香港為官，就不得不整天面對刺耳的批評？乾脆把香港變成內地，特首就可以輕鬆執政了。

習近平是編外紅衛兵，梁振英是外圍地下黨，兩人真是天生一對。紅衛兵在北京全面接班，在香港亦橫行霸道。習近平欽點梁振英治理香港，維園未嘗不可能變成天安門。紅衛兵縱橫香港，東方之珠遂淪為紅色淪陷區。

誰破壞了「鄧大人」一言九鼎的承諾？

香港舞蹈節剛一開幕，便傳出由香港芭蕾舞團與德國多蒙特芭蕾舞團合作的揭幕節目《紅樓夢》中有關「文革」及紅衛兵等情節遭到刪除的醜聞。無論是緣於特區政府或中聯辦施加的壓力，還是出於香港芭蕾舞團的「自我審查」，這一結果無疑為香港的文藝創作自由敲響了喪鐘。

喪鐘為每一個香港人而鳴。北大人不僅要控制你能看什麼電視，還要規定你能跳什麼舞蹈。下一步，連餐桌上吃什麼飯菜，他都要來插一手。東方明珠的香港，已然沉淪為死水微瀾的臭水溝。

當初，鄧小平信誓旦旦地向柴契爾夫人解釋「一國兩制」構想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即香港回歸中國後，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五十年不變，香港人「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如今，香港人當然還可以炒股，內地人也都在炒股，股票成了中共

點石成金的圈錢手段。就連香港股市也被內地的那些摻水虛胖的上市公司蠶食了半壁江山。香港人雖然還可以炒股，但再也不能信心十足，人人都要先看北京的臉色，再押上大半輩子的血汗錢。

而跳舞呢，從這次香港芭蕾舞團被閹割的遭遇可以看出，香港人雖然還能跳舞，但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必須嚴格遵循北大人擬定的劇本。若有北大人不喜歡的動作，哪怕你有沉魚落雁之美，也只能「藏之於深山，傳之於後世」。

於是，剩下的就只有「馬照跑」了。賽馬是英國人引入的貴族運動，而賭馬是香港人傳統的休閒生活。北京的貪官污吏對此不感興趣，他們更樂意到澳門金碧輝煌的賭場一顯身手。在那個揮金如土的戰場上，惟有大小「公僕」們「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所以，紫禁城裡的天朝貴冑們，懶得干涉香港人這點僅存的樂趣。

從電視牌照風波到《明報》總編輯換人，從紅衛兵式的親中社團攻擊林思慧老師到水客兵團凌霸香港市民，從駐港解放軍霸佔好山好水到內地公安跑到香港執法……特區的「特」字，日漸褪色；香港的「內地化」，不可遏止。如果真有人傻傻地問：究竟是誰違反了鄧大人「舞照跳」的承諾？答案很簡單，是鄧小平自己，以及鄧小平的接班人們。

中共從不兌現任何承諾、也不遵守任何條約。延安時代，共產黨以「聯合政府」的願景誘騙中間力量的支持，而一旦奪取政權，當年諷刺國民黨政權的名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便成為對共產黨自身的絕佳描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自食其言，施展「陽謀」，掀起「反右」運動，百萬知識份子遂成網中之魚；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出爾反爾，揮起屠刀，鎮壓「反革命暴亂」，數千愛國市民和學生頓成孤魂野鬼。殷鑒不遠，歷歷在目。

「黨人治港」終結「一國兩制」

我們的上一代為逃避共產黨而來，
請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重回魔掌。

——《光復香港》海報

梁振英未經普選，由北京操縱的小圈子欽定推選為香港新一屆特首，使香港進入「土共治港」時代。梁振英當選後立即赴中聯辦「認祖歸宗」，全然不顧香港民眾之非議。因為推舉他當特首的，不是香港市民，而是中聯辦。未來五年，梁振英不是香港市民的公僕，而是中聯辦的傀儡。以梁振英的級別，不足以隨時「上達天聽」，必須通過中聯辦來「轉奏」，所以討好中聯辦是他上臺後的首要任務。

習近平如虎，梁振英似狼，虎驅狼入羊群，港人未來命運堪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一天天走向北京的殖民地的不歸路。梁振英剛一上臺，港人便發起大遊行，數萬人絡繹不絕走上街頭，甚至有人焚燒特區區旗，這是此前遊行中很少出現的情況。可見，特區區旗與香港價值已經皮肉脫離，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和獨立傾向已如野火燎原。

此次，梁振英的「贏」，其實是「輸」。梁振英的處境比董建華和曾蔭權還糟糕：董、曾二人都是高票當選，直到任職末期才醜聞纏身、灰頭土臉；而梁振英在還只是候任特首時，就遭到大部分港人的唾棄。北大人利用此一卒子實現了「黨人治港」的目標，但「黨人」之品行與能力均弱於此前的「商人」與「公務員」。可以預見，此後之五年，將

會是「黨人亂港」的五年。

中共秘密黨員：梁振英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日前上載梁振英的簡歷時，以「同志」相稱，引來網民瘋傳和媒體查詢。「人民網」後來將「同志」兩字刪除。雖然「人民網」注明資料來源是「新華網」，但在「新華網」的領導人資料中，所有人都不稱同志。「同志」一詞是「人民網」夾帶的「私貨」，更是來自中宣部的「點睛之筆」。

此「同志」非彼「同志」——在港臺，「同志」是同性戀群體的特殊稱謂。梁振英有妻有子，大約不是同性戀之「同志」，而是黨同伐異之「同志」。香港媒體引述分析人士說，「人民網」將梁振英稱為「同志」，歷任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卻無此稱謂，此種差異不免讓人產生聯想。

「同志」之稱呼來自蘇聯共產黨，毛澤東曾在一九五九年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黨員以「同志」相稱。近年來，除了在黨內正式場合，一般共產黨員之間不再以「同志」相稱，黨報還曾特別發表文章，批評官員互相稱呼「老闆」的「庸俗習氣」。此次，「人民網」將梁振英定義為「同志」，不是無心之過失，而是為其「驗明正身」。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梁振英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在候任特首辦公室會見記者，當眾簽署法定聲明，強調自己不屬任何政黨。對於「人民網」以「同志」稱呼他，梁振英指出，自己不是共產黨或任何政黨成員，也從來沒有要求加入共產黨或政黨。

儘管梁振英百般辯解，卻不足以消弭世人之懷疑。香港政論家桑普撰文指出，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鐵證如山」。第一，已過世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曾在洛杉磯親口向學運領袖王丹說起，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第二，一九八八年，三十三歲的梁振英接替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已自稱共產黨員），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按照中共規定，秘書長必由黨員擔任。第三，「六四」後，梁協助中共起草包括新增第二十三條的基本法，若非中共自己人，不會如此胡作非為。第四，一九九七年，中共悉心部署，地下黨員葉國華出任董建華首席顧問，梁振英出任行政會議成員，兩年後更成為行政會議召集人。若非地下黨員，獲得如此權勢和地位，不可想像。這些疑點，梁振英無法一一澄清。

培養秘密黨員是中共的一大「法寶」。一九二一年，中共在上海建黨之時，便是一個與本拉登的「基地」組織類似的、大搞恐怖活動的小團體。中共長期以秘密會社的方式行事，毛周等人都是以馬列主義包裝的梁山盜賊。經過二十八年艱苦的地下黨生涯，中共終於奪取天下。但中共建政之後，仍未擺脫地下黨之烙印。其統戰部、外聯部等部門，職責便是在海內外發展和安插秘密黨員，且成效顯著。

在中共的歷史上，梁振英不是第一個秘密黨員，也絕對不是最後一個。許多人非得等到黨旗覆蓋屍體的那一刻，地下黨員之身份才曝光，可謂「蓋棺論定」。名聲顯赫的中共秘密黨員，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中華民國「國母」、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宋慶齡，幾乎相當於中華民國「副元首」卻發動「西安事變」救中共一命的軍閥張學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富可敵國的榮毅仁，「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負責人、代共產黨管理天主教會的主教傅鐵山……可見，無論或富或貴，或聖或俗，都可被中共收入囊中。既然那麼多如雷貫耳的大人物都是中共秘密黨員，多一個區區香港特首梁振英又算得了什麼。

「自我殖民主義」才是香港問題的死結

是港督治港好，還是土共治港好？是做英國的殖民地好，還是做中共的殖民地好？這不該成為一個問題。

中共的宣傳機構慣於炮製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迷魂藥，讓在殖民

地時代生活過的香港人在心理上有一種負罪感，似乎他們的愛國心天生就弱一等，需要後天拼命努力來彌補。孔慶東以此辱罵香港人，很多香港人亦不敢反駁。

其實，最壞的不是殖民主義，而是「自我殖民主義」。在西方知識界「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等左翼學說甚囂塵上之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奈保爾在深入觀察若干第三世界國家的現狀之後，敏銳地指出，將這些國家的一切麻煩歸罪於殖民統治或當前不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無補於事。恰恰相反，正是本國獨裁者的野心、腐敗和大眾的愚昧與殘忍扭結而成的「自我殖民主義」，才導致在那些「半生不熟的社會」中發生比動物界更為殘酷的、人與人之間的廝殺。所以，奈保爾將「自我殖民主義」當作批判的主要對象。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對中國的統治就是「自我殖民主義」的活標本。如果不是毛澤東好大喜功、為所欲為，怎麼會發生在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毛澤東從來不把民眾的生命與尊嚴放在心上，悍然對來訪的蘇聯領袖赫魯雪夫說：「中國不怕核戰爭，準備死三億人！」當然他自己不在其中。如果不是鄧小平執意維持一己和一黨之獨裁，怎麼會命令野戰軍在首都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和學生？鄧小平視民眾之生命如草芥，不惜「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的穩定」。以毛鄧為代表的共產黨，才是將中國看作他們個人的「殖民地」的「自我殖民者」。

中國歌手艾敬在一首歌中深情地唱道：「讓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給我蓋上大紅章。什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麼樣？他可以來瀋陽，我不能去香港。……香港香港，怎麼那麼香？」香港的繁榮和富足，因為有英國統治的緣故，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避開了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內亂和暴政。內地人將香港當作地上的天堂，北韓人奔向南韓，中國人則奔向香港。從五十年代以來的偷渡潮，到如今的赴香港生子的大陸孕婦，沒有選舉權的中國人都在用腳投票，他們不願意生活在共產黨的「自我殖民主義」之下，而願意生活在打上英國殖民地烙印的香港。

從來沒有聽說過有美國人、歐洲人、香港人偷渡到中國大陸，只聽說過中國人偷渡到美國、歐洲和香港。且不說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毛時代，即便是號稱實現「大國崛起」的時代，為什麼還是有成千上萬中國人前赴後繼偷渡到別人的地盤，不惜當「黑人」、打「黑工」，甚至發生英國多佛海灘上數十名偷渡客死難的慘劇？慘劇發生之後，倒是當地民眾自發到現場燃燭、獻花祭奠，中共駐外使館則不聞不問。中國民眾出自本能的選擇，難道不是「寧願做他國的非法移民，也不做共產黨統治下有名無實的『公民』」嗎？

「英人治港」非恥辱，「三百年殖民地」又何妨！

香港人將他們的遊行稱之為「反英」遊行。此「英」乃梁振英之「英」，而非「英國」之「英」也。此「英」的背後是「習」，反「英」必要反「習」——梁振英不過是習近平的走卒而已。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之後，多份民調顯示，六成以上的港人懷念英國之「良治」。這也印證了劉曉波當年「三百年殖民地」之論斷。劉曉波為此承受了鋪天蓋地的辱罵和抹黑。

出賣國家土地最多的中共，厚顏無恥地以愛國者自居，並將所有異議者妖魔化為賣國賊。中共官方媒體上的言論，人們大都解讀為「反義詞」——「和諧社會」是最不和諧的社會，「包容式發展」是絕對不包容異見者。中共當局反復渲染劉曉波是「黑手」、「罪犯」、「漢奸」、「賣國賊」、「帝國主義的走狗」，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甚至揚言：「如果一九八九年劉曉波勝利了，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嗎？……如果中國政府把劉曉波的言論和相關文章都放到網上，中國的憤青們就可能在大街上把他打死。」且不說無數民眾恰恰因為中共對劉曉波的圍剿而尊重他，即便有被中共的教育和宣傳毒害的「糞青」真要對劉曉波施加暴力，那也只能說明中國社會處於茹毛飲血的階段。

「六四」之後，中共迅速炮製出一本名為《劉曉波其人其事》的小書，專門用於批判劉曉波。該書全文收入劉曉波一九八八年撰寫的《但願香港永遠是世界的自由港》一文，並在「本書編者按」中指出：「劉曉波曾經提出過一個要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的賣國主張。在此文中，劉曉波極力美化西方殖民主義，胡說『英國人的殖民化』給香港帶來了『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由此又造成了『香港的商品化』。」這段批判文字堪稱「此地無銀三百兩」：如果不是「英國人的殖民化」，如果不是英國帶來的制度文明，香港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以及「商品化」等各項驕人的成就，究竟從何而來呢？如果香港一直處於從滿清到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下，它依然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邊陲漁村，怎麼可能蛻變成「東方之珠」？所以，「感謝英國」，雖然政治不正確，卻是實事求是的真理。

「六四」屠殺之後，劉曉波在中國境內遭到全面封殺。《劉曉波其人其事》中作為「附錄」的劉曉波的若干原文，包括《但願香港永遠是世界的自由港》一文，當時成了許多像我這樣的少年人的啟蒙讀本。我仍然清楚得記得，初中剛畢業的我，讀到這些文字時的激動與震撼，就如同突然從黑暗的鐵屋子中看到一道燦爛的陽光。若干年後，當我踏上香港的土地，我的感受與昔日的劉曉波一模一樣。

是的，寧願呼喚英國人回來，也不要土共將香港「內地化」。香港回歸之後，香港警察逐漸變得與內地公安「同質化」。梁振英不就說過，可以使用若干暴力手段對付遊行示威的民眾嗎？那麼，香港如何才能捍衛其「核心價值」呢？

港人當理直氣壯地張揚「英人治港」時代法治與自由等優秀遺產，以此「英」對抗彼「英」，方能免於淪為北京之殖民地。

劉進圖被斬：香港版的江南案

共產黨毫無疑問地就是法西斯制度，它仍然是這樣的制度，根本無法改變。

——列·達·蘭道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身中六刀，背部傷口最長達十六厘米，傷及胸腔，腳部傷及主要神經。劉進圖被送入醫院時，一度生命垂危，經過數小時的搶救，終於從鬼門關上活過來。香港媒體用「被斬」這個詞語形容刺殺嚴重性與殘酷性：「斬」，乃是直取人的性命，兇手經驗嫻熟，先砍斷受害人之雙腿，再刺入其背部，不像是留下活口的樣子。香港著名評論員林行止說，雖然他無法妄斷劉進圖遇襲的因由，「不過，任何恩怨，招來如此暴戾殘酷的刻意傷殺，筆者何止震驚？真是髮指！」

事件發生之後，《明報》的報頭轉以黑色刊印，並發表社論指出，「昨天是香港新聞界最黑暗的一天」，兇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鬧市行兇，是「公然挑戰法治社會」。《蘋果日報》在題為「再鋒利的刀也滅不了我們的聲音」的社論中指出，「我們沒有退讓的餘地」，因為新聞和言論自由是香港的生命線，必須好好守護，以確保香港不會枯萎雕謝。「不管是威逼利誘，不管是鋒利刀刃，都不可能令我們滅聲，都不可能令香港滅聲。」

兇案發生，震驚世界。國際媒體廣為報導，美國和歐盟亦發表聲明表達關注。而據中國的傳媒人士私下表示，中宣部迅速下達了「死命令」：《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受傷一事，各媒體一律不得報導。中央級大

報刻意回避，即便有隻言片語的報導，也大都不提及劉進圖作為《明報》前主編的身份；相對開明的地方報紙，如廣東《南方都市報》、上海《東方早報》及北京《新京報》等，均沒有報導此事件，尤其是有港澳專版的《南都》亦未予報導，更是耐人尋味。偏偏是享有特殊的「言論自由」的極左立場小報《環球時報》，在評論中信口雌黃，將兇徒輕輕放過，反倒批評「有香港反對派人士……暗示劉因得罪高官而遭此不幸，這樣毫無根據地在輿論中給案件提前定性應當受到譴責」、指責有人「利用劉進圖的敏感身份放大兇案效果，製造困惑，搞亂香港」。此評論讓人不能不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聯想。

劉進圖為何遭遇「滅口」之災？

劉進圖為人溫和，業界多名人士均表示，難以想像劉是因私怨而受襲。劉進圖剛被解職不久，在香港的新聞自由環境急劇惡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估計，劉進圖遇襲是因為《明報》派出記者參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揭發中共太子黨海外財政網絡的調查。其公布的密檔顯示，至少有五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現任或前任常委的親屬曾在庫克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册公司，包括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溫家寶的獨子溫雲松和女婿劉春航，以及胡錦濤、鄧小平、李鵬等人的家族。

關於習近平家族的部分，文件顯示，習近平大姐齊橋橋的丈夫鄧家貴，是地產開發商，還投資過生產手機和電子設備的稀有金屬。鄧家貴曾與地產商李華和李曉平兄弟合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卓越通力地產發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鄧與李氏兄弟各占一半股份。這些材料與此前美國彭博社關於習近平家族擁有數億美元財富的報導相吻合。

據報導，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的調查組中，除了來自香港《明報》、台灣《天下》雜誌、德國《南德意志報》和漢堡「北德電臺」的記者外，

最初還有中國媒體的記者。調查開始幾個月後，該中國媒體便被迫撤回其工作人員，因為中國當局對其發出警告：不得對這一有惡劣影響的事件進行任何報導。一位中國記者在退出時解釋說：「有證據顯示我們的報導人員正被密切監視，而且當局有可能會採取進一步措施。」

早在劉進圖被解職之際，曾為中共香港地下黨重要人物、後來弃暗投明的梁慕嫻，在名為《一個推想》的文章中分析說，劉的去職很可能與《明報》參與此項調查有關。作為總編輯的劉進圖決定《明報》參與此項調查，而在中國大陸政經關係極為深厚的《明報》老闆張曉卿事前並不知情。當張曉卿獲知此事後，必定承受中共很大的壓力以至不顧員工和輿論的反對，對《明報》高層作出重大調動，派出親信，空降而來，嚴格把關。對此，梁慕嫻的推論是：「劉進圖及參與此事的員工們是為了協助找出中國共產黨已經腐敗到最高頂層的證據而作出了偉大的犧牲。……這件事也說明現今的國際事，中國事，香港事常常纏繞在一起，我們觀察事情不能只看著香港本土，要放眼世界，監督中國，才能看出關鍵的焦點。」此一高屋建瓴的論述，洞穿了撲朔迷離的事態背後的真相。

不過，梁慕嫻在撰寫此文之時，所指的「犧牲」僅僅指劉失去總編輯職位，她絕對沒有想到劉會「被斬」，差一點真的「流血犧牲」了。一般人會推測，既然劉進圖已遭撤換，不能繼續左右《明報》報導的路向，換言之，他已是一個「無害之人」，為何有關勢力還要對他步步追殺？原因其實很簡單：或者是因為他有可能掌握更多的、尚未發布的材料，被揭露者一定要阻止這些材料進一步曝光；或者是因為他參與調查的行徑讓「北大人」龍顏大怒，下令必須給予更嚴重的懲處，才能對香港新聞界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

劉進圖被斬後，國際調查記者聯盟總監 Gerard Ryle 立即發表了一份聲明：「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在得悉劉進圖受暴力襲擊後，感到震驚。劉進圖是香港《明報》前總編輯，而《明報》是（偵查離岸公司秘密資產的）夥伴媒體。我們慰問劉進圖及其家人，為他們祈禱，並希望當地警

方能盡早緝兇。不少人猜想襲擊動機。我們並未察覺有任何證據，把《明報》跟 ICJ 合作偵查離岸公司秘密資產，連繫上是次襲擊。然而，這個猜想，反映很多香港媒體在一連串新聞自由受威脅下，感到實在的關注和憂慮。……我們能够跟一位勇敢的報章編輯合作，生產這麼重要的報導計劃，實在感到自豪。」該聲明措辭謹慎，却並不排除此案的發生與調查報告之發布之間的因果關聯。

日光之下無新事。在此案件告破之前，人們無法確定劉進圖被斬與《明報》調查中共頂級高官家族貪腐這兩件事具有必然聯繫，但從常理和常識推論，人們可以明明白白地知道，此事件背後必定有一雙隱藏得很深、很深的黑手。香港本地的黑社會，不會有動機和膽量犯下此驚天大案，一定有更黑的勢力在指揮和操縱。香港的黑社會，一般是「盜亦有道」，不會隨意屠戮無辜者；唯有北京中南海裏的那個黑社會及其教父，才是「盜且無道」，因為他們的權力帝國，就是蹂躪著千萬人的屍體建立起來的。

江南之死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劉進圖被斬，堪稱「香港版的江南案」。江南案發生在美國，在美國執法機構強大的偵查能力之下，案件最終水落石出；劉進圖案發生在香港，香港警察早已不是「英國皇家警察」，成了中國公安之一部分，打壓民衆的抗議綽綽有餘，偵破此類綫索延伸到北京的大案則無能為力，所以此案真相大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多就是抓捕幾個香港本地黑社會的嘍囉來頂罪。

將江南案與劉進圖案對比，因為國共兩黨都是仿照蘇共而建立的獨裁政黨，故而其維護權力、維護獨裁者的面子和尊嚴的手法，皆有相似之處。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舊金山家中遇刺身亡。行刺者為臺灣情治機構指使的竹聯幫首任總堂主

陳啟禮及其兩名手下。案件內情曝光後，美方震怒，蔣政權在國際上顏面掃地。後來，中華民國方面雖然承認江南案為其情報局官員主使，但仍強調本案乃情報局官員獨斷專行所致，非高層授意，並逮捕和審判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以平息輿論的壓力。

當時，坊間普遍認為，蔣家第三代接班人之一的蔣孝武，可能是江南案的主謀，但並無確切證據。不過，蔣孝武因此被外放為駐新加坡大使，從此失去接班的機會。臺灣之政局因而丕變。

據時任國安局長的汪敬煦的回憶錄記載，蔣緯國似乎也涉入此案。陳啟禮由江湖大佬搖身一變為特務爪牙，蔣緯國是知情人：「民國七十三年元月，政府決心清除流氓……陳啟禮試圖投靠情治單位藉以脫罪，於是找上曾任老總統侍從、與官邸關係頗深的情報局局長汪希苓……陳啟禮想了一個點子，於七十三年六、七月間，由陳立夫和蔣緯國作東，邀請我、警備總司令陳守山、汪希苓、調查局長阮成章等人聚餐。」好個黑白兩道把酒言歡的場景。

劉宜良遺孀崔蓉芝堅稱，丈夫之死必然與蔣經國有關：「劉宜良因著《蔣經國傳》且即將動手寫《吳國楨傳》，而被蔣孝武指使情治單位派人所殺害。」蔣孝武則是受蔣經國的指使行事，他當然不會把老爸供出來。而台灣作家楊青矗根據汪希苓服刑時享有的優厚待遇，以及數位當事人對主謀者身分地位的推測，亦認為事件的主謀是蔣經國本人。

江南在《蔣經國傳》中將蔣經國描繪得極為不堪，且宣布還要撰寫蔣經國的仇敵吳國楨的傳記，蔣經國心中早已對他動了殺機。蔣經國長期執掌安全部門，安全部門的官員個個都能揣測領袖的心思意念。不必等領袖下令，他們就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所以，即便不是蔣經國親自下達了暗殺江南命令，至少可以說，這個暗殺計劃符合蔣經國的想法。然而，蔣經國未曾料到，江南雖然喪命，江南案引發的波瀾却讓他和他的政權受到沉重打擊。曾身陷文字獄的臺灣作家柏楊指出，蔣氏家

族的獨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後才告終結。江南奉獻生命與鮮血，「化作壓死暴政的最後一根稻草——證明蔣中正、蔣經國父子的政權，已墮落為赤裸裸的多行不義的權力。」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獨裁政權輕率地啟動暗殺行動，其結果往往得不償失。

紅色恐怖是習近平的靈魂底色

既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自蘇共脫胎而來，那麼他們多少都繼承了蘇聯政權的暗殺傳統。蘇聯理論物理學派的創始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列·達·蘭道，就曾直接斥責蘇聯政權是「法西斯」，並將國家領導人稱為「罪犯」，他說，「我能相信誰？相信劊子手嗎？」

從列寧、斯大林以下，蘇聯當局就擅長於「從肉體上消滅國家的敵人」，克格勃內部專門設有一個從事恐怖暗殺行動的特別處，他們以殺人來建功立業，其暗殺的範圍遍及全球。一九二一年，在中國開槍打死奧連堡哥薩克軍首領亞·杜托夫；一九二二年，在保加利亞殺害沙皇將軍波克羅夫斯基；一九二六年，在巴黎殺害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領袖彼特拉留。而最轟動世界的事件，還是斯大林派遣殺手殘忍地刺殺了流亡南美的托洛茨基，去除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中頗具影響力的心腹大患。二十年之後，兇手「榮歸」莫斯科，被授予英雄勳章。

中共從事暗殺活動的頻率，雖比不上蘇聯，却也留下諸多仍然是謎的案例。比如，李志綏出版《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之後宣布要寫作第二本書，一向身體狀況良好的他，不久即在家中離奇死亡；中功創始人張洪堡一度是中共座上賓，流亡美國之後參與反共活動，隨即死於一場神秘的车禍；而叛逃美國的中共國安部門高官俞正強，據說後來也遭到中共特工的暗殺。

在香港，中共策劃暴動及暗殺，亦有悠久的歷史。一九六七年，中共地下黨掀起「六七暴動」，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來的暗殺、炸彈放置和槍戰。暴動期間，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員殉職在內的五十一人死亡。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強烈批評左派的暴力行徑數日後，他與堂弟遭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六七暴動」場面慘烈與言論自由受影響的標誌性事件。

近年來，暴力摧殘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事件，在香港更是層出不窮：《壹周刊》總編梁天偉被斬斷右手、《翡翠》雜誌作家慕容公子背部被砍、商業電臺主持人鄭經翰腳筋被挑、《陽光時務》老闆陳平街頭遇襲、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家遭撞開放刀斧、《蘋果日報》發行商勤力德老闆被斬……所有的案件無一偵破。到了劉進圖慘案發生，越來越多香港人才猛然意識到，如今的處境已是「今日滅聲，明日滅口」。

香港處境的惡化，是習近平強勢政策的直接結果。自十七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習近平即以儲君身份執掌處理港澳臺事務的大權。在毛時代度過青春時代的習近平，並非毛時代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但毛時代殘酷的鬥爭哲學，深深的浸透在他的血液裡。習近平有一種從毛那裏獲得的冒險主義的激情和突破一切道德、倫理及法治底線的蠻勁。習近平看不起按部就班、垂拱而治、恪守技術官僚的理性主義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他要大幹一場，所謂「大亂才有大治」。那麼，在這盤大棋局中，殺幾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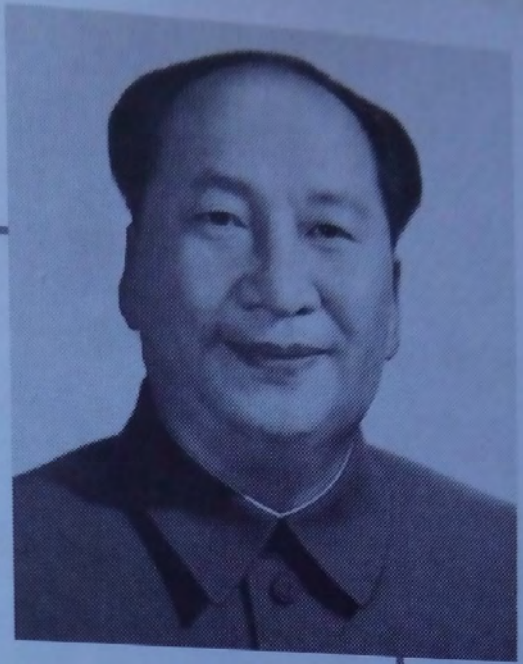
所以，習近平的手下把握了主子的性情與思路之後，紛紛投其所好，在各個方向強勢出擊——包括喪心病狂地打壓香港民衆的民主訴求。斬殺劉進圖，就是他們恐嚇香港人的一個關鍵步驟。習近平未必親自下達了殺人命令，但他強橫的施政風格必然導致此事件的發生。主導此事件的，不會是懵懵懂懂的中級、低級官員，更有可能是與習近平非常親近的智囊團和秘書班子，惱羞成怒的習近平家族成員，以及安全部門的高級主管。只有他們才敢下此決斷，他們不會不知道此事件將對香港社會

造成何等巨大震撼和反彈，但他們仍要一意孤行，因為他們除了殺人以外，已經沒有別的法子了。

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止我出版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的，與撲滅關於太子黨海外資產報告的，是同一雙看不見的黑手。從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騙到深圳誘捕，到《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有一條若隱若現的線索貫穿其間。我曾受到活埋的恐嚇，以及成為「美國版的江南案」的「主角」的威脅，在中共的黑名單上，我與劉進圖是名字上要畫上個紅叉的同類。是啊，只要想說真話，你、我、他，何人不會是姚文田？何人不會是劉進圖？

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就是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黑手和兇手。即便在臺灣民主化之後，人們也沒有能夠找到蔣經國親自下達的製造江南案的手令；未來中國民主化之後，人們照樣未必能發現直接指向習近平的炮製劉進圖案的鐵的證據。獨裁者有的是白手套。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黨國元首的習近平，其基本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導致了一種怎樣的時代氛圍——那就是「殺人如草不聞聲」。

不過，習近平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主謀和行兇者相信透過身體暴力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港人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士，卻不會被嚇倒，而是勇敢地向行兇者宣告——「They can't kill us all」。香港學者、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龔立人如此闡釋這一宣告：「我們宣告的重點不是一種任由施暴者繼續身體暴力的打不死精神，而是因這宣告，我們決心要將主謀和行兇者繩之以法，並結束一切身體暴力。」暴力不是人類歷史進程的主宰，愛、和平與公義才是，正如龔立人所說：「面對身體暴力，我們謹記耶穌的話，「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在忿怒下，我們以更和平對抗身體暴力，但相信上主所說，對他人身體暴力的結果必而臨在行使者身上。」我們以此作為對習近平的判決書，以及對自由不滅的信念。



第三章

魂勞夢斷：

論毛旗幟之難舉

「毛」病不改，惡「習」難除

上聯：江山是老子打來，誰讓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

下聯：天下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

這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反動文人誣譏國民黨政府的對聯。

——慕容雪村

習近平率領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在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當天參拜毛澤東紀念堂，向毛澤東的坐像三鞠躬。這是毛時代結束之後，第一次由黨魁率領政治局常委會全體成員參拜毛屍。那些對習近平還殘存著最後期待的人士至此夢幻破滅，而司馬南、孔慶東等毛派則彈冠相慶、感激涕零。習近平拜鬼，顯示中共將繼續走一條毛式獨裁之路。有聰明的網民用了八個字來概括今天中國的處境：「毛」病不改，惡「習」難除，將毛澤東與習近平的關聯性一語道出。

習近平「尊毛攘夷」之舉，堪稱抱薪救火、得不償失。西方觀察家蒙蒂菲奧裡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挺毛澤東，為了中共昌盛》的文章，作者指出：「通過壓制對毛的批評——並擴大到禁止批評中國共產黨的一些不怎麼光彩的過去——習近平要達到兩個目的：助長中國的民族主義，鞏固自身的地位。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兒子，他要想這個國家的頭把交椅上坐穩，一定程度上是要依靠其家族和毛的關係的。」習近平奉毛為他效仿的典範——儘管毛差點將他血緣上的父親習仲勳折磨致死——因為毛被他視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習近平一貫就是「毛粉」，人們為何視而不見？

中共當局動用龐大的宣傳機器對習近平濃妝豔抹，但習近平骨子裡是什麼樣的貨色，並非無跡可尋。從習近平上臺後的一系列言行中可清晰地發現，他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毛粉」。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毛不離口」，其名言是：「如果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這一思路，在其仕途的每個階段，都是有跡可循的。

習近平任職福建期間，每年春節都跑到閩西「革命老區」探望軍方政要的家屬、鄉親，並宣稱「忘記老區就是背叛，就是忘本」。以一九九九年春節為例，習近平先後走訪武平縣、上杭縣、長汀縣等地，探望中共已故軍頭劉亞樓、陳丕顯、楊成武的家人，其中還特意慰問時任中組部部長和江澤民大管家的曾慶紅的母親鄧六如的家人。同年年底，習近平又陪同曾慶紅出席古田會議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參觀古田會議紀念館時，曾慶紅興致勃勃地邊看邊念當時入黨的規定：「不吃鴉片不賭博。」習近平在一旁湊趣說：「現在我們的入黨條件是不是可以加一句：不練法輪功。」把肉麻當有趣，以此顯示他對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政策的全力支持。

二零零六年，習近平調任浙江之初，便「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情」到嘉興瞻仰「紅船」，「接受革命再教育」，顯示他是共產黨事業忠心耿耿的接班人。所謂「紅船」，即中共建黨之初在南湖召開秘密會議時的那條船——當然習近平參觀的是後來的複製品。他宣揚說，反腐倡廉的快捷方式在於學習「紅船精神」，「如果黨員能來南湖看一次展覽，聽一次黨課，學一次黨章，觀一次專題片，瞻仰一次紅船，重溫一次入黨誓詞，就可以『精神傳承、思想昇華』」。另一方面，出於捍衛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需要，習近平在打壓宗教信仰自由不遺餘力，他親自主導了震驚

中外的「蕭山教案」。當時，杭州郊區蕭山的家庭教會自行興建大教堂，習近平派出軍警使用暴力手段強制拆毀，現場有多名年老教徒遭到毆打，多名長老被抓捕之後判刑，前往調查的記者咎愛宗被行政拘留七天。

二零零七年，陳良宇垮臺後，習近平調任上海，在上海黨政幹部大會亮相之後，第一次在媒體和公眾面前出現，不是去資本主義化的浦東新區視察，而是率領上海黨政軍領導班子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會址。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這是上海的驕傲；我們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榮，更倍感責任重大。」他宣稱，這次參觀是「重溫黨的光輝歷程，緬懷黨的豐功偉業」。他的這些話不是說給上海民眾聽的——最講求實際的上海人，眼中只有錢，對意識形態很冷淡；這些話乃是說給北京聽的——「儘管我在表面上十分資本主義的上海工作，但我的一顆紅心始終不變」，北京中南海的元老們才會對他放心。

二零零九年，習近平以「王儲」身份訪問南美，在中國駐墨西哥使館接見華僑和留學生時，用露骨的語言指責西方國家「吃飽飯，沒事幹」，對早已不再「輸出革命」的中國的內政指手畫腳。言談之粗俗，一時震驚四座。連中國官方媒體亦覺不妥，不予報導。習本能地流露出毛時代的「紅衛兵痞子」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雖然當年他戴著「反革命的子弟」的帽子，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但他也是喝著「狼奶」長大的青年，毛主義之毒素深入其骨髓。

二零一零年，習近平在黨史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一定要維護共產黨正統意識形態，「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在他心目中，謊言可以消滅真相，黨性可以壓倒人性。在這一原則之下，共產黨幹過的喪盡天良的壞事，如「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和「六四」，都是不得研究、不得書寫的禁區。習近平大概讀過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知道極權主義統治的秘訣：壟斷歷史，才能壟斷未來。

在率領新科政治局常委在十八大之後第一次公開露面、赴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習近平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兩次引用毛澤東詩詞——「雄關漫道真如鐵」、「人間正道是滄桑」。前任影帝溫家寶喜歡引用文縷縷的古詩，習近平則更喜歡引用音律不諧的毛詩，可見習近平的文化素質連溫家寶都不如。

而習近平在紀念毛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長篇講話中，引用毛詩詞的頻率更是達到了頂峰。我粗略統計就有如下這些——「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倒海翻江卷巨瀾，雄關漫道真如鐵。」「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習近平引用毛詩，首先是出於本能的「脫口而出」——他在那個人人閱讀毛選、朗誦毛詩、歌唱「紅歌」的時代長大，青年時期深受共產黨革命文化之薰陶，「毛主義」滲透到其潛意識之中。

習近平與已故傑出的經濟學家和憲政學者楊小凱是同代人，但他遠不如楊小凱那樣勤於讀書和敢於思考。楊小凱也是「黑幫子女」，在獄中「刮骨去毒」，徹底地「別了，毛澤東」，成為「如鷹展翅上騰」的自由人；而在習近平的心目中，毛依然是一輪永不落山的「紅太陽」，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毛是誰也動不得的「祖宗牌位」，是劉小楓所言的「國父」。

其次，習近平引用毛詩，是「以詩言志」——習家在毛時代吃盡苦頭，左派對習如何處理毛的精神遺產心存疑慮。習近平特意以此告慰左派，他不僅不會清算毛的罪惡，還會繼承毛的事業。習近平深知，一旦否定毛，共產黨的歷史就要重寫，共產黨的合法性根基就會動搖乃至崩塌。

不少「天真樂觀派」認為，習李的接班地位確立之後，中共將在意識形態領域去毛化，甚至遷移毛屍、改變毛主席紀念堂之用途，由此啟

動政改的第一步。體制內「救黨派」的代表人物辛子陵，煞有介事地披露，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並通過「去毛」決議，全體鼓掌贊同。仿佛他本人是列席者，親眼目睹每一個細節。辛子陵為此行文，若心存幻想，自然可以商榷；若故意說謊，則不可原諒。企圖以謊言「救黨」，不過是猴子撈月般的「無用功」。辛子陵等「救黨派」炮製的，分明是麻醉民間抗爭的迷魂藥。

果然，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在十八大開幕式上，全體與會者起立為毛等「元勳」默哀，顯示毛依然是至高無上的「神主牌」。保護毛，就是保護黨；捍衛毛，就是捍衛專制制度。在此意義上，作為新任黨魁的習近平，「大度」地超越了習家與毛家之恩恩怨怨。在權力鬥爭中，向來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習近平讀書不多，這句邱吉爾的名言還是聽說過的。儘管毛讓他的家族及他本人吃盡苦頭，但若要讓習近平「脫毛」，無異於讓他坐在椅子上將自己抬起來一樣，絕無可能。

「毛主義」的實質，就是反人類、反人道、反人性。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包括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都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惟有毛還高矗在中國的廟堂之上。習近平引用毛詩，以詩言志：今日之中共，依然是毛黨；今日之中國，依然是毛國。只有順從「毛黨」和「毛國」的運作模式，才能在權力格局中分得一杯羹。

以鄧為師，以毛為父

習近平在經濟上走鄧的道路，在政治上卻要向毛的道路回歸，他是「以鄧為師」，更是「以毛為父」。在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中，「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順序井然，「父親」排在「老師」前面，「精神之父」重於「厚黑師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習近平看來確實打算要調整經濟結構，但重大政治改革依然是

不可能，他在政治上要加強中央的集權。文化上要加強對文化的統治、對教育的統治、對思想的統治、對輿論的統治。」鮑彤認為，習近平是「毛澤東的風格走鄧小平的路線」，即「在經濟問題上，他要求的自由，超過了鄧小平。但是在政治上他要求的集權，比鄧小平講得更明確」。

如何對待毛的遺產，習近平從鄧小平那裡學來妙方。毛死後，鄧複出掌權，相繼扳倒「四人幫」、華國鋒、葉劍英等對手，成為一代新君。如何開啟鄧時代的帷幕？鄧採取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方式：對毛的評價為「三七開」，處理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歷史決議》時，鄧否定了胡耀邦等人提出的「將毛澤東的錯誤說透」的建議。因為若一一清算毛的罪惡，鄧本人亦脫不了干係——比如，鄧是毛導演的「反右」運動的總執行者，鄧可不是慈眉善目之輩，不能像習仲勳那樣自詡「一生沒犯過左的錯誤，沒整過人」。

雖然毛澤東手下留情，沒有像對劉少奇那樣對鄧小平趕盡殺絕，但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殺子之恨」——「文革」伊始，鄧小平垮臺，兒子鄧朴方被北大紅衛兵批鬥之後拋下高樓，身受重傷，雖僥倖存活，卻落得高位癱瘓、終身殘疾。鄧小平、鄧朴方父子內心深處極度怨恨暴戾恣睢的毛澤東。但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法統，聰明而強悍的鄧小平仍高舉毛澤東這一不可替代的象徵符號——儘管鄧在經濟上走上了一條跟毛截然不同的「走資派」道路。

義大利名記者法拉奇在「文革」結束後曾到中國採訪鄧小平，她單刀直入地追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的回答乾脆俐落：「永遠要保留下去。……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鄧拿起一根煙點著，繼續說：「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共產黨的「黑話」是



需要翻譯的，鄧小平的這段話，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保住毛澤東，才能保住共產黨的天下；我雖然不喜歡毛澤東，但毛的僵屍放在那裡，對我有利無害，何樂不為？

老師以大局為重，學生當然謹記在心。習近平不會輕易棄毛而去。對習近平而言，否定毛萬萬不可，其結果是「天下大亂」。否定毛澤東，受損的唯有共產黨獨裁集團。毛倒了，共產黨必然「樹倒猢猻散」。那時，習近平就不能坐在「龍頭老大」的位置上——這才是他「尊毛」的秘密所在。

若以人民的觀點來看，否定毛，不會「天下大亂」。不僅不會「天下大亂」，每個獨裁者的倒掉，結果都是國泰民安、惠風和暢。希特勒的倒掉、齊奧塞斯庫的倒掉、波爾布特的倒掉、薩達姆的倒掉、卡扎菲的倒掉……人們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沒有獨裁者，人們才能「出黑暗、入光明」。

知青時代的習近平 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嗎？

七十年代的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消極的，不是失望就是投機。

——潘鳴嘯 (Michel Bonnin)

《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姜文根據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改編的電影。王朔和姜文都是軍隊大院裡的子弟，「文革」伊始，他們終於有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父母忙於革命或「被革命」，無暇管教孩子，孩子們便肆意揮霍青春。這部電影在「題記」中說：「個人的命運恰似一朵長河裡的浪花，無論是他的歡唱還是他的低吟，都被時代的洪流所裹挾，他不可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未來，他沒有絕對的自由。」這些出身於「無產階級暴力機器」的軍人家庭的孩子，不用像平民子女那樣「上山下鄉」，還可以隨意打人、宴飲、吊馬子，雖然不能像皇帝權力無邊，的確很少有人敢管他們，「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他們真實的感受。

習近平不屬於其中的一員。「文革」剛開始，習仲勳已是「死老虎」，被紅衛兵押解到西安批鬥。在紅衛兵整理的批習材料中，有如此描述：「無產階級革命派運用光芒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將這條落水狗批駁得體無完膚，狼狽不堪。」習家的處境雪上加霜：習近平作為「黑幫」家屬，年僅十五歲亦被揪出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多年以後，習近平回憶說：

「後來決定送我去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女學習班。在我要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才能進去。」一九六九年一月，習近平獲准跟五千多名北京知青一起遠赴陝北，那時他不到十六歲。如今，身為黨國「老大哥」的習近平，偏偏公開頌揚毛，難道他的青年時代真有過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嗎？

習近平的知青生涯有多難？

毛澤東為何突發奇想，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法國漢學家潘鳴嘯在研究知青的專著《失落的一代》一書中，分析了毛發動該運動的意識形態動機、政治動機以及社會經濟動機。意識形態動機在於培養革命接班人、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以及縮小「三大差別」（工農業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政治動機在於降服紅衛兵，以及加強毛的「魅力領袖」式威權。社會經濟動機則在於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前者為發展農村及邊疆地區，後者則為解決城市就業及人口過剩的問題。

這個運動最終全然失敗，留下傷痕累累的農村，以及被浪費十年甚至更長青春歲月的「失落的一代」。如今，習近平上臺，象徵著知青那一代人雖處囊中、脫穎而出。那麼，知青那一代人曾經沉淪於社會的最底層，是否對毛時代的邪惡與黑暗產生批判精神？是否對農民的苦難與窮困念茲在茲並努力改變之？事實並非如此。很多當過知青的人，反倒更加深味「厚黑學」原理，做事不遵循任何道德底線，崇拜法西斯式的「狼圖騰」，以暴力和謊言博取經天緯地之事業。

習近平到趙家河僅僅三個月之後，由於無法忍受當地的艱苦生活，偷偷逃回北京。那時，紅色浪潮席捲北京，處處風聲鶴唳，這個一無所有的少年人草間求活而不得，被當作「倒流人口」管制起來，關進「學習班」，強制勞動。海澱那一帶的下水管，都是由這些「准囚犯」埋下的。

後來，習近平的姨父、姨媽將他「撈」出來，並勸他回到陝北，告訴他那是唯一的出路——偌大的北京，早已沒有這個前副總理的兒子的存身之處。無奈之下，他只好回到陝北，臨深履薄，活命第一。

習近平到陝北當知青，避免了像其他被整肅高幹的子女那樣在城市飽受凌辱。不過，陝北的貧窮讓他吃盡苦頭。有一次，他從生產隊分到一點豬肉，等不及去煮熟，拿起刀來就割下一塊，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邊吃邊說：「肉，真是太香了！」此一情形，堪稱二十世紀的茹毛飲血。習近平學會了抽煙，幹活時常常找藉口偷懶。遇到有逃荒的人來要飯，他和其他的北京知青便惡語相向，按照他們接受的教育，乞丐都是「壞分子」。鄉親們對此非常不滿，不明白這些細皮嫩肉的「北京娃娃」為何如此殘酷。可見，知青雖然是被當權者拋棄的一代人，但在作為「現代奴隸」的農民面前，卻又居高臨下、頤指氣使。

當初饕餮不繼、苦不堪言的知青生涯，如今回憶起來卻無比甜蜜。「人質愛上綁匪」不是一句玩笑。習近平就是一名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知青。他多次宣稱「青春無悔」，「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二是培養了我的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然而，他卻從未反思農村的「困難」是如何造成的，也沒有對毛的政策有所質疑。對習近平而言，苦難並沒有轉化成追求自由的動力，反倒滋生了攀附權力的野心。知青生涯讓一代人的理想徹底破滅。很多人最終選擇「與狼共舞」，既然無法戰勝黑暗，那就加入他們吧。

終於，時局有了轉變，習近平的生命中迎來一線曙光——他成為被推薦上學的「工農兵大學生」，得以到最高學府清華大學讀書。從此，他擺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涯。

習近平沒有像王岐山那樣接觸異端思潮

在新一屆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中，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張德江等五人都有知青生涯。其中，習近平和王岐山都在延安插隊，兩人的經歷和閱歷卻迥然不同，由此也可窺見此後兩人精神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差異。

當時，習近平等十五個少年人被分配到趙家河村，公社先把知青名單提前分好，各大隊支書根據單子招呼分給自己人，點名確認後，社員幫助知青拿箱子鋪蓋行李，知青跟在社員後面回大隊。在這十五個孩子中間，有十個人的父母正在接受批鬥，習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搬運行李的時候，有一個小插曲。「當時有個後生，平時村裡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給知青扛箱子的時候，他率先挑了一個看起來比較小的棕箱，結果在路上還是落在了後面。等歇息的時候，他隨手掂量了一下別人扛的大箱子，才發現遠沒有自己的沉，他嘴裡嘀咕說，這北京知青是不是帶了金元寶。後來證實，那個箱子是習近平帶的，裡面裝的不是金元寶，而是一箱子書。」後來，「愛看書」、「好學」，成為梁家河村人對習近平的評價之一。在他們的記憶中，習近平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好像也有數理化。「那時候不通電，他就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著書。」村民石春陽說。

習近平比較愛讀技術類的書，使他產生了為村子引入沼氣的想法。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四川綿陽一些農村在搞沼氣，用來做飯、照明，既方便，又廉價。幾天後，習近平到公社請了假，自費跑到四川綿陽地區實地考察沼氣池建造技術。回到村裡後，他決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氣池，用事實來說服社員。幾個月後，當社員用第一口沼氣池的沼氣做飯照明的時候，鄉親們不得不佩服這位年輕的習支書「有知識、點子多」。這些作為，極大地改變了習近平的處境，成為他日後被推薦上學的奠基石。

不過，習近平雖然愛讀書，卻不像當時有的知青「部落」那樣，熱衷於讀那些帶有異端色彩的、內部出版的「灰皮書」。這是他與王岐山之間的一大差異。

王岐山比習近平年長五歲，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歲的王岐山和兩萬多名北京知青一道，來到延安馮莊公社插隊。多年後，據《京華時報》報導，王岐山對這段艱苦的生活記憶深刻：「後來跟黑龍江的同學見面後我都想哭，他們幹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啊。我這是累了還吃不飽，知道餓是什麼滋味了。」輾轉饑腸無從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勞作也清寂單調，讀書是當時不多的休閒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為好。

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書尹治海，至今記得王以石板為桌看理化數學，其中一本「外國經濟方面的書」，曾引起村民的特別關注。據延長縣作協主席張思明採訪習近平的文章記述，這本「外國經濟方面的書」是王岐山從習近平那裡「順」來的。習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延安下鄉，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川時，曾在王岐山處借宿，隨身攜帶的一本經濟學書籍被王留了下來。

一九七一年，陝西省博物館重新開門，亟需一批講解員，王岐山等十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後前往西安，在講解員的崗位上工作了六年。在博物館工作期間，王岐山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身份，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這一時期，王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一起參加在西安的「地下讀書會」。在「文革」後期，不少城市都有「內部書店」，一部分高級幹部享有在此類書店買書的特權。「讀書會」成員中不乏高幹子弟，因此在那個相對封閉的年代，「讀書會」的成員往往能接觸到常人看不到的「內部書」。

王岐山在「文革」期間參加「讀書會」，接觸到中外具有異端色彩的思想觀念，他學的是歷史，這一背景使得他在八十年代成為風頭正勁的「改革四君子」之一。而習近平在思想激盪而活躍的八十年代，從未發出過自己的聲音，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基層官僚。同樣當過知青，習

近平比王岐山左，王岐山比習近平右。是故，比王岐山平庸的習近平，成了中共的最高領袖，這也正符合中共內部「寧左勿右」、「優敗劣勝」的人才選拔機制。

習近平打左燈往大寨開

即便王岐山成為中共的「一哥」，他也未必有全面改革的願景。不過，至少王岐山沒有公開為毛時代招魂、為知青生涯塗脂抹粉。

習近平因為沒有受過「文革」後期民間異端思想的洗禮，始終深陷在毛主義的泥沼之中。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還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接待來訪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兩人脫下西裝外套、卸下領帶，來到青城山高級中學。該校教英語六年的李老師與三十一位英語課學生圍成半圓形，與兩位元領導人進行對話。

習近平引述毛澤東曾教導學生的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對於毛澤東的名言，習近平爛熟於心。毛是死人，習是活人，死人卻遙控著活人。如果說習近平的知青時代真有「陽光燦爛的日子」，毛主義就是他的陽光。

二零一三年，習近平在上臺之後第一個五一勞動節上的表現，足以說明他急不可耐地打出了「向左轉」的車燈：五一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傳統的「國際勞動節」。如今，在全球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所剩無幾，過五一勞動節的國家也沒有幾個。中共率由舊章、行禮如儀，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面接見一批所謂的「勞動模範」的慣例依舊不變。

習近平不會到香港接見罷工的碼頭工人——那才是真正跟肩挑風雨的勞工站在一起；而是到了御用工會——全國總工會——接見早已挑選好的、對黨忠心耿耿的「勞模」。在官方報道中，第一個出場並佔據最大篇幅的，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

郭鳳蓮是「文革」時期毛澤東親口稱讚的「鐵姑娘」，緊隨當過漢奸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陳永貴，因大寨而紅遍全國，年僅三十一歲就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和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省委副書記）。「文革」結束後，她隨「大寨經驗」一起被否定和批判，一度銷聲匿跡。

幾經沉浮，郭鳳蓮又得到了習近平的青睞。政治經驗豐富的她，清楚地知道剛剛登基的「今上」想聽什麼話，她一開口就是一段讓習近平心花怒放的套話：「實現中國夢，首先要圓咱農民的夢。農民夢圓之時，就是中國夢實現之日。我今年六十八歲了，但心還不老，還想作貢獻。」她進而「歡迎」習近平到大寨去走一走。

於是，現場充滿了懷舊的氛圍。習近平回應說：「一九七四年我也做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縣裡組織到大寨參觀，我也報名了，結果村子裡臨時有點急事沒去成。有機會會去看一看，看看我國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看來，這兩個昔日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三十九年前沒有在大寨碰面，三十九年後終於在北京相會。

習近平對大寨念念不忘，就是對毛時代「一切往左轉」的政策敝帚自珍。大寨是一個一吹就破的肥皂泡，事實上，就連當年的郭鳳蓮也沒能把貧窮從身邊趕走。「文革」之後，心勞日拙的郭鳳蓮回憶說：「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麥是二斤半，這二斤半小麥在磨上還填不了磨盤眼兒。過年吃餃子，當時大寨人吃是玉米麵餃子，當時非常困難，能吃得起玉米麵餃子就不簡單了。」這個爽然若失的「典範」，卻未曾反躬自問：這種衣食不繼的「困難」究竟是誰造成的呢？

在陝西當知青的習近平也曾飢不擇食，常年以玉米等粗糧充饑。他不願意回到那個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時代，但是，作為黨魁，他又想擁有毛澤東那高山仰止、幕天席地的權威，以及毛對黨政軍所有機構「一把抓」的控制能力。於是，針對如今信仰瓦解、萎靡不振的黨，習近平拿出的救命藥方，不是民主、法治，偏偏是老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那一套老辦法。

第三章 魂勞夢斷：論毛旗幟之難舉



但是，習近平能夠將中國變成一個放大的大寨嗎？聰明的鄧小平知道「打左燈往右拐」的妙計，愚蠢的習近平卻「打著左燈回大寨」——在那千溝萬壑之間，他能找到美不勝收的海市蜃樓嗎？

擒賊不擒王，去薄不去毛

通過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權力恐懼強加於每個被統治者，以此來享受行使絕對權力的快樂。這是極權制度異於其它制度的獨家創新，更是極權者異於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圓滿——把恐懼和施暴作為人生的最大享受。

——劉曉波《混世魔王毛澤東》

有人邀請芬蘭著名電影導演考裡斯馬基到中國訪問，考裡斯馬基回絕說：「中國太遠了，飛機裡又不能吸煙，除非派架專機。而中國有『文革』。」

邀請者說：「可是『文革』已經結束了。」

考裡斯馬基說：「是嗎？我看未必。」

一生沒有到過中國的考裡斯馬基，卻比很多一輩子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更瞭解中國。

短短數年間，薄熙來並未花太大功夫，就將重慶變成「紅都」——紅歌、紅舞、紅色短信……無處不紅。數千萬人口的重慶，大學有數十所，文人學者、知識分子，少說也數十萬計，有誰在薄熙來權勢熏天時，發出過一句異議之聲呢？

由於意外的王立軍事件，薄熙來倒臺了。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說「中國有著相當秘密和嚴格的領導層繼任人選拔程序，但薄熙來試圖顛覆這一程序，他希望借助自己的個人號召力和贏得草根支持者的能力來

另闢蹊徑躋身最高領導層，這是他犯下的大錯。」薄熙來失去了權力，也失去了名譽與自由。但薄熙來的罪名中，並沒有「搞小型文革」這一條。

薄熙來導演的「小型文革」剛一落幕，習近平導演的「大型文革」立即登臺。毛的旗幟從薄手上轉移到習手上——中國並沒有「躲過一劫」。比起目空一切的薄熙來，不顯山、不露水習近平有著更高超的政治權謀術，其策略是：去薄不去毛，藕斷絲還連。凝聚太子黨，江山要共用。

習近平為何肯定「重慶文革」？

薄熙來時代的重慶，有年長的人驚呼：「文革」又來了！其實，不是「文革」又來了，而是「文革」從未離開過。難道薄熙來僅僅靠他一個人的力量，就能掀起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不是薄熙來有三頭六臂的本事、有聰明絕頂的智商、有翻雲覆雨的權術，而是他熟知群眾心理，深知如何挑撥起人們心中最陰暗欲望。用民主運動前輩王若望的說法，「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薄熙來只是喚醒了人們心中蠢蠢欲動的「小毛澤東」。

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的那幾年，風生水起，不僅召集了一幫文人學士打造「重慶模式」，連洋人基辛格和彼岸的國民黨大佬吳伯雄都跑到重慶來「取經」。各地諸侯為之側目，胡錦濤、溫家寶沈默以對。當時的政治局常委會對桀驁不馴的薄熙來傾向於「冷處理」，連薄的盟友周永康都不敢明目張膽地挺薄，惟有習近平視為知己、大聲叫好。

二零一零年年底，習近平以「儲君」的身份赴重慶調研，薄熙來隨侍左右。調研期間，習近平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唱讀講傳」節目演出。習近平還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資料彙集處，視察了交巡警平臺，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

機制」。調研結束時，習近平主持召開重慶市黨政幹部座談會並講話，「對近年來重慶在改革發展穩定方面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

習當然知道薄對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構成了挑戰，但他對薄舉起的「毛旗」，比薄更有眷戀之情，所以他才會迫不及待地肯定「重慶文革」。政論家桑普分析指出，習近平不是拉攏薄熙來，而是與薄熙來確實「英雄所見略同」。「只要細心審視多年來習近平的言行，即知他推動民主憲政的意願不高，精神層次還是停留在對黨八股的頂禮膜拜。」

那張習近平與薄熙來、王立軍三人談笑風生的照片，出現在重慶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那時，誰也沒有料到，短短一年多之後，這張照片上的三個人，一人順利登基、成為新一代「老大哥」，其餘二人先後成為萬人唾罵的階下囚。這三個人以後很難在同一場合出現了——除非中共垮臺，習近平被捕受審，入獄服刑，習近平、薄熙來和王立軍三個人，被關押在同一個監獄之中，在放風時偶然相遇，那該是一個多麼戲劇化的場景啊。

習近平與薄熙來乃一丘之貉

習近平與薄熙來出生於創建中共國的元老家庭，是血統純正的紅二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比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垮臺的時間更早，習近平沒有資格像薄熙來那樣在「文革」初期加入紅衛兵激進組織「聯動」。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這兩個十多歲的少年人，若在血雨腥風的北京的校園或街道上相遇，將會發生怎樣的碰撞呢？

那時的薄熙來，是讓人談虎色變的暴力團體「聯動」的一分子。「聯動」是一個由高幹子弟組成的「恐怖主義小分隊」，在他們的父母尚未垮臺之際，利用「根正苗紅」、資訊靈通的特權，抄家焚書、拘禁刑求、殺人越貨、無惡不作。有老毛撐腰，公安束手，少年變惡魔，學生變打手。而那時的習近平，背負著「叛徒子女」之惡名，是「黑五類」中最黑的

那類人，是不齒於人類的「臭狗屎」，是被紅衛兵專政的物件。

所以，習近平若與薄熙來狹路相逢，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下場。薄熙來對習近平不會手下留情，必定是一頓劈頭蓋臉的暴打。薄熙來打人心狠手辣，當薄一波垮臺後，薄熙來為求自保，不惜對生身父親大打出手，薄一波被兒子打得肋骨折斷。薄熙來又怎麼會放過作為「賤民」的習近平呢？那麼，習近平能否在心狠手辣的薄熙來手下保全性命，不得而知。

命運無常。四十多年後的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陰差陽錯地熬成了王儲，薄熙來卻入常夢斷，委屈地成為偏安一隅、主政重慶的「西南王」。儘管習仲勳與薄一波的政見大不相同，但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太子黨，在縱橫捭闔的黨內權力鬥爭當中，一向藏拙的習近平與鋒芒畢露的薄熙來，是分是合？

薄熙來放手一搏，本已眾望所歸，卻又功虧一簣。王立軍事發，讓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達成了搞掉薄熙來的「共識」。薄熙來的垮臺，不是因為習近平反感薄熙來搞的「唱紅打黑」，而是薄熙來咄咄逼人的野心威脅到習近平的接班的大計。如果薄熙來留在政治局中，即便不入常，也會給習近平製造麻煩。所以，習近平倒薄，僅僅是為鞏固個人的權力，肅清權力場上危險的挑戰者，而不是反對薄所操弄的毛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薄熙來的落馬，並不意味著毛主義退出歷史舞臺。就「治國方略」而言，習近平與薄熙來是一致的：要保住黨國，非得請出毛的牌位不可。於是，「習毛」取代「薄毛」，中國仍處於苦不堪言的「後毛澤東時代」。

薄熙來上演了一台好萊塢狗血連續劇，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而習近平比薄熙來高明的地方在於，在尚未掌控最高權力時，不會輕易暴露個人的政治取向。有的時候，甚至故意讓那些嚮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識份子」認為他會像他的父親一樣開明。而一旦掌握了黨政軍大權，習近平馬上顯露出與毛在思想上割不斷的傳承關係。習近平如同一個風箏，無論飛得多麼高，線的末端，牢牢掌握在水晶棺中的毛澤東的手裡。

毛澤東是習近平唯一的榜樣。習近平讚揚過曼德拉，羨慕過普京，喜愛《教父》中的主人公，但毛對他的吸引力超過了任何人。故而，其一言一行，一顰一笑，惟毛首是瞻。二零一三年八月，習近平在武漢視察期間，專程去毛當年下榻的東湖賓館探尋毛的足跡，並在一幅毛與民眾交談的照片前駐足良久。習近平特意叮囑湖北的黨政官員：「今年是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辦成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特別是在對青少年一代教育中發揮更大作用。」習近平深信：除了毛以外，誰也不能救共產黨。鄧小平不能，習仲勳也不能。所以，他要緊抱毛的大腿。

全盤否定毛澤東是中國人自救的第一步

既然習近平以毛為父，各級官員無不緊緊跟隨。據《湖南日報》報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就習近平考察湖南做精神傳達，聲稱要扎實做好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各項工作，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關於隆重、簡樸、務實辦紀念活動的指示精神」。又據湖南湘潭官網透露，毛澤東故鄉韶山將這次紀念活動稱為「壓倒一切的最大政治任務」，大興土木、規求無度。

紀念毛，就是為「反右」、「大躍進」、「文革」招魂，就是打造共產黨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神話。「毛後」或「後毛」的三十年，鄧小平實行「跛腳改革」，經濟高速發展，但從未清除毛主義的毒素。看看那些與腰纏萬貫的民營企業家的言論和傳記，如華為之任正非、阿里巴巴之馬雲、巨人之史玉柱、海爾之張瑞敏，哪一個身上沒有毛的影子？直到今天，毛是中國人靈魂的主人，中國人是毛主義的奴隸。

即便許多經歷過「八九」民運洗禮的知識份子，在現實中幾經挫折之後，又重新回到毛的懷抱。他們憧憬毛式暴力革命的壯觀與宏大，以及毛時代虛偽的平等與自由。劉小楓、甘陽、孔慶東，個個都以毛的孝

子賢孫自居，或要打通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三大傳統」，或要將毛塑造成「華盛頓加林肯」的「國父」。

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張藝謀使用的美學範式，正是毛時代暴力美學和集體主義美學之變形。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日漸升溫的時刻，此種美學模式具有越來越巨大的市場價值和「政治正確」的崇高地位。

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經濟學家茅於軾指出，毛澤東是一個給中國人帶來大災難的罪人。這句大實話捅了馬蜂窩：毛派對其展開猛烈圍攻，威脅要提起公訴，呼籲當局宣判茅於軾為「賣國賊」。茅於軾所到之處，毛派如影隨形，甚至提前享有了上街遊行示威的權力——那些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維權者，紛紛被捕入獄；而那些舉牌鼓吹毛式暴政的「毛粉」，個個安然無事。各地警察「選擇性執法」，對毛派擾亂公共秩序的惡行不聞不問。因為習近平就是毛派的總頭目，毛派就有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丹書鐵券」。

那麼，誰才是賣國賊？不是揭露毛的罪行的茅於軾，恰恰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割讓大量領土給蘇聯，以換取蘇聯對其政權的承認與支持；毛澤東為了幫助金日成的侵略戰爭，不惜讓四十萬中國官兵命喪異邦；毛澤東讚揚日本的侵華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這讓中共免受國民黨圍剿之苦，在後方大肆發展，進而奪取天下——這樣一個只愛自己卻從不愛國、從不愛民的暴君，與五代十國的「兒皇帝」石敬瑭有何差別？

毛澤東更是自古以來殺死最多中國人的獨裁者。美國文化新聞網絡雜誌「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評選全世界過去一百年十三個大暴君，毛澤東以害人最多，超越殺人魔王斯大林和希特勒名列世界第一。黃巢、張獻忠、洪秀全等屠夫殺戮的中國人，加起來不如毛澤東一個人多——毛澤東掌控的是一架現代化的殺人機器，殺人的效率更高。在毛時代，大部分中國家庭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但是，若干受害者的家人或後人都心甘情願地充當毛的奴隸或奴才——習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從茅於軾受到「圍剿」的遭遇可以看出：人們原以為，儘管不能公



開批評「今上」，但至少爭取到批判毛澤東的自由；實際上，這點自由是虛幻的，是隨時可能被收回的。在習近平下令媒體和學校必須遵循的「七不講」中，就有「不能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這一條，當然包括不能講毛的「錯誤」（準確地說，是「罪行」而非「錯誤」）。

薄學毛，習更學毛。薄已倒，毛未倒。然而，中國不去毛，中國就沒有希望。學者陳奎德在《問責：三年大饑荒與毛澤東之責》一文中指出：「使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為二十世紀最大屠夫，鑄進史冊，是伸張歷史正義，祭奠千萬中國亡魂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的千秋大業。」是故，毛澤東塑像的倒掉、毛澤東崇拜的破產、毛澤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乃是中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先聲。

毛澤東愛游泳與習近平愛踢球

領袖既不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護身符，也不是一個永遠的人，而是極權主義組織的簡單結果；他的確不是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種功能，是運動中不可或缺的。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在通常情況下，極權體制下的領袖人物，其個人生活均屬於「國家機密」。但另一方面，出於造神運動的需要，官方的宣傳機構也會刻意公佈領袖的某些興趣愛好和言行舉止，以便於打造其親民形象——吊詭的是，即便是打造親民形象，也是造神運動的一部分。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一書中指出，儘管所有的獨裁政權都熱衷於製造個人崇拜，但北韓的金日成進一步將個人崇拜推向新的境界。金日成甚至從基督教中竊取禮義和語言，讓他自己從二十世紀的「獨裁者肖像館」中脫穎而出。在官方媒體上，金正日甚至能製造某些超自然現象，比如當他外出視察時，周圍就出現一道神秘的光圈，企圖暗殺他的美帝特務射來的子彈全都被擋住了。如此，金日成簡直成了電影《駭客帝國》中的主人公。

不過，金日成不過是毛澤東的學生而已。如今，熱衷於重建毛時代的政治結構和宣傳模式的中共黨魁習近平，對毛澤東崇拜得五體投地，恨不得請毛澤東從水晶棺中爬出來，以鐵腕幫自己「監國」。

毛規習隨。既然毛澤東熱愛游泳，習近平也就順理成章地以球迷自

居。習近平以球迷的形象出現在中國民眾乃至世界的面前，決不是表明他要接受民主理念，並承認自己是一個有血有肉且有愛有恨的、有限的個體；反之，這是他從毛太祖那裡獲得的一套搞個人崇拜的「錦囊妙計」。

毛澤東為何製造「橫渡長江」的假新聞？

極權國家領袖的健康狀況，永遠是首要的政治問題，即便是解決了接班人遴選問題的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國家機密」。當年，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從不對外發佈。毛澤東進中南海後深居簡出，若非其私人醫生李志綏出版回憶錄，人們無從知曉他的日常生活。不過，人們大都知道毛熱愛游泳，從青年時代在湘江「中流擊水」，到八旬高齡仍五次下水游泳，一生樂此不疲。不過，游泳逐漸從其個人愛好變成政治表演。對毛來說，游泳不僅是強身健體的需要，更是他宣示其超人般的能力和絕對的權力掌控度的最佳方式。

公安部長羅瑞卿長期負責毛澤東的安全事務。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回憶錄中寫道，羅瑞卿曾因為阻止毛澤東下長江游泳而遭到毛之痛斥。一九五六年初夏，毛在廣州突然生出想到長江游泳的念頭。在毛身邊的羅瑞卿、王任重、汪東興等聽了都表示反對，認為長江水流急、有漩渦，游泳太危險。毛態度執拗，其他人語氣有所緩和。羅瑞卿因為身上責任重大，反復申明不能冒這個險，還亮出最後一招：「這事得向中央請示彙報後，才能決定！」毛的脾氣也上來了：「你向誰彙報請示，中央主席就是我！」羅無言以對。之後，羅瑞卿學會了游泳。「父親不會游泳，但為保衛毛主席，他在五十歲時學會了游泳。」然而，如此忠心耿耿，也未能避免被毛整肅的下場。

「文革」伊始，毛澤東以「橫渡長江」的行為展示其領袖氣魄，表明了推倒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體系的決心。但是，近年來有若干歷史研究者指出，毛「橫渡長江」的多幅照片是假造的，是從毛在游泳池和北

戴河游泳的照片加工而來。

根據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新華社報導，七十二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歷時一小時零五分鐘，游程近十五公里。隨之，各地紛紛以毛為榜樣，開展聲勢浩大的「學游泳，練橫渡」運動。那時，游泳橫渡不單是一項簡單的體育運動，而上升到「向毛主席表忠心、表決心和表立場」的政治高度。

根據簡單的數學計算，就可知道當年公佈的游泳速度是造假的。因為一小時零五分遊十五公里，等於每秒速度三點八五米，這個速度是當今體壇世界記錄保持者楊孫泳速的兩倍多。按楊在倫敦奧運會創下的一千五百米自由泳十四分三十一秒計算，他的泳速僅有每秒一點七二米。

毛愛游泳，普通百姓也愛游泳，那麼，毛就跟老百姓水乳交融了嗎？非也。毛愛游泳，並不能說明他是一個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並不能絲毫減少他的暴戾之氣。

習近平的「足球夢」為什麼難圓？

與之相似，作為球迷的習近平，並不比不會踢球的江澤民、胡錦濤離民主、自由更近。

習近平多次在公開場合談足球。二零一一年七月四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韓國訪問團時表示，對中國足球有三個願望：一是中國足球隊進世界盃，二是中國能舉辦世界盃，三是中國有朝一日能獲得世界冠軍。

二零一二年二月，習近平訪問愛爾蘭都柏林時，曾公開展示球技，不過他身著正裝和皮鞋，那場秀演得不怎麼樣——比起在日本訪問期間全副武裝、像模像樣地打棒球的影帝溫家寶來，其演技及敬業精神稍遜一籌。

二零一三年六月，習近平訪問墨西哥期間又說：「我是一個足球迷，中國足球一直很努力，但是目前只有一次闖進過世界盃比賽……」

二零一三年十月，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期間，向印尼記者談及即將舉行

的亞洲杯預選賽，他說：「足球的魅力還在於賽場情況瞬息萬變，結局不可預測。我希望中國國家隊和印尼國家隊能為大家帶來一場賞心悅目、友好精彩的比賽。」他還希望中國和印尼的球隊都能進入世界盃決賽圈。在習近平透露了對足球的「中國夢」後，《人民日報》在其微博上寫道：「『在不久的將來躋身世界盃決賽圈』，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殷殷囑託，也是全國人民的夢想所系。中國足球，你可要爭氣啊！」很快就有網民調侃說：「習總，這個願望可能真的只能靠你來實現了，指望足協的話，估計我孫子的孫子的孫子也看不到這一天。」

習近平在印尼還透露了他愛好足球的原因：「足球是一項講究配合的集體運動，個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團隊合作才是決定比賽結果的關鍵。」由此可見，習近平對足球這項西方式的競技運動的理解何其錯誤。習近平在訪美期間曾特意會晤足球巨星貝克漢姆，可惜貝克漢姆沒有向其講述足球的真諦：在球場上，比所謂的「集體主義」更加重要的，恰恰是對個性和天賦的張揚與發揮。雖然足球比賽是一種以「隊」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對抗，但個體的能力及魅力才是足球的吸引力所在——沒有貝克漢姆的球隊，粉絲一定減少一半以上。

習近平的這句話道出了他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對所謂的「集體」的推崇、宣揚，以及對個人的壓抑、蔑視，這正是一切極權體制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這不是東方與西方的差異，而是自由社會與極權社會的差異。普遍而論，專制國家足球隊的水準通常都不高，雖然這些國家可以窮一國之力在某些個人項目上奪取奧運金牌，卻很難在足球上取得重大突破。體制之先進與落後，與足球水準之高下，大致成正比。當年，東德球隊被西德球隊踢得落花流水；如今，北韓球隊根本不是南韓球隊的對手——即便北韓統治者以將失敗者送進勞改營來威脅球員，其足球隊也無法獲勝。

在這個意義上，若不接受民主自由的世界大勢，習近平永遠圓不了他的「足球夢」。

中國體育必須解除「愛國魔咒」

習近平的「足球夢」在民間產生了諸多「克隆版」。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畢業典禮上致辭時，學習習近平神侃足球，博得滿堂喝彩。楊校長自稱鐵杆球迷，借世界盃告誡學生要有擔當：「義大利、法國，作為上屆世界盃的冠亞軍，卻在小組賽就早早被淘汰，名聲、傳統、天賦，甚至金錢都無法讓他們再向前一步，為什麼？因為這些球員忘記了他們對球隊的責任、對國家的責任。」這是我看到的最為背離足球精神和體育精神的言論——與習近平同樣錯得離譜。

其實，足球就是足球，足球是一種比賽、一種娛樂。如果哪個國家將其興衰存亡維繫在足球之上，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缺乏遊戲精神和自信心。球場上的情勢千變萬化，勝負乃兵家之常事，沒有哪個國家的哪支球隊能永遠把持冠軍寶座。對球場上的失敗者作嚴厲的道德譴責，是最不道德的行徑；將球場上的失敗當作教訓學生「為國服務」的人生箴言，更表明教育者思想的貧乏和思維方式的落伍。而這正是習近平「足球夢」的核心所在。把國家、民族和集體的榮譽、利益，放在個人的自由、權利與尊嚴之上，是中共主導的教育理念中最邪惡的部分。

從習近平到楊玉聖的「足球觀」都表明，中國人依然生活在虛構出來的「被列強欺凌的弱者」的悲情之中。在國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太渴望勝利了。《北京日報》的社論公然讚賞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仿佛誰質疑此體制，誰就是賣國賊。在此背景下，勝利者是民族英雄，失敗者則千夫所指，一榮一恥，天壤之別。故而，劉翔在此重壓之下折戟沉沙。

中國人很難想像此一場景：當阿根廷隊失敗歸來，成千上萬球迷們到機場守望，各種標語彙集成海洋：「我們為你們驕傲」、「感謝你們的努力！」……仿佛不是在等候一支失敗的球隊，而是在迎接一群高唱

凱歌的英雄。站在阿根廷足協總部前等候國家隊歸來的女球迷阿莉西亞，如此表達球迷們的心聲：「對阿根廷人來說，世界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是所有阿根廷人的心。」中國人何時才有這種寬廣而溫厚的「阿根廷之心」？

一個小小的足球，不能承擔國運興衰的重擔。若把目光轉移到美國就可以發現，足球在美國是一種處於邊緣位置的運動，根本無法與橄欖球、籃球和棒球這三大球相媲美。許多美國人認為，足球比賽的規則反映了舊大陸帶有貴族等級秩序的不合時宜的沒落氣質。美國報紙總結了足球無法作為一種觀賞性運動在美國流行的幾個原因：每場比賽難以得分，經常出現平局；裁判一旦決定不可更改，不夠公平；假摔的盛行是一種軟弱的表現，橄欖球和籃球中實打實的傷痛本該是男人的光榮。故而，美國足球的水準只是世界二流，在國際賽事中，美國足球隊很早便被淘汰出局。但這並未損害美國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強國的地位。

與習近平和楊玉聖「足球夢」中濃烈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相比，我更看重足球比賽中對自由的追求和對力量的展示。如果我是習近平或楊玉聖，我會如此論述對足球的熱愛：我熱愛足球，因為我熱愛自由，願每一個中國人都「因真理，得自由」，願每一位中國同胞都記得胡適說過的一句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那個演戲的人，你是叫不醒的

——評習近平主導的整風運動

在中國公民擁有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多的財富和知識、逐漸習慣於訴諸法庭，或在網上公開自己意見的時代，這種愚民政策更顯得不合時宜。這位新主席盡可以擁抱過去，中國公民早已變成了另外的樣子。

——《南德意志報》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共在北京召開所謂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決定開展黨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要求官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繼而又發動「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這些語彙，七零後的年輕人可能從所未聞，宛如天方夜譚。而更加年長的中國人、尤其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則耳熟能詳，宛如惡魔重現。

不過，與毛澤東窮凶極惡、殺人無算的「延安整風」相比，習近平的「整風」效果要差多了：首先，習近平的權威有限，黨對社會的控制無法做到像毛時代那樣密不透風，也就不可能像當年的毛那樣對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份子及群眾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故而，在黨和政府內部推行「整風」，難以掀起暴風驟雨，而只能是和風細雨。其次，儘管中共當局竭力控制傳媒，但如今是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時代和「自媒體」時代，習近平無法形成毛時代那樣的「一言堂」。民間的冷嘲熱諷，有

效地消解了官方宣傳攻勢的「嚴肅性」。在公眾眼中，「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批評和自我批評」運動變成了一幕幕的荒誕劇。

從「割尾巴」到「洗澡」

名為「整風」，實為「整人」。習近平的「洗澡」之說，始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當時，《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教條與褲子》，批評某些領導幹部和留蘇知識份子說：「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什麼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各人尾巴粗細不等」，因此割尾巴所需「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這種粗俗、暴力、血腥的流氓腔文章居然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社論和評論文章！

於是，人人都在毛面前「脫褲子」，也就是向毛宣示效忠。「脫褲子」是一種中國式的納粹舉手禮。就連周恩來亦不例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一、二、三日，周恩來一連作了五天發言，痛陳自己的歷史錯誤。周發言之前，毛先在開場白中說，黨的整風是脫褲子，讓黨員赤身露體暴露；然後在同志們的幫助下洗澡，洗清身體內外不潔的汙物；最後是擦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毛最後說：「現在，我們看恩來脫褲子吧。」周恩來忍受此胯下之辱，從此徹底成為毛的家奴。

習仲勳是當時少數堅持不整人的中共官員。他本人是此前西北蘇區「肅反」運動的倖存者：一九三五年九月，西北蘇區在「肅反」中逮捕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錯殺兩百多人。習仲勳亦罹禍其中，「肅反」主持者準備活埋之，甚至土坑都已挖好。所以，死裡逃生的習仲勳在主持綏德地區的「整風」運動時，反對株連及逼供手段。當時，在綏德分區出現了捕風捉影，甚至體罰逼供的現象。在綏德師範

出現了很多「假坦白」，不少女學生竟然踴躍坦白自己是「特務」。習仲勳看到這種「假坦白」後心情沉重，對人說：「這麼小的女學生，又沒有出去過，怎麼會當了特務呢？」習仲勳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向中央和西北局發電報，建議及時制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也許，從那時起，習仲勳就被毛看作不值得信賴的「異類」。

中共奪取天下以後，將類似的方式運用到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當局考慮到沒有經過「整風」的知識份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便委婉地改稱為「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的「洗腦」。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小說《洗澡》中對此段經歷有過描述：那些「被洗澡者」必須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代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

為了讓「澡」洗出效果，「浴池經理」們想出各種辦法，演繹出一連串形象的比喻。比如，洗「大盆」、「中盆」還是「小盆」。「水」，指群眾；「盆」，指會議。盆之大小，指會議之規模，參加者之多寡。職位高的，如校長、院長，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

「洗澡」的效果，與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關。心理承受力弱的人，一下子就被「洗」死了——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藥而死。北京大學有七名教師自殺身亡。不過，此種烈度比起後來的「反右」和「文革」來，只是毛毛雨罷了。

當然，毛澤東本人是不洗澡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揭露說，毛覺得洗澡浪費時間，他的衛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書或閒談時，用一條濕毛巾替他擦身。不愛洗澡的毛卻將「洗澡」變成一種「鈍刀子殺人」的政治運動，讓整個中國血雨腥風、哀鴻遍地。

毛後三十年，經歷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很難重演毛的「洗澡」大戲。因為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僚，哪一個沒有長長的尾巴呢？江澤民家族、李鵬家族、溫家寶家族、習近平家族，哪一個家族不是富可敵國？他們能

從自己的「尾巴」開始割嗎？

連江澤民都知道「與時俱進」的道理，他主導的「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運動，講了半年，收效甚微，不得不就鳴鑼收兵。如今，習近平拒絕憲政民主，企圖以毛式「洗澡」挽救大廈之將傾，真是虛張聲勢、貽笑大方。

「群眾路線」與「四菜一湯」

習近平發起「群眾路線教育」的會議上說：「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習近平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習近平近乎於夢中說夢。雖然不惜使用「生死存亡」這樣斬釘截鐵的詞語，但他無論說得怎樣斬釘截鐵，各級官員依然是如風過耳。習近平偏偏忘了，他總結的「四風」，根源全在於共產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指責「一黨獨裁，遍地是災」。此種權力結構不變，中共的「自我整風」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連毛時代掀起真刀真槍的政治運動，亦無法解決官僚體系的痼疾；更何況今天從思想到意志再到行動力都已癱瘓的中共，又怎麼可能自己實現「刮骨療傷」呢？

比如，習近平到各地視察輕車簡從，每餐都是「四菜一湯」，媒體對此大肆渲染。於是，官場掀起了一股「四菜一湯」的風氣，緊跟中央「反對浪費」的政策。然而，官媒《瞭望》週刊報導說，所謂「四菜一湯」，在地方上經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調整，已經完全變質。該報導指出，「四菜一湯」標準走樣現象，歸納有三類：一是數量不變而菜品出現「豪華升級版」，山珍海味，極盡奢華。二是玩「大盤套小盤」的數字遊戲，乍一看是「四菜一湯」，四個盤子，然而每個盤子都很大，

大盤子裡頭再套小盤子，小盤子裝的都是不同的菜，總體數量遠遠超出「四菜一湯」。三是上菜時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湯」，等客人吃過之後撤掉再換一輪，反正最終保證餐桌上永遠都是四個菜，一個湯。報導引述江蘇揚州市委常委、紀委張書記的話說，這些標準走樣現象，從形式上看沒有超過「四菜一湯」範疇，實際上卻都是大大超標。安徽某縣紀委書記也說：「在基層基本上沒有得到執行，很多只是口頭上說說。」

再比如，習近平推動的所謂公車改革，亦是掩耳盜鈴。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習近平在《關於領導幹部「配車問題」發表的內部講話》中宣誓旦旦地宣佈：「我們逐漸要坐自主品牌的車，現在也有了這個設計和生產，老坐外國車觀感也不好。很多外國領導人都坐自己國家生產的車，除非沒有生產。」他明確提出，公務車改革規定絕不搞「試行」，而是要「言必行、行必果」。

習近平不敢破除公車消費的陋習，卻以民族主義忽悠民眾——如果中國的官員都使用自主品牌汽車，說明官員個個都愛國，民眾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習近平不敢公佈他的座駕是什麼品牌，耗費了人民多少的稅金。各級官員配備的所謂「自主品牌」轎車，如「紅旗」轎車等，早已是「紅旗的殼、奧迪的心（發動機）」，有的甚至比原裝奧迪的裝備和裝飾還要豪華，這難道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嗎？這樣的公車改革，能有什麼成效呢？

中共各級官僚無不享受著「腐敗至死」的快樂，他們才不管習近平那「生死存亡」的諄諄教導呢。無論中共如何反腐（號稱「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宛如左手打右手一般，雷聲大，雨點小，而腐敗永遠「堅如磐石」。

為什麼習近平先拿河北省開刀？

眼看政令不出中南海，習近平遂巡視天下。中共新華網報導說：「二

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滹沱河畔，翠屏山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教育實踐活動聯繫省份河北，全程參加並指導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對河北省省委常委班子的專題民主生活會十分關心，要求會議有真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主持會議時，習近平對中共河北省委說：「我參加河北省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會，可不是聽你們講鶯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那麼，在習近平親自掛帥監督之下，中共河北省委做了什麼樣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呢？

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批評秦皇島市委書記田向利說：「急於求成，急於證明自己，急於讓領導認可。」

河北省委組織部長梁濱批評周本順說：「對幹部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夠。」

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批評周本順說：「希望書記能夠強力推進決策落實。」

周本順批評河北省委副書記趙勇說：「幹事過於急躁，有時過於追求規模、聲勢和形式。」

趙勇批評周本順說：「對扶貧工作過問不夠。」

這些批評，看似誠懇，實則虛偽；看似尖銳，實則溫吞。沒有一項批評會對官員們的官位構成實際的威脅，也沒有一個官員會因類似的批評而辭職下臺。習近平和他的部下都知道他們是在演戲，他們也知道老百姓都知道他們是在演戲，他們仍然有模有樣、有板有眼地完成了這一幕鬧劇。

這種表演無法鞏固中共的統治，唯一的作用就是讓網民笑翻天。網民的智慧遠遠高於官員，有一位網民創作了一個「穿越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短劇：「西門慶對武大郎說，我今天必須批評你，出門老是不關好門窗。武大郎委屈的說，大官人，我也提醒你一下，你來我家時，

不要被隔壁的王婆看見好戲。潘金蓮滿臉嬌羞，武大郎一本正經的批評，娘子，下次曬衣時，注意晾衣杆，高空墜物很危險滴。潘金蓮說：死鬼，下次能再晚點回家麼。」

習近平選擇在河北上演這出好戲，決不是無的放矢、隨機選擇。這跟他在河北邁出仕途的第一步有關。河北不是他的發跡之地，而是他的傷心之地。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任縣委書記，政績平庸，劣評如潮。雖然時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習仲勳施加影響，試圖讓其在省內獲得提拔，卻遭到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揚的抵制。不得已，習仲勳將兒子安排到老友項南任省委書記的福建省任職。

當時，習近平前去向高揚辭行，高揚當面調侃說，你是中央管的幹部，來去自由，不用向我辭行。習近平只能忍氣吞聲。此後，高揚調任中央黨校校長，多次在中央的會議上談及此事，認為如此提拔幹部，是不正之風的體現。習近平對高揚銜恨在心。二零零九年，高揚在北京去世時，喪禮冷清，媒體一度不作報導，很多人猜想這就是身為王儲的習近平從中作梗。

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麻雀變鳳凰」的習近平，一定要衣錦還鄉，一定要如劉邦那樣到當初鬱鬱不得志的地方耍一把天子的威風。這是古今中外內心陰暗的獨裁者共同的心理特徵。既然當年受到河北省委書記的蔑視和羞辱，如今貴為「今上」的習近平，首先就要肆意捉弄河北省委書記及一班省級官僚，以發洩昔日地位卑微的七品芝麻官心中之惡氣。儘管羞辱的對象並不是眼中釘高揚，但踐踏的是同一頂官帽，習近平亦可心滿意足、仰天長嘯了。

控制幹部，神話領袖

習近平當然知道下邊的官員都是逢場作戲，但他拿不出更好的整頓吏治的妙方來。《南德意志報》在題為《崇尚毛路線，習近平在擁抱過

去》的社論中說：「這位新主席激情滿懷，承繼毛主義傳統，重開舊有的政治運動。不久前，他號召恢復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就好像從未發生過「文革」和毛式恐怖一樣。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從事宣傳，但只有在具有儒學傳統的中國才存在過『思想改造』。它的任務是，消除作為個體的人，將他塑造成社會主義的一個主體。」

「習式整風」的目的，不只是出氣和炫耀這麼簡單，更為重要的乃是控制幹部和神話領袖。當年，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完成了對黨政軍的一體化的掌控，成為無人可以挑戰的「偉大領袖」。沒有「延安整風」，就沒有毛的絕對權力。歷史學家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概括了毛控制幹部和神話領袖的四大法寶：第一，以政治學習來洗腦。內容是聽報告和學習文件：聽報告是聽領導人報告或傳達報告，學習二十二個「幹部必讀」的文件。第二，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交代問題即所謂「向黨交心」；相互揭發則以「小廣播」為題，包括黨的機密，對國內外大事、本單位等有背離中央精神的私下議論，人們一下陷入「紅色恐怖」之中。第三，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還要寫「反省」筆記，並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後發展為要寫每個階段的思想小結，然後組織評定，存入檔案。第四，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飲食上的「大、中、小灶」制度已在全黨推行。接著還有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領導幹部的保衛制度等等。領導幹部一旦犯了政治錯誤，所享有的特權亦隨著消失，因此助長他們倒向權勢而昧於事實和良心。從此黨內極少有人敢於獨立思考和自由發言，即便出現這樣的人物，也得不到黨內多數的支持。

習近平當然知道，他缺乏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領袖魅力」，他所處的時代也不再是一個閉關鎖國、肆意愚民的時代，他無法獲得毛時代的幹部對毛的那種「死心塌地」的愚忠。於是，他企圖通過新的「整



風」活動，至少獲得幹部階層口頭上和表面上的效忠。當他在會場上耳聞目睹省級官員們「舉輕若重」的表演時，他並不希望從中發現他們真正的惡行和罪過，進而將他們「一鍋端掉」，以換取天下百姓皆大歡喜。他只是要部下們明白：各級官員都有被觸動、被整肅的可能性，惟有最高領袖一個人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習近平就與其他官員區隔開來，形成一個只有官場裡的人看得到的「神光圈」。是故，習近平饒有興味地玩弄此種貓捉老鼠的遊戲，藉此樹立其個人權威並杜絕誕生「第二個薄熙來」的可能性。

如果習近平真要想聽到來自老百姓的心聲，只需要到上訪村走一走就所得不菲。但他並不想對既有體制和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所以，這場表演，是共產黨內部的自娛自樂，跟民眾的切身利益和制度變革並無多大關係。

習近平為何重提「楓橋經驗」？

極權的產生過程是，某一個或某一些觀點脫群而出，節節升級，吸收其他那些模糊、隱晦、分散不定的單個現象也加入到自己當中，並最終形成內部統一的思想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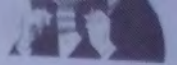
——馬克斯·韋伯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浙江省杭州市舉行「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五十周年大會」。習近平對此作出「重要指示」稱，五十年前浙江楓橋幹部群眾創造的「楓橋經驗」就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現在要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使其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

此次會議由國務院秘書長楊晶主持，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出席並講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公安部部長郭聲琨、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等政法領域重要人物悉數出席，顯示出規格極高。然而，這個會議表明，已然窮途末路的維穩模式，居然向毛澤東尋求思想資源，習近平確實到了黔驢技窮、饑不擇食的地步。

何為「楓橋經驗」？

何為「楓橋經驗」？習近平對「楓橋經驗」的概括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實際上，用毛的話來說，就是不必依靠類似於蓋世太保、



克格勃之類的秘密警察，而是發動群眾，讓群眾充當「協警」，讓「敵對分子」不由自主地「陷入人民民主專政的汪洋大海」。

毛本人和中共的宣傳機構，對「楓橋經驗」語焉不詳。事件的原始出處，載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四一六頁，是毛澤東《對謝富治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批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容如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後，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幹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毛澤東十一月二十日

當時，任公安部長、武警部隊司令員兼政委的謝富治，準備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作題為《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發言稿首先呈送毛審閱。毛閱後作了如此批示。

毛並未提及「楓橋經驗」，只是說「諸暨的好例子」。諸暨縣的經驗，最基本一條是發動群眾、制服敵人，把共產黨內部肅反的方針用於處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揭發出來的「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楓橋經驗」的精髓，說到底，就是發動群眾、加強專政、以「階級鬥爭」為鞏固政權的首要手段。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放棄「階級鬥爭」的提法，強調構建「和諧社會」。令人不解的是，本來是標榜「階級鬥爭」的「楓橋經驗」，又如何「舊瓶裝新酒」，成為習近平的統治方略？

習近平上臺前夕，二零一二年夏，《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袁

鵬的文章《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五至十年》。該文聲稱，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等五類人正在干擾中國崛起。文章指出，美國將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這五類人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

作者袁鵬身為中國國家安全部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所」美國所所長，他的觀點當然不是個人意見，而是中共強力部門的想法。專制政權的慣用伎倆有兩個：一是對外塑造敵人，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灌輸仇恨意識，製造一個或多個陰險狠毒的國際敵人。二是對內挑撥分裂，劃分等級，挑起群眾鬥群眾。袁鵬的這篇文章，體現的就是此種中共傳統的文宣手段。

袁鵬文章中的「新黑五類」與毛時代的「老黑五類」有所不同。「老黑五類」是基於階級身份劃分的，通過多數人對這少數人實行專政，肆意剝奪這些人的公民權利。「新黑五類」則是基於權利意識產生的，是一群為自己和大多數人主張公民權利的人。然而，讓人震驚的是，連弱勢群體也被當局劃入「新黑五類」，工農大眾中的相當大部分難道不都是弱勢群體嗎？一個號稱代表工農的政權，偏偏要將工農中的大部份視為敵人，何其荒誕！一個政府不僅不去保護和幫助弱勢人群，反倒將之視為威脅國家崛起的障礙，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納粹思維。

從劃分「新黑五類」到推崇毛時代對付「敵對階級」的「楓橋經驗」，習近平的「以人民為敵」的心思意念逐漸浮出水面。

惡名昭彰的謝富治是「楓橋經驗」的始作俑者

所謂「楓橋經驗」，其始作俑者是「文革」幹將謝富治。

謝富治是解放軍第一批上將，五十年代初主政雲南，就作惡多端，見風使舵、扶搖直上。羅瑞卿倒臺後，謝接任公安部長，掌握政法實權。



「文革」伊始，謝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六七年，謝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等重要職。一九六九年，任中央軍委委員，同年任政治局委員。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一九七二年病死。

謝富治的工作主要在公安系統，用公安系統為毛澤東掃除政敵，因其心狠手辣、窮凶極惡，在黨內迅速竄升。中共高層的排名極有講究，從《人民日報》報導的重要公共活動的出場順序就可見一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的報導中，謝的排名為第二十一位；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報導中，謝的排名升至第十六位；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報》的報導中，謝的名次驟然上升到位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第九位，居然在朱德、李富春、陳雲等元老之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謝富治炮製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堪稱「中國的蓋世太保法」的《公安六條》。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發佈《公安六條》。該文件規定，凡是攻擊毛澤東、林彪的，都是「現行反革命」，「以現行反革命論處」。而在實際工作中，又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不滿的，也是「反動行為」，要「依法懲處」。《公安六條》製造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致使數百萬人家破人亡。比如，「趙健民特務案」使雲南大批幹部群眾受到迫害，一萬四千人被迫害致死。又如「內人黨案」使得內蒙古等地三十四萬六千餘人受到誣陷，一萬六千人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零年，中共中央發佈了一份關於康生、謝富治問題的文件。文件指出，「根據確鑿證據，查明康生、謝富治兩人，政治品質表現惡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犯下嚴重罪行」。文件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佈，同時撤銷對這兩人的《悼詞》，並開除他們的黨籍。」謝富治的骨灰也被從八寶山革命公墓撤出。同時，審判林彪、江青集團的最高法院

特別法庭，也判定謝富治有罪，只是因為人已亡故，不再予以處罰。

謝富治是中共高官中良心泯滅、以殘酷無情地「整人」來獲取功名利祿的代表性人物；習仲勳則是中共高官中極少數良心尚存、以「一輩子沒有整過人」為榮的開明派。這兩人形成了善惡之兩極。在中共黨內「優敗劣勝」的潛規則之下，謝富治在短短數年間便飛黃騰達，大權在握，成為「中國的貝利亞」；反之，在延安時代地位遠遠比謝富治高的習仲勳，卻成為遭到整肅的對象，失去自由長達十六年之久，雖然在「文革」的迫害中倖存下來，晚年亦不免精神分裂、鬱鬱而終。若你是中共體制中的後來者，你會效法他們中的哪一個呢？

作為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似乎並沒有受到父親人格的感召，偏偏將迫害父親的兇手之一的謝富治奉為「師傅」，將謝富治提煉出來的「整人妙計」重新翻出來作為捍衛其獨裁權力的利器。此種「精神弑父」之舉，堪比親手殺死父親之肉身的隋煬帝。

「楓橋經驗」是習近平與周永康共同穿的一條褲子

隆重召開紀念毛澤東肯定的「楓橋經驗」的大會，不是習近平的突發奇想，在中共黨內早已有人如此幹過了。這麼幹的人，就是如今身陷腐敗醜聞、成為「打老虎」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周永康。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浙江省委在浙江紹興召開「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四十五周年大會」，周永康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周永康在講話中充分肯定浙江省和全國各地學習推廣「楓橋經驗」取得的成績。他指出，「楓橋經驗」已經成為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一面旗幟。他也警告負責維穩事務的官員，「要積極疏導、有效處置影響社會穩定的熱點、敏感問題，堅決防止因思想不重視、工作不主動、措施不到位，使個體矛盾演變成群體矛盾，讓小事情發展成大事件」。換言之，就是要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搖籃之中。

習近平並沒有因為周永康鼓吹過「楓橋經驗」，而將其視為臭不可聞的垃圾。在權力爭奪的層面上，習近平與周永康是「你死我活」、「有
你無我」。上臺之後短短數月之間，習近平就對周永康在石油和政法系
統之內多年經營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抽絲剝繭、各個擊破，然後在
空出的位置上安插自己的羽翼和心腹。如此這般，他的權力才能穩固下
來。否則，他在中南海的龍床上一個安穩覺也睡不好。

但是，在治國方略上，習近平與周永康一同分享毛澤東的資源，他
們拒絕學習西方的民主憲政，剩下的就只能是「我注六經」、「毛選萬能」
了。在這一點上他們如同學生兄弟——就好像當年勢同水火的林彪集團
與江青集團，分別扮演毛澤東左右手的角色一樣。因此，習近平和周永
康的鬥爭，是惡與惡的鬥爭，而非惡與善的鬥爭。任何一方的勝利，與
任何一方的失敗，都跟普通民眾無關，都跟民主自由無涉。不值得期待，
更不必載歌載舞歡慶之。

如果用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來分析「楓橋經驗」，那就是如何讓群眾
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的基礎。漢娜·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首先瓦解公共
生活，讓民眾變成原子化的、孤立的個體，他們不再擁有共同的世界、
不再是真正政治上相互平等的人並彼此發生關係。惟其如此，群眾才會
全身心地置身於群眾運動之中，心甘情願地為獨裁制度添磚加瓦。習近
平羨慕毛澤東能輕而易舉地達致此一目標，而在今天的中國，他還想如
此「運動群眾」已不復可能。

而這恰恰就是習近平和周永康不約而同地重視「楓橋經驗」的根本
原因。在今日中共的政治運作中，已然形成一種奇特現象，我將其概括
為「人亡政不息」。這就是：儘管薄熙來垮臺了，但薄熙來在重慶大張
旗鼓地推行的那場「小型文革」，卻由習近平以更為隱秘而堅決的方式
向全國推廣；儘管周永康成了一隻有氣無力的「死老虎」，但周永康主
持政法部門期間愈演愈烈的「暴力維穩」政策，卻由習近平全盤繼承、
且推出升級換代的新版本。

習近平不妨改名「習禁評」

中國不會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國的知識體系不能參與世界知識體系的建構，不能成為知識生產的大國。即使中國在快速的經濟崛起，充其量也只能成為一個物質生產大國，但是在精神文化生產和創新乃至輸出上仍然是個無需重視的小國。

——柴契爾夫人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吹響了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號角，是為「八一九講話」。共產黨是一元化領導，立法和司法都由黨一手掌控，這些部門立即忠實執行總書記的命令。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推出《關於辦理利用互聯網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關於『網絡誹謗』的最新司法解釋」指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流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即構成侮辱罪或誹謗罪。

香港人已領教過全國人大如何就《基本法》「釋法」，反而是內地民眾對兩個高院如何「釋法」倍感陌生。此種釋法如同徐克電影《七劍下天山》中清王朝向天下蒼生發佈「禁武令」，其令一出，江湖噤聲，網絡世界，死水一潭。政論家胡平指出，「兩高」對懲治所謂「網絡謠言」的司法解釋，邪惡程度甚至超過毛時代的「公安六條」。此後，警察抓人理直氣壯，不必像炮製薛蠻子案件那樣，為之精心策劃「聚眾淫亂」之罪名。

清末龔自珍有詩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這首詩說的不僅是晚清中國的狀況，亦是今日中國之光景。政論家胡平三十年前寫出了轟動一時的《論言論自由》，三十年後中國的言論自由狀況卻不進反退。在此情形之下，又怎麼會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希望？

「習近平時代」以文字獄開局

小人得志便猖狂。習時代剛拉開帷幕，文字獄便如「黑雲壓城城欲摧」。

四川射洪縣異議人士、商人李必豐，被當地法院以「合同詐騙罪」判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三十萬元。李的律師馬小鵬在庭審結束指出，所謂「詐騙罪」卻沒有利益受害人，不符合有關法律的規定。長期積極從事民主運動的商人李必豐，此前已兩次被判刑入獄，前一次也是以相同罪名被囚。所不同的是，這次判刑更重。

李必豐原為四川綿陽市稅務局幹部。一九八九年，因組織遊行，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出獄之後繼續從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一九九八年，再次被逮捕，並以涉及金額六千元人民幣的「經濟詐騙罪」判處七年徒刑。二零一一年九月，四川警方懷疑他為某人逃亡海外提供幫助，多次被傳訊後將其逮捕入獄。加上這次十二年的刑期，他累積被判刑二十四年。

李必豐是近年來被判處刑期最長的異議人士，甚至比《零八憲章》倡導者劉曉波的刑期還要長一年。即便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李對中共的威脅，亦遠遠小於劉曉波。那麼，為什麼李會被如此重判呢？

在正式判決之前，李必豐案已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全球數百名作家、記者和諸多人權組織簽名呼籲釋放李必豐。此案拖到十八大之後宣判，不是地方法院作的決定，而是秉承最高當局的旨意。

中共當局最害怕有經濟實力的商人與知識份子、維權人士結盟。晚

清末年，正是地方士紳和正在興起的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派的合作，才催生了辛亥革命。在共產黨看來，李必豐有錢、有理念，是最危險的人物。當局刻意製造出這一標誌性案件，給民間社會一個「下馬威」——看你們誰敢「蠢蠢欲動」？

與此同時，北京網友「星河艦隊」因在推特上的一條玩笑，被以「散佈虛假恐怖資訊」的罪名刑事拘留。「星河艦隊」本名翟小兵，一九七六年生，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曾為媒體人，現為某投資公司經理。北大中文系出了不少高官與鉅賈，也出了孔慶東之流的「三媽教授」。儘管「五四」傳統已是涓涓細流，但還有像翟小兵這樣追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的畢業生。

這則推文是喜歡講科幻故事的翟小兵開的一個玩笑：「《死神來了》（此為美國有名的一部恐怖片）之六即將上映。大會堂突然倒塌，正在開會的兩千多人只有七人倖免，事後卻又一一離奇死亡。是上帝的遊戲，還是死神的怒火，神秘數字十八怎樣開啟地獄之門？十一月八日全球院線震撼登場！」美國好萊塢災難大片中，常有白宮傾覆的畫面，美國總統不會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查禁之，不過一笑置之罷了。然而，魔教教主沒有幽默感。這個段子剛發佈，翟小兵就被公安局從家裡帶走並刑拘，關押於密雲縣看守所。

「星河」被刑拘的消息被轉發到微博上，相關微博轉發數將近兩千次。不過，他的新浪微博帳戶在引起關注後很快被刪除。對於微博上喜愛開玩笑，甚至是政治玩笑的人來說，這則消息也令他們「渾身冷汗」，@胡淑芬表示：「寫段子的同學們，人人自危吧。」媒體人石扉客發佈多條相關消息聲援之，他直言：「開不起玩笑的政府，不敢開玩笑的社會，對一句反諷式玩笑引發的牢獄保持緘默的公眾，共同鑄就了我們身邊的人間地獄。」

網民的地獄，就是習近平企圖打造的天堂。鴉雀無聲之中，惟有他一個人可以發聲。

習近平上臺之日，便是「習近平」三個字在網絡上被遮罩之日。有網友感歎說，原來他不叫習近平，而叫「習禁評」！

在緬甸，昂山素季被釋放並自由參與政治活動；在中國，劉曉波仍被關押，其妻劉霞被軟禁在家、劉霞的弟弟劉暉被構陷入獄。一進一退，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丁瑞失業與雲山入常，也形成鮮明對比——緬甸啟動了真正的改革，中國拒絕任何實質性的改革。

丁瑞為何許人也？丁瑞（Tint Swe）曾擔任緬甸最後一任審查總長，他的辦公室在二戰期間曾是令人畏懼的日本憲兵審訊中心，這也是丁瑞的綽號「文學刑訊官」的來歷。在過去近五十年間，緬甸軍政府在印刷前對每本書、每篇文章、每幅插圖和照片以及每首詩都進行審查。直到吳登盛總統上臺，啟動政治改革，釋放昂山素姬和大批政治犯，取消流亡人士歸國的禁令。而在諸多改革措施中，最讓人振奮的消息是：當局宣佈廢除新聞出版審查制度。

二零一二年八月，丁瑞將國內知名的編輯和出版商召集到辦公室，宣佈一個重大決定：審查制度從此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丁瑞承認：「我過去做的工作與這個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和現實不協調的。」此後，往日熙來攘往的辦公室，變得門可羅雀。儘管有些失落感，但丁瑞在接

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直率地表示：「我很自豪，是我終止了審查制度。」與丁瑞失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錦濤時代的中宣部部長劉雲山榮升常委。在胡時代，有一武一文兩大鷹犬：一武是主管政法委的警察頭子周永康，一文是宣傳部長劉雲山。劉雲山以宣傳部長躍升黨國領導人，有人說是江澤民的支持，有人說是胡錦濤的安排，但更明顯的因素是：他的工作成績得到習近平的信任和首肯。

這是一個比傻的時代，更是一個比壞的時代。鄧小平時代主管意識

形態的胡喬木，雖然左，畢竟還是下筆成章的秀才；如今的「文化沙皇」劉雲山，平庸如爬蟲，僅以對上溜鬚拍馬、對下防民之口，便青雲直上。與丁瑞掌管的僅僅一百多人的新聞審查部門相比，劉雲山掌控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數以萬計的媒體和數百萬的宣傳幹部，其規模讓新聞大亨默多克望塵莫及。中共宣傳部沒有公開的電話號碼，設在紫禁城旁領導人辦公廳對街的總部也不掛牌。宣傳部腐敗而專橫，它發給媒體的指示屬於國家機密——媒體人師濤僅僅因為披露了宣傳部不准媒體報道「六四」的命令，便被關押八年之久。

劉雲山時代的宣傳部，炮製了「文革」結束後最多的文字獄。劉曉波、劉賢斌、陳衛、朱虞夫……這張名單可以彙集成一本厚厚的辭典。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先是失去教職，繼而被刑事拘留；而作為被討伐對象的劉雲山，卻因為替胡錦濤「守門」有功，獲得了入常的門票。

丁瑞失業，顯示緬甸民主化進程勢不可擋。以臺灣、南韓、南非之經驗而論，開放報禁之後，必然是開放黨禁，新聞自由將帶來整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相反，劉雲山入常，則顯示中共抱殘守缺、不到黃河心不死。習近平沒有吳登盛的智慧，劉雲山也沒有丁瑞的智慧。

向初中生下手，讓所有人閉嘴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甘肅省張家川縣官方對外公佈，九月十二日男子高某從高處墮下致死，案發之後，有人利用網絡平臺虛構事實，擾亂公共秩序，於是懲處七人，其中初中三年級學生楊輝因發帖轉載五百次以上，情節嚴重，故將其刑事拘留，「或將面臨檢察機關的公訴」。這是網絡發帖轉播五百次入罪的首宗案例。

楊輝的父親稱，兒子年僅十六歲，在張家川鎮中學上初三。兒子在北京上小學和初中，為了能參加高考轉回甘肅上學，學習成績很不錯。兒

子性格開朗，對社會沒有仇視，發微博是出於一種正義感。據楊父介紹，九月十四日中午，楊輝在微博發佈消息稱，「九一二案發後警方不作為，且多次與群眾發生爭執甚至毆打死者家屬」。當晚，楊輝再發微博，稱「警方強行拘留死者家屬，與群眾發生衝突」。九月十五日晚，又發微博稱，「鑽石國際 KTV（案發地）的法人代表是張家川縣法院的副院長蘇建」。正是這些資訊，導致官府惱羞成怒。

楊輝被拘之後，網民為之鳴冤叫屈。有網民指出，「提出質疑豈能跟造謠畫上等號」，憂慮警方濫權；另有微博實名認證為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永紅在微博指，按照《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楊輝應避免羈押。

初中生發帖被刑拘，看似一個地方性的偶然事件，但放在當局「封網抓人」、「淨化網絡」的大背景下，則是「全國一盤棋」中的典型案例。中共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連十六歲的孩子都害怕，何來「自信」之有？網民以史官的筆法評論說：「史書一定會這麼說的：為了讓自己看上去更加正確，他們選擇了世上最孤獨的活法：一種思想、一種聲音、一種溝通方式——抓人。為了進一步烘托強大的形象，他們派出幾十個全副武裝的警力，英勇合圍，成功抓走一個『造謠』的初三學生。」

如果說抓捕薛蠻子這樣的「大 V」（指身份獲得認證的網絡意見領袖），是用殺雞儆猴的方式，警告那些在網上討論國事的城市中產階級——即便像薛蠻子（薛必群）這樣既有錢又有美國護照的「大人物」，我們也不會手軟，所以，大家不要心存僥倖，一定要老實聽話；那麼，抓捕這名十六歲的中學生，則是恐嚇所有的基層網民——即便是未成年人，我們也無所忌憚，照抓不誤，我們的監獄是「老少鹹宜」的，誰敢繼續嘗試失去自由並遭受酷刑的滋味？如果不想嘗試，就乖乖閉嘴吧。

警方這一次拙劣的做法，招致民意的極大反彈。網民挖出該案負責人張家川縣公安局長白勇強的斑斑劣跡，比如曾向上一級的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長史居平行賄五萬元等。紙終於包不住火。楊輝被釋放之日，即白

勇強被停職之日——楊輝走出看守所的大門時，模仿邱吉爾著名的「V」形勝利手勢，這位「醒著的」少年必將繼續發光；而白勇強此後再也「不勇」也「不強」了，等待他的是「棄車保帥」的可悲結局。

習近平的王朝不可能靠消滅言論自由而固若金湯。美國大法官路易士·布蘭代斯指出，社會秩序不能單單靠懲處違法來維持：「禁錮思想、希望和想像會招致更多危險；恐懼會滋生更多壓迫；壓迫會引發更多仇恨；仇恨必將危及政府的穩定。保障安全的萬全之策，在於保證人們能夠自由討論各種困境及解決方案。」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當之無愧地是中國言論自由的敵人，也是中國人的自由夢、幸福夢的殺手。習近平讓全國網絡鴉雀無聲的企圖沒有那麼容易達成，除非讓中國變成像北韓那樣斷絕網絡的國度。

何謂「意識形態安全」？

中共雖已執政六十多年，其心態仍然停留在奪取政權的戰爭時期，其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處於「戰爭狀態」。它還沒有適應「執政黨」的地位，而定格在「革命黨」的身份上。這說明中共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署名「石平」的文章，題為《讓網絡空間清朗起來》。文章將網絡輿論比作「文革」時期的「大字報」，認為「網絡大字報」搞人肉搜索，傳播不實資訊，甚至造謠誹謗，其傳播速度更快、覆蓋面更廣，危害更大。「有些人利用網絡空間的言論自由，大肆抹黑、攻擊黨和政府，讓關於政府的負面新聞和批評聲音充斥網絡。」

這篇文章真是「倒打一耙」，「文革」期間流行的「大字報」，分明就是毛澤東發明的權力鬥爭的工具，是共產黨用於窩裡鬥及階級鬥爭的利器。如今網絡資訊的傳播，與「大字報」風馬牛不相及：人們在網絡上獨立發佈資訊和言論，不受權力之控制，其真假、對錯受公眾之檢驗。

固然，其中可能摻雜謠言與虛假資訊，但網絡自身具有甄別和篩選機制，最終必然去偽存真，並不需要權力插手，乃至充當至高無上的「裁判」。

習近平命令傳媒傳播所謂的「正能量」，也就是那些溜鬚拍馬的言詞。有「正」必有「負」，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表示，要加強對互聯網「負能量」的打擊，「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重中之重，是確保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重大決策」。

在這裡，「意識形態安全」與「國家安全」並列。意識形態本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如果採用當代政治學家薩特金的定義，意識形態為其信仰者提供了這個世界「是如何」及「應如何」的圖像，並借此將這個世界驚人的複雜性，組織成簡單且可理解的事物。在民主社會和憲政國家，意識形態是多元的，彼此共存、競爭、衝突、磨合。所以，雖然民主國家也會宣揚其主流的意識形態，但不會用國家暴力機器壓制和打擊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也不會憂慮所謂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那種為「意識形態安全」憂心忡忡、進而不允許公民批評和質疑的國家，其捍衛的必然是邪惡、黑暗、偏狹的意識形態。

那麼，習近平領導的這場意識形態戰爭，能大獲全勝嗎？英國《金融時報》在評論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共當局的網絡整治，是習近平領導的更廣泛的行動的一部分。儘管當局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發動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卻很難成功。「首先中共和他們的反對者一樣需要網絡。網絡論壇是發洩社會不滿的重要管道，也是測試民意的重要場所。完全關閉網絡輿論可能會導致社會壓力增加，後果十分危險。」一個靠壓制異見維持的社會，正如美國大法官安德魯·傑克遜所說：「強制性地保持觀點一致，所能獲得的只是墓地般死氣沉沉的一致。」像僵屍一樣的習近平，喜歡的正是這種如墓地一般死氣沉沉的環境吧。

惟有偽造歷史，才能壟斷未來

記憶如同一個可以輕易擦拭的黑板。

——維克多·克萊普勒《第三帝國的語言》

習近平明顯比胡錦濤聰明，例證之一就是他深知歷史的功用。胡錦濤是一個缺乏歷史感的人，他恪守當下，「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是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職業經理人；而習近平是個有雄心壯志書寫歷史的「紅二代」，他不僅要在當下「有所作為」，也要通過偽造歷史來壟斷未來，這就是「太子黨」的一種「本能」。

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

習近平在十八上第一次以總書記的身份露面時，在短短十多分鐘講話中，十九次提及「人民」一詞。有一些「屁民」包括「公知」為之歡欣鼓舞，他們認為，「六四」之後苦苦等待二十多年，翻身作「主人」的機會來了。

然而，這篇被譽為「務實誠懇」的「就職講話」，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大話、空話和謊話。以習近平的視野和胸襟，他不可能講到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這些名詞，更不可能從心底裡認同這些普世價值。剩下還能騙人的，就只有「人民」了。

習近平拿「人民」說事，是一件毛澤東早就穿過的「皇帝的新衣」：「人民」是共產黨專用的政治術語，是《毛澤東選集》中出現次數最多

的詞彙。習近平抱出「人民」的牌位來，企圖繼續麻醉公眾。然而，「人民」還會像毛時代那樣如待宰的羔羊一樣乖乖引頸就戮嗎？

當年，「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毛澤東，一邊洋洋得意地宣稱，「糧食不夠吃，餓死一半人，其他人就能吃飽」；一邊又用飛沙走石般的書法題寫「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視人民如草芥和視人民如主人，哪個是毛澤東的真實面貌呢？

歷史的真相是：毛澤東從未將「人民」當「人」看待，他高談闊論的「人民」只是統計學上一組無足輕重的數字。據美國國務院解密的文件記錄，一九七三年二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來訪的基辛格時，數次談到中國女人的問題。毛說：「中國的女人太多了。」他願意「先白送給美國幾萬中國女人」。其後，毛又表示可以送給美國「一千萬中國女人」。毛開玩笑說，「這些女人到了美國，美國人的麻煩就多了」。在毛眼中，一千萬中國女性不算有自由和人權的「人民」的一百分，而只是他隨意支配的「禮物」。

對於崇拜毛澤東的習近平而言，誰是他的「人民」呢？他的「人民」，不包括「被自殺」的李旺陽、「被車禍」的錢雲會、自焚而死的藏人、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以及被關押在獄中的劉曉波、朱虞夫、李必豐、許志永等良心犯——實際上，這些人才是「公民社會」之主體。絕望的訪民、四處逃散的攤販、被掠奪土地的農民……他們也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習近平使用「人民」這個抽象的、虛幻的、集體的詞語，卻不知道每一個生命體的價值、尊嚴和自由是不可侵犯、不可剝奪的。

從古至今，中國的「人民」從未有過選擇或拒絕某人從天而降成為統治者的權利，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專制政府指定的統治者。稍有能力和資本的「人民」，「用腳投票」，移民他國。近年來，號稱「大國崛起」的中國，成了全球第一大向海外移民的國家。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如改名為「中華移民共和國」。

中國的微博上有一則笑話：某人要移民到美國，領導問他：「你對

你的工資不滿意嗎？」某人回答說：「滿意。」領導追問：「對你的住房不滿意？」此人回答說：「滿意。」領導再問：「對醫療，孩子上學都不滿意？」此人斬釘截鐵地回答：「都滿意！」領導迷惑不解了：「既然你都滿意，為什麼還要移民？」此人回答說：「美國允許我不滿意。」

可見，沒有自由和公義的國家，不是人民的「祖國」。習近平以為，「人民」都是朝三暮四的猴子，可以肆意欺騙。他拿出那套早已過時的騙術來，結果一眼就被「人民」看穿了。

那個「有錢也沒有用的時代」是什麼時代？

新華網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電，習近平在山東農科院召開座談會，聽取農業專家、農業主管部門、基層幹部意見。習近平表示：「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保障糧食安全對中國來說是永恆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發生大饑荒，有錢也沒用。」

那個「有錢也沒有用的時代」是什麼時代？

習近平尚是王儲、兼任中央黨校校長時，曾就黨史研究發表講話，強調黨史研究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他說：「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人民日報》隨即發表社論，警告要吸取前蘇聯「搞歷史虛無主義，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等領袖人物，導致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的歷史教訓」。

王岐山是學歷史出身，愛讀歷史書，談起歷史，開口便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樣的經典著作。習近平則不學無術，缺乏基本的歷史知識，不斷犯自相矛盾的錯誤，陷入「左右互博」的尷尬之中。

大飢荒研究在中國是禁區，屬於習近平劃定的「七不講」的範疇。所以，楊繼繩的《墓碑》只能在香港出版。這一次，習近平居然公開承

認大飢荒的「歷史經驗」，不就成了官媒所批判的「歷史虛無主義」嗎？

同時，習近平又大言不慚地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倘若中共的革命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大飢荒時代怎會有數千萬民眾被活活餓死？沒有飯吃的百姓，尋覓此種「營養劑」來吃，不就皆大歡喜了嗎？

直面大飢荒的歷史，中國應當向烏克蘭學習。烏克蘭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及在四十年代的二戰結束後，經歷了三次饑荒，數百萬人餓死。有糧倉之稱的烏克蘭大地本可以養活整個歐洲，而且三十年代烏克蘭糧食充足，是斯大林的錯誤農業政策導致大饑荒的蔓延。幾年前，烏克蘭通過立法，規定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六是悼念大饑荒以及政治迫害受難者的紀念日。

二零一三年是大饑荒八十週年的紀念日，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輔，下午兩點舉行了悼念遊行。下午三點，烏克蘭主要的東正教和天主教堂舉行了安靈彌撒。下午四點，烏克蘭全國默哀一分鐘，並開始點燃蠟燭活動。烏克蘭永恆悼念大饑荒受難者全國委員會呼籲，每個烏克蘭人在自家的窗臺上點燃蠟燭。在首都基輔的烏克蘭大饑荒受難者民族紀念碑前，點燃了一萬多支蠟燭。烏克蘭各政府機構、企業等建築下半旗，國旗上同時懸掛黑色絲帶默哀。新聞媒體和文娛場所當天停止娛樂節目活動。

東正教會基輔和烏克蘭都主教，專門發表聲明譴責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暴行。聲明說，千百萬人在大饑荒中餓死，並不是因為糧食歉收和外敵入侵。大饑荒是布爾什維克政權殘酷政治迫害中的一部分。製造大饑荒是為了強制推行集體農莊運動，並把整個富農階級作為共產黨政權的敵對因素全部消滅。

與大飢荒成為全民記憶的烏克蘭相比，中國的文明程度遠遠落後：在中國官方的歷史敘述中，大飢荒的真相仍然被深深掩蓋，大飢荒的責任人仍然被供在神壇上，大飢荒的死難者五十年無祭。如果不是習近平

自作聰明地提醒中國曾經有過那個「有錢也沒有用」的時代，年輕一代怎麼會相信有錢居然買不到糧食？那個「有錢也沒有用」的大饑荒時代，是毛澤東的傑作。惟有否定大饑荒、否定毛澤東的暴政，中國社會的轉型正義才能啟動。若不否定大饑荒，死於大飢荒的數千萬冤魂將死不瞑目。習近平，你難道不害怕每晚的夢境，都會被白骨和血淚所充滿？

憶苦思甜，宛若北韓

中國網絡上瘋傳一組體育明星穿著嶄新的老式紅軍軍裝的作秀照片。官媒報導說，中國田徑協會組織中國田徑隊來到井岡山接受紅色教育暨軍訓，包括「飛人」劉翔、新科「百米飛人」張培萌、一百一十米欄新秀謝文駿等紛紛著裝亮相。他們在井岡山的活動有：聽革命傳統教育講座、參觀革命舊址、重走紅軍路等。看到這些腰纏萬貫、常常光鮮地在廣告中代言的體育明星，如今一臉凜然正氣、舉起拳頭宣誓的模樣，真有看荒誕不經的「穿越劇」的感覺。

中共的黨史、軍史，是一個臭不可聞的爛泥潭。井岡山並沒有「神聖的傳統」可供追溯。當年的井岡山，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盜賊王國，毛澤東火拼袁文才、王佐，與林沖在梁山泊火拼王倫並無二致。日本歷史學家高島俊男評論說：「毛澤東的井岡山之路，跟馬克思所說的革命完全是兩回事，反而和中國歷史上大盜賊們走的路完全一模一樣。」這個無道之盜，因鬼蜮伎倆、殺人無數，終於成了「盜賊之王」。

今天這些腰纏萬貫的體育明星，難道也想到深山老林當中落草為寇嗎？當然不是，他們內心深處未必覺得紅軍的軍服有多麼漂亮，但他們深知，穿過這件軍服，才能成為共產黨的「自己人」，才能確保「民族英雄」的地位。在中國，當運動員實在是太辛苦，花在賽場之外的功夫，甚至多於賽場之內——不懂政治的「潛規則」，就不可能在共產黨的筵席上獲得一個座位。

幾乎與此同時，一組來自美國紐約萬聖節遊行的照片也在網絡上廣為流傳。一群中國年輕人身穿草綠色軍裝、戴著軍帽和寫有「為人民服務」字樣的紅袖章，有人手中還舉著《紅寶書》。他們在鏡頭前興致勃勃地擺出各種紅衛兵的經典造型，似乎他們的打扮比那些裝神弄鬼的洋人更有創意。

大多數網友對此種娛樂方式不以為然。有人質問說：「那些扮紅衛兵、跳忠字舞、玩笑娛樂的年輕人，可否真的知道紅衛兵時代的滅絕人性的罪惡？」有人批評道：「中國留學生扮紅衛兵過萬聖節，這和穿著黨衛軍制服有什麼區別？無聊當有趣，無知當噱頭。」

是的，如果在萬聖節的遊行隊伍中，有人身穿納粹黨衛軍軍服，一定會遭到千夫所指。但是，身穿紅衛兵的軍裝，人們就可以用幽默、搞笑來辯解。就好像美國著名牧師華理克在臉書上讚賞《紅色娘子軍》的劇照，招致很多華裔基督徒的批評後，反倒斥責批評者「缺乏幽默感」。然而，我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幽默之處——想起被女紅衛兵毆打致死的老師們，我只感到不寒而慄。

然而，若是習近平看到這兩個新聞，一定會開懷大笑。這就是他期待的洗腦教育的功效。從運動員到留學生，都成了中了「蠱毒」的「無敵戰士」。這將是一支多麼強大的軍隊啊！金正恩就擁有這樣一支僵屍般的軍隊。習近平在這個世界上最仰慕的人，不是奧巴馬，不是貝克漢姆，而是金正恩。人家可以不到三十歲就繼承大統，習近平卻要熬到六十歲才成為黨魁。人家統治的是一個整齊劃一的國家，習近平卻要辛辛苦苦地清除掉「與黨離心離德」的知識份子和民眾，才能樹立「絕對權威」。人家才真正是六十年一貫制，金家王朝一脈相承，顏色不變；習近平卻要苦心積慮地整合中國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巨大裂隙，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左擁右抱，矛盾統一，好不辛苦。

習近平總算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如果習近平到秦城監獄探望薄熙來，一定會對薄熙來說：你只是將重慶變成「紅都」，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你看一看，我如何將中國變成貨真價實的「紅國」？你煽動的不過是一些無知的底層愚民，我得到的卻是體育明星和留洋學子的加盟，所以，你進了監獄，我坐了龍椅。

什麼樣的信仰，讓習近平甘之如飴？

向來不說人話的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信仰的味道》的文章。說的是一九二零年，第一個翻譯《共產黨宣言》全文的學者陳望道，在翻譯這篇馬列經典時，母親為之準備一碟紅糖和粽子，還在外面問他紅糖夠不夠，他說：「夠甜，夠甜的了。」母親收拾碟子時發現他沒有蘸紅糖，蘸的是墨汁。《人民日報》評論員感歎說：「這就是信仰的味道！」

這篇文章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現在共產黨最缺少的正是信仰的力量。習近平仰天長歎「竟無一人是男兒」乃是出自肺腑、有感而發。習表面上是在說昔日的蘇俄，其實是在說今天的中國。他每天閱讀內參上怵目驚心的材料，比一般民眾都更心知肚明：黨已徹底敗壞，病人膏肓。

一旦掌權，共產黨無一例外地就蛻變成了無恥之尤的「竊國集團」。當年，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跟老媽「顯擺」，帶著老媽參觀他那全是高級進口跑車的車庫。小戶人家出身的老媽，悄悄在兒子耳邊說：「兒子呀，這些車確實很漂亮，但萬一布爾什維克又來了，我們怎麼辦？」今天中國共產黨的高官個個都像勃列日涅夫那樣富可敵國，不過他們的老媽比勃列日涅夫的老媽聰明——溫家寶的老媽名下擁有上億美元，卻沒有絲毫的不安。共產黨官員十有八九都是「裸官」，早已將贓款和家人轉移到海外，即便有一天無產者跑來「共產」也不怕。

很多良知未泯的中共老幹部，直到晚年才幡然醒悟，所以人們對這群人有所謂「兩頭真」之評論：早年加入共產黨幹革命是出於真誠的信仰，晚年黃粱夢醒、反戈一擊也是出於真誠的信仰。不過，早年的選擇，

固然有可能是「真」的，但「真」並不意味著「善」，那些向希特勒致敬的德國百姓也是真誠的，真誠卻走向了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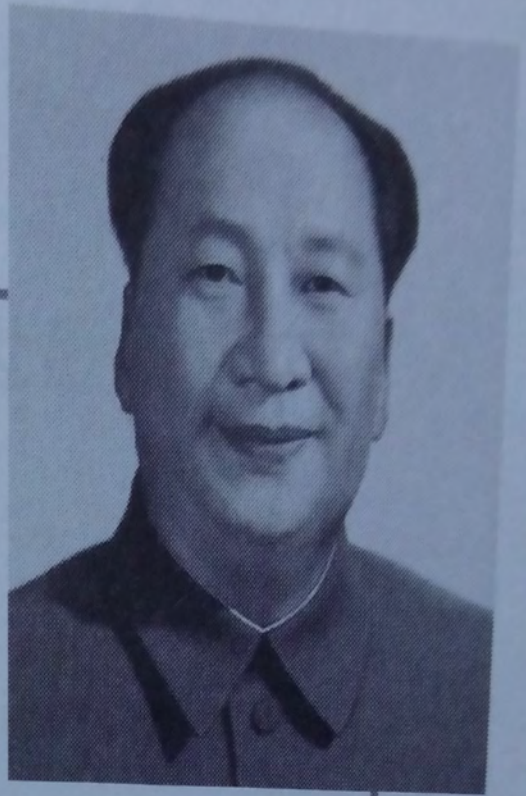
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不過，他很快就發現，從潘朵拉的盒子裡放出來的是個魔鬼。從此，他淡出革命隊伍，成了「脫黨分子」。中共建政後，他憑藉老資格和真學問當上復旦大學校長，「文革」中卻難逃皮肉之苦。幸好年輕時練過武功，才死裡逃生。

可見，作為信仰的共產主義，不僅不是救人的良藥，反倒是害國的毒藥。貫穿整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實踐，造成數以億計生命的毀滅。從蘇聯、東歐到中國、柬埔寨，無不如此。

有意思的是，陳望道當年自費翻譯馬列經典，如今紅朝設置龐大的衙門承擔此任務，即中央編譯局。前局長名為衣俊卿，名字有幾分梨園或青樓的味道，堪比梅蘭芳。副部級的衣局長有一群粉絲，名為「洗衣粉」，甚至為之設置「衣俊卿吧」。女弟子形容衣老師「謙謙君子，溫潤如玉」，還有很多帖子稱其為「衣帥」。

「衣帥」不是繡花枕頭，學問確實了得。據說寫入十八大報告的「三個自信」（所謂「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就是他在耗資幾十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裡挖掘出來的寶貝。習近平對這個提法大為欣賞，上臺之後常常擺在嘴邊。本來，衣俊卿已被習總看中，要高升為「御前掌筆使」。誰知，百密一疏，被一個哀怨的女弟子貼在網上的一篇「情色小說」毀了錦繡前程。

從陳望道到衣俊卿，堪稱共產黨人世紀「變臉」之大戲。那麼，習近平會是當今中國唯一的、忠貞不二的「共產主義者」嗎？



第四章

醉生夢死： 論當權派之裝睡

習近平比拿破崙三世愚蠢一百倍

獨裁者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獨裁者需要偶像崇拜，它要以此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

——別爾嘉耶夫《精神的王國和統治者的王國》

在地方任職期間謹言慎行的習近平，一旦大權在握，個性便張揚起來。看來，絕對的權力，不僅像阿克頓勳爵說的那樣，導致絕對的腐敗，而且還會導致絕對的專橫。與平民出身、上有元老監國、下有諸侯跋扈，故而謹小慎微的江澤民和胡錦濤不同，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鞏固權力的時間極短，宣揚和實踐個人施政方針的心志亦更為迫切。

習近平希望「左牽毛」、「右擎鄧」，將中共一黨獨裁的體制維持下去。但是，習近平畢竟不是毛澤東、希特勒式的「曠代雄主」，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梁京在《習近平的拿破崙三世性格》一文中，將習近平與路易·波拿巴相提並論，這是迄今為止我看到的最為準確的類比。不過，我要接著寫這篇「對照記」的續集：實際上，習近平比拿破崙三世愚蠢一百倍。

習近平敢面對真槍實彈的競選嗎？

拿破崙三世的歷史評價，似乎被定格為志大才疏、平庸無能，這主要是因為雨果和馬克思對他的否定性評論早已膾炙人口。雨果稱之為「渺

小的拿破崙」，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評論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於是，拿破崙三世簡直就是馬戲團中的小丑。

其實，拿破崙三世獲得最高權力，並不僅僅是依靠其伯父拿破崙的餘威與餘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個人縱橫捭闔的才幹。路易·波拿巴首先靠選舉成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的總統選舉中，他取得壓倒性優勢，以五百六十萬票擊敗僅獲一百五十萬票的競爭對手。波旁王朝遺老、奧爾良王朝成員和舊貴族等君主主義者都支持他，認為至少他是一個「比較不差的」候選人。部分資本家受其進步主義經濟主張的吸引，也對他表示支持。不過，他的支持者主要來自人數最多的階層：農民和工人。他們目認為，路易·波拿巴可以像他的伯父一樣，重振法國的國際聲威，穩定動盪不安的局勢。

在總統任期內，路易·拿破崙政績顯著，逐漸流露出稱帝的野心。一八五二年十一月，法國舉行全國公投，百分之九十七的人都支持路易·拿破崙稱帝。於是，他黃袍加身成為拿破崙三世，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改造成法蘭西第二帝國。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獨裁帝國」之後，他又轉向「自由帝國」。歷史學家路易·吉拉爾在《拿破崙三世傳》一書中指出，路易·波拿巴的轉向，除了權力運作的需要，也與他青年時代在瑞士和義大利受過自由主義思想的薰陶有關。一八六零年之後，拿破崙三世對反對派作出讓步，允許議會自由辯論，出版會議記錄，放寬審查制度，更在一八六九年任命自由派成員埃米爾·奧利維耶為首相。

路易·波拿巴是通過相對公正的競選上臺的，他在選舉中獲得的支持度，遠遠超過日後任何一屆法國政府。他敢於直接面對農民和工人等「勞動人民」發表演講，反倒比工人出身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們更受底層民眾歡迎。信仰聖西門主義的群眾是其主要支持者，他們甚至稱拿破崙三世為「社會主義皇帝」。路易·波拿巴比較關注基層人民，其著

作《消滅貧困貧窮》為他贏得了工人和農民的支持。他在位期間，確實致力於改善基層的工作環境，在一八六四年，他甚至不顧大商人和企業主的反對，賦予工人以罷工權。

與之相比，習近平的王位是一個小圈子黑箱操作的結果，並不是他努力爭取來的，更不是民眾投票決定的。在習近平被確定為黨魁兼國家元首的中共十七大上，他被視為一匹黑馬，是中共黨內各派系平衡、妥協的結果；更是共產黨統治進入末期之際，以「選蠢」為標準來選擇接班人的產物。

以習近平的那點能耐，他不敢參與競爭性的選舉。即便展開黨內選舉，他也不是政治局同僚李克強、王岐山的對手；甚至不是身陷牢獄的薄熙來的對手——如果讓習近平與薄熙到天安門廣場上對百萬群眾發表演講，鹿死誰手，猶未可知。

進而言之，如果中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選舉，習近平這個胸無半點墨的「假博士」，面對劉曉波、許志永那樣學識淵博、以民主自由為旨歸的「真博士」和反對派人士，必然是無言以對、一敗塗地。

拿破崙三世雖貴為皇帝，權力受內閣、法院和議會之制約，他無法實現絕對的專制；而習近平卻是「無冕之王」，其權力之大，讓古今中外的帝王亦瞠目結舌。習近平剛剛掌權，就致力於扼殺有限的網絡言論自由，發起你死我活的「輿論鬥爭」。

另一方面，中共自稱無產階級先鋒隊，卻將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和農民踩在腳下。習近平上臺後，連象徵性的民生政策都不願實施，不分給工農大眾一點改革的紅利，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毫無改善。

習近平有發展經濟的能力嗎？

拿破崙三世執政期間，法國經濟高速發展，使得他獲得了一定的統治合法性。歷史學家指出，拿破崙是法國第一個將經濟放在首位的管治

者。他在青年時代流亡英國時，對英國的工業革命的成就印象深刻，當政之後，遂專注於發展國家經濟，在工業和貿易方面奮起直追遙遙領先的英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是法國第一個將「經濟目標清楚地擺在第一位」的時期，法國產業迅速現代化。路易·波拿巴還致力於促進自由貿易，降低貸款利息，加大基礎建設，以確保國內經濟繁榮發展，他希望給後世留下一個「開明社會工程師」的形象。

改造巴黎是拿破崙三世對後世的又一個重要影響。他希望能通過以下措施，提升巴黎的衛生狀況和生活品質：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污水處理系統，改善衛生；設計出一種新的住宅，以容納更多居民；在全市興建公園，其中有三個大型公園，以免基層市民在星期日只能去酒館消磨時光。這個由建築師奧斯曼男爵主持的計劃，最終使巴黎成為一個由林蔭大道和綠地公園組成的城市，成為歐洲乃至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與之相比，習近平連推動經濟改革的能力和魄力都不具備。在基層任職期間，習近平的經濟政策朝令夕改，成績單根本拿不出手。比如，習近平在河北省正定縣任縣委書記期間，並未踏踏實實、因地制宜地發展地方經濟，而是與薄熙來一樣喜歡搞面子工程。他主導了作為影視基地和旅遊點的「紅樓夢大觀園」項目，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留下巨額財政赤字。該項目在短短幾年之後就夭折，成為一處人跡罕至、芳草萋萋的斷壁殘垣。如果在民主國家，如此低能的地方官員一定會被問責而下臺。但是，習近平靠著父親的蔭蔽，不僅沒有受到懲處，反倒扶搖直上，加官進爵。雖然當時河北省的領導對他不以為然，拒絕提拔他，他卻通過父親的關係，與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結識，並轉到福建省任更高一級的地市級的官員。

如今，習李之搭配，其緊密程度比不上前朝胡溫之搭配。李克強雖不是經濟專家，因身為國務院總理，在經濟第一線工作，故而迅速組建了一套強有力的經濟官僚班子。李克強設計的上海自由貿易區計劃，被習近平大大壓縮，習近平很害怕步子較大的改革，即便這種改革完全局



限於經濟領域。海外媒體剛剛要炒作「李克強經濟學」這一概念，大約是習近平感到李克強有功高震主之嫌，心中十分不快，立即命令宣傳部門禁止提及這個詞語。李克強亦只能逆來順受，沉默是金。面對中國經濟滑坡的整體趨勢，習近平束手無策，惟有採取「拖字訣」，拖一天算一天。對此，《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指出：「中國的『低消費高投資』經濟就是一種龐氏騙局。」他的結論是：「中國這輛『龐氏自行車』正在沖向一堵牆。而且，這只法西斯章魚已經唱響了它的絕唱。」

習近平的對外擴張是自取滅亡

習近平唯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積極對外擴張。他要像毛澤東那樣四面出擊、雄霸天下。既然中國即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那麼在國際舞臺上就要大聲說話、舒展拳腳。反日、反美、南海和東海爭端，火花四濺。

這正是習近平與拿破崙三世最為相似的地方。當年，拿破崙三世的國內政策本來風生水起、欣欣向榮，其個人威望也臻於頂峰。偏偏他要發動橫挑強敵的對外擴張政策，給自己以及整個帝國敲響了喪鐘。路易·波拿巴熱衷於改變世界政治地圖，在亞洲、非洲等地大肆殖民。那些落後國家當然無法抵抗法國的武力，他遂以為自己天下無敵，比作為戰神的伯父還要厲害，便不惜奉行軍事冒險主義。結果，他的好大喜功終於誘發了普法戰爭，法軍一敗塗地，他本人淪為俘虜，法蘭西第二帝國亦土崩瓦解。

習近平認為，他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改變世界格局，便不惜來一場「世紀豪賭」。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多年來都是中國外交政策的指標，在習近平眼中卻已然過時。既然西方國家要到別國搞顏色革命，中國為什麼不也去插手他國之內政呢？於是，從辛巴威到敘利亞，

處處有中國的「黑手」。

習近平和路易·波拿巴都是那種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猛人」。梁京分析說：「習近平與拿破崙三世的性格相似並非偶然，因為法國與中國都有迷信中央極權的傳統。這個傳統讓法國成長為成熟的民主國家的道路極端曲折，也正是這個傳統讓中國的現代化吃盡苦頭。」中國的專制傳統以及共產黨的黨文化，只能孕育出習近平這樣的「猛人」——他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停滯在毛澤東時代，旁人無法用一種現代的、文明的方式與之對話。

是故，今日由習近平掌舵的中國，比昔日由拿破崙三世掌舵的法國還要危險，幾乎就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梁京認為，習近平的才學、視野甚至還不如他拿破崙三世，而他控制的國家和資源遠遠大於拿破崙三世，如果不能節制帝國夢並及時迷途知返，他給本國和其他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有可能會超過拿破崙三世。梁京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預言家眼睜睜地看著預言變成現實，不知該是悲是喜？

拿破崙三世身上有很多優點，偏偏有一個巨大的缺點：剛愎自用。僅僅這一個缺點，就讓他所有的優點統統歸零，就讓他所有的成就化為烏有。與之相比，習近平一個優點都沒有，偏偏有一個跟拿破崙三世一模一樣的大缺點：剛愎自用。這幾個月以來，習近平諸多或內部或公開的講話，都清晰地表明，他已聽不進身邊智囊和文膽的意見，要奪命狂奔般地将中國帶入無邊的黑暗之中。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一百五十年之前的拿破崙三世，還能流亡到英國過最後幾年的寓公生活；一百五十年之後的習近平，在即將到來的大廈傾倒、烈火焚城的時刻，能在哪裡找到藏身之處呢？

解析習近平的智商與情商

當代大小國家許多政治領導人的平庸，以及他們言語中表現出來的愚蠢只能增加人們的懷疑。最終，這種懷疑就會變成默然和鄙視。

——諾·馬內阿《論小丑》

習近平執政以後，一個名為「學習粉絲團」的微博用戶引起媒體關注。這位「習粉」在習南巡前夕，比中共官媒中央電視臺和新華網都提前準確報導習近平在廣州的考察路線。該用戶的自我簡介稱「這裡是喜歡，支持習的家園。愛習不停，歡迎各位同學加入學習團」，其微博內容刊登習近平在南方考察期間的圖片、早期的家庭合影，甚至親切稱呼習近平為「平平」。我很佩服這位以「習粉」自居的人士，以學習之「習」隱喻習近平之「習」，也算是創意無限。

習近平為何許人也？當他在中共十七大上成為黨魁的接班人時，中外輿論一片譁然。習近平在全國乃至全球的知名度，遠遠比後來之權力鬥爭中慘敗的薄熙來要低。人們查考其履歷，習近平曾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任職，從七品芝麻官的縣委書記到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履歷完整。但人們又發現，習近平沒有留下任何值得稱道的政績，也沒有留下一句有個人風格的「名言警句」。除了擁有遠比他本人更出名的歌唱家妻子彭麗媛之外，確實乏善可陳。

在既得利益集團像混凝土一樣「板結化」的今天，在「眾寡頭共治」

的權力格局之下，習近平只是比胡錦濤稍強勢一些的「維持會會長」而已。無論是胡溫，還是習李，都是由幾百個家族組成的權貴集團推選出來的「代理人」。他們上位非經過西方式的選舉，而是小集團之黑箱操作。他們不是因為聰明能幹或政績輝煌才被相中，恰恰相反，是因為平庸和愚蠢，以及對利益集團「無害」，才「脫穎而出」。這正是後極權主義時期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的最大特點：正如庸庸碌碌的胡錦濤被鄧小平看中，無所作為的習近平亦成為各派系勉強接受的領袖。黨進入了失去生機的衰老期，黨的領袖也是未老先衰的無能之輩。

解析習近平的智商與情商，透視其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便可得出結論：中共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腦死亡」。

看哪，這個愚不可及的假博士！

一個公然偽造博士學歷的人，智商顯然不可能太高。習近平十三歲即失學，十六歲到西北當知青，一九七五年通過「走後門」成為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那時，已是「文革」後期，政策略有鬆動，習仲勳被下放洛陽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

就讀清華大學時，習近平的教育水準應當是「小學程度」。習近平傳記的作者楊中美指出，倘若從習近平沒有完整地受過中學數理化教育的學歷來看，要學好化工系有機合成專業是有基礎低的難度的——他此前做過的唯一與化工有關的事情，就是在農村搞過沼氣當柴燒。不過，當時的大學當中，並沒有太多專業知識的傳授，學習的大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之類的口號和整人、鬥人的秘訣。習近平因此可以勉強畢業。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在仕途上步步升遷，習近平覺得「工農兵大學生」的履歷難以啟齒，學歷應當與官位同步攀升。於是，在擔任福

建省副書記及省長期間，他進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思想教育」專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欲蓋彌彰，弄巧成拙，這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博士學位反倒引來更多非議。學者金觀濤質疑說：第一，習近平並未讀過碩士課程，直接取得博士學位有違教育部的規定；第二，習近平本科是學化工的，從未涉足法學領域，其博士論文的品質令人懷疑；第三，習近平一邊擔任省長的要職，一邊兼顧一千多公里外清華大學的博士課程，即便不吃不喝、不休不眠也難以兩全，除非他會分身之術。

而學者鍾祖康更是考證出，替習近平寫論文的槍手為福建江夏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和副院長劉慧宇。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中有大量內容與劉慧宇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一書的內容如出一轍。看來，劉教授的槍手身份當得並不專業，居然將為領導寫的文章收入個人的論著之中。也許，她沒有料到省長大人在短短十幾年後成了萬眾矚目的國家元首吧。

對於這些質疑，習近平及其辦公室一概不作回應，更不會像西方的政府官員那樣因抄襲醜聞而辭職。有網友如此描繪習近平的處境：「大家都知道你沒穿衣服，你也知道大家知道你沒穿衣服，可你就這麼堂而皇之在大街上走著。」

稍稍具備一定的智商者，大概不會愚蠢到以假學歷來欺世盜名。要麼是因為習近平智商太低，欲望太強，以為天下之人都是傻子，才會出此下策；要麼是因為習近平本人剛愎自用，完全不把民意當作一回事，「我就是這樣做了，你們又能拿我怎樣？」——當然，沒有任何人敢啟動正式調查，以判斷習近平博士學歷之真偽；但是，作為中國國家元首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帶頭弄虛作假，必將沉重打擊當局的信譽，更讓中國教育機構頒發假文憑之風氣氾濫成災。

誰來測試習近平的「情商」有多高？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未對外公佈的統計資料，全國長期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年均數字從二零一零年初以來，一直高居在一千二百萬的水準，預計二零一三年底將達到一千五百萬的新峰值，是香港人口的兩倍還不止。一個讓年輕人喪失現實的生機和未來的希望的社會，不可能是穩定的社會。所以，習近平跑到天津市人力資源發展促進中心，瞭解就業和培訓的情況，以顯示對此問題的關切。

習近平與高校畢業生、失業人員等座談時，問大學生村官楊代顯，「情商重要還是智商重要？」楊回答「都重要」。習說，做實際工作情商很重要，萬貫家財不如薄技在身，情商要與專業知識和技能結合。習口一開，必定是金玉良言。於是，中共官媒大肆宣揚習近平如何體察民意、愛民如子。

一般而言，教導他人好好提升情商的人，自己的情商一定也不低。但是，誰來測試習近平的情商呢？這可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國家機密」。

不過，既然身為「第一公僕」，人們當然可以從習近平的言行舉止中分析他的情商狀況。習近平上臺之後，在多個場合不遺餘力地頌揚毛澤東，在觀察家們看來，此舉必然導致兩個自相矛盾的問題：到底是毛澤東是壞蛋，冤枉了習近平的爹爹習仲勳？還是習仲勳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反黨壞蛋，習近平是反黨分子的後代？上述兩個問題，每一個分別有「是」或「不是」的兩種答案。兩個問題，四種答案。習近平無論是選擇哪一種，都會使他陷入為自己打造的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狼狽境地。

一邊頌揚老毛，一邊紀念老爸，習近平如果不是情商太低，又怎麼會剛一上臺就如此巧妙、如此成功地給自己四處布下絆馬索，挖下陷阱，使自己難以掙脫、擺脫、逃脫、脫出，使他自己成為眾人的笑柄？而以提倡「情商」作為解決年輕大學生就業的法寶，是習近平開出

的一副錯誤的藥方，本身就表明習近平的情商幾乎為零。他根本沒有體會到那些一畢業就失業的大學生們焦灼和絕望的心態，如此居高臨下地給出言不及義的「就業指導」，只能讓數百萬沉淪為城市邊緣人的失業青年對他和他的政權更加怨恨。

增加中國的就業，首先要改變國企對中國的經濟命脈部門的壟斷，讓民企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如此，中國的經濟才會有持久的活力，大學畢業生才能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一個連我這樣的外行人都知道的答案。習近平偏偏毫無作為，守株待兔。

對聯救黨，帝王思想

習近平在山東荷澤考察期間，給市、縣委書記們念了一副對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說，對聯以淺顯的語言揭示了官民關係。「封建時代官吏尚有這樣的認識，今天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比這個境界高得多。」

中國的官媒順藤摸瓜，發掘出習近平提到的這位「封建時代官吏」是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零年）河南內鄉知縣高以永。高氏撰寫的這副對聯保存在河南內鄉縣的古縣衙，被廣為稱頌。

習近平不是第一個對這副對聯津津樂道的中共高官。一九九九年，江澤民在視察河南南陽時得知這副對聯，很感興趣，還指示中央辦公廳查考此聯出自何時、何地、何人之手；一九九五年，朱鎔基來到內鄉縣衙，給予這副對聯高度評價；二零零四年秋，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考察內鄉，也來過內鄉縣衙，欣賞此對聯。

依靠這副對聯，就能拯救腐敗不堪的共產黨嗎？當年，這副對聯並未療救作者高以永一心效忠的滿清王朝；如今，又怎能「穿越」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成為共產黨起死回生的一記靈丹妙藥呢？

這副朗朗上口、雅俗共賞的對聯，將政治的清明訴諸於官員的良心和道德，而沒有任何權力分割和制衡的思想。所謂「地方全靠一官」，在中國的政治史上，每一處的地方官都是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合一的「土皇帝」。遇到好官、清官，那是當地百姓的幸運和福氣；遇到貪官、酷吏，那是當地百姓的不幸和厄運，既然「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誰敢不忍辱偷生乃至引頸受戮呢？而前者是百裡挑一，後者是普遍現象。人民大部分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人的良心和道德是最靠不住的東西。聖經中說：「在我裡頭，就是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人性的幽微和黑暗，使得任何人在掌握了權力之後，如果沒有制約和監督，都會走向腐敗和墮落。在科舉制度之下，大部分的官員確是來自百姓之中，有過清寒士子的生涯；但他們掌權之後，一般都會拼命撈錢，所謂「一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

在中國歷史上，專制統治者如何反腐呢？皇帝自己驕奢淫逸，卻熱衷於頒佈各種旨意、訓諭，並由政府大量翻刻，命令儒生反復誦讀。比如，高以永所在的康熙朝，康熙皇帝便親自撰寫《上諭十六條》和《禦制訓飭士子文》，要求士子背誦和默寫。凡是不能默寫的人，就要按照實際成績降低等第，乃至斥置不錄。統治者認為：「誠以士為民倡，果能平時服誦，相與宣講，內而砥礪躬行，外而化道鄉俗，自見熏德善良，風氣日臻醇厚。」然而，這些說教只是可笑的形式主義，各級官員並不相信，大家只是行禮如儀、互相欺騙罷了。於是，這個國度最盛產的便是偽君子。

習近平深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已臭不可聞，無法再拿出來教育官僚和矇騙民眾，便只好求助於傳統禮教和皇權文化。他拒絕引入民主憲政體制，因為民主憲政與專制獨裁水火不容。然而，正如英國思想家洛克所說：「誰認為絕對權力能夠純潔人們的氣質和糾正人性的劣根

第四章 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



性，只要讀一下當代或其他任何時代的歷史，就會相信適得其反。」可惜，讀書太少的習近平，一見到這副冠冕堂皇的對聯，便如獲至寶，撿過來給共產黨官僚們作教材。聽他背誦對聯的官員們，當面虛心受教，背過臉去則仰天大笑。

空談從來不誤國，實幹未必能興邦

中國需要的是領導者，而不是掌權者。只有民主才能產生真正的領導者。不然，那些潛在的可能成為領導者的人，只能被迫精神閹割，把自己的以及所能反映的人民的意志，消融在上級的個人意志之中。

——侯健羽

習近平上臺伊始，便喊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治國綱領。此一口號受到海內外寄希望於中共「自改革」的人士的吹捧，他們認為這是「習氏新政」之先聲。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口號本身就是大而無當的誤國妄言，而非救國秘訣。

「空談」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和政府決策的必要環節

習近平之「空談誤國」說，前面缺乏主語，如果是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官員說的，倒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對全國人民說的，那就大錯特錯了。為什麼呢？

首先，普通民眾對時政問題的「空談」，是其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老舍的話劇《茶館》中，滿清和民國的茶館中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告示，提醒茶客們不要議論國家大事，以免惹禍上身。儘管儒家

文化中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但在中國實際的專制制度之下，庶民倘若不小心談論到「敏感」的國事，下場往往都很悲慘。《茶館》沒有寫中共建政之後的情況，不過，作者本人的遭遇就堪稱《茶館》之續篇——老舍疲於奔命地「緊跟」共產黨的文化政策，躲過「反右」，卻躲不過規模更大的「文革」。雖然他早已放棄「清談」的習慣，仍然成為「被運動」的目標。肉體折磨、精神羞辱，再加上一夜之間妻兒反目，讓他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而投湖自盡。

反之，在民主國家，「空談」是公民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不是政府工作人員的公民，通過「空談」來討論乃至監督政府的作為，不會受到政府的壓力、警察的騷擾。美國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指出：「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它很可能包含了對政府或官員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銳的攻擊。」退一萬步說，即便普通人的「空談」說錯了，也不至於「誤國」，因為民眾不是政府官員，並不掌握公權力，「誤國」的只能是手中握有權力的政府官員。

其次，「空談」也是媒體的本性。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公共生活中充當的重要角色，就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並對政府作嚴格的監督和嚴厲的批評。媒體不具有行政和執法的權力，只能「坐而論道」，而不能「起而行道」。但是，媒體的「空談」卻能在某些關鍵時刻改變歷史的走向，比如《華盛頓郵報》對水門事件的揭露，使得尼克森在彈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黯然辭職——這一事件，超乎獨夫民賊毛澤東的理解能力。

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從媒體是否可以海闊天空地「空談」就可以看出來。尤其是，這種「空談」所針對的對象是政府及各級官員。美國首席大法官埃文斯·休斯指出：「當報界輕率詆毀公眾人物，謾罵誹謗恪盡職守的公職人員，並借用公共輿論對他們施加負面影響時，我們不能說媒體權力被嚴重濫用，因為與開國先驅們當年遭受的人身攻擊相比，這類言論根本算不上什麼。」換言之，政府和官員就是被要媒體和民眾

責罵的，幹得不好當然會被罵，幹得好也會被罵。罵是常態，贊是例外。習近平應當好好學習一下休斯大法官的這段話，並捫心自問：「我是否有足夠的胸懷充當公眾和媒體『空談』的對象？」

第三，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掌握立法權力的議會，就是不可或缺的「空談」機構。所謂「議會」，其功能就是「議」，即以「空談」為己任。議會並不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並不參與「實幹」。那麼，議會有何存在價值呢？如果按照習近平的設想，議會乾脆就該廢棄了，在中國，號稱「橡皮圖章」的人大更是可以精簡。然而，議會的價值恰恰在於，在政府的政策實施之前，對其進行充分、細緻的分析、討論和辯駁，使其正面效應擴展到最大，負面效應下降到最低。「議」或「空談」正是一個健康的政府作出決策的必要環節。

習近平的「空談誤國」之說，脫胎於古已有之的「清談誤國」。明朝的滅亡，就有人將責任強加到「袖手清談」的士大夫身上。在皇權專制傳統中，即便是「亡國之君」亦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批評的「君」，士大夫便不幸被當作替罪羊。其實，清談哪能誤國乃至亡國？作家冉雲飛敏銳地指出：「『清談誤國』這種比傻概念在中國流行千年，人們竟然看不出其間的邏輯不通來，這也變相證明我們受愚弄得有多深。『清談誤國』是誰發明的呢？我沒考證過，但我想專制獨裁政權最喜歡以此來鉗制言論自由，同時人們也因此喪失了思想溝通下的腦力激蕩。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思想家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不能自由地清談。」可惜，習近平不把專制和腐敗當作敵人，而將清談當作「敵人」，是愚蠢，還是刻意為之？

從「多難興邦」到「實幹興邦」

習近平的後半句話「實幹興邦」，亦了無新意，不過是溫家寶在汶川地震中「多難興邦」的「升級版」而已。

溫家寶文縷縷的、比歌劇還要矯情講話，對於盼望天降甘霖的奴才來說，是最佳的精神按摩。尤其是溫家寶視察四川地震災區時說的「多難興邦」四字箴言，瞬間傳遍神州大地。公知與屁民無不感激涕零，有無恥文人王康甚至以耶穌基督比喻溫家寶。然而，對於溫家寶的這一謬論，冉雲飛在《多難興邦與腦子壞死》一文中有深刻剖析：「興邦不需要多難，多難不一定造成興邦的果。美國包括西方許多民主國家算是「興邦」，但它們沒有多少災難；北朝鮮的災難不比我們少，但你看金正日把這邦給興得，興得以餓死人為樂。在我們國家，人禍遠多於天災，靠頻發人禍這樣的災難而興國，腦子要有多壞死，才敢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我們的總理說這種話，而很多人包括知識界不少人都附和的時候，你就知道腦子大面積壞死是如何煉成的。」相信「多難興邦」的謬論的人，就是那些永遠叫不醒的「裝睡的人」。他們不是太善良，而是過於聰明了。

如今，習近平以「實幹」為號召，似乎刻意顯示與擊鼓傳花、垂拱而治的胡錦濤大異其趣。但是，何謂「實幹」？中文是一種極為模糊、極為曖昧的語言，而官員使用的中文俗稱「官話」、「套話」、「大話」、「空話」，進而成為謊言的淵藪。比如，官方與民間都在談論「改革」，都在爭奪「改革」的話語權，卻很少對「改革」本身作出清晰的定義。實際上，官方說的「改革」與民間談的「改革」，雖然是同一詞語，但本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官方所說的「改革」，是從鄧小平開始就不斷強調的「改進行政效率」和「改善工作作風」，並不涉及對一黨專制格局的改變和更替；而民間所談的「改革」，如《零八憲章》所涉及之內容，是一種根本性的、政治制度的變革。所以，中共當局才會將《零八憲章》當作眼中釘、肉中刺。

習近平使用的「實幹」這個詞語，也充滿歧義。當年，毛澤東搞「大躍進」、「三面紅旗」、「人民公社」，不正是以「實幹」為標榜嗎？全國幾億人民都被毛的熱情給忽悠起來，大煉鋼鐵，深耕密植，吟詩作賦，熱火朝天，仿佛一夜之間就超英趕美、邁進共產主義。古今中外，



從來沒有哪個帝王和領袖有如此大的幹勁和魄力。毛澤東甚至親自深入鄉村，親手拿起鋤頭，跟農民們一起揮動幾下。豬頭豬腦的毛澤東與骨瘦如柴的農民對照鮮明——頓頓紅燒肉、夜夜玩女人的領袖，能不心寬體胖嗎？說起「實幹」來，江、胡、習等後輩，哪個能比得上風風火火的毛太祖呢？

那麼，毛的實幹導致了什麼樣的結果呢？毛一個人異想天開並強迫所有人參與的「實幹」，最後演變一場亙古未有的「人禍」，造成和平年代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在短短三年間，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八年抗戰死難軍民的總和。習近平當過知青，下過鄉，應當親眼目睹毛荒謬絕倫的農業政策使得中國農民如何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有沒有對毛瘋狂的「實幹」有所反思呢？如果習近平倡導毛澤東式的「實幹」，不僅不會興邦，反倒會亡國。

所以，真正能興邦的，不是實幹，而是民主和憲政。民主興邦、憲政興邦，專制禍國、獨裁禍國，乃是一百多年來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和顛撲不破的真理。習近平指揮官媒反憲政、反民主，其下場就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誰在為習近平抬轎子？

——從「公知捧習」看文人奴性

人類的最大敵人不是共產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人的心靈、人的想像力的庸俗化。

——布羅茨基

習近平在十八大閉幕式上作了一篇簡短的「就職演說」，被民間驚為天人，連字正腔圓的北京官話都被讚不絕口——中共建政以來，確實還沒有出現過說得一口純正北京話的最高領導：毛澤東說湖南話，鄧小平說四川話，江澤民說江蘇話，胡錦濤說安徽話。唯有在北京長大的習近平，滿口是「代表先進文化」的京片子。

習近平上臺之初，說了一些「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把權力關進籠子裡」等貌似開明的話，南下深圳重走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讓海內外對他推動改革抱有無限希望。一時間，習近平剛剛坐上聚義廳第一把交椅，雖然還未大赦天下，就出現萬民歡騰的景象，諂媚之詞鋪天蓋地而來，他的榮譽比奧巴馬的諾貝爾和平獎還要來得容易。

人類的愚蠢就在於：總是在曾經跌倒過的地方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重重地跌倒。許多「奴在心者」的「公知」，對「新一屆領導班子」產生海市蜃樓般的奢望，如同十年前對「胡溫新政」的憧憬。如果說十年前

人們對胡溫的期待，是「很傻很天真」；那麼今天對習字的期待，則是「很無恥很卑賤」，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大爆發。

不到半年時間，一切化為水月鏡花。當年的胡溫新政，還吹出了一串肥皂泡；如今，習近平龍椅還沒有坐穩，便急不可耐地撕破溫文爾雅的面紗，露出「習近毛」的真面目。那些捧習臭腳的公知們，還有什麼春秋大夢可做呢？

習近平不曾畫餅充饑，公知們自動望梅止渴

習近平在「勝選演說」中，自吹自擂說，中國共產黨「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如果這是奧巴馬的勝選演說，一定會被聽眾噓下臺去；可是，習近平如是說，卻獲得滿堂喝彩。可見，中國的「賤民」比「公民」多得多。

且看「公知」們的心聲：

——著名媒體人錢鋼認為，習近平的講話「很正面、很親切、很實在」。他說：「我覺得這裡面釋放出來的信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國的語境裡面就是說人話還是說神話，他是說人話。我覺得中國的變革要從說人話開始，樸素的，常識性的話開始。」

——專欄作家郭宇寬說：「說實話，我覺得習說話入耳的多，至少什麼高舉，緊跟之類的噁心詞少一些。」

——自稱「民主小販」的楊恒均說在微博中說：「本人剛剛連線香港、美國、澳洲的洋人與華人觀察家，大家對習的講話一致有好感，這是非常難得的。當然也許是與會議相比，有一絲清風，但不排除習講話中透出的積極資訊。」

——《新週刊》執行總編封新城說：「說話比較正常。這個國家的目標無非是：正常起來。」

這些人，被人們認為是今日中國多少有點頭腦、有點良心的「公知」。然而，不知是他們的感覺系統出了問題，還是我的感覺系統出了問題——我絲毫沒有覺得習近平說了什麼「人話」，更不認為這些說法有多麼「正常」。習近平並沒有一句話提及政改和民主化，他說的是跟胡錦濤差不多的空話、套話，只是表達方式更讓人「喜聞樂見」罷了。

雖然不能拿習近平跟演講出口成章、滔滔不絕的奧巴馬相比——人家奧巴馬是常青藤名校畢業的執業律師，而習近平的法學博士是通過「以權謀私」拿到的，兩者含金量相差太大；但是，如果拿習近平與中共十三大時的趙紫陽一比，亦高下立現：趙紫陽出任總書記之後的講話，那才是真正的務實和開明。趙紫陽敢於回答中外記者的自由提問，還端著酒杯自信地繞場一周。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也曾走到那一步，為什麼人們全都忘得乾乾淨淨了呢？是誰把人們的記憶消除了？

十年前，熱烈吹捧「胡溫新政」的，是一群名聲不小的「公知」——我因為「憑愛心、說誠實話」地指出胡溫都不是改革派的事實，打碎了他們美不勝收的夢想，便遭到他們一致的圍剿，將我定位為「破壞胡溫改革大業的千古罪人」。可是，十年後，事實證明，胡溫十年是「胡作非為」的十年，是「溫水煮青蛙」的十年。當年那些忽悠民眾相信「胡溫新政」的「公知」們，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昔日的錯誤判斷道歉。

如今，聲嘶力竭地吹捧習近平為「曠代明主」的，又是一群名聲更大的「公知」。待到習近平張牙舞爪、揮起屠刀時，他們會忘記起初自己一廂情願的戀慕，以及五體投地的獻媚嗎？

追問吳稼祥：習近平的「真身」是個「改革者」嗎？

中國知識份子人格最卑賤之處，即缺乏獨立精神，永遠以皇帝的是非為自己的是非。他們最高的人生目標，是成為「帝王師」，成為「南書房行走」。他們以為可以指導皇帝如何治理天下，殊不知，在皇帝看來，只不過將他們「倡優畜之」而已。

吳稼祥在八十年代曾經任職於中央辦公廳，因反對「六四」屠殺曾被囚於秦城監獄。近年來，他又活躍於公共領域，時不時透露些許「大內」的消息，故而成為海外媒體追捧的對象。

日前，吳氏在香港接受《亞洲週刊》、《明報》等媒體專訪，大肆讚揚習近平英明神武。他說，他對習近平改革的信心很大，相信習近平是一個「合格的改革者」。習近平釋放部分左傾政治信號只是「假動作」，這些動作僅僅是追求黨內政治平衡的手段，「千萬不要把假動作看成他的真身」。他認為，中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過於鋒芒畢露，改革的動作過猛，用力過猛，引起反彈。這也是習近平突然轉向左傾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認為習的左傾形象是反對他的人偽造的。

吳稼祥指出，目前的習李組合是「迄今最好的組合」，並建議民眾要有信心和耐心。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唯一兩份把政改作為一個重要部分來寫的黨代會報告，除了十三大，就是十八大，足見政改受重視程度。他強調，改革者需具備三個特點：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而習近平就具備這三個特點。

以上言論讓吳氏的身份撲朔迷離：他究竟是政治反對派，還是「獨立公知」，還是幫閒文人？

若說是政治反對派，同樣在「六四」後坐牢的、地位比吳稼祥高得多的、作為趙紫陽秘書的鮑彤，至今仍受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既不能在中國的媒體上發表隻言片語，也不能去香港探望兒子。而同樣有著「不可抹煞的歷史污點」的吳稼祥，卻能一本一本地出版著作，並跑到香港

「打書」，當局為何對這個「六四分子」網開一面？是不是覺得這個昔日的新權威主義者還有發揮餘熱的「剩餘價值」？

若說是「獨立公知」，吳氏又老是喜歡搬出當年「中南海工作人員」的「尊貴身份」，仿佛當過一天的「南書房行走」，就是他一輩子的光榮和資本，就能永遠有一個獲得上層資訊的特殊管道。言談之下，仿佛自己並沒有「出局」。這種對「曾經闊過」的身份的刻意標榜，可一點也不「獨立」。

那麼，剩下的便只有「幫閒文人」這一種身份定位了。吳氏的一系列言論，既缺乏基本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的訓練，又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他說習近平改革「用力過猛」，但習近平上臺後究竟搞過什麼改革呢？習近平沒有搞過任何一點改革，既然沒有在改革上花過力氣，「過猛」何從談起？吳氏又說，習近平的左傾言行是「假動作」，那麼那些被捕入獄的民主人士，難道是被「誤傷」的「炮灰」？吳大智囊可以諫言習近平，將他們全都釋放出獄嗎？

關於習近平的本質，跟太子黨關係密切的政治觀察家李偉東如實指出：習近平的夢想是「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百年一個圈」，這一百年只要實現了高水準的小康，達到了民族復興的初步目標，就可以一俊遮百醜。「習近平就是要畫完這個圈，借著民族復興一百年這個夢捎帶把共產黨變成一百年都是光榮正確的，重新樹立共產黨的合法性。」

李偉東透露，這個思路是太子黨接班之前就策劃好的。六、七年之前，中共宣傳部門就拍了一部音樂舞蹈史詩，叫《復興之路》，是為建黨九十周年而作。其中，有兩個跟習近平密切相關的人，一個是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淮，是出品人；另一個是習近平妻子彭麗媛，是主唱。李偉東認為，「中國夢」的思維邏輯那時候就形成了，絕不是習上臺之後臨時一會左、一會右拼湊出來的，這是一條深思熟慮的路。

可惜，精通權謀術的吳稼祥沒有讀懂習近平的心思意念，最終落得個「多情卻被無情惱」的結局。

追問楊恒均：習近平在下一盤怎樣的「大棋局」？

當習近平的種種倒行逆施的舉措明明白白之時，網絡上名氣很大的寫手楊恒均突然拋出一篇題為《習近平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的評論。我跟楊恒均有過幾面之緣，也讚賞他寫過的若干傳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但對這篇評論無法苟同。

楊恒均說：「新任領導人上臺，會做什麼呢？首先要鞏固權力，維護政局與社會穩定。」他認為，「推崇『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習近平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習近平首先處理中美關係，要「搞定美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老牌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一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才善罷甘休。」所以，「搞不定美國，國內很多事就做不下去，而等到美國要起來搞定你的時候，就悔之晚矣。」他是學國際關係出身的，對這個領域似乎最有發言權。

然而，楊恒均剛一下筆就錯了。第一，並非所有的大國權力更替都要經過你死我活的戰鬥，美國崛起與英國衰落，就是自然演進的，英國心甘情願地交班，美國當仁不讓地接班，共同維護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以及根植其上的國際關係。第二，目前，中國遠遠沒有達到挑戰乃至取代美國的地步，十三億中國人擁有的財富不足三億美國人的四分之一。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中國都沒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東西。中國更沒有能力取代美國「世界警察」的地位。中國家門口的鄰國，個個都是「敵國」，都未能被中國「搞定」，中國又如何「搞定」美國？第三，中美關係的癥結，不是國家利益的衝突，而是制度文明的碰撞，是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的不相容。戰後，日本經濟迅速崛起，美國的公路上跑的大半都是日本車，美國並不在意，因為日本是民主國家，不會挑戰美國。所以，中國要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得學習日本，走上民主道路。中國不民主，就永遠「搞不定」美國。如今，中美外交，雙方

都是虛以委蛇，習近平不會真把奧巴馬當作朋友，美國也不會真將獨裁中國當作夥伴。

接著，楊恒均認為，習近平的第二步棋是「清黨整風」，他指出：「習近平是唯一上臺沒幾天，就敢拿執政黨與幹部隊伍開刀的最高領導人。」這個看法之幼稚，讓人噴飯。習近平拿哪個高官顯貴「開刀」了呢？薄熙來是自我爆炸、自我毀滅的，薄的垮臺不是習近平的成就。迄今為止，並沒有任何一個現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因為腐敗問題而受到司法處理。落馬的官員一般都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腐敗只是最方便安裝的罪名。

習近平號召學習延安整風，重提「楓橋經驗」，讓官員在電視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做法不過是刻舟求劍、自欺欺人罷了。習近平對「本黨」的整治，連喜劇都算不上，只能算鬧劇。另一方面，習近平悍然抓捕數十名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殘酷鎮壓新公民運動，整肅媒體，清理網絡，拒絕民間反腐和輿論監督，足以證明他的反腐是「關起門來的假動作」。

習近平上臺之後的作為，並非如楊恒均美言的那樣，是胸有成竹地下一盤老百姓期盼的「好棋」；反之，習近平除了回頭路，不敢走任何一條新路。正如政治評論員梁京在《習近平的危機來的很快》一文中指出的那樣：「儘管習近平的身世和經歷與多數紅二代不同，與多數官僚也不同，他還是不能超越中央集權和一黨專制的系統邏輯，他是這個系統生產出來的，具有複製這個系統的基因和本能。」如此看來，習近平已然無棋可下，只能坐以待斃。

習近平不敢作任何政治改革，他允許李克強推行的經濟改革也是一場「朝三暮四」的騙術。其騙術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彼得·戴蒙德所說：「中國百姓三十年積累的六十萬億人民幣財富，在短短幾年內已經或將要通過房地產轉入政府手中，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瘋狂財富大轉移！」習近平就是這個騙局的操盤手。

▲▲▲
可惜，那麼多中國人，包括楊恒均這樣似乎很聰明的中國人，都欣然地將騙子當救星來崇拜。

追問蕭功秦：習近平代表誰的「黃金時代」？

有一次，大名鼎鼎的新威權主義者蕭功秦訪問美國，一位友人請他吃飯，邀我也參加。我婉言謝絕了。我不單單是反對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學說，更是厭惡他的「腐鼠功名侏儒淚」，我擔心我會忍不住當面斥責他，讓主人下不了臺。

臺灣作家尉天聰記載了前輩學者逯耀東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們被邀請去一家大飯店參加宴會，禮也送了，位子也坐定了，但一看同桌的某些人，逯耀東就拉著尉天聰出去：「走，吃牛肉麵去！」尉天聰說：「酒宴就要開始了！」逯耀東說：「這種飯你也吃得下去？你也不看看同桌的是什麼貨色？」

那麼，蕭功秦是個什麼貨色呢？日前，蕭功秦接受《紐約時報》採訪，聲稱習近平的出現是件極大的好事，習近平是他概念中的模範領導人鄧小平的新化身。他說：「習近平代表著中國新威權主義黃金時代的到來。現在集中權力很重要。這個時期需要一個強人，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這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必須既具有聲望，又具有得到制度保障的權力。」對於習近平的一些極左言行，蕭功秦解釋說：「他採用了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為了回到老列寧主義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抑制政治參與的爆發，從而為改革創造一個健康、穩定的政治環境。」那麼，習近平會欣賞和重用這樣的馬屁精嗎？

其實，蕭功秦本來是薄熙來的「編外馬仔」。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蕭功秦在一次由薄熙來資助的研討會上高調發言，其發言稿整理成長文《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四處流傳。這是一份迫不及待的賣身契，這是一張爭先恐後的投名狀。眼看薄熙來行情上漲，

學霸文痞紛紛投靠，再不行動，可就分不到一杯羹了。

可惜，長期鬱鬱不得志的蕭功秦，對薄熙來集團內部的權力紛爭一無所知。那時的重慶已山雨欲來風滿樓，有人要棄船而逃了，他卻還悶頭加盟。那時，海伍德被殺已經一個多月，王立軍與谷開來瀕臨決裂的邊緣。蕭功秦在公開發言中，高度讚揚重慶的「唱紅打黑」，以及所謂的「警務改革」，他說：「重慶的警察沙龍和警察文化就是要把警察這個事業，從專制工具的功能轉變為維護現代國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在文明建設中力求增強警察的榮譽感與責任感。我覺得他們有一種理想追求的。」他還特別提及一個細節：「我注意到警署內部接待我們參觀團的警官都是穿西裝，不穿警服，我問他們為什麼，他說我們就希望給大眾一種親和的印象。」西裝革履、文質彬彬背後的殺人越貨、刑訊逼供，難道這位書齋中的學者真的一無所知嗎？那時，李莊案已經激起全國律師和輿論的公憤，大教授為何充耳不聞呢？

這就是所謂的「利令智昏」吧。蕭功秦萬萬沒有想到，兩個多月之後，重慶「警察文化」的始作俑者王立軍就遁入美國領事館，成了中共建政以來級別最高的「叛國者」。蕭功秦本來期望「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沒有想到，意氣風發的薄熙來不僅沒有成為一代天驕的帝王，反倒成了不名一文的階下囚。這一次的買賣沒有做成，蕭大教授只好退而求其次，將重整山河的希望寄託在習近平身上。此前，在蕭教授眼中，習大大比不上意氣風發的薄熙來，是個扶不起來的劉阿斗；沒有想到，這個木訥人居然有魄力成立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沒有搞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那麼，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學說，不正是一張獻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濃妝重彩的面具嗎？

習近平的黃金時代到來了，蕭功秦的黃金時代到來了。可是，想要成為公民的中國人啊，又陷入了更加黑暗的奴隸生涯。

追問笑蜀：習近平有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嗎？

中國著名的「公知」、媒體人笑蜀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寫了一篇名為《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的文章。該文對習近平、對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判斷，常識性錯誤比比皆是，讓人懷疑作者究竟是故意裝傻，還有別有所圖。

笑蜀為習近平的集權舉措辯護說：「急於打造國安會、改革領導小組和升級版的中紀委這三大臂膀，目的就是對付官僚集團可能的抵抗。」這個說法太滑稽了。如今，檯面上演出的「康師傅下架」的活報劇，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演爛了的老劇本——若非企圖「篡黨奪權」，無論多麼貪腐和淫亂，「康師傅」都不會垮台，當年的「四人幫」、林彪集團也不會垮台。這些勢力遭到清洗，絕非共產黨放棄獨裁、徹底肅貪的跡象，反倒讓勝利一方更團結、讓既得利益集團更牢不可破。習近平及其家族，早已深深嵌入富可敵國的階層之中，他怎麼可能重新鍛造三個武器，對官僚集團下手？習近平要用這三大武器打擊的，是生機勃勃的、自主性越來越強的民間社會，包括笑蜀曾與之並肩前行的、「新公民運動」倡議者許志永。

笑蜀認為，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是：「用共富穩住底層、用改革穩住中層、拒絕左右綁架。」他在這裏偷換了「共富」和「改革」的概念。真正的「共富」，不是鄧小平說的「讓一部分讓先富起來」，不是這種二十多年來「官僚吃肉，百姓啃骨頭」的「權貴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而是北歐模式的福利社會主義——福利社會主義的前提是以民主政治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真正的「改革」，更不是在上掌權者宣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條下的小修小補，而是去除一黨獨裁、走向民主共和。若恢復「共富」和「改革」的真意，則可明明白白地看出：習近平不可能讓中國實現「共富」，也沒有誠意實行「改革」。所以，無論底層還是中層，習近平都不可能「穩住」。共產黨只有毛路和鄧路

兩條路可走，習近平走不出第三條道路來。

至於習近平「拒絕左右綁架」，更是無稽之談。首先，笑蜀用「綁架」這個負面詞彙形容「左派」和「右派」的政治主張，顯示出他在潛意識裏站在掌權者一邊，急不可耐地為習近平出謀劃策。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下，毛派（左派）是專制幫兇，自由派（右派）是民主先驅，兩者豈可不加甄別、沒有價值判斷地一鍋端？如果用笑蜀「綁架」的思路，那麼被關進監獄的劉曉波和許志永反倒成了居心叵測的「綁匪」，習近平則是值得幫助和力挺的「肉票」？

笑蜀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認知是：「自由派的精英，包括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白領人士，更多傾向自由派。但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則更多傾向左派甚至『毛左』。」所以，他對習近平的處境充滿同情，「中國社會被撕裂太狠，被哪邊綁架都等於四面樹敵」。笑蜀巧妙地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置換成「自由派的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矛盾，而故意掩蓋了事實真相：無論是「自由派的精英」，還是「普通老百姓」，反對中共獨裁制度的認知、信念和遠景都是一致的。

進一步分辨，所謂「毛左」，究竟有多少是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呢？大部分「毛左」是權力慾望未得滿足的邊緣知識分子——就如同毛當年的身份，如同從黃巢到洪秀全等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野心家的身份。底層民眾在毛時代並沒有享受過「好日子」，底層民眾在「文革」中受到的壓迫凌辱比那些暫時靠邊站的官僚不知嚴重多少倍。

即便有部分底層民眾在中共長期的洗腦教育之下，對毛時代心存幻想，但這是信息不對稱的結果。一旦新聞出版自由了，他們讀到揭露毛的書籍和史料，一夜之間，觀念就會翻轉。

最後，笑蜀對習近平發佈的三中全會公報也有頗多肯定之處。他認為，中共過去最多講到「綜合治理」的程度，且是與維穩對接的。「現代治理」不然，本質上是公共治理，反映出思維方式的轉換。我真懷疑他是《歷史的先聲》一書的編者——當年，共產黨在延安用謊言騙倒了



不少善良的中國人，笑蜀將四十年代中期共產黨報紙上的社論收集成書出版，讓共產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此書在中國被查禁、出版社被整肅。後來，在香港出版再版，若干中資的發行公司和書店都不予販賣。笑蜀既然有過這樣言論自由被剝奪的經歷，又怎麼會被一個「現代治理」的詞彙迷得膝蓋發軟呢？從「綜合治理」到「現代治理」，習近平有停止過抓人嗎？

不過，在許志永和王功權等數十人被捕、被判、被酷刑的同時，笑蜀却能自由行走於中國、香港和台灣之間，四處宣傳他的「中間路線」，「現代治理」果然對他網開一面，難怪他要感激涕零了。

是望梅止渴，還是飲鴆止渴？

——中國的傳統道德和傳統宗教是習近平的救命稻草嗎？

絕對的統治者並不容許任何一個生活領域中的自由創造力，無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無論他們是否同情極權主義，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而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

——漢娜·阿倫特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第四屆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獲得者。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道德的力量也是無窮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道德模範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旗幟，要深入開展學習宣傳道德模範活動，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激勵人民群眾崇德向善、見賢思齊，鼓勵全社會積善成德、明德惟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起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撐。」

習近平講的每一句都是虛假而空洞的官話、套話，並不比江澤民和胡錦濤高明。習近平還特別向眾人介紹全國道德模範龔全珍，她是紅軍老將軍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習近平說：「龔全珍同志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精神，並當選了全國道德模範，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我感到很欣慰。我向龔全珍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們要把艱苦奮鬥精神一代一代傳承

下去。」最後，自然是「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每當官方大肆鼓吹道德倫理的時候，就表明這個社會從官府到江湖都已經道德淪喪。那麼，有沒有立竿見影的藥方？二零一三年二月，習近平在北京會見臺灣佛教界領袖星雲法師，這是中共黨魁罕有地接見海外宗教界人士。星雲法師曾因在「六四」之後收留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而被中共當局冷凍多年。如今，習近平特別安排接見星雲法師，不僅是對臺灣實施統戰的策略之一，更顯示中共將對包括佛教在內的中國傳統宗教將更加寬容。

對此，路透社發表分析報導稱，習近平認為中國面臨道德準繩缺失，多年經濟高速增長和全民以致富為榮造成道德真空，應以中華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來填補。習近平深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意識形態無法繼續凝聚人心，便只能求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宗教。為此，政府部門將調整涉及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政策，希望借助這些傳統信仰的力量遏制腐敗盛行，並幫助解決貧困群體住房、上學和看病難的問題。

但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和宗教真的是習近平和共產黨的救命稻草嗎？

極權主義是全民道德敗壞的根源

習近平上臺之後，不得不承認，當下的中國處於「禮崩樂壞」之狀況，但他不敢承認其始作俑者正是共產黨的獨裁統治。當代中國的道德敗壞，有兩個重要步驟：首先是毛澤東時代從「鎮反」、「反右」到「文革」的諸多政治運動，讓維繫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幾乎被掃蕩殆盡，僅存一點星星之火。毛澤東鼓勵學生毆打老師、子女揭發父母，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學生活活打死，作家老舍因為受到妻兒的揭批絕望地投湖自殺……如此人間慘劇，一幕接一幕地上演。毛澤東站在一旁，笑看全民作惡，既然人人手上都沾滿了鮮血，他就心安理得了。

其次是「六四」屠殺，學生和市民以極大的愛國熱忱參加民主運動，運動的目標僅僅是反腐而非推翻共產黨的統治，卻換來中共當局動用軍隊、血腥鎮壓。於是，民眾心中僅存的那一點希望、善良和熱情，經過此役全都灰飛煙滅。「我是流氓我怕誰」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信奉的價值觀，「比壞」成了在這個叢林社會的第一生存法則。

極權主義是道德的敵人。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分析了獨裁者是如何毀滅一個社會長期形成的道德倫理的。她指出，納粹分子們相信「在我們這個時代作惡有一種病態的誘惑力量」。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外都明確地說，他們並不承認一般的道德標準，這已成為共產主義宣傳之本。漢娜·阿倫特還提出「平庸的惡」的概念。她發現，希姆萊有將群眾組織到絕對控制的高度才能，希姆萊認為大多數人不是放蕩不羈者、瘋子、冒險家、性罪犯、騙子，也不是社會上的失敗者，而首先是安分守己工作的人、顧及家庭的良民。對於那些只考慮維護自己私人生活的人來說，最容易摧毀的莫過於他們的隱私和私人道德觀。在經過幾年的掌權和協調之後，納粹可以正確地發佈：「在德國，只有睡著的人仍然是一個有隱私的人。」漢娜·阿倫特進而指出，人類身上存在的智識的、精神的、藝術的創造力，對於極權主義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他們一貫會清除每一種更高形式的知識份子活動。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歷屆共產黨領導人都是這樣做的。所以，中國人淪為庸人和賤民。他們心安理得地參與作惡，然後拼命撇清自己。在強權面前，他們是順民；在弱者面前，他們是暴民。沒有民主憲政的制度架構，就沒有成熟的公民責任感；而沒有在公共空間中得以彰顯的公民責任感，也就不可能有在私人領域中可以持守的道德底線。然而，今天的中共當局只是將傳統道德和宗教拿來當作暫時的止痛劑罷了。習近平並沒有改變一黨獨裁體制的想法，相反，他還試圖鞏固和強化這套體制。在此背景下，他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

「選擇性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零一三年七月，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張樂斌在《人民日報》撰文呼籲，善待宗教應成為常識、共識，信教的權利應受到保護。但是，張樂斌所說的宗教，特指儒教、佛教、道教等中國「自古有之」的傳統宗教，並不包括晚到中國的基督教及其背後的普世價值。在中共眼中，基督教始終是一種與「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糾纏在一起的「敵對勢力」——習近平上臺之後，對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不僅沒有停止，反倒變本加厲，山西臨汾、四川閬中、河南平頂山等地相繼發生嚴重的宗教迫害事件。另外，藏傳佛教、維族人信仰的伊斯蘭教以及法輪功等宗教及民族群體，仍然是「維穩政策」的犧牲品。所以，「選擇性的宗教信仰自由」絕對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平心而論，近年來中共當局確實稍稍放鬆了對傳統宗教的控制。比如，佛教與現代商業文明的「完美結合」，誕生了「少林寺有限公司」及其兼任政協委員的、精明能幹的 CEO 釋永信；一年一度的「世界佛教論壇」聲勢浩大，花錢如流水，通常有中共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黨國領導人出席；在以「第一喉舌」自居的央視螢幕上，收視率很高的是關於風水、周易和命理之類的、昔日被黨國斥之為「迷信」的節目；大小官員都熱衷於求仙拜佛，結交各類大師或高僧，後來遭到官方媒體討伐的「氣功大師」王林就曾經跟若干高官顯貴稱兄道弟、把酒言歡。

但是，這些群魔亂舞的現象並不表示傳統道德的回歸或傳統宗教的復興。傳統道德和宗教本身已經失去了生命力，靠政府外力的扶持無法實現「病樹前頭萬木春」。比如，各大學紛紛成立規模龐大的「國學院」，毛時代遭到沉重打擊的儒家學說，被重新請回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然而，當局對儒學的欣賞，是因為其中蘊含了可以由「忠君愛民」升級為「忠黨愛國」的思想元素。正如張謙在臉書上所論述的那樣：「『孝』並不

是原始儒家的重心，原始儒家的重心在於『忠』，『孝』是用來比附『忠』的一種工具。儒家文化只是將動物界的食物鏈關係予以儀式化的一種東西，從這個意思上來說，儒家文化只是一種動物文化。」這種「忠孝不能兩全」的處境下「棄孝保忠」的模式，具體到習近平的身上就是：如果說習近平對習仲勳是「孝」，那麼他對毛澤東就是「忠」。既然「孝」必須向「忠」讓路，那麼習近平拋棄習仲勳的善良與開明，而選擇毛澤東的兇殘與蠻橫，就不必承擔任何道德和良心上的壓力。

共產黨首先轉型，黨員才能享有基本人權

習近平志大才疏，缺乏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更沒有高瞻遠矚的願景。故而，當他看到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亦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要確保任內不出現堤決魚爛之局面，就足以名垂青史。如此，習近平政權便出現了朝令夕改、政出多門、自相矛盾的情形，在宗教和文宣政策方面尤其如此。

一方面，習近平本人並不相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儘管他有當「毛二世」之野心，但他大概心知肚明，回到毛時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習氏夢」。所以，習近平才會會抱著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法則，搬出曾被毛太祖掃地出門的傳統道德和傳統宗教來救急。

另一方面，習近平又試圖要保持共產主義思想的純正和共產黨組織的純正，不惜掀起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在這一場鬥爭中，他必然將所有宗教信仰都視為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既然共產主義本身是一種「現代宗教」，那麼決定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員，自然就放棄了憲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

在這一原則之下，黨刊《求是》雜誌日前發表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文章《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文章中說，黨關於黨

員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則立場是一貫的，從未有過絲毫動搖。「這一原則
是黨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決定的。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
員應保持清醒認識，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這一原則。」

對於「不允許黨員信教違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說，朱維群在文章
中也作出嚴厲批駁。文章中說，這種說法實質上是假冒「公民權利」的
名義取代對黨員保持思想先進性的要求和履行黨員義務的責任。「當一
個公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就意味著他無條件地接受馬克思主
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也就意味著他根據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
由權利自願選擇了不信仰任何宗教。」站在共產黨作為獨裁政黨的立場
上來看，朱部長的這一解釋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共產黨員的人權是殘
缺不全的。那些身為共產黨員卻又悄悄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暗地裡的門
徒」，腳踏兩隻船，又豈能穩穩當當地安身立命？

這篇文章還指出，不僅不允許共產黨員信仰任何宗教，而且黨「要
對宗教事務實行有效管理，促進、幫助宗教團體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
在媒體和各級各類學校教育中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團結
愛國宗教團體，把境外利用宗教進行的種種滲透堅決頂回去」。換言之，
「教」不能影響「政」，「政」卻要控制「教」。如此一來，「政教分立」
的原則就不可能實現，憲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遂形同虛設。

中國的道德、倫理、心靈、精神的轉型，與政治和政黨制度的轉型
環環相扣。未來的共產黨必須實現脫胎換骨式的大轉型，轉型成為西方
民主社會中類似於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黨」，並放棄對馬列主義、毛
澤東思想等「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惟有如此，其黨員才能回歸
公民社會，擁有現代公民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自由。惟有如此，中國社
會才能在自由、民主、憲政的前提下，建立起現代公民的道德、尊嚴和
責任感。

——看習近平如何「深入基層」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晉書·惠帝紀》

上臺伊始，習近平就繼承了中共歷屆領導人喜歡「深入基層作秀」的傳統。這一角色一般由總理扮演，溫家寶因此贏得「影帝」之名，及至其被《紐約時報》揭露出家族富可敵國，「八寶飯」們才偃旗息鼓。如今，習近平拋開本該在前臺扮演慈母角色的李克強，親自上陣擔任主角，也許是因為他看到民心潰散而分外焦慮，而不惜赤膊上陣。

然而，裝模作樣地噓寒問暖，就能挽回民心嗎？在統治危機日趨嚴重之際，中共需要一個有魄力和遠見的領導人，對朽壞的體制和僵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大刀闊斧地改革。病人膏肓者，需下猛藥，方能起死回生。而在地方任職期間政績平平的習近平，並不符合這一現實呼求。

即便是體制內的少數的明白人，亦對此憂心忡忡。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指出，這十年最大的問題是，這一代領導人到了關鍵崗位之後，不知道在這個位置上應該做什麼，他們只是在扮演一個政治角色。政治基本上儀式化了，一切在空轉，念講稿，背講稿，完全做表面文章，但單不住局面，到處出問題。整個幹部隊伍沒有對國家負責任的人。

人們不能指望習近平成為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說過一段擲地有聲的話：「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讓人民無法忍受的獨

裁統治。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動國家的進步和民主。」在習近平眼中，戈爾巴喬夫卻是罪惡深重的「叛徒」。

習近平是「點土成金、撒豆成兵」的巫師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年元旦前夕，習近平風塵僕僕地來到河北阜平縣龍泉關鎮駱駝灣村視察。這是一個特別貧困村，村裡六百零八口人中有四百二十八人為貧困人口，超過三分之二。中共黨魁的習慣是，在新年等重要節日，特別挑選一個貧窮地區去視察，以顯示關懷窮人、皇恩浩蕩。

習近平在與村民的座談中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當過村黨支書的習近平，比木訥的胡錦濤能說會道，他用農民都能聽懂的语言說：「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這句話跟他此前說過的「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相映成趣，立即傳遍大江南北。江澤民吹拉彈唱，胡錦濤百無聊賴，習近平則用順口溜治國——但是，他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真能帶領百姓實現「點土成金」的豐功偉業嗎？

中共建政以來，強行締造了城市與農村分離乃至分裂的二元社會結構，使中國城鄉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水深火熱；這廂是奴才，那廂是奴隸。這個習近平視察的村莊，離北京只有三百公里，卻有三分之二村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與繁華喧囂的北京相比，宛如天堂與地獄之差別。有人如此形容中國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水準的落差：城市像歐美，農村像非洲。此一比喻並不誇張。

那麼，新官上任的習近平如何帶領民眾脫貧致富？

習近平祭出的法寶是「只要有信心」。所謂「信心」，就是要求老百姓對共產黨迷信和盲從。然而，正是這種虛幻的「信心」，使得在二十

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三千多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他們淒慘地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對共產黨仍抱有信心，認為毛主席知道真相之後會來拯救他們。殊不知，這是人禍而非天災，毛澤東就是罪魁禍首。

也正是因為這種愚蠢的「信心」，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當中，學生和市民好心好意地給黨和政府提反腐意見，幫助黨「改正錯誤」。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都不認為共產黨會開槍殺人——共軍不是自稱「人民解放軍」、「人民子弟兵」嗎？結果，鄧小平悍然出動野戰軍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釀成血流成河的「六四」慘案。

屢次受騙之後，人民對共產黨的「信心」，還剩下多少呢？

「信心」不可能讓天上掉下餡餅來。如果不推動政改，黃土永遠是黃土，黃土不會變成黃金。駱駝灣村的四百二十八名貧困人口，其貧困的根源，不在於自然條件的惡劣，也不在於村民不夠勤勞，而在於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用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話來說，這是「制度性的貧困」。共產黨依靠農民革命起家並奪取天下，最對不起的恰恰是農民。

學者高玉凌在《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一書中描述了毛澤東時代農民的悲慘生活：政府給農民規定「口糧標準」，北方大約三百六十斤，南方大約四百斤。這都是「原糧」，折合成「成品糧」則每天不足八兩。對農民來說，一面是繁重而長時期的體力勞動，一面是在不少地方幾乎無油無菜沒有副食的伙食。「特別快到晌午時，那種餓得一點都動彈不得的勁頭，沒有親身體驗的人是很難瞭解的。」知青時代的習近平對此必有切身體驗，發跡之後卻「得意忘形」了。

解鈴還需系鈴人，解決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的鑰匙，不是像毛澤東那樣在「大躍進」中煽動農民對「吃飯不要錢」的「黃金世界」保持信心，而是切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將土地所有權、自由遷移權和鄉村自治權歸還給農民。

中國人民不需要習近平大刀闊斧幹出驚天動地的好事，只要他和他的黨不再奴役大家、壓榨大家、欺騙大家，就皆大歡喜了。

莫愁前路無知己，大媽原來不識君

中共官方微博「新華視點」發佈消息說，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習近平到地處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武陵山區是中國特困地區最集中的十四個區域之一。

中共最高領袖若要訪寒問苦，地方當局一般都會悉心挑選對象、反復彩排演練，竭力做到滴水不漏、萬無一失。不過，最高領袖偶爾也會心血來潮，刻意避開既定路線，突然闖入某個不在原有計劃裏的普通百姓家中。這一次，習近平便沿著狹窄山路輾轉到花垣縣十八洞村的一戶特困戶施齊文家。施家四壁黝黑，一盞節能電燈是唯一的電器。

這家的主人是一位苗族大媽，家中沒有電視和報紙，所以她不認識習近平。老大媽突然看到一支鮮衣怒馬的人馬，浩浩蕩蕩湧入家中，驚慌失措地向帶頭的人詢問：「怎麼稱呼您？」陪同的村主任立即介紹說：「這是總書記。」

習近平的演技直追「影帝」溫家寶，他握住這名大媽的手詢問年紀，聽到大媽已六十四歲，便喊著說：「您是大姐。」習近平問大媽：「吃得飽嗎？」「有果樹嗎？」「豬養了嗎？」他還問，養的豬是「自己吃了，還是賣了？」他走進老人睡覺的小木屋觀看，揭開米倉蓋子察看，還走進豬圈看老人養的兩頭豬，似乎又想起了「知青」時代在延安的那些艱難歲月。

對於丹麥王子哈姆萊特來說，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對於中共黨魁習近平來說，老大媽「吃得飽嗎」，這更是一個問題。中共統治中國長達六十四年之後，新任中共黨魁居然搞不清楚治下的民眾是否「吃得飽」，是瀆職還是無知？可見，中共宣傳機器一直以來大肆宣揚的「以

世界上最少的人均耕地養活最多的人口」的「偉大成就」，是浮誇和謊言。

這個跟中共政權同齡的苗族大媽，家徒四壁、目不識丁，年輕時看到過鋪天蓋地的毛主席像，只知道毛主席是永不落山的「紅太陽」，毛主席以後的中共黨魁一個也不曉得，真可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過，這一次習總蒞臨之後，她那間漆黑破敗的小屋，從此將蓬蓽生輝。地方官員大概會對她作出特殊照顧，至少以後不用再餓肚子了，說不定當地政府還會賞賜一台電視機，讓她每天都可以目不轉睛地觀看大小官員們精心演練的「新聞聯播」，尤其是看英明神武的習總如何治理國家。看久了，老大媽頭昏眼花，也許更分辨不清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習主席了。

那些以皇帝乃至上帝自居的獨裁者，最喜歡演出此類親民秀。當年，毛澤東在製造亙古未有的大饑荒的前夕，也曾多次到農村的田間地頭，跟農民「親切交談」，但這些「貼身觀察」並未阻止他強行推進「三面紅旗」政策。

習近平深入農家，是對毛澤東的模仿。一九五八年，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撇開與會的高級官員，驅車到成都郊區的紅光社視察，下車後即大步邁入一戶「政治上不乾淨」（在國民黨時代，這家的男主人當過甲長）的村民溫幺娘家中。

老眼昏花的溫幺娘，聽到毛澤東用她不太聽得懂的湖南話跟她打招呼，迷惑不解地問：「老同志，你是哪個省來的？」毛不點破自己的身份，周圍的人也不敢接茬。於是，毛就這樣「匿名」地跟溫幺娘聊了十多分鐘。當時，毛也問到「能吃飽嗎」這個問題，溫幺娘看到周圍都是一群有頭有臉的幹部，知道問話者來頭不小，便含糊其辭地回答說：「只要不浪費，就能吃飽。」農民亦有農民的狡詐。

如今，習近平到湖南農村視察，就像重複當年毛澤東到四川農村的劇本。說不定，習近平在出發前特別調來當年郫縣縣委辦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縣和興鄉紅光社談話紀要》，認真學習了一番。

當年的那份「談話紀要」的最後一段寫道：「主席走後，當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隊的記工員說，當真話是『龍行一步，百花沾恩』。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春雨貴如油，下午主席來過，我們紅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證要增產，這不是沾恩又是什麼？』」在共產黨的官方文件中，居然如此赤裸裸地宣揚封建迷信、個人崇拜的那一套，他們哪裡是馬列主義者。

在普通的黨員群眾眼中，毛不僅是革命領袖，更是「真龍天子」。日本學者高島俊男在《中國大盜賊》一書中說，毛澤東是盜賊之王，共產中國是盜賊之國，「當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接受自由、人權、民主理念的時候，只有中國這個地方，完全落後於那樣的歷史進程，整個社會還是和五百年以前、一千年以前沒有什麼不同，只要出現一個荒唐無道的暴徒，就能隨便把整個社會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才會被毛澤東糟蹋得那麼厲害。」如今，習近平對毛澤東鸚鵡學舌，可見中國至今沒有走出毛澤東時代，至今沒有走出盜賊王國的國界。

奴才是孕育暴君的溫床

習近平到慶豐包子鋪買包子，自己買單、端盤子、取包子。所點菜單為：二兩豬肉大蔥包子、一碗炒肝、一碟芥菜，消費二十一元。

此前，習近平微服私訪、坐計程車體察民情的新聞，先由香港的中資媒體報導，卻被新華社闢謠，成為一個烏龍事件。據說習近平為此痛斥中辦和中宣部不會辦事、弄巧成拙。

此後，美國總統奧巴馬到華盛頓的唐人街打包中國菜，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的時候去小店品嚐北京小吃，英國首相卡梅倫訪問中國的時候到成都的一家火鍋店嘗新，互相競技，好不熱鬧。這些舉動讓習近平如坐針氈，遂決定上演一齣別出心裁的親民秀，將落後的比分扳回來。在民主國家，領導人輕車簡從、上街吃飯、自得其樂，本是尋常之

事，不會成為轟天大新聞；而在專制國家，獨裁者們自導自演的親民秀，必定會被官媒鋪天蓋地報導，民眾更要傾力配合演出，人人感激涕零、山呼萬歲。

我曾在《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中剖析溫家寶的演技，那套迷惑了不少「過於善良」的中國民眾的招數，無非是吃家常菜、抱小孩子、握老人手、說貼心話而已，並不複雜，可以速成。而今，習近平果然後來居上，大概瞄準了新一屆奧斯卡獎影帝的桂冠。

百密一疏，終究有漏洞：習近平告訴鄰桌人，他上午視察完畢，正好沒吃午飯，就「順便」到這家老百姓吃得起的餐館吃點便飯。比起卡梅倫在成都一桌六百多元、人均上百元的火鍋來，一餐二十一元確實是家常便飯。但是，餐廳門口的看車人提供了一個官媒不敢報導的細節：當天，一大早就有多輛車前來佔據周圍的車位，一個神秘人物先給了他兩百元，臨走又給了一百元，還對他說，今天你會看到花錢也看不到的人。可見，這齣戲是中辦精心安排的，而不是習近平興之所至的「即興表演」。僅僅算上三百元的停車費，習近平的這頓飯並不便宜。

這一次，我感興趣的不是習近平的演技如何，而是民眾的反應。官媒報導了幾個細節：有個小孩子看到習近平之後，在媽媽的鼓勵下，欣喜若狂地跑過去叫「習爺爺」，並為「習爺爺」唱歌助興；習近平剛走不久，就有一位徐女士一家特意趕過來吃包子，她告訴記者：「就坐這個位置，給自己沾沾喜氣。」另一位女士直接到點餐處說：「來份主席套餐。」所謂的「主席套餐」一時賣斷了貨。晚些時候，習近平坐過的桌子被搬走，換了新的桌子，店長告訴記者說，公司總部要將桌椅留存起來，在適當時候對外展覽。

魯迅曾區分奴隸和奴才的差異：奴隸是在暴力之下被動地失去自由的人，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地隸屬於暴君、並為暴君服務的人。前者身不由己，後者助紂為虐。而今，那些跑來沾習近平的「喜氣」的民眾，以及將習近平坐過的座椅收藏起來的店家，則是百分之百的奴才。上面的

各色人等，都是奴才。

中國人，不是奴才，便是暴民，而少有公民。當年，看到秦始皇的車駕浩浩蕩蕩地出巡，項羽說：「彼此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這是兩個血液裡流淌著造反基因的暴民。未來，在參觀習近平的桌椅的長龍當中，會不會出現現代版本的項羽和劉邦呢？

有千千萬萬的奴才，才有殘民以逞的暴君。用共產黨的術語來說，這些人就是共產黨永遠掌權的「群眾基礎」。有了這樣的群眾基礎，才有了習近平的「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包子鋪與吃屎黨

號稱「愛國歌手」的馬仕健推出新歌《平易近人》，將習近平的名字鑲嵌其中，從頭到尾都是阿諛奉承。其中，有幾句歌詞是這樣唱的：「偉大的總書記敬愛的習主席，華夏兒女跟隨您攜手向前進，偉大的總書記敬愛的習主席，中華民族有了您一定會復興！」習近平听了，還不心花怒放！

馬仕健一曲成名，其他人不甘落後。作曲家吳頌今和作词者鄒當榮合作，寫成歌曲《包子鋪》。然後，吳頌今和北京琴書泰斗關學曾的關門弟子王樹才、流行民族戏曲全能女歌手談芳兵，一起来到庆丰包子鋪月坛店，在習近平坐過的座位旁，為正在進餐的顧客們，現場演唱《包子鋪》。衆多食客與服務員圍觀，氣氛十分熱烈，兩位歌手連唱三遍後，許多顧客還意猶未盡，要求再唱一遍。這是二零一四年最有創意的行為藝術。

中國官媒報道，《包子鋪》引起音樂界的關注，衆多歌手爭相演唱。央視《星光大道》二零零五年冠軍趙本水、央視《新視聽》女笑星花妹、湖南歌手譚圳、北京歌手謝東、山東笑星大新等百名歌手演唱的方言版《包子鋪》正在緊張錄制之中，有望搶占地方臺多個欄目。陳思思、龔

琳娜、于文華等大牌明星演唱的名家版《包子鋪》，也即將推出。

其實，這些歌手的水平，哪裡比得上歌后彭麗媛？乾脆請彭國母親自出場，由國母給國父唱頌歌，比當年江青執導八個樣板戲更加驚艷，豈不是千古絕唱、萬世佳話！

聖經中說，日光之下無新事。吃屎的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春秋時代的越王勾踐為吳王夫差嘗糞，那是被迫的。而《資治通鑒》中卻有一個自動吃屎的典故：武則天時代的御史中丞魏元忠患病，屬下郭霸前去探望，把魏元忠的糞便放到嘴裡嘗嘗，歡天喜地地說：「大人的糞，味道如果是甜的，就應該憂慮；可是，今天它的味道既臭又苦，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一般只記載重大事件的《資治通鑒》不忘記錄這件小事，郭霸遂以「吃屎黨」創始人的身份青史留名。作家柏楊用白話翻譯《資治通鑒》，翻譯至此，萬分感嘆地說：「為了當官，連老闆的糞便都可嘖嘖下咽，喜形於色，功夫之高，使人歎為觀止。……一個什麼誘因，使人性墮落到這種程度，值得沉痛探討。」

我想，當代的史家也應記載下馬仕健、吳頌今等人的名字。有習近平這樣剛愎自用、自我膨脹的獨裁者，才有滿坑滿谷的「吃屎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乾脆改名「吃屎黨」。如此，才名正言順。

高歌神曲，天上人間，渾然忘我——今天的中國，究竟是動物莊園，還是一九八四？這個時代，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薄熙來的想像力有限，只能拾文革紅歌之牙慧；習近平後來居上，推出紅得發紫的「紫歌」，讓薄熙來甘拜下風，只得乖乖在秦城監獄安度晚年。

習近平的肺跟我們一樣嗎？

持續多日的陰霾籠罩了中國七分之二的國土，北京更成為「首霾之

區」。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北京的空氣污染威脅到人們的身體健康，敦促北京居民呆在室內，避免外出。

習近平偏偏就要出行——「你們這些金貴的老外，嬌生慣養、瞻前顧後，我從小就吃過苦，我才不怕呢。而且，這是我的轄區，我說了算。」於是，習近平出現在南鑼鼓巷，官方媒體贊美說，這是與百姓「同呼吸，共命運」。

這趟行程，不是微服私訪，而是有備而來。有居民告訴香港《信報》記者，當地官員提前一周就精心準備，拆除了一些招牌，趕走了一些臨時住戶，警察整夜守著，連井蓋也查了一番。既然是「人民的好主席」，既然「腳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澱多少真情」，習近平還怕什麼呢？

官方媒體肉麻地描述說：「從古都歷史文化保護到胡同居民的安居夢想，從治理交通擁堵到嚴查『地溝油』上餐桌，習近平的關注重點，猶如一張視野開闊的民生畫卷。」皇恩如此浩蕩，老百姓想不哭都不行：習近平緊接著視察自來水廠，在央視鏡頭下，一名女工果然熱淚盈眶。這是只有在北朝鮮金正日出巡時才能看到的精彩鏡頭。看來，央視記者剛剛從平壤取經回來；看來，中國乾脆改名叫「西朝鮮」算了。

習近平不戴口罩就出門，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霾意志。習主席的肺部能消化霧霾，我們也能！習近平喜歡引用毛澤東的話，不過，與其照本宣科，不如推陳出新，下一次背誦毛澤東詩詞，不妨采用網友創作的新版本——「北國風光，千里雲烟，萬里霾飄，望京津一綫，迷霧茫茫，晉冀魯豫，塵土昭昭。」不是共產黨，誰能帶領人民「敢叫日月換新天」呢？

霧霾有弊也有利，它是抵抗美帝的最佳武器。習近平統領的解放軍中，有一位名叫張召忠的少將，在央視上發表高論：「激光武器最怕的就是霧霾。」他表示，霧霾是由微小的金屬顆粒構成，放大後就如同在空氣中瀰漫著的小鋼球。在有嚴重霧霾的天氣中，激光武器無法穿透霧霾。那麼，一有霧霾出現，北京便如同有了一張免費的「天網」。任憑



美帝的導彈多麼先進，根本就打不進來。

標榜「實事求是」的習近平，似乎沒有張少將那麼浪漫。習近平公開承認，空氣污染是北京面臨的「最大挑戰」。那麼，誰能主動請纓，克制陰霾呢？

監獄裏的四川黑幫商人劉漢或許是最佳人選。坐擁四百億財富的劉漢，因周永康案而受審。此人攀附上康師傅集團後，用二十二億巨款買到了「殺人執照」，殺死六人而逍遙法外。據說，在其家鄉廣漢，一提起劉漢的名字，小孩子都會嚇得發抖。不過，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當地數百所學校應聲而倒，唯有劉漢捐助修建的希望小學屹立不倒。究其原因，有人悄悄透露：「黑社會的工程，哪個建築商敢偷工減料？」

所以，如果讓劉漢當中國的環境保護部部長，哪個工廠敢敷衍塞責？北京一定能重見藍天。而作為中國教父的習近平，有了一個黑幫嘍囉替他管理空氣，也就不必冒著肺部變黑的危險，四處表演親民秀了。

人話乎？鬼話乎？

——透視「習近平語錄」

因為這個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資料。它假裝無處不在。它的警察機構不受制約。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麼都不怕，假裝從不作假。

——哈維爾

痞子戴上了王冠，依然是痞子。習近平是毛語言的拙劣的模仿者，他說的不是人話，而是鬼話，他被毛澤東的鬼魂附體了。上行下效，各級官員都在使用這種「毛習並存」的語言方式。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傳達習近平「八一九」講話時這樣說：「互聯網的能量在變大，是我們黨的心腹之患。導向不能變，陣地不能丟，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國信辦主任兼外宣辦、國新辦副主任魯煒召集門戶網站大佬開會，講了三句話：「網絡是黨之大患、國之大患、亡黨亡國」；「你們跟著我好處大大的」；「你們有甚麼好招，都講出來。」中國媒體人高瑜認為，這些觀點、這些話，當然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而是「拾習牙慧」。

如果說胡錦濤語言的最大特色是「乏味」，那麼習近平語言的最大特色就是「粗鄙」。毛澤東是敗壞當代漢語的罪魁禍首，他給漢語灌注了虛驕、野蠻、兇狠、狂熱等惡劣的風格，其遺毒一直未能清除。在納粹時代飽受迫害的德國猶太裔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



言》一書中，揭露了納粹不僅是靠軍隊和蓋世太保實現其統治的，更是靠語言、教育和宣傳征服人心的。他指出：「納粹語言改變了詞語的價值和使用率，將從前一般的大眾語匯收繳成黨話，並讓所有這些詞語、片語和句型浸染病毒，讓這個語言服務於他們可怕的體制，令其成為他們最大的、最公開的、也是最秘密的宣傳蠱惑的手段。」我們應當使用維克多·克萊普勒的手術刀，來剖析習近平的語言模式和統治秘訣。

我的腳不愛你的鞋

習近平上臺後出訪的第一站是俄羅斯，暴露了其「聯俄抗美」的戰略意圖。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提出與鄧小平之「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比肩的「鞋論」——「我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共同享受尊嚴，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知道。」

中共官媒吹捧說，習近平的「鞋論」獲得「好評如潮」，揭示了「國家發展的真理」。更有御用文人將攻擊目標直指美國：「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強行推行『美國模式』，對與自己發展道路不相同的國家，要麼，無端指責，粗暴干涉其內政；要麼，無理制裁，大打出手，迫使別的國家『削足適履』，走『美國模式』的發展道路，這是國際社會動蕩、經濟瀕臨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共一直把美國當作宣洩民族主義情緒的「公共污水溝」，一有風吹草動，就對美國口誅筆伐。其實，共產黨不僅害怕美軍，更害怕美國奉行和推廣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習近平究竟有什麼資格代表中國人民表態說「鞋子合腳」呢？他並非民選領導人，在這一點上還不如普京——儘管普京當完總統當總理，當完總理又當總統，在選舉中營私舞弊，但畢竟有那麼多選票在手。中

國人卻從來沒有選舉權，也就是沒有選擇合腳的鞋子的權利。中國人腳上的鞋子，是中共硬塞給的，國人的雙腳被這雙劣質的鞋子磨得血肉模糊。共產黨不准人們說不舒服，強迫人們裝扮出笑臉，一起歌唱「祖國是個美麗的大花園」。

不僅如此，中共還強迫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都穿同一雙鞋子。「同一個中國，同一個夢想，同一雙鞋子」的口號，也喊到了香港，特首必須內定，選舉變成花瓶，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台灣也不例外，中共的如意算盤是：「導彈促統一，總統變特首，一切聽北京。」當然，習明澤和薄瓜瓜們都要到劍橋、哈佛去穿「英國鞋」和「美國鞋」，這是國家機密，閒雜人等，「非禮勿聽」。

「我的鞋子我作主」的原則，在中國從來就行不通。一九八九年，人民忍無可忍，想換一雙鞋子穿。他們走上街頭，說出共產黨分配的鞋子並不合腳的真話，結果遭到坦克和機槍的血腥屠殺。魂飛魄散的倖存者們，忍氣吞聲地繼續穿上那雙不合腳的鞋子。

二零零八年，劉曉波等數萬民眾簽署並發佈《零八憲章》，對他們喜愛的鞋子的品牌、樣式、尺寸等提出具體而詳盡的描述。結果，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判入獄十一年，兩年後成為全球唯一系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還有誰比習近平更無恥呢？「鞋論」話音未落，中共中央就下達了在校「七不講」的指示，即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正如評論家許知遠所論，即使習近平的「新政」尚未構成一次「亞文革」，也多少像對五零年代共產黨統治模式的某種拙劣重複——黨國要壓垮與收服社會力量，獲得全方位的壟斷。至此，「鞋論」真相大白。

臺灣民眾有了向總統扔鞋子的自由，什麼時候，中國人才有類似的自由呢？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習近平瞬間就會被人民的扔去的鞋子淹沒。那些鞋子，習近平一輩子也穿不完。

習近平「淡定」到幾時？

空氣污染不僅是政治和經濟問題，更是人命關天。長期以來，中共強詞奪理說，「人權」就是「生存權」，將「人權」與「豬權」等量齊觀；但是，即便這種說法成立，中國的環境污染已經危及民眾的生命安全，讓「生存權」所剩無幾。

北京市衛生局對外發佈消息，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監測資料顯示，二零零一至二零一零年，北京市肺癌發病率增長百分之五十六。全市新發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為肺癌患者。二零一零年，北京市戶籍居民肺癌死亡率達十萬分之四十八點九，居「眾癌之首」。難怪網友文三娃在微博中諷刺說：「不信謠，不傳謠，再過幾年去化療……」

由於民眾的呼聲太高，習近平不得不出面回應。在二零一三年春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及北京的霧霾天氣時說，在問題面前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

這是典型的「習式語言」。習近平使用時髦用語「淡定」，比語言乾癟蒼白的胡錦濤生動活潑。「淡定」是習近平在黨內崛起的秘訣，「多磕頭、少說話、不幹事」，使他成為黨內各派系都能接受的人物。但是，如太極拳般「淡定」的招數，能改變北京上空的陰霾嗎？

空氣污染不僅是環保問題，更是政治和經濟問題。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指出，中國在任何相關衡量標準上可能「永遠」不會趕上美國。他說：「下一次你去中國，發現污濁的空氣讓你窒息時，要記住，讓空氣變污濁的東西也被認為對GDP有貢獻。如果你剔除環境惡化付出的代價對中國的GDP進行調整，那麼中國GDP的規模會減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空氣污染不僅是中國的內政，正演變為一個棘手的國際問題。中國的陰霾甚至飄到一萬公里以外的美國加州，讓加州的空氣品質急劇下降。

加州「大盆地聯合空氣污染控制區」主任特德·謝德說：「這的確令人難以置信，卻是千真萬確。」美國媒體發表了美國太空總署（NASA）網站的圖片，顯示一片黑暗區域從中國轉移到美國西岸。

當北京空氣品質指數達到駭人聽聞的七百五十五時，該用什麼語言來形容呢？美國大使館在 Twitter 上的 @BeijingAir 帳戶稱，根據美國大使館空氣監察設備的資料，北京空氣中的污染水準「超出了測量範圍」，這是描述污染水準達到五百以上的術語。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稱，污染水準在三百到五百之間屬於「有害的」，意味著人們應當避免一切戶外活動。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規定的標準，污染水準到達五百以上，就意味著空氣中顆粒物水準是安全係數的二十倍以上。

對中國官員來說，美國大使館的這套空氣監察設備，以及 @BeijingAir 這個 Twitter 帳號的存在，都是外交上的心病。據維基解密獲得的一份美國國務院電報稱，中國外交官曾要求美國外交官停止在 Twitter 上發佈消息，稱這些資料「不僅會讓人迷惑，而且還是無禮的」。

中共不僅不發佈相關資料，還要阻止美國大使館發佈資料，表明習近平沒有能力整治北京以及中國各大城市的陰霾問題。陰霾是「要錢不要命」的「中國模式」的必然結果。如果治理包括陰霾在內的環境污染，就得讓以毀滅環境為代價獲得的經濟發展模式暫停。而經濟增長一旦放緩，隱藏在經濟繁榮之下的諸多社會問題必將破土而出，中共的統治就會出現嚴重危機。所以，習近平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北京的空氣一天比一天糟糕，好在他在中南海的居所裡可以享受「特供空氣」。

爆炸的血泊之中，何來「最後勝利」？

習近平的語言，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人人都聽得懂。青島中石油管道爆炸之後，習近平親赴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黃島分院看望醫護

人員和傷者。新華社報導說：「總書記對醫護人員發揚救死扶傷的崇高職業精神給予充分肯定，叮囑他們勞逸結合，科學調度，再接再厲，奪取最後勝利。」習近平更指出，要做到「一廠出事故、萬廠受教育，一地有隱患、全國受警示」。這副行雲流水般的對聯，可以大刺刺地掛在習近平辦公室的門口，他真是太有才了。

溫家寶喜歡引用古詩，習近平則喜歡使用成語。然而，公益志願者唐古拉質疑說：「作為黨首國首，如此巨大的人禍災難面前，說得出『再接再厲』這樣的腦殘語言，天朝恐怕是獨一份吧？」若是民主國家的執政者遇到此類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首先想到的是向人民鞠躬道歉，並處罰負責官員。習近平偏偏回避兩件當務之急，英明神武地指揮眾人「奪取最後勝利」。

既然人死不能複生，再大的「勝利」也與死者無關。難道習近平有讓人「死裡復活」的本事？習近平心中並不關心死者，他關心的首要問題是：絕對不能讓此類事故激起民眾的「反骨」。所以，要趕緊扭轉人們的關注點。

有了習近平「奪取最後勝利」的混帳話，青島大小媒體將「喪事當作喜事辦」，全部進入了一種「大躍進」時代的亢奮狀態，頭版報導的標題有：《排隊獻血，愛暖寒冬》，《最佳醫護，最好救治》，《住安置點，如家溫暖》，《官兵做飯，百姓喊香》……律師袁裕來說：「請問，青島發生的是悲劇嗎？你看得出來嗎？」網民洛之秋認為：「『官兵做飯，百姓喊香』，這個災難新聞的標題應該進入中國新聞史。」

中共青島市委書記李群是迫害陳光誠、釀成無數強迫墮胎血案的元兇。李群活躍在習近平的鞍前馬後，似乎喜從天降，讓他有了在總書記面前表現的機會。李群主持常委擴大會，「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中石化東黃輸油管道洩漏爆炸事故處置情況彙報時的重要講話精神」。《青島日報》報導：市委書記李群一行走訪了海洋之星酒店的群眾安置點。他們向安置群眾說，感謝你們的配合與理解，我們一起來努力早日回家。



五十六歲的王振華激動地說：「不是黨和政府，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老百姓非常感激黨和政府的關懷。」這段肉麻的話，讓人想起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四川地震後創作的千古名句——「黨疼國愛，縱做鬼，也幸福。只盼墳前有螢幕，看奧運，同歡呼」。

「奪取最後勝利」是一句毛式語言，堪稱妄下雌黃、徒托空言。從晚清時期，官場就已開始流行這種官話。一八五七年底，兩廣總督葉名琛創造了一個軍事史上的奇跡，面對強敵，他老人家宣稱「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一門心思地求神問卜，演唱空城計。結果，英法聯軍輕易攻陷廣州城，葉總督被俘虜——這是中國近代百年戰爭史中，唯一被外敵俘虜的封疆大吏。葉總督被英國人像運「豬仔」一樣海運到加爾各答，水土不服，病死於異國。直到臨終前，葉總督還在筆記中寫道，夷人必定「不戰而敗」。氣定神閑、妙語連珠的習近平，下場會比葉名琛更好嗎？

維克多·克萊普勒指出，揭示第三帝國語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們，是知識份子不可推卸的使命。懷有虔誠信仰的猶太人，當他們認為一件餐具已經淪為宗教意義上的不淨之物時，他們便會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潔之。人們應當將納粹語言中的很多詞語置入群葬墓坑，長時間掩埋，有一些要永遠掩埋。我也激勵自己，有一天，能夠全身心地從事清除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共產黨語言的工作。

彭麗媛能代表中國的「軟實力」嗎？

他們似乎永遠以不變的形象出現：第一夫妻。這對新貴處處顯示自己的王者風範，他們那種對王權的陶醉在這個馬戲團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聞所未聞。

——諾曼·馬內阿《論小丑》

「公知」連清川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了一篇題為《第一夫人政治學》文章。文章指出：「第一夫人在現代社會與外交關係之中，乃是一個正式的建制，而非隨意與臨時的安排。並非說單身國家元首不存在，而只是指，在一般的情況下，第一夫人的存在與表現，是一國政治正常、開明乃至優異的一種呈現。」作者對彭麗媛跟隨習近平出訪俄羅斯的表現，給予充分肯定：「此次隨訪俄羅斯，彭麗媛的著裝、表現與風度，引發了國際社會和中國普通民眾的大量關注，的確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夫人政治大放異彩的一次表演，也乃是中國政治正面形象的一次展示。」

不過，連清川的這篇文章，題目就錯了。沒有「第一先生」，何來「第一夫人」？惟有民選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才是「第一先生」。習近平是獨裁政黨強加給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第一先生」；所以，夫唱婦隨的彭麗媛，豈能佔據「第一夫人」之美名？僅憑長相和歌喉，以及中國本土品牌的漂亮服裝，能展示什麼樣的「政治正面形象」呢？中共殺人、抓人、黑監獄、強迫墮胎的種種惡行，能被彭麗媛那美麗的形象「一

美遮百醜」嗎？一個彭麗媛，就能讓學識淵博的連清川頭腦發昏，看來「美人計」挺管用的。

彭麗媛為何不敢與「紅衣大叔」PK「中國夢」？

二零一三年三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中國夢」，並首次具體闡述其內容：「以二零一零年為基礎，到了二零二零年實現國內生產毛額翻一番，完成小康社會，在本世紀中葉成為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這個夢恢宏浩大，跟當年希特勒千年帝國的美夢有異曲同工之妙。習近平穿上這件「皇帝的新衣」，在國際舞臺上呼風喚雨，不亦樂乎。

皇帝的新衣，自然有人來揭穿。居住在江西南昌的網名「紅衣大叔」的李磊，寫了一首名為《中國夢》的歌曲，自己演唱，自己錄製，MTV在網絡上發佈之後，瞬間便有數十萬人點擊。有一段是這樣唱的：

中國夢不是獨裁的夢，中國夢不是專政的夢，中國夢不是「遮罩」的夢，中國夢不是貪官的夢。中國夢是人民的夢，中國夢是民主的夢，中國夢是憲政的夢，中國夢是民富的夢。

李磊在接受海外媒體訪問時說：「現在官方在炒作『中國夢』這個概念，灌輸官方意識形態，我們就是要表達跟他們不同的理念。我是本著這個目的創作這首歌曲的。網友都說一針見血，每一個字都高度概括出民主人士心目中的『中國夢』，所以引起網民強烈共鳴，大家覺得把他們的心聲唱出來了。」然而，李磊演唱的視頻很快遭到封鎖和刪除。

既然習總認為大夥都認同他的「中國夢」是最佳版本，當局為什麼不敢讓李磊的「中國夢」上臺競爭呢？如果想在央視上創造收視率超過春晚的、兼具新聞與娛樂特質的節目，不妨讓專業歌唱家彭麗媛與業餘

歌手「紅衣大叔」在黃金時段來一場世紀PK。彭麗媛家喻戶曉，李磊籍籍無名；彭麗媛是專業水準，李磊是業餘水準。兩人唱出各自的「中國夢」，究竟誰能脫穎而出、贏得人民的支持呢？

號稱「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習近平，偏偏沒有讓妻子出馬替他「打擂臺」的自信。習近平心裡知道，縱然「國母」擁有天籟之音，但那陳腐不堪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歌詞，會讓「國母」不戰而敗。反之，李磊對「中國夢」的描述，句句說到民眾心坎上，並讓貪官污吏心驚膽戰——如果李磊的中國夢實現了，在民主自由的中國，哪裡有裸官們橫行霸道、橫徵暴斂的機會？

中共一方面重重封鎖真實資訊的傳播，一方面強力洗腦，甚至使用「植入」這一強制方式。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召開「深化中國夢宣傳教育座談會」，負責宣傳事務的常委劉雲山表示：「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道出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心聲，具有強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國夢昇華了黨的執政理念，是當今中國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幟，要把中國夢的宣傳教育融入各級各類學校教育教學之中，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園文化建設之中，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人的大腦難道是電腦，可以隨意植入晶片？劉雲山並不把億萬民眾當作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生命個體，而是當作他指揮若定的僵屍。

習近平、劉雲山之流不會啟動政改。只要劉曉波還在獄中，只要「六四」未獲正名，只要報禁和黨禁不開，政改就是空中樓閣。那麼，彭麗媛的衣服是什麼品牌，與中國民眾有何干係呢？

彭麗媛為何不幫助小安妮捍衛「上學權」？

八十年代，彭麗媛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傳遍大江南北，那麼，

她的丈夫能重新點燃中國熄滅已久的夢想嗎？

在安徽合肥琥珀小學旁邊，網友把課堂搬到廣場上。一堂數學課正在進行，而學生只有一個，就是「被失學」的小安妮。

安妮的父親張林八十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如果他隨波逐流，以其才智和學歷，早已躋身權貴階層。張林不願「與狼共舞」，選擇參與民主運動，一九八九年之後多次入獄，長期受到警方的嚴密監控。

這一次，無惡不作的國保將黑手伸向無辜的孩子：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安徽蚌埠便衣國保到琥珀小學將張安妮帶走並扣留在派出所，之後張林父女倆在派出所見面，並被強行帶回蚌埠。國保不准他們返回合肥的家和學校，造成安妮失學多天。習近平絢爛之極的「中國夢」裡，居然擺放不下一張小女孩的書桌——文靜的張安妮的夢想是：「我最希望學好跆拳道，把公安都打跑。」

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國四十多名人權律師和網友齊聚合肥，為了安妮的教育權益展開接力絕食活動。參與二十四小時絕食、絕水的劉衛國律師說：「年僅十歲的張安妮被剝奪上學的權利，小小的心靈遭受巨大的創傷和痛苦，她的痛苦我們是無法理解的，但我們可以通過絕食產生的痛苦，來陪著她，來感受她。同時也希望通過這種和平手段，讓當局儘快地解決小安妮上學的事情。孩子是無辜的，不要再對孩子下手。」

網上流傳著一封張安妮寫給彭麗媛的求救信。雖然這封信並非張林和安妮父女所作，但張林表示：「我聽說彭麗媛曾到俄羅斯的孤兒院看望孤兒。但在她的祖國，我的孩子卻被從學校裡驅趕出來。」安妮說，如果有可能，她想告訴彭麗媛，讓她幫助懲罰那些不讓她上學的人，「不要讓那些警察再恐嚇、再威脅學校，不讓我入學」。

在帝國時代，皇帝的老婆名為皇后，號稱「母儀天下」之「國母」。彭麗媛雖然沒有資格被稱為民主國家之「第一夫人」，卻算是專制帝國之「國母」。既是「國母」，關照一個失學的孩子，應當在情理之中吧？抗議者在街心花園裡手持「讓安妮重返學校，讓『熊貓』回歸人性」

的標語。其中，前半個期待，若國母垂憐，可輕易達成；後半個期待，卻是與虎謀皮的幻想——只要尚存絲毫人性的人，不會去當殘民以逞的「國保」（被網友戲稱為「國寶」的政治警察）。「國保」這個部門彙聚了人渣中的人渣，惟有他們才做得出騷擾十歲小女孩的惡行。

若非上級授權，「國寶」豈敢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用習近平的導師、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話來說，中共的統治法寶只剩下最後一個，即「授權作惡」。胡錦濤留給歷史的最大遺產是暴力維穩，習近平上臺之後，「胡規習隨」，繼續縱容「國寶」為非作歹，以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國寶」是習近平在中南海裡安穩做夢的最後一道防線。然而，在民怨沸騰、一觸即發的情勢之下，作為「保皇一族」的「國寶」，其命運必然如跟納粹黨的蓋世太保一樣，與主子一同玉石俱焚。

僵持數周之後，小安妮還是找不到一張讀書的書桌。經美國駐華使館的精心安排，小安妮順利赴美依親就學。小安妮的父親以及幫助她的一班維權人士，卻先後被投入監獄。小安妮及其家人、支持者的命運，成為「強國夢」中最不和諧的一部分。對此，彭國母始終默不作聲。

彭麗媛的裙子與道光帝的龍袍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習近平倡導反對奢靡、勤儉節約，彭麗媛自然充當夫君的第一支持者。中國媒體報導，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為到訪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舉行歡迎儀式，彭麗媛當天身穿的裙裝曾經在訪問墨西哥時穿過。而她此前出席歡迎韓國總統朴槿惠的活動時身著的套裝，也曾出現在訪問墨西哥時的鏡頭中。官媒聲情並茂地讚美說，彭麗媛「一裙多穿」是身體力行「節儉令」。荊釵布裙、素面朝天的彭麗媛，能否引領由奢入儉的新風尚？

比起擁有數千雙鞋子的菲律賓前獨裁者馬科斯的夫人伊梅爾達來，彭麗媛算得上「清水出芙蓉」。既然習近平出行要求輕車簡從、四菜一湯，

彭麗媛不會像郭美美那樣穿金戴銀、珠光寶氣。

貴為國母的彭麗媛，用在穿著打扮上的開銷，也許比不上某些官員包養的二奶和小蜜。新浪微博認證為中國旅遊與經濟電視臺主持人的紀英男，在網絡上爆料，被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范悅誘騙包養近四年，並「每天給一萬元零花錢，近四年裡共耗資一千多萬元」。作為清水衙門的檔案局的一名副司長的情人，其花錢如流水的生活方式，讓彭國母自歎不如。那麼，彭麗媛「一裙多穿」的作風，是否能遏止中共官僚系統鋪天蓋地的腐敗呢？

彭麗媛的裙子，不禁讓人想起清朝道光皇帝的龍袍來。道光帝一生儉樸，所穿之龍袍甚至是宮內舊料所制，史書記載：「衣非三浣不易。宮中用款，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掌司各官，皆有『臣朔饑欲死』狀。」滿朝文武均投其所好，嶄新的朝服上故意打幾個補丁，以示為官清廉。

然而，大清朝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體制內的監察機構形同虛設，非皇帝以身作則就能改變。清人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記載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道光皇帝平常穿的湖綢褲子的膝蓋處破了個洞，捨不得扔掉，便讓內務府去縫補一下。誰知，一個補丁就花了三千兩銀子，比買一條新褲子貴多了。道光帝知道價格之後，招來負責的官員責問，補一條褲子為何這般貴？內務府的官員回答說：「皇上的褲子是有花的湖綢，剪了幾百匹綢才找到對應相配的圖案。再加上褲子上的補丁是在蘇州打理的，手藝好，工費高自然。此外，還有保鏢押運的費用也不低……」道光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無言以對，隨他去了。

道光一朝，大廈已經傾斜，而上下敷衍塞責，互相欺瞞。後人評論說，大清非亡於宣統，而亡於道光。如今的習近平，拖延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實行民主憲政，偏偏號召「節儉救國」，片面強調道德教化，豈不同樣是捨本逐末，歧路亡羊？即便搬出矯矯不群的彭麗媛來，又能矇騙多少民眾呢？

彭麗媛無法對內改善共產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對外提升中國的

「軟實力」。作為親善大使的彭麗媛，背後並沒有精神和價值的支撐。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中國和俄羅斯不瞭解的軟實力》一文中直率地指出：「在當今世界上，缺少的不是資訊，而是關注，而關注取決於可信度。政府宣傳很少是可信的。儘管中國煞費周章地要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 (CNN) 和英國廣播公司 (BBC) 分庭抗禮，但沒有多少國際受眾喜歡靠不住的宣傳。」彭麗媛不是柴契爾夫人、默克爾這樣有信念、有思想的女性政治家，也不是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雷根的夫人南茜那樣支持民主自由理念的第一夫人。不管她是否心甘情願，因為她的丈夫是習近平，她就必然淪為中共宣傳機器上一顆鏗亮的螺絲釘，即使她能與中國古代「四大美人」分庭抗禮，亦不能延緩共產黨覆亡的命運。

誰更適合當中國國母：彭麗媛、鄧文迪、郭美美？

習近平上位後，彭麗媛英姿颯爽、大出風頭，一洗江澤民時代，江夫人王女士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之窘態。

當年，名滿天下的彭麗媛，選中名不見經傳、外表老土且有失敗婚史的七品芝麻官習近平，如今總算修成正果，母儀天下，讓全中國的女性都佩服其披沙揀金的「火眼金睛」。彭麗媛才應當去電視上的那些婚配節目當評委，一定能點好鴛鴦譜。

對於那些夢想「上位」的年輕女性而言，成不了彭麗媛，鄧文迪也是可以效仿的榜樣。傳媒大亨默多克宣佈向法院申請與鄧文迪離婚。此前，默多克夫婦到英國議會出席聽證會，遭到一名抗議者投擲蛋糕，鄧文迪閃電出手護衛老公，展示了中國功夫的魅力。儘管如此，他們的婚姻仍然破裂。消息傳出，人們紛紛猜測，在這場世紀離婚官司中，鄧文迪能分得多少財產？至少是數十億計。雙方的律師摩拳擦掌，一場宛如羅馬鬥獸場中的大戲即將上演。

鄧文迪出生於山東的一個小康之家，這個從小就頗有抱負和心計的女孩，把婚姻當作跳板。第一次婚姻讓她從中國移民到美國，第二次婚姻讓她進入點石成金的商界，第三次婚姻則讓她成為富可敵國的默多克的妻子。十五年來，鄧文迪經歷了三次婚姻，終於登上金錢與權勢的巔峰——不僅套牢了默多克，而且成為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情人。

然而，鄧文迪的發跡之路，早已不是最激動人心的中國灰姑娘的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鄧文迪十五年的奮鬥目標，年僅二十出頭的郭美美一夜之間就實現了。四川地震的血淚尚未淡去，青春玉女郭美美以「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之名在微博上炫富，「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甚至曬出一張五億人民幣的銀行對賬單。

一個虛榮淺薄的小女子郭美美，三天之內就毀掉了中國紅十字會的百年信譽。據廣州《新週刊》的一項調查顯示，郭美美事件之後，僅有百分之二的網友願意捐款給紅十字會。而當醜聞纏身、聲名掃地的紅十字會即將調查郭美美的消息傳出之後，郭美美發出一則針鋒相對的聲明：「敢動我一根毫毛，我立即公佈紅會很多不為人知的貪污內幕。」話音剛落，紅會負責人立即澄清，該會不會調查郭美美。

風波之後，郭美美照樣我行我素地在網絡上炫富，果然沒有人敢動她一根毫毛。人們對這個「無恥者無畏」的年輕女孩又恨又妒，恨的是為什麼她可以不勞而獲、錦衣玉食，妒的是自己沒有她的姿色和運氣，遂只能「蝸居」、甚至「蟻居」。

連紅十字會這樣久負盛名的慈善機構都成為郭美美的囊中之物，中國有哪裡是乾淨之地呢？中國社會的全面腐敗乃至潰敗，已到了堤決魚爛的地步，正如前輩學者資中筠所論：「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等沒有全腐敗，所以被推翻了社會還有救。現在是各行業都腐敗，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給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就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對，不會在乎甚麼公平正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第四章 醉生夢死：論當權派之裝睡



鄧文迪應當為郭美美折腰，明眸皓齒的彭麗媛亦當甘拜下風。中國的女子真是一代比一代剽悍，難怪習近平感嘆說，偌大的帝國之內，竟無一人是男兒！

既然郭美美「不是男兒勝似男兒」，習近平乾脆休掉彭麗媛，迎娶郭美美，以郭美美為國母，更能代表崛起的中國無與倫比的新形象！



第五章 夢醒時分： 論獨裁黨之覆滅

夏俊峰是習近平手上沾的第一滴血

狗在何處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處舔你的血。

——舊約《列王紀上》第二十一章十九節

習近平殺人，不需要親自出手，他甚至不必像笨拙的蔣介石那樣在某一一份判決書上親筆簽署將有期徒刑更改成死刑的命令。但是，中共政權每殺害一個人，習近平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的手上一定沾上了無辜者鮮血。在這個意義上說，夏俊峰當然不是習近平殺害的第一個人——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當局對藏人和維族的血腥鎮壓仍在持續，習近平渾身上下早已血跡斑斑。但是，我說夏俊峰是習近平手上沾的第一滴血，是基於夏俊峰一案的象徵意義：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販被虐殺，是依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中共政權與「群眾」決裂的重要標誌。

夏俊峰在被執行死刑前說：「我是正當防衛，不是故意殺人，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服。」他更拒絕在執行書及判決書上簽字，以抗議司法的不公正及對他行使死刑的不當。夏俊峰不是一名懷有「顛覆國家政權」企圖的異議人士，也不是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更不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他只是一個在街邊賣羊肉串的、艱難地討生活的小販。除了偶爾在口頭上埋怨幾句社會的不公，他不會主動挑釁那些「代表」黨和國家力量、身穿威風凜凜的制服的城管。夏俊峰之所以手刃兩名城管惡徒，是因為那些「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城管要將他置於死地而後快。

習近平一定要處死夏俊峰，是以夏俊峰的死來換取全國數百萬城管的忠心。殊不知，殺了夏俊峰，將激起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般的「匹夫之怒」。《戰國策·唐雎不辱使命》中有一段流傳千古的對話：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元氣所在。此刻，反抗暴政的小販，殺死的是直接向其施暴的城管；彼時，捍衛生命權與人格尊嚴的底層民眾，將向躲藏在中南海裡的習近平及其同僚討還血債。雖然中共的司法機器輕而易舉地殺死了夏俊峰，但習近平從此將無法安然入睡。

在傳統中國，城市的繁榮來自於小販的勤勞

夏俊峰所求，不過是粗茶淡飯、養家糊口。然而，偌大的天朝，偏偏容不下他那三尺之窄的攤位。我知道流動小販「風裡來、雨裡去」的日子的艱辛，因為我的奶奶和外公都當過多年的小販。爺爺早逝，奶奶一手拉扯大了三個孩子，每天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磨好豆腐，挑著擔子沿街叫賣；外公本來是一名醫生，卻因為地主家庭的出身，被禁止行醫，只好在巷子口擺一張賣酸辣蘿蔔條的小攤謀生。

傳統中國，在君主專制之下，王權對民眾生活的控制「吞舟是漏」，小販大都安居樂業、其樂融融。歷史學家王笛在《街頭文化：程度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一八七零—一九三零》一書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個傳統城市的日常生活與大眾文化，那些在鄰里穿梭的小販和工匠，很少受到來自朝廷的干擾。晚清時期的成都，小販是街頭最搶眼的人群，他們為城市生活帶來了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在當時的成都街頭，大約有一百五十種販賣不同物品的小販。以飲食而言，賣各種小吃、

點心、水果的攤販，在街角、人行道、寺廟、茶館甚至官府門前比比皆是，外國遊客稱之為「流動廚房」。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小販們都游走於大街小巷，竭盡全力地、不分晝夜地謀生。對此，王笛評論說：「無數的街頭小販與固定的商店將街道連接起來，極大地擴展了城市的商業空間，對形成城市活躍的街頭文化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所以，流動攤販之於城市，不僅有著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是參與了創造一種草根性質的、自發的、堅韌的市民文化。

這一傳統，如今在臺灣保留下來。我在臺灣的各個城市都逛過大大小小的夜市，尤其青睞那些沒有寬敞的室內店鋪的小販們攤位上琳琅滿目的食品和貨物。我有一位遠房的姨媽嫁到臺灣，在基隆廟口擺設了一個小小的鮮榨果汁的攤位。她告訴我，政府除了定期的衛生檢查之外，不會徵收苛捐雜稅，也從來不會有城管這樣一個窮凶極惡的部門前來騷擾乃至取締。臺灣社會的民主與溫情，從對小販的寬厚與容納上就可見一斑。那麼，同為華人社會，為什麼隔岸的天朝，小販們卻不得不生活在城管的淫威下，一旦城管「叫囂乎東西」，他們就「隳突乎南北」乃至抱頭鼠竄？

為什麼城管非要將小販斬盡殺絕？

夏俊峰被「合法」地殺害之後，有網友評論說：「城管不管，他們就沒有飯碗；城管去管，小販們就沒了活路。這個案子中，三個死者以及家庭都是受害人，城管也多出身貧寒的家庭。歸根結底，是城管制度之惡。」其實，人們還可以追問下去：城管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當局為什麼縱容城管作惡？

如果說作為中國的蓋世太保的國保警察的設立和膨脹，是因為中共當局要利用這支隊伍確保一黨壟斷權力、消滅所有潛在的挑戰者；那麼，城管逐漸成為一支惡行昭彰的「准軍事力量」，其對立面只是那些並非

政治反對派的、掙扎在生存邊緣的小販群體，當局為何不給小販一條活路呢？

當局對小販施行空前的強力管制，必然有經濟方面的原因。就城管這一體系而言，該機構中的大部分成員，都不是從國家財政系統中領取固定薪水的公務員，而只是「名不正、言不順」的「臨時雇員」。他們的收入多半來自於從小販那裡撈取的「油水」。這一畸形的「激勵機制」，使許多城管在掃蕩、敲詐、掠奪小販的時候，無不爭先恐後、衝鋒陷陣，樂此不疲。在普遍倦怠而低效的執法部門中，城管神奇地成為了一個兢兢業業、雷厲風行的「特種部隊」。

而在我看來，中共當局驅使城管打壓小販，其首要的考量並非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目前，中國政府是全球最有錢的政府。通過大肆賣地，以及若干有形和隱形的重稅，中共早已「多財善賈，長袖善舞」，不會太在乎從小販那裡榨取微不足道的「小錢」。中共不允許小販階層自由經營和發展，乃是基於這個文化最落後的「農民黨」天生對城市文明的仇恨，以及極權主義對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的莫名的恐懼——小販是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

毛時代的中國，黨掌控一切時間和空間，那時的中國，沒有一個小販。所有自發的、自由的經濟模式，都被共產黨政權消滅殆盡、每個人都必須隸屬於單位、街道，每個人被改造成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正如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極權主義相信權力只存在於通過組織而產生的力量。希特勒早在一九二九年就發現，納粹運動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將十萬人變成了一種類型」，「這些人不僅思想統一，而且面部表情幾乎也一樣」。秦始皇的兵馬俑是如此，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的百萬紅衛兵亦是如此。反之，小販擁有相對的經濟自由，其人身疏離於體制之外，有可能成為極權主義潛在的「不合作者」。習近平無比嚮往毛時代，企圖讓中國回到毛時代那種全國山河整齊劃一、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的狀態。故而，雜亂無章的小販

司法系統何以成為獨裁者手中的屠刀？

這一次，最高法院罔顧民間和法學界的呼聲，執意處死了夏俊峰。此一冤案的產生，中共建政以來第一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周強，可謂「功不可沒」。法學家賀衛方對於這個結果失望地歎息說，沒有想到那位法學博士的決定居然如此「不專業」。

其實，這個殺人的決定，跟專業無關，而只跟權力有關。早在任湖南省委書記期間，周強就主導了對「六四義士」李旺陽的虐殺，湖南是迫害人權的重災區。人們又怎能指望這個劊子手升遷為最高法院院長之後，就洗心革面、金盆洗手呢？更何況，一旦習近平作出了最終的決定，周強豈敢有所非議？中國的最高法院院長惟黨魁之命是從，哪能像美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樣不受總統的左右？於是，夏俊峰的命運便註定了。

在二零一四年一月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親自出席並發表長篇講話。習近平強調：「對於政法工作來說，維護社會大局穩定是基本任務。」習近平大權獨攬，將政法部門的權力收歸己有。周永康雖然被清除，但暴力維穩的路數卻變本加厲。政治評論家李偉東在《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之路」》中認為，習近平再一次把中國引向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國家之路。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法西斯崛起之路，是一條必然失敗之路。沒有公正，就沒有平安。暴政都是建立在刀尖上的，建立在嚴刑峻法上的，因而也就是無法持久的。

那麼，本來是捍衛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司法系統，是如何成為極權體制的幫兇的？德國學者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一書中，研究了第三帝國時期德國司法系統對納粹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進而從反面論證了司法獨立、法官獨立、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則和正當司法程序對一個法治國家的必要性。



當時，納粹政權重用了一批法學家為其塗脂抹粉。希特勒欣賞的最高大法官愛德華·博姆克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在興登堡時代曾經任副總統，希特勒上臺後，他奉命主持所謂的「元首法庭」；而作為希特勒「御用法學家」的施密特，是法學博士和法學教授，挖空心思為殺人如麻的《緊急狀態法》提供理論支援，故而被納粹奉為「新帝國的國家法理論家」——基於臭味相投的道理，迷戀施密特的中國學者劉小楓，提出要將殺人魔王毛澤東奉為「國父」。穆勒發現，在納粹設立的、讓人談虎色變的國民法庭、特別法庭等冠冕堂皇的司法機構中，像愛德華·博姆克和施密特這樣學富五車卻殺人不眨眼的人物多如牛毛。司法的沉淪，是法西斯征服全社會的最後一步。

今天中國司法的敗壞，與納粹時代的德國相比，何嘗不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習近平、李克強、周強等人都擁有真真假假的博士頭銜，比起半文盲的毛澤東似乎「專業化」和「知識化」。但是，中共的統治並沒有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從匆忙殺害夏俊峰的過程就可以看出，與毛澤東時代殺害林昭、遇羅克如出一轍。這個政權已不憚於展示出其猙獰的面目，讓人感到恐懼就是其目的。

庚子年間，慈禧太后志得意滿地發出「向萬國宣戰」的詔書；二零一三年的今天，習近平則藉夏俊峰案發出「向萬民宣戰」的「偉大指示」。我深信，夏俊峰如野草，春風吹又生；習近平如驕陽，再毒的日頭也有下山的時候。

軍機處、中央文革小組與全面 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
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

——《淮南子》

習近平自行擔任新設置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之後，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主持召開該小組第一次會議並發表講話。據央視現場畫面顯示，除了組長習近平和副組長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之外，在裡圈就坐的小組成員有馬凱、劉延東、許其亮、汪洋、趙樂際、杜青林、王晨、周強、張慶黎、王正偉、王滬甯、劉奇葆、李建國、孟建柱、栗戰書、趙洪祝、郭聲琨、曹建明、周小川等人，幾乎囊括了所有關鍵權力部門的負責人。

中國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袁曙宏表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設立的最高級別的改革領導機構，它既不同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設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更不同於之後設立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而是直接隸屬於中共中央的統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機構。似乎「小組」一出，天下澄清、萬民得救。然而，在我看來，此「小組」跟改革無關，不過是實現權力的重新分割罷了。習近平設立「領導小組」，不是他的創新發明、異想天開，遠可追溯到雍正皇帝設置軍機處，近可勾連到毛澤東設置中央文革小組。

作為「隱然執政之府」的軍機處

清朝取代明朝，體現了八旗軍事體制的優越性；滿人對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卻採取「拿來主義」態度，清朝的政體和官制基本上沿襲自明朝，只是其君主專制體系更趨嚴酷和嚴密。

清朝第三任皇帝雍正登基後，由於其皇位來路不正，遂重用特務，大興文字獄，並對外用兵。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籌劃用兵西北，為求保密並削弱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密旨由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於內廷密籌辦軍需。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清軍大舉征伐西北兩路，正式設立軍需房於隆宗門內北側，選內閣中謹慎縝密者入值，後改稱辦理軍務處、軍機房。次年，始稱軍機處，並成為定制。

雍正皇帝性情苛刻陰狠、狹隘猜忌，不信任原有的官僚體系，也不敢輕易裁撤、大動干戈，遂用偷樑換柱之方式，將軍國大權轉移到軍機處。顧名思義，軍機處為籌畫西北戰事而設，戰事結束後就當關門大吉；然而，軍機處不僅依舊存在，而且像章魚那長長的觸角，向各方張牙舞爪。是雍正的性格與野心催生了軍機處，甚至可以說，沒有雍正就沒有軍機處——更準確地說，是軍機處這一機構貼合君主獨裁政體，故而成為清代權力體制之重鎮。

軍機處是一個臨時的顧問和執行機構，自誕生之日起就擺脫了正式官僚體系壅滯、繁瑣的弊端，非常適合雍正加強君權、朝綱獨斷的意願。有清一代，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是「三無」機構——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所有官員都是兼職。軍機大臣之任命，並無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軍機大臣、軍機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職，皇帝可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本衙門。軍機大臣一般由親王顯貴、大學士或上調中央的封疆大吏擔任，但「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職責是向皇帝提出

建議並執行皇帝的政策，決策權永遠在皇帝手上。

由此，軍機處迅速成為「威命所寄」的權力核心，內閣形同虛設，滿清入關前即掌握重大權柄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不久後亦遭廢止。在清末的總理衙門設置之前，軍機處一直是為皇帝服務的最高權力機關，《清史稿》指出：「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只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後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後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於內閣而於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這段概括十分準確：首先，軍機處「名不師古」，它的確是雍正首創，史無前例；其次，「職居密勿」，即軍機處參與重要機密事務，而非處理一般性政策；第三，軍機不僅僅負責軍事事務，其他重大決策「罔不總攬」；第四，「隱然執政之府」，是說其雖有執政之實，卻無執政之名。總而言之，自從有了軍機處，皇帝的權威得到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強化，臺灣歷史學者傅宗懋認為：「世宗（雍正）的集權很是巧妙的，並不是像以前的枝枝節節，他只設了一個軍機處，於是就把以前內閣和八旗的權力，整個拿來。」（《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由此可見，雍正堪稱一個善於集權的專家。

奉命「炮打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組

毛澤東在文革前夕設置「中央文革小組」，與雍正執政後設立軍機處，有異曲同工之妙。歷史學者王毅在《「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文化基因》一文中分析說：在中國君權的長期發展中，其「自動保持自己」的趨向演化為一系列具體的操作方式和縝密的制度，所以它才積澱成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資源和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即便是毛親自拍板成立的、披著「破舊立新」和「新生力量」等外衣的「中央文革小組」，在本質上走的仍然是一條向中國傳統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徑。

毛親筆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中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該小組主管五界（學術界、

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組成人員大換血，而且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政治局會議，甚至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直到中共九大開會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主席臺左邊，政治局委員坐在右邊，主席團名單亦是中央文革成員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員排列在後。

中央文革小組這個「名不正、言不順」卻權力無邊的機構，體現了毛個人的意志與性情。首先，毛身上具有強烈的「山大王氣」，用他自己的話說，兼具「虎氣」與「猴氣」。毛對國家常規權力體制有一種敵視心理——從早年喜愛綠林小說到晚年批判「宋江投降」，他一生始終有著對國家體制濃得化不開的「造反情結」。其次，毛因輕率發起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在七千人大會上被迫認錯，退居二線。他對以劉少奇、周恩來為首的黨和政府的官僚體系深感不滿，為奪回權力，遂有暗渡陳倉之計：用文革小組聚攏一批「秀才」，向官僚體系開炮。

毛的深沉的心機，即便長期擔任其秘書的陳伯達亦未能洞悉。毛提拔陳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為副組長，組員為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在《最後口述回憶》中寫道：陳向毛提出，自己是個書生，當不了組長。毛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話雖如此，毛借助的只是陳的充滿了殺伐之氣的筆頭，毛親自在背後牽動那根指揮傀儡的長線。

中共的體制學自蘇聯，若是完全定型，則為技術官僚治國的模式。毛偏偏最不願受這套僵化的體制的束縛。執政十多年後，毛痛感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辦公廳、中宣部、《人民日報》等常規權力體制是在貫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的個人意志經常受到抑制與稀釋。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多次說「北京的空氣不好」。

那麼，為了摧毀已有的權力體制，毛就必須在國家制度中造就一個與此目的相適應的、強大的政治工具。如王毅所論，這個工具需具備如

下條件：首先，它必須由毛直接和完全駕禦、絕對按照毛的個人意志行事，即周恩來所說的「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其次，它必須具有極強的政治能量和權力欲望，以便與常規體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第三，從政治稟賦來說，它必須與一系列常規國家權力體制相矛盾、甚至相敵對；與此相應，從政治行為方式來說，它也必須捨棄常規方式而以陰謀詭計等一切非常規方式為基本手段；第四，它必須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動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閻王」在輿論上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於是，由毛的秘書陳伯達、毛的妻子江青以及掌控秘密警察的康生這「三巨頭」負責日常事務的中央文革小組應運而生，成了口含天憲、權傾一時的「當代軍機處」。

如同俄羅斯套娃一樣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毛澤東熟讀古書，從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中汲取的養料，遠遠多於從馬列主義中學到的教條；從秦始皇和雍正皇帝那裡學到的縱橫捭闔之術，遠遠多於從列寧和斯大林那裡學到的執政秘訣。而習近平堪稱對毛亦步亦趨的「好學生」，儘管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差點成了毛的刀下之鬼，習近平本人卻深得毛的厚黑學、權謀術之精髓。

習近平的元首寶座幾乎是「從天而降」，他本人並沒有與之相應的、響噹噹的聲望、政績和才幹。他的身上既有雍正的剛愎自用，也有毛澤東的兇殘與自戀。他不願成為「集體總統」當中只是股份稍多的一員，也不願成為權力受制衡的「唯一總統」，他的夢想是像雍正皇帝和毛澤東那樣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習近平接過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這「三位一體」之大權後，仍嫌不夠。江澤民和胡錦濤不也是三權合一嗎？但江與胡仍未成為開天闢地、雄才大略的君王。習近平一上臺就迫不及待地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兩個新的機構，並赤膊上陣、親自掌印，由「三位一體」走向「五權合一」。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權力之大，令其他中央級的小組（包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等）全都望塵莫及。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又宣佈下設六個專項小組，包括：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民主法制領域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六大方面。這是中央一級的、橫的層面。在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個縱的層面，為改變胡錦濤時代「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狀況，習近平命令各省市自治區仿效這一建制，迅速設立相應的領導小組，並由地方第一把手出任組長。由此，習近平可更順暢自如地掌控封疆大吏，避免出現晚清時地方督撫權力凌駕於中央之上的危險。這種疊床架屋的設置，宛如俄羅斯套娃。該小組的職權範圍堪稱無所不包、無遠弗屆，而最終的決策權集中在習近平一個人手上。

有些「過於善良」的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本質上是改革派，只是苦於權力不夠，無法雷厲風行地推動改革大業。要改革，就必然觸動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要先集中權力，享有不可挑戰之權威。其實，這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習近平逐漸形成了「強人政治」之格局，卻不是為改革作充分的準備，而是竭力延緩和壓制民間的改革呼求。聽聽習近平在此次會議上理直氣壯的講話就一清二楚了：「要牢牢把握改革正確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論、制度等根本性問題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這話說得難道還不夠明白嗎？習近平誓言嚴防死守、絕不改革，民間社會何必自作多情？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儼然是一個「濃縮版」的國務院，它所能召集的官員已超過國務院的內閣會議。作為總理的李克強遭到縮權和架空，原本屬於國務院的地盤所剩無幾——李克強能完全掌握的，大概就只剩下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了；而習近平則成功實現了擴權和集權的意圖，南面稱孤，好不得意——但歷代暴君幽靈附體的習近平，真能笑到最後

第五章 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



嗎？軍機處未能挽救滿清王朝的覆滅，中央文革小組也未能拯救毛澤東神話的崩潰，那麼，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不能令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萬壽無疆、千秋萬載。

彈宣千付鑑映向平武習

習近平向知識份子宣戰

「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

——雍正批田文鏡折

《紐約時報》援引彭博通訊社駐香港職員的消息報導說，彭博新聞共同創辦人、總編輯溫克勒阻止發表有關一些中共政治局現任和前任常委的家人與富商王健林之間秘密財金關係的報導，以及另一篇有關中國某高官子女獲外國銀行聘用的報導。溫克勒解釋說，叫停報導是為了防止引發中國當局懲罰，「被踢出中國」，是仿效納粹德國時代外國媒體在德國的生存之策。此前，彭博社因為發表關於習近平家族的財富的報導，其網站被中國封鎖，在中國拓展市場的計劃遭遇重挫。這一次，他們總算學乖了。

饒有意味的是，溫克勒把目前在中國的處境和納粹德國相比較，為自己辯解說，當時一些國際媒體也不得不自我審查，以便能夠留在德國。彭博社的退讓，是西方媒體的一大恥辱；但被拿來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未必就是習近平的榮耀。不過，令習近平洋洋自得的是，他不僅牢牢控制中國國內的所有媒體，也能對西方媒體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其就範——彭博社開除了那幾名撰寫調查報導並反對「自我新聞檢查」的記者，這是當年毛澤東都沒有做到的事情。

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長達兩個小時的「八一九講話」，詳細內容一直不見於官方媒體，在三中全會之前忽然在互聯網上全文曝光。

習近平特別挑選八月十九日，即蘇聯共產黨保守派發動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進而導致蘇聯共產制度崩潰的這一天，發表此講話，有告誡全黨「居安思危」之意。該講話具有鮮明的希特勒風格，是一篇向中國知識份子以及一切進步力量的宣戰書。

大刀向知識份子的頭上砍去

在「八一九」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在知識份子中「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甚至出現了個別同黨和政府離心離德的人」。他承認，互聯網是中共面臨的「最大變數」，搞不好會成為中共的「心頭之患」。而對「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蔑」的「一小撮反動知識份子」，「一定要嚴肅打擊」。這已經不是磨刀霍霍、殺氣騰騰，而是明火執仗、荷槍實彈了。

習近平下令黨的宣傳、文化和教育部門「關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知識份子，下功夫做好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演員歌手等群體的工作」。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當局製造出一個龐大的賤民群體，即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在內的「黑五類」，他們和他們的親屬被剝奪基本的公民權，受盡歧視（青年時代的習近平也是「黑五類」）；在胡錦濤時代，中共當局則有「新黑五類」之說，認為「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五類人干擾中國崛起」，必須強力打壓；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共當局又在知識份子中列出五類「高危人群」，對他們使用收買、籠絡、監控、醜化、關押等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古往今來一切獨裁者固有的心態。習近平斬釘截鐵地下令說：「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報刊雜誌、講臺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臺、舞臺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網絡報刊、

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一個向知識份子宣戰、視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為天敵的官僚，不可能是改革派。海內外對習近平存有的畫餅充饑式的期望，由此可休矣。

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精神之子」，對知識份子的防範和仇恨也是從毛那裡一脈相承。被日本歷史學者高島俊男稱為「盜賊之王」的毛澤東，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在北大擔任圖書館臨時工時，自尊心受挫，因而蔑視人類一切文明成就，對知識階層存有刻骨的敵意。毛掌權後公然宣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將知識份子歸入「臭老九」的賤民行列。而習近平雖然從清華大學撈到一個假冒偽劣的博士帽，但對知識、對文化，如同毛一樣，是疏遠的、敵視的。習近平將那些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物都當作具有顛覆性的力量，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那麼，中國剩下的全是順民和奴才，他治理起來就輕鬆自如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習近平要求各級官員要「敢於亮劍」，大小官僚便如狼似虎地行動起來。媒體系統對「自由撰稿人」的情況統計上報，各大網站對「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嚴密監控，出版社、作協等對簽約作家加強管理，文化演出機構、廣電系統對「獨立演員歌手」嚴加控制，一系列對策陸續出臺。尤其是網上「大V」，多人被冠以其他罪名抓捕並公告天下，甚至在審判之前就強迫當事人在央視認罪。推動新公民運動的法學家許志永、投資家王功權等先後被逮捕；北大敢言教授夏業良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解聘；廣州《新快報》遭到整頓和清洗；西藏官員宣佈要清除達賴喇嘛在西藏的一切影響……

蘇俄和納粹德國是如何迫害知識份子的

向知識份子宣戰，中共政權不是始作俑者。蘇俄和納粹德國就曾放膽做過。這兩個政權的下場如何，眾所周知。以短期而言，暴政所擁有

的絕對暴力，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無法抵抗，暴政隨意剝奪知識份子的自由，乃至終結知識份子的生命；但長期而言，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暴政無法征服、無法扼殺、無法泯滅的，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涉及到二十世紀蘇俄哲學、思想史和知識份子問題時，「哲學船」是一個必須言說的詞彙。一九二二年夏，列寧親自下令組織一個專門工作小組，擬定流放「敵對知識份子上層人物」的名單。當局聲稱：「把這幾百個蘇維埃政權最危險、最陰險的敵人毫不憐惜地驅逐出境，我們將長期淨化俄羅斯……抓個幾百個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們，請你們出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該小組以加米涅夫為首，作為列寧的助手，加米涅夫對知識份子殘酷無情。十四年之後，加氏本人卻成了斯大林大清洗運動的犧牲品，在飽經酷刑之後承認自己是間諜，然後遭槍決，其前妻、大兒子和小兒子也陸續被槍決。加氏的命運比被他列入流放名單的大部分知識份子更加悲慘。

一九二二年，作為克格勃前身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發出雷霆之擊，按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行政流放的決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抓捕。名單上的兩百一十七人中，實際遭到流放的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在被流放者當中，索羅金後來成為美國的「社會學之父」，別爾嘉耶夫的思想影響了整個歐洲，布林加科夫寫出了更為優秀的著作。而在留下來的入當中，只有三個人繼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餘大多數都未能避免三十年代的再次被捕、判決甚至槍決的厄運。可見，沒有自由的祖國不是祖國，而沒有祖國的自由，儘管差強人意，終究還是自由。二零零二年，彼得堡市為紀念「哲學船」事件建立了紀念碑，當年的被驅逐者即便無法魂兮歸來，他們的著述卻重新擺上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

納粹德國在迫害知識份子方面亦不甘落後。剛剛奪取政權，納粹宣傳部大幅擴張，魔爪四處伸展，命令所有大學清理圖書館中「起敗壞作

用的文獻和圖書」，所有大學生清理自己、家人的和朋友的書架。很快，一份多達一百三十一個禁書作家的名單新鮮出爐，此後這個名單有增無減、越來越長。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作出了一份書面規定：「我重申，我毫無例外地保留所有禁令由我親自決定的權力。」在戈培爾控制下的帝國文化局成立了，將所有文化和專業領域歸入一個「進行煽動活動」的中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的晚上，戈培爾親自在柏林歌劇院廣場的焚書現場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德國歷史學家福爾克爾·魏德曼在《焚書之書》中評論說：「那個晚上仿佛是穿過一百三十一位非德意志精神清單上的作家生平的一條裂紋，穿過他們生平和作品的裂紋，也是一條穿過德國歷史的裂紋。」

愛因斯坦和湯瑪斯·曼等最優秀的知識份子一個接一個地逃離了德國，更多的知識份子被剝奪公民權和國籍，並被關在集中營裡。納粹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下獄並折磨至死，以此顯示其對抗人類文明主潮的決心和意志——全世界輿論的呼籲都沒有用，希特勒叫囂，就是要讓你們踢到鐵板上。一邊焚書一邊殺人的納粹，似乎掌控了全域，篡改了歷史，美化了現實，並規劃了未來。德國作家勒內席克勒在國外的流亡地悲哀地寫道：「如果戈培爾得逞，將我們的名字從德國的黑板上擦去，那麼我們等於死了，下一代人就會對我們一無所知。」這就是戈培爾的目的，是五月之夜那把火的目的，也是當時所有將書扔進火焰的人的目的。

但是，納粹沒有得逞。納粹企圖建立的千年帝國，轉瞬之間便灰飛煙滅。而那些被焚燒的書，重新在印刷廠和書店中復活，那些書中的自由心靈和獨立精神也得以代代相傳。

從雍正到習近平：文字獄治國

列寧的辦公桌上有一份流放者的名單，希特勒的資料夾裡也有一份

焚書者的名單。與他們相似，習近平有一份為了統一輿論而必須「嚴打者」的名單——中國的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著這樣一份名單，名單上列出「四十七個大V」，即互聯網上最有影響力的四十七個人。據說，這個名單已經得到證實，包括秦火火、薛蠻子、何兵、李開復、李偉東、雷頤、五嶽散人、李承鵬、老榕、任志強、潘石屹、陳志武、茅於軾、肉唐僧、袁騰飛、陳有西、張鳴、榮劍、吳祚來、賀衛方、羅昌平等人。

其中，秦火火、薛蠻子已被捕入獄，茅于軾、賀衛方人等則被軍方製作的政治宣傳片《較量無聲》點名批判，稱之為「政治變節分子，或公然損害國家利益，為西方利益集團服務，或公開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賣國的言論，瘋狂程度，令人瞠目」。一張網已經張開，收網的日子快了。

如果將習近平與列寧、斯大林、希特勒等洋人相提並論，一定會讓癡迷於「中國夢」的習近平惱羞成怒——這根本就是崇洋媚外！為什麼拿我與那些夷人相比！那麼，如習所願，不妨追溯中國自身的歷史，看看習近平跟哪個皇帝相似——尤其是在對知識份子的滿腔仇恨這一點上。

清代大興文字獄的雍正皇帝，其言語之粗暴、心胸之狹窄、手段之狠毒，堪稱習近平之鼻祖。有一次，浙江總督程元章密告吳茂育刊刻《求志篇》一事，雍正對此甚是嘉許，作出朱批：「地方上匪類之為國家生民、世道人心之害，甚於盜賊遠亦！盜賊乃是有形跡之可憑，地方官員便忽於辦理，亦勢所不能。至於奸匪，各地方大吏不肯留神訪察，盡可置之不問。此皆不識輕重，非純臣之居心。」在雍正看來，以文字來危害「世道人心」的文人，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是不可饒恕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奸匪」比「盜賊」危害更大，應當把懲治「奸匪」擺在比緝拿「盜賊」更加重要的位置。盜賊只是危害普通民眾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一般不會直接對抗朝廷；而掌握話語權的「奸匪」則貶低君王的威望，攪動反抗的潮流，堪稱心腹之患。

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與雍正的此段朱批何其相似！缺乏自信

的習近平，只能用一樁又一樁的文字獄來強化他那如同將殘的燈火的信心與信念。他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切異端，都是顛覆性因素。這是獨裁者們千年不變的思路。

習近平話音剛落，大學和媒體便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殺伐之聲，不絕於耳。教育部長袁貴仁立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號召教育系統學習「八一九」講話，「對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的，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定。對那些影響大、危害大的錯誤思想觀點，要進行有力批駁，針砭要害、揭露本質，決不能讓它們干擾人們思想、干擾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如此見風使舵的奴才，當然值得朱批嘉獎。在這樣的教育部長的治下，當然不會出現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所定義的大學教育：「大學應該培養精神貴族，而不是精神附庸。」

習近平像清朝的雍正皇帝，也像明朝的那些皇帝。明朝的皇帝們，有了錦衣衛還不夠，還要有東廠、西廠；天朝的習近平，有了國安、國保、網警、五毛還不夠，還要增設至高無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樣下去，國人只能「道路以目」，「反右」和「文革」再度降臨。薄熙來沒有做到的，習近平全部實現了——難怪身陷大牢的薄熙來，面上帶著春天般的微笑。黨國的事業有習近平安穩掌舵，「唱紅打黑」繼續乘風破浪，薄熙來可以在秦城監獄的五星級牢房裡安度晚年了。

玩火自焚的「類人孩」

——讀矢板明夫《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

「領袖」往往被塑造成這樣：他舉起一隻手給大家「指引」道路，面帶慈祥的微笑，一對關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縫著。當時誰能夠想到，在這偽裝背後竟然隱藏著病態般的殘忍、無情的詭詐？

——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臺北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記者矢板明夫訪問，得到他贈送的近著《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矢板明夫的中文極為流暢，他的父親是二戰留華孤兒，他在十五歲之前居住在天津。矢板明夫是我的同齡人，他告訴我，在幼小時的記憶裡，有打倒「四人幫」的全民遊行、胡耀邦主導的老幹部大平反、華國鋒一派的下臺、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臺等事件，政治運動從來沒有停過。之後他隨父母回到日本，求學於慶應大學，再回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博士課程，畢業後進入《產經新聞》，擔任北京特派員。橫跨中日兩國的成長、求學經驗，以及駐北京多年的記者工作，使作者歷練出對中國政治敏銳的觀察分析能力。

習近平剛一上臺，在外交上即咄咄逼人。近在咫尺的日本對於中國當局操弄民族主義狂潮的伎倆心有餘悸，中國研究迅速成為顯學。矢板明夫的這本書剛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媒體、政界和學界的高度關注。

《日本經濟新聞》中國總局記者島田學評論說：「在中國稱霸國際社會的重要時刻，卻是由被前後世代暗中揶揄為『缺乏教養、視野狹窄』的一代進入領導班子。不瞭解這種歷史的諷刺性，就無法正確理解今後的一代進入領導班子。不瞭解這種歷史的諷刺性，就無法正確理解今後的中國。」日本《正論》雜誌評論說：「本書的強項在於作者採訪取材的功力，不愧是資深北京特派員。書中充滿外部無從得知的共產黨王朝內部情報，如同小說般有趣。」記者的敏捷與學者的嚴謹，在這本書中融會貫通。學者余世存用「類人孩」形容中國的統治者與中國的人民。如果把這一概念移用到習近平身上，像是為其量身定做。習近平這個潑猴式的「類人孩」，在聚光燈下自得其樂的表演，還能持續多久呢？

習大元帥，橫刀立馬？

《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一書，以「最強大的中國」與「最弱勢的領袖」之對比，點出未來十年中國的矛盾處境。作者認為，各方勢力妥協下出線的習近平，雖然權力根基薄弱，但直爽而強硬的作風，為其執政走向埋下不確定的因素。不過，我並不同意此書的副題——習近平未必是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在掌權前，他默默無聞，未能形成強大的派系；但接班之後，他手上的權力大於當年有太上皇監國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也比謹小慎微的胡錦濤更敢作敢為。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習近平為何被選為接班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元老之一。作者認為，身為「太子黨」一員的習近平，靠著父親光環，以及各方勢力折衝妥協的機運，爬上最高領導人大位。但是，習近平的接班並不能服眾，他的上臺顯然不是「萬眾歸心」，恐怕正是共產黨中央權力鬥爭愈趨惡化的開始。

本書的第二部分從家庭成員、成長、求學、興趣及朋友等各角度，描繪出中共官方密而不宣的習近平的真實面貌。作者指出，習近平雖貴為高幹子弟，歷經家庭離散、下放農村的少年時期，透過推薦入學擠進

名校清華大學，隨後在重回政壇的父親庇蔭下平步青雲，更拿到博士學位，但實際的學識飽受質疑。母親隱身其後儼然為軍師，妻子是將軍也是國民歌手，政治色彩濃厚的家庭與婚姻，是將習近平推上領導人地位的最大助力。

作者分析說，在「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中國，習近平在軍方擁有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多的人脈。曾任《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的馬利德在《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一書中指出，比起毛澤東和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有理由擔心能否依賴軍隊的忠誠，他們在登上最高領袖的寶座前，從未在軍隊中擔任實質性的職務。而毛澤東和鄧小平既是政治領袖，也是職業革命家和軍人。江澤民和胡錦濤打破模式，是近百年來中國第一次由文人領袖控制政治和軍事體系。在江澤民上任時，鄧小平給他的建議是：「五個工作日中，有四天要放在高級將領身上。」江澤民謹記於心，上任後兩年內，提升了一大批將領，親自巡視一百多個軍事據點。之後，擊敗「楊家將」的挑戰，這才掌握實權。

與江澤民和胡錦濤這樣靠運氣和察言觀色獲得提升的平民子弟相比，作為高幹子弟的習近平在仕途上的發展是父輩精心籌畫的結果：一九七九年，習近平從清華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央軍委辦公廳，擔任國防部長耿飭的秘書，由此與軍方有了密切聯繫，被軍方視為「我們的人」。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國經濟週刊》發表耿飭的女兒耿焱的一篇耐人尋味的訪談。耿焱說，習仲勳與耿飭早在陝北期間就是好友，「他們倆性味都很耿直，幾十年來都比較合得來，習仲勳伯伯的兒子近平還曾經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耿焱在訪談中借已故父親的口稱讚習近平：「父親覺得近平是一個非常踏實的小夥子，用心學習。當時父親有三個秘書，習近平最年輕。」反正耿飭已經去世，他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已經無從考證。耿焱又說，在習近平三年的秘書生涯中，「其中兩年我父親在任上。這段經歷應該對他很重要，他可以參加很多中央的會議，參與一些軍隊、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會議、文件，中央怎麼處理他應該都很清楚。」

這段在軍方高層工作的經歷，是習近平戰勝諸多競爭者而上位的關鍵因素之一。

矢板明夫在分析習近平的軍方背景時，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部門」的說法。一位精通日語的中國學者，稱之為一語道破天機，「中國的很多學者也在談『軍隊非國家化』這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用這麼簡潔易懂的語言概括過。」這位學者又說：「這樣一概括，大家會自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中國也像臺灣一樣施行了民主選舉，共產黨失去了政權，那麼解放軍也會和共產黨一起下野。由一個在野黨掌控軍隊，那將是十分恐怖的局面。」既然習近平有遠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為深厚的軍方背景，而解放軍又是「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部門」，那麼，一旦國內統治遇到危機，習近平更有可能動用軍隊鎮壓國內民眾的抗爭，或者對外發動一場小規模的戰爭以轉移視線、凝聚民意。換言之，習近平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有玩火自焚的資本和激情，而日本和臺灣會被塑造成中國首當其衝的「敵人」，這一點尤其不可等閒視之。

東北亞局勢宛如火藥桶，習近平是點火者嗎？

於是，矢板明夫將目光轉向東北亞。近代以來，東北亞尤其是朝鮮半島一直是一種「超不穩定結構」，美國、俄國、日本、中國等大國在此逐鹿，合縱連橫、硝煙四起。以中國而論，朝鮮半島問題並不是一個遙遠邊疆的小患，而是輕輕一動即傷筋動骨，甚至將中國拖到了亡國的邊緣。十九世紀末，若不是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介入朝鮮內亂，中國就不會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遭到慘敗並割讓臺灣；五十年之後，若非韓戰突然爆發，中國與美國未必會兵戎相見，中國從此閉關鎖國三十年。直至今日，東北亞比起局勢逐漸穩定的巴爾幹半島來，依然是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缺乏國際視野和歷史縱深感的習近平，也許認為東北亞是其對外「立威」的好戰場，一旦他有此種想法，亞歐及世界的和平就

岌岌可危。所以，未來習近平在東北亞的作為，是其外交的一大看點。

矢板明夫矚目東亞變局，更多從另一層面展開，即東亞的民主化浪潮會對中國產生正面影響嗎？他寫道：「在二戰以後，許多國家都走過相同的歷史。第一代獨裁領導人建國，第二代領導人實現經濟的發展，當經濟增長趨緩、出現瓶頸時，即開始轉向民主化發展。」以韓國和臺灣為例，李承晚與蔣介石是完成建國使命的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政治魅力，從暗殺到戰爭，為所欲為。到了下一代，由於向心力衰退，樸正熙與蔣經國都致力於經濟建設，讓國家實現高度經濟增長，以贏得民眾的支持。之後接班的盧泰愚與李登輝，在剛接掌政權時都是相當弱勢的領導人，但他們選擇改變體制，採取直接問信於民的投票選舉方式，讓國家走上民主的道路。這兩位總統不僅讓自己成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也都成為在世界史上留下功績的政治家。

中國也有相似的發展軌跡。矢板明夫分析說，毛澤東建國，鄧小平及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實現了經濟增長。習近平會如何因應人民的不滿，維持政權的正當性？矢板明夫作出具前瞻性的預期：像盧泰愚或李登輝那樣「出黑暗、入光明」，雖然是舊制度的催生物，卻依然選擇走向民主的新時代。這無疑是習近平奠定其歷史地位的著力點。這個建議優於習近平身邊的那些唯唯諾諾的垃圾智囊的主意。但是，習近平本人有沒有學習盧泰愚和李登輝的智慧和勇氣呢？至少從他目前的所作所為來看，盧泰愚和李登輝都不是他的選項。他更有效仿毛澤東的意願，這個意願對於中國和東北亞來說，都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景山上的歪脖子樹正在等待著這個大胖子

本書第三部分從軍權、外交、少數民族問題、言論箝制及兩岸關係五大面向，分析習近平接班後的政策走向。習近平接收的中共政權，如同一艘千瘡百孔的巨輪，體量龐大，漏洞雖一時不足以致命，卻已呈現

不可收拾之態勢。

矢板明夫舉了一個小小的例子說明中國當下的現實：二零一一年春天，有一名維吾爾族的中年男子打電話到位於北京市東邊的《產經新聞》中國總局辦公室，說想前來拜訪。在電話裡竊聽到此消息的中國政府竟出動十幾名便衣警察，在辦公室周邊嚴陣以待，準備逮捕這名「上訪者」。從這件事即可看出，共產黨對於自己的統治多麼沒有信心。

有著相同感受的《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伊恩·強森在《苛稅、胡同和法輪功》一書中指出，中國政府並非一直缺乏自信，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之後，共產黨其實頗得民心。而在中國國力空前強大的今天，「中共反倒喪失了自信心，中國的統治者緊張兮兮。中國境內失業率攀升，貪汙和腐敗滲透日常生活，他們的對外關係屢屢導致危機。……這個國家的心理日曆已經成為一連串的瘡痍與痛處的疊合。」

那麼，習近平有能力扭轉這一頹勢嗎？過去在香港與日本等地出版的各類《習近平傳》，通常都會用大篇幅來不厭其煩地介紹習近平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政績」。而矢板明夫將這類內容全都「割愛」。他認為，習近平在進入中央以前，的確長期擔任地方首長，但和其它同一世代的地方首長相比，在經濟增長與改善民生等重要領域，留下的成績絕不是特別亮眼的。一位前共產黨消息人士在評價習近平擔任地方首長時的能力時，只給了個「中等中的中等」的評價。習近平才智有限、知識結構老化、思維方式僵化，成為中共的掌舵人之後，亦不太可能力挽狂瀾、大刀闊斧地開始政治改革。

果然，從習近平上臺之後的一系列作為和言論來看，習近平否定了國民和世界對他的期待。他不是中興之主，更像亡國之君。他像崇禎皇帝那樣死不悔悟：崇禎帝一上臺就端掉了權傾一時的魏忠賢，人民正要載歌載舞，他又將繼續驅使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殘民以逞；如今，習近平十萬火急地反腐敗，讓「政法沙皇」周永康落入陷阱，人民正待敲鑼打鼓，他又竭力捍衛滋生腐敗的一黨獨裁的專制制度，進而設置權

第五章 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



力無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讓中國向「警察國家」邁進一大步。崇禎的作為，加速了明帝國的滅亡；習近平的作為，也將加速中共國的覆滅。

景山上那棵吊死崇禎皇帝的歪脖子樹，在「文革」中被紅衛兵砍掉了。現在的那棵，是後來重新栽上去的。我去景山時，看見過這棵樹，似乎弱不禁風的樣子。到時候，習胖氣喘吁吁地跑來上吊，這棵樹也還可以承受他那臃腫肥胖的身體。

習近平不是蔣經國

共產黨沒有培養出自己的蔣經國，這是它未來要倒楣的地方。

——周為民

在習近平上臺之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佔據半個版面的評論文章《政改關口：習近平像蔣經國》。文章指出：「媒改與政改並舉，是使臺灣邁向透明化的關鍵政策。」蔣經國的經驗，習近平會仿效嗎？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的演講中，引用蔣經國的座右銘「計利當計天下利」。習近平講到，「堅持合作共贏。『計利當計天下利』。中國願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對東盟國家開放，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東盟國家。」當年，國民黨元老之一、著名書法家於右任曾手書「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之對聯，贈予蔣經國。蔣經國將此作為座右銘。

然而，引用蔣經國的一句話，並不意味著習近平要仿效蔣經國。恰恰相反，習近平執政之後，人們清清楚楚地發現：習近平斷然拒絕成為「中國的蔣經國」之選項，像泰坦尼克號的船長一樣，喪心病狂地下令這艘大船向著隱然可見的冰山撞去。

蔣經國為了保有權力而順應民主潮流

那些眼巴巴地期待習近平良心發現、啟動政改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將蔣經國吹捧為偉大的民主先驅。他們期望中國出一個蔣經國式

的人物，然後就萬事大吉、一夜變天。這是一種道德上的怯懦和思維上的懶惰：從來沒有哪個掌權者心甘情願地讓出權力、開放競爭，變革不是守株待兔地等來的，變革的動力來自於民間社會的努力與奮起。

蔣經國並不是民主自由價值的信仰者，而是威權體制下的獨裁者。美國學者丹尼·羅伊（Denny Roy）在《臺灣政治史》中指出，蔣經國的權力來源莫基於黨、軍隊和情治系統的堅定支援，從他的資歷來看，他是一個「始料未及的改革的支持者」。

蔣經國年輕時代留學蘇俄，從克格勃那裡學到特務統治的手段。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蔣介石全力培養蔣經國為接班人，蔣經國先後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國家安全局局長、專門教育及監控青年學生的「反共救國團」創始人等要職，是製造白色恐怖的主要人物。黨外運動先驅康寧祥與蔣經國有較多交往，是黨外人士中對蔣經國持較為正面評價的人，他在回憶錄中指出：「在蔣經國生前，民主、自由是臺灣有識之士的渴望，他卻宛如割肉之痛，遲遲不肯讓步。」

蔣經國是一個務實的獨裁者。與喜歡搞個人崇拜、塑像和肖像遍佈臺灣各地的老蔣不同，小蔣不准手下為自己塑像，也不准在公共場合懸掛自己的肖像，更沒有為自己營造「紀念館」之類的建築。他對個人崇拜不感興趣，也逐漸收起了「反攻大陸」等自欺欺人的神話。老蔣習慣於深居簡出，像中國歷代的皇帝那樣顯得神秘莫測；小蔣則經常輕車簡從地深入百姓家中，觸摸民眾脈搏，塑造親民形象。

蔣經國不是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敢於拿既得利益集團開刀的領導人，他的長處在於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在其晚年，臺灣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已不可阻擋。就島內局勢而言，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基層選舉和鄉村自治的格局，保存了公民社會的命脈，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日漸明顯；經濟的高速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渴望政治參與的中產階級群體；「二二八」以來國民黨外省精英集團對本省人的打壓，造成了族群對立和國家認同危機。就國際局勢而言，在與中共的外交戰中節節敗

退的臺灣當局，需要以「自由中國」的旗號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不得不正面肯定人權的價值——甚至宣佈一九七六年為人權年。

作為臺灣最後一位「開明獨裁者」，蔣經國是「解嚴」決定的拍板者。對比中國統治者鄧小平動動用坦克和機槍屠殺民眾，蔣經國力排眾議作出「解嚴」的決定，是看到了「時勢比人強」的道理。「解嚴」的先聲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下午，蔣經國在接受《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葛蘭姆的訪問時，首度提到臺灣將解除戒嚴。當時，坐在中間擔任英文傳譯的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馬英九，後來回憶說：「我一個字一個字的把這段話譯為英文，當時覺得好像有一股電流過我的身體，我告訴自己，這一刻終於來到了，我們正在改寫歷史。」

不久後，當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宣佈成立之時，國民黨保守派主張立即逮捕民進黨的有關人士。蔣經國卻說：「這時機不適合訴諸於憤怒，若以魯莽的手段採取積極行動，將會造成社會的動亂。我們必須考慮國家的穩定與人民的安全，以平心靜氣的態度來應對。」隨即，當局制訂新的人民社團法，使民進黨和其他新成立的黨派就地合法化。蔣經國指出：「時代在變，事情在變，潮流也在變。要適應這些變局，執政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來迎接這場民主革命，也才能與歷史潮流接軌。」他深知，與其讓蔣家和國民黨被民眾的怨憤所埋葬，不如積極迎接新時代的來臨並在新時代找到一個新的位置。臺灣的民主化進程，蔣經國並不是主動參與者，而是被動接受者——不過，他沒有選擇成為攔路石，這是他的高明之處。

社會變革的功臣，當然首推像曼德拉、哈維爾、瓦文薩那樣體制外的民主鬥士和人權活動家，在臺灣，他們是雷震、殷海光、彭明敏、郭新雨、康寧祥、林義雄、高俊明等人；同時，也離不開像蔣經國這樣的「開明專制者」。即便統治者身上籠罩著舊時代的陰影，甚至手上沾有鮮血，只要他能看清歷史潮流並順應之，也能與反對方攜手書寫歷史的新篇章。反之，如果剛愎自用、固執己見，昧於人心向背和國際大勢，就必然成



為時代轉型中的「負能量」，可悲又可恥地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從臺灣的民主進程這一脈絡來審視兩岸關係可以發現：兩岸的競爭，不僅是經濟和科技的競爭，更是意識形態的競爭。歷史學者徐宗懋評論說：「蔣經國決定解除臺灣戒嚴令，對中國大陸二十年來的發展造成衝擊。兩岸從內戰、冷戰到逐漸開放和解，在歷史長河中也許只像一瞬間，但對老百姓來說，卻是一輩子的生死浮沉，包涵死亡、別離、重生等種種苦痛與喜悅。解嚴以來，臺灣人民權利上升，逐漸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擁有言論及組黨的自由，這些都不斷衝擊著中國大陸，啟迪了今日中國大陸人民面對黨禁報禁的抗爭。」這一競爭，方興未艾。這一競爭，有可能以良性的方式達致「雙贏」的結局。

習近平害怕的「顛覆性錯誤」是什麼呢？

當大地震將要來臨之際，連老鼠都能感覺到若干徵兆，故而敏捷地離開鼠洞、倉皇逃生。偏偏有遲鈍和蒙昧如習近平者，依然習焉不察、率由舊章。當年，蔣經國順勢而為，讓國民黨在民主潮流的衝擊下倖存下來，並在政黨輪替之後二度上臺執政；如今，習近平抱薪救火、刻舟求劍，祈求毛太祖顯靈保佑，進一步集中權力、壓制言論自由，其結果只能是為他自己也為整個共產黨送終。

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在印尼巴厘島巨星的 APEC 峰會上，習近平發表了一篇題為《深化改革開放，共創美好亞太》的演講。在冗長的空話、套話之中，鑲嵌了一句耐人尋味的、「有料」的話：「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何為「顛覆性的錯誤」？香港《南華早報》的解讀是，不走回頭路，堅持改革開放，終結薄熙來路線。這是一廂情願的「過度闡釋」。習近平的本意是：所謂「顛覆性的錯誤」，就是「讓共產黨失去政權的錯誤」；而避免「顛覆性的錯誤」，就是確保共產黨一黨獨裁、永遠執政，拒絕

民主轉型、多黨競爭。習近平最恐懼的是失去政權，他怕革命，也怕選舉。他認為，繼續專制是保有政權的唯一方式。他連香港民眾期盼的「雙普選」都談虎色變，又怎麼可能讓中國民眾擁有選舉權呢？不開放黨禁和報禁，是習近平死守的兩個底線。

在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中，多次提到「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的說法，正與 APEC 峰會上演講所說的「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暗合。二零一三年十月八日，社科院院長、黨組書記王偉光在《人民日報》發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一文，直接引用習近平的一段講話原文，「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王偉光指出，堅決反對西方所謂「新聞自由」，並要「及時支持因堅持真理而被圍攻同志」——雖然他沒有點出這些「同志」的名字，但胡錫進、孔慶東、司馬南、方舟子、吳法天等御用文人，一定是黨媒要聲援的對象。這些「高級五毛」在網絡上遭到大多數網民的駁斥和嘲諷——即王偉光所謂的「圍攻」。王偉光和習近平不僅沒有從中看到民心所向，反倒要與民意為敵。

習近平所說的「顛覆性的錯誤」，包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蔣經國的改革。在他看來，開放黨禁和報禁，導致國民黨一度失去執政權，是蔣經國犯下的「顛覆性錯誤」，他不能效法之。臺灣在兩蔣時代即具備議會監督政府的雛形，康寧祥作為民選議員在立法院質疑作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讓蔣經國數度「臉紅脖子粗」。蔣經國反倒欣賞康寧祥的認真和率直，多次邀請康寧祥到辦公室茶敘。習近平連這樣的胸襟和肚量都沒有，他哪會老老實實地到國會去接受質詢呢？而且，以他有限的學識和能力，若真遇到民意代表的尖銳質詢，必然是瞠目結舌、一問三不知。

那麼，沒有犯過習近平所說的「顛覆性的錯誤」的共產黨國家，究竟還剩下哪幾個呢？中共的難兄難弟，已經屈指可數。越南積極向美國

靠攏，當然是變「修」了；俄國雖可結盟，但俄國共產黨已淪為在野黨。剩下的典範，只有北韓三代世襲的金氏王朝，以及古巴哥哥傳位給弟弟的卡斯特羅政權——十年前胡錦濤上臺時，不就號召全黨要學習朝鮮和古巴如何控制輿論嗎？習近平要向金正恩取經嗎？

抱殘守缺，「專制至死」

蔣經國順應民主潮流，不是因為他有多麼英明神武，而是臺灣社會掀起了洶湧澎湃的民主潮流。習近平選擇抱殘守缺，乃是因為中國民間改革的壓力不足，而既得利益集團的慣性相當巨大。習近平本人處於精神撕裂的狀態：他仿佛是一個從《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的時代「穿越」來到今天的、生不逢時的人物。他的身體深陷於毛時代的泥沼中，嘴巴偏偏要伸出來呼吸二十一世紀的新鮮空氣。

習近平並不認為齊奧塞斯庫、薩達姆、穆巴拉克、卡紮菲等獨裁者垮臺的原因是背離主流民意和世界民主大潮，反而認為是因為他們獨裁得不夠全面和徹底。這跟當年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痛定思痛」的結論差不多：蔣介石並不認為失去中國大陸的是因為他本人的驕傲和短視、國民黨自身的腐敗無能以及長期壓制人民的民主渴求，反倒認為是過早行憲、集權不夠。於是，蔣介石在臺灣大開殺戒、長期戒嚴，以白色恐怖粉碎民眾的民主訴求，暫時獲得了苟安的局面。但是，蔣介石在臺灣倒行逆施、殺人如麻，必然付出巨大代價，那就是：島內族群對立、民眾怨恨加深、國家認同模糊，蔣介石是無可推諉的「始作俑者」。蔣經國承襲了蔣介石的包袱，故而無法與舊制度一刀兩斷，遂成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人物。對臺灣民主化所作的貢獻，遠不能與李登輝相比。

在習近平身上，卻連「半新」的部分都沒有。早在一九八五年，習近平就曾赴美訪問，看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富饒與文明，他的視野應當比大部分與他同齡的、當時未曾出洋見過世面的地方官員開闊。同樣是以農

業為主的地區，習近平短暫停留的愛荷華州的小城市馬斯卡廷 (Muscatine) 與他當時擔任縣委書記的河北省正定縣，可謂天壤之別（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種差別僅僅是縮小了少許而已）。前者已經是高度現代化、機械化的農業，後者還停留在刀耕火種、人牛並耕的階段。但是，習近平並沒有因此成為親美派或民主派。

那時，習近平出訪的身份是代表團團長、河北省石家莊地區食品協會主席（因為共產黨書記的名稱讓西方人厭惡，代表團成員遂用其他身份掩蓋之）。習近平在一個普通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居住了兩天，得以窺視美國尋常人家的日常生活，想必大開眼界——即便以當時他的「縣太爺」之尊，無論是居住的條件與環境，還是生活的舒適度，都無法與一般的美國人相提並論。

二零一二年，習近平以中國國家副主席的尊貴身份再度訪美，特意安排去當年的房東家拜訪，被美國媒體稱為「懷舊之旅」。但是，這張「懷舊牌」並不足以讓習近平決心學習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他與曾經留學瑞士的金正恩一樣，並沒有將自己的國家打造成美國或瑞士的願景——在他們的字典裡，第一是權力，第二是權力，第三還是權力。

習近平袍笏登場，能帶領共產黨走出「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嗎？習近平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為號召，能成功地煽動民意嗎？他最大的愚蠢之處就是，以為每個民眾都比他更愚蠢。習近平不曉得，今天眼睛亮起來、看透其本性的中國人，已經越來越多，即便他像毛澤東那樣善於蠱惑民心，今天中國人的心智早已不是當年那種懵懵懂懂的狀態了，就像推特上的一段推文所說——央視女記者採訪農民工：「假如中日爆發戰爭，你願意上前線嗎？」農民工回答說：「上前線有戶籍限制嗎？要暫住證嗎？不是黨員行嗎？我什麼都沒有，就是一個農民，能上嗎？還有，犧牲了大家賠錢都一個價嗎？」

習近平能找到幾個真正願意為他賣命的人呢？

一個也沒有。

不學不丹國王辛格，偏學滿清攝政王載灃

雖然我可以努力做個好國王，但我不能保證不丹代代都是好國王。為了不丹人民的長久幸福，必須推行民主；一個好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不丹第四代國王辛格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習近平究竟要走什麼路，已經清晰明瞭了。西方媒體及中國民間輿論普遍認為，三中全會公報是「老調重彈」、「毛鄧併用」。公報中提到中國首設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唯一的焦點。香港《南華早報》認為，國安委將有利於中共高層進一步集權，成為集黨內外軍政大權的第五大權力機構，也有利於習近平進一步扮演政治強人。海外媒體博訊網認為，國安委將超越公安、國安、中紀委，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部門，重點是意識形態和輿論，習近平將親自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華爾街日報》在社論中指出，國安委將大大加強中國國內安全機構的力量，以應對因污染、土地和腐敗引發的中國民眾抗議活動，及西藏和新疆等地的動盪狀況。習近平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讓自己獨攬大權的企圖，堪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從這一舉動可以看出，習近平斷然否定了學習臺灣的蔣經國、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南非的德克勒克以及不丹第四代國王辛格等帶領國家和平轉型、走向民主的政治家，而決然地學習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及滿清王朝的末代攝政王載灃等抱殘守缺、自取滅亡的人物。習近平以為，通過進一步的集權，他可以提升施政效率，可

以樹立個人權威，進而建立千秋萬載之帝國偉業。殊不知，滅頂之災瞬間就會將他席捲而去。到了那時，他無論怎樣垂死掙扎，也是無濟於事。

辛格「自我罷黜」，締造「快樂王國」

不丹國王辛格·旺楚克率領王室和國家走出了一條「自我罷黜」、「自廢武功」的民主之路，從而被西方媒體譽為「當代華盛頓」。

辛格早年曾赴印度和英國留學，一九七二年登基，成為不丹旺楚克王朝第四代國王兼任陸軍總司令。一九九八年，辛格解散內閣，將政府管理權移交給大臣委員會。二零零一年，他下令籌備起草憲法，以結束世襲君主制，建立議會民主制國家。二零零六年，他讓位給兒子以後，兩代國王共同推進不丹的民主政治進程。二零零八年，不丹舉行首次國民議會選舉，產生議會民主制下的政府，不丹成為世界上最年輕的議會民主制國家。現在的不丹國王深受民眾愛戴，也頗有影響力，但已沒有任何實權。

是遺臭萬年，還是流芳百世，不同的選擇，往往在一念之間。辛格登基之後，勤政愛民，國勢蒸蒸日上。但他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有效的制度與親民的國王之間，應當選擇哪一個？是為有效的制度犧牲一個親民的掌權者，還是以後者犧牲前者？辛格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選擇拋棄打造自己愛民如子、光榮正確的偶像崇拜，而著力探索如何建立一個良好、有效的制度。中國學者阮思餘在《不丹：清醒的國王，速來的民主》一文中評論說：「這一點，對於威權國家善於、而且是將更多精力用於塑造魅力型的領袖人物來說，特別具有借鑒和啟迪意義。看看人家國王是怎麼做的？國王尚且如此，帶有些許民主化標籤的國度為何差距那麼大呢？」

不丹並不是一個有民主傳統的國家，在不丹的歷史上，神權和王權輪替是根深蒂固的傳統。雖然沒有民主傳統，民主仍然可以在這片喜馬

拉雅山麓的美麗土地生根發芽。不丹的兩個鄰國都有慘痛的教訓：錫金頑冥不化，拒絕民主，國家殘破，被印度吞併；尼泊爾王室強橫封閉，引發內部火併的血案，然後倉促轉型，導致毛派上臺執政，國計民生雪上加霜。有了這兩個鏡鑒，不丹的民主化是在兩任國王極力呼籲、走遍鄉鎮解說的基礎上實現的。為了宣傳、解說民主，辛格和他的兒子走遍全國各鄉鎮，不是為自己拉票，而是告訴人們要學會民主、要積極參與投票。在選舉前夕，現任國王發出呼籲：「你必須投票，每個人都必須行使他的選舉權。請自豪的、自信的運用你的那一票。」在世界歷史上，國王為民主、為選舉親歷親為、奔走呼號的情形恐怕不多見。不丹選民給予熱烈回應，三十二萬合格選民中，將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參與投票。此一投票率讓英美、歐洲等老牌民主國家亦甘拜下風。

民主的實現，既需要民間社會公民意識的成長，也需要在上掌權者的道德勇氣、廣闊胸襟和歷史感。阮思餘關於不丹民主化進程的觀察與評論，真該擺上習近平的案頭，比那些所謂的「智囊」挖空思想出的「建國宏圖」更有價值：「或許我們可以從不丹國王近年來關於推進民主的相關理念與一些做法中得到一些啟示。在這方面，不丹國王不僅語出驚人，而且親歷親為。至少我們可以感受到，不丹國王口頭上的民主與行動中的民主還是相當吻合的。或許民主啟動的某些時刻，我們需要的正是類似不丹國王這種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操守與踐行。」

有了民主制度，不丹所追求的「國民幸福總值」才成為可能。「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縮寫GNH，也稱國民幸福指數）這個術語，是辛格於一九七二年提出來的。他的解釋是：建立一個能為不丹基於佛教精神價值觀的特殊文化服務的經濟和政治環境。這是一個評價生活品質的指數，比國民生產總值更具全面，並注重精神上的感受。不丹教育部長良博·包爾對此一願景的闡釋是：「如先知般的睿智發想，簡單扼要，雖出自一位國王，卻是人類的夢想，因為追求幸福終究是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個人渴望的最高目標。」不丹總理廷禮（Jigmi

Y Thinley) 進一步指出，既然幸福是所有居民唯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渴望，政府就應該竭力創造一個讓居民可以追求幸福的條件。不丹的憲法主張，國家有責任推動以 GNH 作為判斷社會政策和計劃的標準。不丹政府透過可分為「四要點」的策略來承擔此責任，作為發展 GNH 的四個支柱分別是：一、公平且永續的社經發展；二、環境保護；三、文化的保存和推廣；四、良好治理的推廣。這四個支柱又可以再分為九個領域：生活水準、健康教育、時間運用、心理福祉、文化、社區活力，以及生態的完整性。

這四大支柱和九個領域，是對以 GDP 為唯一指標的「中國模式」的「撥亂反正」。「中國模式」的核心是極權政治，是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然後才是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最後將經濟增長的殘羹冷炙分給民眾。「中國模式」形成一個日漸凝固化的以鄰為壑、贏家通吃的發展格局。今天，如果你問一個中國人是否幸福，許多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即便是那些有錢有勢之人。薄熙來幸福嗎？當他肆無忌憚地殘害民眾時，他自己的家庭早已分崩離析。習近平幸福嗎？他雖然掌握最高權力，童年淪為「狗崽子」的恐懼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在中國，沒有人幸福，無論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無論是掠奪者還是被虜者。但是，如果你問一個不丹人同樣的問題，絕大多數人的回答卻是肯定的，而且那種發自內心的幸福溢於言表；此外，幾乎所有去過不丹旅遊的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不丹讓他們回到了心靈的故鄉。也正因為如此，不丹被人們視為「快樂的王國」。

幸福需要智慧以及仁慈、無私的心，不丹王室以他們清明的智慧、寬廣的胸襟，成就了不丹人民長遠的幸福，也在人類民主道路上留下了令人仰望的典範。這樣的典範，對於畸形發展的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躊躇滿志的習近平，爭霸的對像是遙遠的美國，對小小的不丹不屑一顧，而他失去的，也許是最後一張救命的藥方。

載灃的權力：握得最緊，鬆得最快

習近平不把不丹國王辛格放在眼中，卻正在重蹈滿清末代攝政王載灃的覆轍。一九零九年，清朝最後一位柱臣張之洞死前，曾和載灃關於一位官員的任免有過一次談話。張之洞說：「老百姓不願意，恐怕會激起民變啊。」載灃說：「不怕，咱手裡有槍。」張之洞長歎一聲：「沒想到竟然聽到了這種亡國之音啊！」載灃的名言，也是習近平的口頭禪。中國歷史循環往覆、跋前疐後，今日之時勢，宛如清末；而今日掌權的習近平，亦重演著昔日攝政王載灃馬不停蹄地「奔向深淵」的那段旅途。

載灃在晚清皇族中，並非腐敗無能之輩。他出過洋，見過世面，喜愛讀書，也不排斥新鮮事物。《辛丑合約》簽訂之後，因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暴民殘害，載灃作為「謝罪專使」赴德國請求諒解。德皇威廉向載灃傳授保持皇權的秘訣：要有足夠數量的軍隊，並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載灃目睹德皇族從幼年時起，就身受極嚴格的軍事訓練，所以國勢強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國的見聞，更讓載灃認識到：「欲使皇室強盛，必先集中兵權；欲使國家富強，必須重視武備。」他以為，只要牢牢抓住軍隊，訓練一支得力的軍隊，就可以永遠保持皇統。

於是，載灃上臺後的第一個舉動，即為集中兵權。他宣佈裁撤近畿省份的練兵處，將其新編陸軍直接劃歸中央陸軍部指揮。四十天之後，他又下令成立專歸自己統轄的禁衛軍，由北洋陸軍第一鎮滿兵中抽調組成，以其弟貝勒載濤、貝勒毓朗、陸軍部尚書鐵良為訓練大臣。這支部隊不僅裝備先進，而且待遇優渥：「悉著呢衣草履，一切領章帽記，製造均屬優良，以示判別面而壯軍容。」

為了從制度上保障滿洲親貴對兵權的絕對掌握，一九零九年七月十五日，載灃連下三道上諭，下令籌辦海軍處，並將陸軍部中的軍諮處分離出來，分割了原本歸陸軍部的一些重要權力，讓軍諮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專職軍事顧問與指揮調度機構：「凡關於規劃籌防用兵及重要事

件，均由軍諮處縝密酌擬，呈請陸軍部堂官覆核，會同軍機大臣具奏請旨遵行。」軍諮處在建制和職能上仿照日本參謀本部，目的是要成為「贊佐攝政王統率陸海軍的總參謀部規模」。這個新機構被載灃交給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載濤管理。

對於海軍這個在甲午戰爭後被忽視的軍種，載灃也試圖納入自己彀中。一九零九年二月，載灃下詔，令肅親王善耆、度支部尚書載澤及海軍提督薩鎮冰等負責妥慎籌畫海軍事宜。五個月後，又發佈上諭，宣佈皇帝為大清國陸海軍大元帥，未親政前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並命六弟載洵、提督薩鎮冰出任籌畫海軍大臣。十月，載、薩兩人受命出訪歐洲，訂購多艘先進戰艦。

載灃攝政期間，竭力加強皇族集權，使少壯親貴們充斥朝廷。這些親貴個個碌碌無為，卻占住顯要權位，彼此明爭暗鬥。觀察家評論說：「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倡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於是洵貝勒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統軍諮府，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等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勾通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隆裕以母后之尊，寵任太監張德為一黨。澤公與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一黨。以上七黨皆專予奪之權，茸無恥之徒，趨之若鶩。而慶邸別樹一幟，又在七黨之外。」結果，政治的敗壞一瀉千里，正如徐世昌所說：「清王朝之亡，並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

研究民主轉型問題的學者王天成指出，許多專制政權在覆滅之前，都會有一個「改革倒退」和「獨裁強化」的時期。載灃攝政時期就是清末憲政改革停滯和倒退時期。宣統二、三年間，清廷再不肯推進憲政，對立憲派的請願活動，採取高壓政策，好像又回到戊戌政變之後維新派遭到鎮壓、頑固派獨霸朝廷的局面。不僅立憲派「心長力短，言之痛心」，即屬於新洋務派的孫寶琦也上書直言：「宗支不宜豫政！」一九一一年，

各省立憲派請願召開國會，由於載灃震怒，各衙門和政府大員都不敢接見請願代表。同年五月，清廷在內外壓力之下推出內閣制，卻是一個民心盡失的「皇族內閣」，「足令全國諮議局之議員人人喪氣而絕望。諮議局議員絕望之日，即清朝基礎動搖之時，至是內外人心皆去」。此後，立憲派轉向革命，地方督撫不願效忠，當是自然之理了。

載灃認為，新軍是清王朝的核心軍事力量，是維持其統治的關鍵所在。在中央集權的國策之下，軍權是集權的重點，而新軍又是其集權、收歸軍權至中央的重中之重。這個想法固然不錯，但是，在以載灃為首的清廷在大肆攫取軍權、特別是新軍的掌控權的同時，卻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接受西方先進軍事思想教育的新軍，已經開始覺醒，有了自己的意識。儘管載灃在表面上將軍權緊緊握在手中，實際上新軍早已不是古代只知道「忠君」的舊式軍隊了。換言之，即便上層建築固若金湯，若地基鬆動，整棟大樓不可能挺立。

武昌起義的發端，就是湖北新軍官兵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表達不滿而發生的武裝嘩變。武昌起義後不到二十天，北洋新軍主力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將領向清廷發出通電，提出十二條政綱，要求立即撤銷皇族內閣，宣佈皇族不得介入政治，儘快組成責任內閣，召集國會，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南北新軍互相呼應，清廷遂蠹眾木折，隙大牆壞、應聲而倒。載灃保護政權、收攏兵權的精心策劃，不是抽薪止沸，而是抱薪救火。有歷史學家指出，新式軍隊在新的國內外局勢下，自我覺醒，從近代化走向現代化。而還在緩慢「爬」向近代化的清政府，顯然又落後於它所倚重的軍隊了。因此，清政府以「剛性維穩」為目標的軍事改革失控，並走向對其自身不利的結果，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載灃萬萬沒有想到，鐵打的軍隊，一夜之間就調轉槍口；當鐵打的軍隊靠不住時，鐵打的江山就「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了。而載灃面臨的變局，如今又落到習近平面前：習近平大量提拔「根正苗紅」的太子黨，以為太子黨可以「抱團取暖」。然而，太子黨大都是管窺蠡測、

城狐社鼠的無能之輩，彼此間亦矛盾重重，不可能為政權注入新鮮血液。習近平再三強調軍隊對黨的絕對服從，並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來控制軍隊、警察和所有的強力部門，在這些部門裡處處安插上他的哥們。他以為，權力越集中，共產黨的江山就越穩固。他甚至不辭辛苦，親自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哪個皇帝親任錦衣衛和東西廠的「督主」，習近平為了不當亡國之君，連命也賭上了。

殊不知，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閉關鎖國的時代，軍隊和警察都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即便官兵平時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兵營裡，他們也有回家探親的時間、也有使用網絡和手機的能力，他們也會感受到中國社會嚴重的腐敗和不公，對社會問題慢慢形成個人的看法和觀點。對於黨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軍隊和強力部門的成員更是心知肚明。中共已經無法像一九八九年時那樣，對軍人實行徹底的洗腦，讓軍人耳提面命地去屠殺民眾了。如果再發出一九八九年那樣的民主運動，軍隊調轉槍口的可能性很大。而警察和秘密警察，早已喪失了意識形態的信念與激情，他們至多是三心二意的「打工仔」，當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們才不會為這個政權「拋頭顱、灑熱血」呢。

載灃的聰明之處在於，當發現大勢已去，就不再孤注一擲、困獸猶鬥，而是體面下臺、退一步海闊天空。故而滿清親貴沒有像法國王室和俄國皇室那樣慘遭革命黨人屠殺。此後，張勳復辟和溥儀到東北建立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滿洲國，載灃都拒絕參與，頗有「願賭服輸」的君子風範。未來的習近平，也許連載灃的這點智慧都沒有。習近平明知中國當下的形勢是厝火積薪，他也要伐功矜能、戴盆望天。他拼命抓權，以為像毛那樣一手遮天，就能江山永固。殊不知，他抓了種種權力之後，其他同僚當然就作壁上觀、在一旁看他的笑話。這個政權已經無法讓這群處廟堂之高的人齊心協力、同舟共濟了。當大變局真的開始的時候，以習近平習非成是的人性，或許真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強項倒地，直至跌入萬丈深淵。那麼，中國下一步的社會轉型，可真就要比清末流更多的鮮血了。

習近平要走安德羅波夫的老路？

任何一種專制制度或極權專政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就是人民智力資源的貧乏和枯竭。這種枯竭現象越是上溯到領導層就越來得明顯。

——阿爾巴托夫《蘇聯政治內幕》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任主席，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作為中央關於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該委員會向政治局、常委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

有趣的是，北京《新京報》頭版大標題報導習近平出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消息時，卻配以一幅北京廟會「皇上駕到眾臣跪拜」的巨幅照片，令讀者譁然聯想。版面照片在網上瘋傳，網民稱：「這不是影射我朝皇上嗎？習大大一身兼五要職（黨、政、軍及深改小組、國安委），當之無愧的新大帝！」「這招真是蓋了帽了！」

中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同於美國的僅僅為總統提供安全政策諮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甚至比當年蘇聯讓人談虎色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權力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不能表明習近平真有「自信」，反倒彰顯出他極度缺乏安全感。

首先，習近平試圖通過該委員會的設置，進一步將權力集中。此機構

的設立，使得習近平一舉廢除了御用學者胡鞍鋼在胡錦濤時代總結的「集體總統制」，在讓自己成為毛澤東那樣高高在上的強人的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其次，官方對該委員會的主要職能的解釋是「對內」而不是「對外」。習近平念茲在茲的關鍵任務，是如何將鎮壓力量整合和擴大、將維穩政策升級換代。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想做而未能做成功的事情，習近平終於夢想成真。

雖然習近平看不起無力拯救大廈傾倒、「竟無一人是男兒」的蘇共，但他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延續統治壽命的想法，偏偏是跟蘇共領袖安德羅波夫一脈相承。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長達十五年之久，運用秘密警察如臂使指。之後，終於熬成蘇共總書記，但執政不足兩年便一命嗚呼。即便其身體健康、持續掌權，但蘇聯舊體制土崩瓦解的趨勢，他縱有三頭六臂亦無法遏制。安德羅波夫的困境，亦是習近平的困境。自以為聰明的習近平正在重蹈其覆轍。

他們都是精神殘缺的「小市民」

曾經為蘇共幾屆總書記提供外交政策建議、擔任蘇聯科學院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的國際關係學者阿爾巴托夫，在回憶錄《蘇聯政治內幕》中，對安德羅波夫時代作出了精闢的評述。阿氏與安德羅波夫長期保持親密關係，儘管他對安德羅波夫有不少袒護之詞，但他承認，包括安德羅波夫在內的幾代蘇共領導人，都「絕對的平庸」，「這樣說既是指他們的天賦和才能，也指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

阿爾巴托夫指出，這些黨的領導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各級官僚機關中度過。「他們之所以被選中並得到升遷，是因為並非出類拔萃；他們熬過來了，從複雜坎坷歲月的眾多彎道中走過來了，是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本人的堅定信念；他們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為地位比他們高的人沒有把他們看作是競爭對手。」安德羅波夫畢業於一所水運

中等技術學校，後來從高級黨校獲得高等教育學位。歷史學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指出，蘇聯的高級黨校就是為官居高位、既沒文憑也沒時間，還沒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領導者而設立的。

與之相似，對習近平最準確的描述，也是「絕對的平庸」。習近平當過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和省委書記，履歷完整，但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亮麗的政績。長期以來，他躲藏在妻子、光芒四射的軍中歌唱家彭麗媛的陰影之下，作為「彭麗媛的丈夫」而存在。直到像抽中大獎一樣成為最高領導人，沒有哪個民眾知道他有何德何能。

在教育程度上，習近平並未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作為「初中生」就被迫成為知青大軍的一員而「上山下鄉」。其大學教育是拿不上檯面的、「文革」時期的「工農兵學員」。後來，他通過「走後門」的方式撈到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這個「注水學位」成為海內外的一大笑柄——他找人代筆完成的博士論文，毫無學術價值，是清華大學百年教育史上的醜聞。

比教育程度有限更可怕的是人格的殘缺、品質的低下和精神的猥瑣。阿爾巴托夫服務過多名蘇共領導人，通過對蘇共最高層的觀察，他發現這樣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斯大林以後歷代蘇聯的「政治精英」們，基本上屬於「小市民」，「他們都具有小市民的眼界、小市民的思想和心」理、以及小市民的理想，雖然他們中大多數人都竭力表現為「偉大的革命家」、「為工農事業而奮鬥的戰士」。所謂「小市民」，就是只能看到眼前的蠅頭小利，缺乏遠見與願景。在承平時期的，小市民式的領導人得過且過，垂拱而治；到了危機四伏的時刻，小市民式的領導者則無法帶領國家和民族乘風破浪、救亡圖存。

這種小市民人格的形成，是斯大林體制的後遺症。阿爾巴托夫指出：「如同大多數不僅在斯大林治下生活過，而且還步入了政界的同齡人一樣，安德羅波夫也是個深受創傷的人。其實這正是斯大林肉體恐怖和精

神恐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打斷人們的心理道德脊椎骨，使他們喪失堅毅勇敢的性格、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阿爾巴托夫寫到他與安德羅波夫之間爆發的一次爭論：安德羅波夫要將一封他人寫的告密信呈送給勃列日涅夫，阿爾巴托夫提出反對意見。安德羅波夫回答說：「我無法確定，此信的影本是否已經轉給了勃列日涅夫，要知道克格勃是一個複雜的機關，它的主席也是處在別人監視之下。」一時間，阿爾巴托夫無言以對，卻深受刺激。他感慨萬千地說：「我們是在什麼樣的哈哈鏡般的世界中生活！籠罩我國最高層的政治道德風尚已經被扭曲到什麼程度！他們檢查私人信件，並向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彙報這些信件。而這樣做還不夠，還精心地去監視那個聽命於領導人的對所有人實行監視的人！」可見，在令人生畏的同時，安德羅波夫自己也感到害怕；他奴役別人，自己也被制度所奴役。

安德羅波夫正是靠這種小心翼翼和忠心耿耿，成為勃列日涅夫選中的接班人。雖然長期執掌克格勃，知道最多的秘密，也擁有除了總書記之外的最大權力，但安德羅波夫也成為箭垛式的人物。他深知，在這個圈子裡面，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豈能掉以輕心？長期過著這種戰戰兢兢的生活，他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已經退化和泯滅了。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指出，在蘇共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這三個最高權力階層上，不存在工作以外的關係。領導人之間基本沒有個人交往。他們彼此沒有好感，互不信任。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談到一個細節，足以說明安德羅波夫鮮明的性格特徵：當戈爾巴喬夫當上政治局委員後，與安德羅波夫比鄰而居。有一次，戈爾巴喬夫邀請安德羅波夫和妻子星期天到家中吃飯。安德羅波夫拒絕了，用平靜的聲調解釋說：「如果我去你那裡，那明天就會有人說閒話，議論誰在什麼地方聚會，為什麼聚會，討論了什麼，我和妻子還沒有到你家，勃列日涅夫就已經知道了。」

這種小市民的特質、這種太監式的自我閹割的人格，同樣深深根植在習近平的精神世界裡。習近平在毛澤東時代深受暴政的傷害——其創

傷程度超過了安德羅波夫。在幾乎家破人亡的絕境中，習近平學會了絕處逢生的本領，這種本領成為他在激烈而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勝出的優勢之一。他學會了隱忍，學會了察言觀色。

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電視片《河殤》萬人空巷，福建女作家、在寧德地委宣傳部工作的康延平受其啟發，也寫了一部名為《閩東人》的電視劇本。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看完後批示說，「小康文筆很流暢，希望寫出讓人受鼓舞的東西，不然，大家看了更加灰心就不好了。」這一批示讓《閩東人》胎死腹中。後來，當《河殤》受到批判，康延平驚出一身冷汗，感歎說：「領導有領導的角度和高度。」見風使舵的權力鬥爭的好手，未必是帶領國家走向應許之地的先知。小市民人格成為習近平終身無法擺脫的束縛，成也緣於此，敗也緣於此。

知識份子是你們仇恨與恐懼的對象

安德羅波夫與前任勃列日涅夫不一樣，不愛虛榮，不懂享樂，對腐敗深惡痛絕。但是，在堅持共產黨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這一點上，兩人是一致的。列昂尼德·姆列欽在《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一書中指出，安德羅波夫秉持的僵化而強硬的意識形態立場，以及對自由化、西化的防範與恐懼，是其在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期間形成的。

正是在安德羅波夫駐匈牙利大使的任上，匈牙利爆發了反共的布達佩斯人民起義，蘇聯大使館一度陷入反蘇的匈牙利民眾的包圍之中，大使館如同狂風巨浪中的一葉孤舟，蘇軍迅速調來三十輛坦克護衛。安德羅波夫看到了他最不願看到的場景：若干匈牙利安全機構的官員因穿著統一發放的黃色靴子，被憤怒的民眾認出，然後被頭朝下地吊在樹上。安德羅波夫的妻子深受驚嚇，健康嚴重受損，以後再也沒能完全復原。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得到的主要教訓簡單而明瞭：「如果黨疏於意識形

態的監督，那它會輕而易舉地喪失國家政權。其他任何東西，無論經濟困難，還是敵人的間諜，都不能斷送黨的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生存的邏輯是：只要有絲毫的放鬆，制度就會開始瓦解。」

安德羅波夫表面上文質彬彬，除了讀書之外沒有別的愛好，偶爾還會說幾句英文，也喜歡接見文藝界的人士。但是，他在骨子裡是極端保守和絕不寬容的。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由於受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蘇聯公民中，尤其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中出現了不問政治和虛無主義的傾向，不僅顯而易見的反蘇分子，還有愛說政治大話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點，唆使這些人去從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動。」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與之如出一轍，連遣詞造句都驚人地相似。

一九六七年七月，安德羅波夫在克格勃內部專門成立了「第五局」，對付日漸活躍的知識份子群體。阿爾巴托夫說，在一次與安德羅波夫會面的時候，安德羅波夫詢問他的意見，他當面反對這個計劃，他指出：「專門局成立之後，知識份子各種事件和問題將不是減少，而只會增加。」他向安德羅波夫解釋說：「道理很簡單：假若成立了專門局，這個局當然會想盡辦法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當沒有真正工作可幹時，就會想出一些工作來幹，這樣就會導致許多嚴重問題。」安德羅波夫斷然否定了他的觀點，認為第五局將是保衛蘇聯政治制度的又一道牢不可破的堤壩。

第五局成立之後，惡果逐漸出現，阿爾巴托夫發現，「這個局的工作實際上絕非不傷人，它在克格勃歷史上又增添了可恥的一頁。發生了不少個人的悲劇，國家的道德政治氣氛惡化了」。對於安德羅波夫和蘇共當局來說，感覺則如虎添翼，他們在對付不同政見者方面可以採取更大規模、形式各異的極其可憎的手段。除了通常的跟蹤和施加政治壓力外，還設法在政治上、道義上敗壞異議人士的名聲，有時不惜採用挑釁、恐嚇或非法投入精神病院等手段，也採用了諸如放逐國外、吊銷蘇聯國籍等做法。第五局內部還設置了一個對付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等異議

人士領袖的部門，由安德羅波夫親自指揮並督促制訂行動方案。

安德羅波夫賦予第五局極大的權力。羅伊·梅德維傑夫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一書中披露，安德羅波夫在克格勃主席和蘇共總書記任上，對付「思想顛覆」的鬥爭方式變得多元化和精巧了。一方面，安德羅波夫拒絕承認蘇聯國內存在持不同政見者。一九七七年，他在紀念克格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誕辰一百周年的報告中說：「『持不同政見』這個名稱，是西方敵對國家出於宣傳目的的精明的創造，是意在迷惑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安德羅波夫又堅決支持利用精神病院來整治異議人士。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蘇共中央，提出「擴大精神病院網的計劃和利用精神病院來維護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設想」。此後數年間，蘇聯有八十萬非精神病患者被押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所謂的「治療」。

習近平身上的知識份子氣質比安德羅波夫還要淡漠，他對知識份子和人權活躍人士的防範和敵視與之如出一轍。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宣佈要嚴控網絡，在其新創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一定會設置一個類似於克格勃第五局的單位，用以控制和打壓異見知識份子群體、阻撓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對於習近平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做法，法學家賀衛方批評說：「你不可把統治的延續建立在讓人民恐懼的基礎上，那不是共和國。威嚇別人反證自己內心的虛弱，正好比愚民者最終必將自愚。警察是用來維護國民的自由與權利的，司法的重要功能是讓政府恪守規則。都二十一世紀了，那種動輒把批評政府的人們送到監獄裡的做法，就是飲鴆止渴，自尋絕路。」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宣佈廢止勞教制度，但這黑監獄、矯正所之類的地方會迅速取而代之。習近平上臺一年多，抓捕的異議人士的數量已經超過了胡錦濤執政的十年。據海外人權關注者創辦的《拉清單》網站的不完全統計，自二零一三年以來，被逮捕、拘留和非法關押的知識份子、維權人士多達一百五十九人。他們的罪名分別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尋釁滋事罪、聚

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聚眾擾亂社會治安罪、非法集會罪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例如，新公民運動的倡導者許志永，已被非法軟禁在家長達數月之久，卻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逮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法律之外，黑頭套綁架、軟禁、酷刑等更是秘密警察普遍使用的「權宜之計」。若是當年執掌克格勃的安德羅波夫複生，到今天的中國訪問，看到這些花樣翻新的做法，一定會歎為觀止、自愧不如。對習近平這個不是情治部門出身的黨魁居然如此心狠手辣、雷厲風行，豈不深表敬意、讚不絕口？

偽裝的改革者與想像中的拯救者

曾擔任戈爾巴喬夫顧問的切爾尼亞耶夫，在安德羅波夫生前與之有過多次接觸。對於人們寄予厚望、甚至惋惜其「英年早逝」的安德羅波夫，他如此評論說：「安德羅波夫既沒有什麼才能，也沒有文化。一步一步地接過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指揮棒，他在任時建立了無處不在的居民監視系統，在各個領域組成了一支人數難以計算、拿報酬的秘密工作者大軍。」他認為，安德羅波夫沒有作出任何傑出的貢獻，除了整頓紀律和讓報紙更多地展開批評外，沒有提出任何卓越的思想。因此，「把安德羅波夫看作改革家是荒唐的。他只是通過一些組織和行政措施來調整一下系統。這無濟於事。只不過所有人都希望安德羅波夫能夠成為俄羅斯的拯救者。」

將安德羅波夫當作改革者甚至拯救者，是被專制制度剝奪了想像力和行動力的庸眾們一廂情願的期待。安德羅波夫一直到臨死之前都認為，國家需要的是整頓秩序、嚴肅紀律和反對腐敗，而不是政治改革。他沒有準備要改變蘇聯的政治體制，認為擴大民主和公開性的問題是屬於將來的事。他只是有限地整頓吏治，抓出幾個貪官，然後在媒體上大肆宣傳。他總在防備著激進變化和擅自的決定，懼怕新人。列昂尼德·姆列

欽評論說，安德羅波夫很難同周圍的世界溝通。「對精神分析學家來說，他是個病人，但誰又敢為他提供心理治療呢？」

在克格勃主席任期內，安德羅波夫大大提高了克格勃的工作效率，讓其他部門望塵莫及。當他成為黨的總書記之後，任命心腹人士掌管克格勃，並依賴克格勃呈送上來的、經過篩選的報告和資訊制訂政策和對策。他將克格勃看作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即便黨在睡覺的時候，克格勃也會充當「守夜人」。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他去世七年之後的一九九一年，克格勃參與了保守派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陰謀，政變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長期充當其副手的克留奇科夫。然而，這場政變不僅沒有拯救衰敗中的黨和國家，反倒讓克格勃與舊體制一同灰飛煙滅。羅伊·梅德維傑夫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安德羅波夫》一書中評論說：「克格勃的活動是反映蘇聯社會的歷史、成就和病症的一面特殊的鏡子，往往是一面形象扭曲的哈哈鏡。」當不可一世的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成為人人唾棄的階下囚的時候，克格勃和蘇共也就壽終正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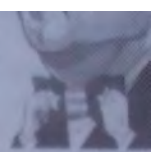
在同樣一面哈哈鏡中，出現了習近平醜陋的面龐。與安德羅波夫一樣，習近平也是一個偽裝的改革者與人們想像中的拯救者。在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改革」一詞出現了五十九次，某些人又開始熱情地憧憬和期盼了。然而，這些所謂的「改革」措施，並不涉及共產黨一黨獨裁體制的改革。英國《金融時報》在社論中指出：「在眾多改革舉措中，沒有一處提到加大政治參與，或者建立制衡制度，後者是對付腐敗猖獗的最有效方式。……在堅稱中國必須創建更具創新性的社會和經濟的同時，習近平領導的政府也在收緊對媒體、意識形態，尤其是中國活躍的互聯網的控制。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更多創新和更多思想控制——能否相容是成問題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也指出：「中共領導層的如意算盤似乎是，在進行經濟結構重組的時候，可以而且也必須壓制社會騷動甚至和平的異議。但鎮壓只能導致更多的不滿，而權力缺乏制衡將繼續拖累經濟。如果中共領導層有關中國前途的辯論衝破斯大林

式體制的秘密黑箱，展露於民主的陽光之下，中國或許會更有可能獲得真正的繁榮。」

安德羅波夫上臺伊始，便承諾反腐敗，因為民眾對勃列日涅夫時代官僚階層的腐敗已經怨聲載道。習近平與安德羅波夫一樣，也信誓旦旦地向人民承諾要「打老虎」，也確實將一群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關進了監獄。但是，他又將更多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公民關進監獄，說明他的反腐風暴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安德羅波夫在廉潔這個議題上無可指責，用阿爾巴托夫的說法，「他在當時的領導人中是以其對世俗功名富貴的冷漠以及在物質享受方面苛待家庭成員著稱的」。安德羅波夫的兒子在阿爾巴托夫領導的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了數年，是個月薪一百二十盧布的最普通的工作人員。有一次，兒子有了小孩以後，提出希望將兩居室換成三居室，安德羅波夫斷然拒絕。

與之相比，習近平的反腐「理不直氣不壯」。習近平家族擁有億萬家財，其財富膨脹的速度與習近平在官場上升遷的過程成正比。增加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公布了习近平、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等五位中共领导人家属的资料。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評論說：「中国人应该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因为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共这一盗贼型政权的本质，这份报告被中国当局在网上严厉封杀这一事实，还让世界再次了解到习近平反腐的『诚意』。」且不說習近平的親屬們富可敵國的財富，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質問習近平一個問題：你的女兒留學美國哈佛大學，昂貴的學費是從哪裡來的？以中共當局公佈的國家主席工資的數額，習近平負擔不起女兒在美國念書的費用。習近平的女兒與薄熙來的兒子留洋的費用，來源是相同的，都是不義之財。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與薄熙來是別無二致，這也說明中共比蘇共更加不堪。如果說當年安德羅波夫真心實意地信仰他所捍衛的意識形態，那麼今天習近平所捍衛的不過是一個「一榮



俱榮、一損俱損」的既得利益集團罷了——他自己也不相信他所宣揚的一切，否則為什麼將女兒送到美國去接受資本主義的「邪惡教育」呢？

安德羅波夫上臺時，身體已經垮掉了，他掙扎了兩年便去見馬克思了。真正的改革是到了戈爾巴喬夫掌權後才開啟。如今，身強力壯的習近平，憑藉其健壯的身體條件，或許可以勝任連續兩屆、長達十年的「中國教父」的職位——再加上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保駕護航」，他會以為這個位子能坐得穩穩當當。但是，正如鮑彤在評論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政治、軍事、反腐、思想、文化、網絡乃至所謂『社會治理』等更廣泛的領域中，習近平堅持而且周密地強化一黨領導、高度集權的原則。這個原則在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裡，大概可以確保領導者主觀戰鬥精神的亢揚，卻難免是千百萬民眾主動創新精神的摧殘者。」那麼，歷史會給習近平十年的漫長時間，任由他來浪費和揮霍嗎？

遠看是暴君，近看是小丑

一直以來，權力的部分神化都是俄國政治文化的信條之一，晚近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被視為聖人的沙皇畫像高掛在教堂裡。布爾什維克黨欣然樂意地採用了這個傳統，領導人的生活被包裝得極端神化。領導人類似法老的木乃伊，走路僵硬、不太微笑、保持緘默，目光定在空中某個點上。

——卡普欽斯基《帝國》

毛澤東自詡身上兼有「虎氣」與「猴氣」，即霸氣與痞氣。與毛相比，習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氣，多了一分猴氣。習近平上臺之後，一方面重判薄熙來，高調反腐敗，拉攏各方軍頭，恐嚇周邊國家，與美國「無聲較量」，命令空殼航母「遼寧號」巡航南海；另一方面嚴控媒體，偽造歷史，掃盪網絡，抓捕公民社會的活躍人士，發動意識形態的「保衛戰」。這些舉動就是向毛太祖看齊。在習近平眼裡，鄧小平不是名正言順的「毛二世」，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是不入流的「過渡者」，惟有他才具備做「毛二世」的願景和決心。

作為「一貫偉大，而又一貫平庸的獨裁者」的習近平的出現，放在世界其他獨裁國家的坐標中可以發現，不是偶然、也不是孤例。早已有一群與之臭味相投的同類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卡普欽斯基筆下的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赫塔·米勒筆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黨魁齊奧塞斯庫（《國王鞠躬，國王下臺》），

巴爾加斯·略薩筆下的多明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公羊的節日》），烏斯拉爾·彼特裡筆下的委內瑞拉獨裁者畢森特·戈麥斯（《獨裁者的葬禮》）……他們像是從同一個模子中造出來的、大小不一的「俄羅斯套娃」。半邊臉是暴君、半邊臉是小丑的習近平，與這些傢伙一樣怯懦、卑賤、虛偽和兇殘，也絕對有資格與他們並肩而立，分享他們的榮耀、輝煌、孤獨、焦慮以及窮途末路。

習近平就是翻版的海爾·塞拉西一世

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一書，是埃塞俄比亞末代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的「別傳」。所謂「別傳」，乃是與「正傳」相對而論。卡普欽斯基「所採訪的都是那些曾經在宮廷內室、皇帝身邊工作過的人」，這些人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述了關於皇帝的種種軼事，在此基礎上他寫成了一本「他者眼中的皇帝」。這本書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在英國、德國等國家洛陽紙貴。之後被改編成戲劇，一九八九年被搬上波蘭話劇舞臺，上演多次，觀者如堵。

那時的波蘭，光明與黑暗即將展開最後決戰。獨裁統治四十多年的共產黨政權，在團結工會的挑戰下搖搖欲墜。人們湧入戲院觀看《皇帝》，不是對埃塞俄比亞和海爾·塞拉西一世的歷史感興趣，他們在舞臺上看到的，其實是波蘭社會活生生的現實。

最偉大的畫家，都不是寫實主義的，畫一張跟照片一樣栩栩如生的畫，有多大價值呢？同樣道理，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是對現實生活簡單的臨摹和複製，而是將故事昇華成預言，照亮未來的道路。每一個頂級作家，其作品都是向聖經的《啟示錄》鞠躬致敬。在此意義上，卡普欽斯基筆下的「皇帝」只是一個象徵、一個符號，甚至它是不是指海爾·塞拉西一世都無關緊要。對許多在專制高壓下生活一輩子的波蘭人來說，埃塞俄比亞是個陌生的國家，但抽掉這個令人陌生的背景板，故事本身

卻是他們所熟悉的，甚至讓他們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幸的國家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皇帝》的簡體中文版於二零一一年在中國出版，亦成為習近平時代啟幕的一則預言——原來，習近平就是一個翻版的「皇帝」啊，他們的基因本是同源。

卡普欽斯基曾經作為波蘭派駐中國的記者，有過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生活的經驗，多少算是「知華派」。他在《皇帝》中有一處提及中國：「一般來說，埃塞俄比亞人很少對別人袒露心聲，他們會像中國人那樣保持沉默。」僅此一句就足夠了，韓寒不是說過「通往北韓的道路，是以人民的沈默鋪就的」嗎？在海爾·塞拉西一世統治的埃塞俄比亞：「即使最親近皇帝的報紙也不能大量印刷，因為這樣會培養更多人的閱讀習慣，他們由此就離思索更近了一步。眾所周知，思索會造成困惑、煩惱、麻煩和憂慮。換句話說，儘管所寫的文章可能是忠誠於皇帝的，但讀的人未必以忠誠之心去理解。」與之驚人地相似，習近平上臺之後，立即封網抓人，企圖造成「普天之下，道路以目」之局面。他發現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失敗，始於意識形態的失敗，故而先不惜一切代價鞏固這個「陣地」。

獨裁者大都很「勤政」，秦始皇每天批閱數百公斤竹簡，斯大林和毛澤東常常通宵不眠地工作。在卡普欽斯基筆下，海爾·塞拉西一世也是一個「好皇帝」：黎明即起，十分勤政；雖然沒上過學、也從不讀書、從來不寫任何東西，但他的頭腦「能儲存一切細節，甚至非常具體的資料」。他對財務一筆不苟，帝國超過十美元的每筆開支都得由他親自批准。然而，和所有深宮中孤獨的統治者一樣，他看到的世界是極不完整的：他每到一個省份，地方官都會精心準備，他看到的只是官員想讓他看到的東西。

這是一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悖論：一個精明的、擁有極大權力的統治者，卻從來不能、也無權知道自己統治下的真實情況。習近平也是如此——在新華社發表的長篇報導《十八大以來中央治國理政紀實》中，

習近平確實是「日理萬機」，他不是無所作為的「懶人」，從幕後的權力運作，到台前的親民秀，黨、政、軍一把抓，內政與外交兼顧，一點都不能馬虎。但是，在「皇帝的新裝」的既定模式中，習近平越是勤勤懇懇，對民眾越是貽害無窮。

對海爾·塞拉西一世來說，政權就意味著一切。他必須蠱惑人心，必須舉行各種儀式，大講經濟發展等問題。他還發展出一套嚴密的監控系統，「所有的居民不得不互相監督、互相刺探、互相猜疑。這其實就是一場變相的國內戰爭」。卡普欽斯基說，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物、睿智的政治家、悲劇性的父親，以及病態的守財奴。海爾·塞拉西一世赦免罪犯，又判無辜者死刑。經過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他在國內塑造了一種「處於無序邊緣的基本秩序」。

這也是習近平的理想：穩定壓倒一切！掌權就是勝利！對於改革，習近平既缺乏勇氣，也缺乏想像力。他清洗了掌管安全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卻不放棄強力維穩的路線。他將「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政法工作會議」，親自發表長篇講話，再三強調「政凌駕於法之上」、「黨權超越國家利益」的中心思想。穩定只能靠暴力來實現，用學者李偉東的話來說就是：「以每年發生十幾萬起群體事件的力度看，已經算是天下大亂了。但亂這件事，在中國是隱性的，因為處在一種高度彈壓狀態，稍稍有一點放鬆，這個亂就會發生。各種積怨太多了，又沒有發洩管道，所以就越來越用一種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革，最終就是火山爆發，玉石俱焚；然而，凡是有風險的事，習近平都不願做。習近平與海爾·塞拉西一世遵循相似的行為模式和治理邏輯，通過相似的博弈維持權力，最終權力也會以相似的方式消解。

當海爾·塞拉西一世被反叛的軍官帶出皇宮，要求乘坐一輛綠色的大眾汽車前往囚禁地時，他嘟嘟囔囔地說：「坐這種車？」這是當天清晨他唯一的反抗——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他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上了車。

卡普欽斯基準確地描繪了這個細節，這不是閑來之筆，它表明這個曾經的英雄和神王，有著怎樣卑瑣而低俗的靈魂，在那樣的時刻還在計較車輛的檔次。一年後，這頭八十三歲的「非洲雄獅」被宣告自然死亡——後來證明是被用枕頭悶死後砌入水泥牆裡。

關於習近平的下臺和死亡，人們當然可以有種種想像和預測，無論怎樣，可以堅信這一點：惡積禍盈的習近平，其命運不會比海爾·塞拉西一世好到哪裡去。

習近平就是翻版的齊奧塞斯庫

通過對比齊奧塞斯庫統治末期的羅馬尼亞和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中國，可以發現，它們具備了很多相似的特徵。尤其是在批量製作和灌輸謊言和炮製偶像崇拜上，習近平把齊奧塞斯庫當做良師益友。

習近平的語言是典型的毛式語言，這是一種奴隸的語言、流氓的語言、騙子的語言，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的話來說，是一種「臣僕的語言」。赫塔·米勒在《鏡中惡魔》一書中，分析了「臣僕的語言」是如何形成的：「意識形態的短語和套話令羅馬尼亞語失色很多，在二十年間這類短語和套話數不勝數。人們可以滔滔不絕、嘴開嘴閉地大聲說上幾個小時，而言之無物。」個人崇拜讓齊奧塞斯庫和他夫人成了羅馬尼亞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官員們講話的時候都得援引這對夫婦的「名言」。在官方媒體上，在公共場合，人們所說的話全都是「這個國家中最明顯的臣僕的語言」。這種語言內化為人性的一部分：「臣僕的語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和嘲諷。它要求大家都來反芻，它不要求有理想，它只要求自我鄙視和盲目重複，直到自己的思維能力被麻痹、萎縮和遺忘。」語言被毒化之後，道德也被毒化。然後，是人們失去反思的能力和反抗的意願，成為麻木不仁的、好死不如賴活的俘虜。

所以，即便齊奧塞斯庫政權垮臺、獨裁者夫婦雙雙死於非命，民眾仍

不能掙脫已經習慣了的腳鐐手铐——鐐铐成了肉體和精神的一部分，或者說是肉體和精神的延伸。推翻齊奧塞斯庫政權的革命發生兩個月後，羅馬尼亞作家丁內斯如是說：「如果四十年都沒有獨立報紙的存在，那語言和思維習慣是不可能在短短數周發生變化的。這就像若果人們給土著居民送去一個電視機，打開只能聽到『咕咕』的布穀鳥叫聲，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學會『咕咕』的叫聲。」自由的喪失可能在一夜之間，迅速而徹底；自由的尋回卻如同鵝行鴨步，緩慢而漫長。

一個有趣的例子近在眼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為失去薩達姆和卡扎菲的伊拉克和利比亞鳴不平說：「薩達姆死了，並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今，天天爆炸、襲擊、派教衝突。卡扎菲死了，利比亞人民幸福了嗎？如今，遍地廢墟，重建遙遙無期。」那麼，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的下場如此悲慘呢？《環球時報》認為，是因為他們的人民太愚昧，他們的人民沒有全心全意地愛戴領袖，沒有與領袖同生死、共存亡。因此，《環球時報》大力號召中國民眾擁護習近平、支持習近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我們擁護習主席，因為我們不想成為第二個利比亞。」言下之意是：卡扎菲的垮臺不是因為獨裁，而是因為獨裁得不夠；習近平必須更加獨裁，才能保住政權，才能讓老百姓「雨露均霑」。這樣的千古絕唱，未來一定會被收入《今文觀止》之中，從而傳誦萬代。

於是，羅馬尼亞人和中國人都異口同聲地「咕咕」叫——「齊奧塞斯庫是我們的救世主！」「習近平是我們的救世主！」不接受這套語言體系的人、不承認這一陳述是真理的人，必然被定義為不可饒恕的、必須投入監獄或驅逐出國的「國家的敵人」。習近平說，你們要把解決所有問題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殊不知，他和獨裁的共產黨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視察山東的時候，習近平特意跑到孔廟去尋求治國的智慧，他大概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傳說，偏偏忘記了毛澤東將「孔老二」視為敵人，他又如何「孔毛並用」呢？而《左傳》中有一句名言是說給

習近平聽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齊奧塞斯庫的統治給羅馬尼亞造成的最大傷害，不是政治的獨裁、經濟的停滯，而是人性的敗壞。在其統治之下，異端思想還未破土而出就被連根拔起，由於外部環境過於嚴酷，羅馬尼亞國內無法孕育生長出優秀的反抗者群體。舉國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齊奧塞斯庫」，像是孫悟空用一把猴毛變出的千軍萬馬，「平庸之惡」吞噬了大部分的百姓，赫塔·米勒哀傷地寫道：「我拒絕為安全局做間諜，這給我在工廠中沒有帶來朋友，而僅僅帶來敵人。我拒絕在學校裡講任何歌頌齊奧塞斯庫的詩，或是拒絕繳納工會會費，造成老師們不恨體制，而恨我。他們看見我繞道走，沒有人願意讓別人看到自己在與我交談。他們認為我瘋了，把我拒絕做的事當做是對他們的人身攻擊。這也是心理學：恨那個大聲說出自己偷偷想著的事情的人。」今天的中國何嘗又不是如此？對於那些挺身而出爭取自由的同胞遭遇到的迫害，大夥兒學會了視而不見；對於先行者承受的苦難，他們甚至抱以嘲諷和調笑。於是，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縮小版的「習近平」。

志大才疏、格調低劣的習近平，是一個自以為是英雄的小丑，也是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之一員。漢娜·阿倫特說：「我要揭露的不是所知道的行為及其結果，而是行惡者本身。」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了「絕對之惡」的概念，後來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中又發展出「平庸之惡」的概念。通過近距離觀察艾希曼這個罪惡滔天的劊子手和納粹黨徒，她發現艾希曼並非一個聰明絕頂的大奸大惡之徒，而是一名渾身上下籠罩著市儈氣的、如果隱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會被發現的小市民。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他之所以執行上級的殺人命令，除了對自己的晉身非常熱心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動機。漢娜·阿倫特評論說：「艾希曼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又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她進而揭示了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而且恐怕是所有官僚制度的性質，就是「把

第五章 夢醒時分：論獨裁黨之覆滅



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間的一隻單純齒輪」。習近平如果不是先成為一顆專制機器上平淡無奇的螺絲釘，又如何能登堂入室、飛黃騰達呢？

沒有哪個暴君會承認自己是小丑，但當權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時，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終暴露之時。那個時刻，離習近平還有多遠呢？

習近平為什麼要對王功權下毒手？

極權的敵人不是任何組織，是他自己的組織本身。如果還有，就是一個：一個不恐懼、不合作，拒絕按他們的規定生活的人。他們根本不需要組織，就知道彼此的存在，知道對方存在對自己的意義。除非瘋狂到極致，他們不可能把僅僅不恐懼、不合作、追求正常生活的人關進監獄，果然如此，也就要準備為它收屍了。

——王瑛

儘管王功權在資本市場名聲卓著，但在習近平眼中，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螞蟻。習近平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將王功權捏死——這是真的。王功權被拘捕之後，遭到密集審訊，甚至可能被施加非人酷刑，最終不得不「認罪」，這才獲得取保候審。中共媒體報導說：「王功權表示，他曾資助許志永並在自己的微博上推出了相關事件。他承認，自己已經觸犯了法律，而且法律是最底線的規則，自己資助和幫助傳播的行為，使得自己也成為了一名參與者。他表示，自己非常後悔，對不起孩子和家庭，以後會斷絕與許志永的來往。」與此同時，習近平正在仿效毛澤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姿勢，向「強有力的權威領袖」的方向大步邁進。兩者之間的勝與敗，似乎不言而喻。

有人說，王功權屈服了，認罪了，灰頭土臉了，身敗名裂了。但是，我要說，這場戰役並未定乾坤。蘇聯克格勃頭子貝利亞說，我們沒有拿

不到的供詞。但是，堆集如山的「供詞」，難道就能捍衛鐵桶的江山嗎？王功權沒有失敗，他已經在中國民主化的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毫無疑問，劉曉波和王功權屬於光明的未來，習近平則屬於黑暗的過去——南非的人權鬥士曼德拉坐了整整二十七年黑牢，終於百煉成鋼，成為當代世界人類精神向度的標杆；而那些逮捕他、審判他、折磨他、凌辱他的種族隔離政權的總統、將軍、法官和獄卒們，有誰紀念他們呢？

習近平向公民社會全面開戰

我與王功權僅有數面之緣。二零一二年秋，他在紐約請我吃地道的川菜，我們一起討論「新公民運動」的前景。我直言不諱地說出真實想法：「新公民運動」的內容稍嫌空泛，刻意「去政治化」，並未如《零八憲章》那樣對未來中國的國家建構、政府運作和社會格局作出具體的規劃與展望。況且，「新」的定義名不正言不順——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公民社會，既然沒有「舊」，何來「新」？

若以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為例，在告別共產主義體制之後，之所以迅速、和平地完成社會轉型，是這些國家具有源遠流長的公民社會傳統。捷克在被德國吞併及戰後共產化之前，有數十年共和國的歷史；波蘭則擁有歐洲歷史最為悠久的議會，以及成熟的聯邦體制。又以臺灣和香港為例，臺灣在日治時代就奠定了地方自治的模式，香港在英治時代留下了英式民主的遺產，這些都是公民社會的沃土與支援。與之相比，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幾乎是從一無所有中開始，故而「路漫漫其修遠兮」。

王功權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奪權者，不是陳勝、吳廣、朱元璋、洪秀全之流的「吾可取而代之」的人物。王功權的所言所行，比如公開批評官商勾結、製作「新公民運動」的各種標識、簽署有關民主憲政議題的聲明、甚至到抓捕良心犯的警局門口抗議，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生

活中如同家常便飯——美國的商人們，大都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批評政府更是樂此不疲的「業餘愛好」。但是，在中國，這就踩到了共產黨的「紅線」。不時質疑政府的地產大亨任志強有一個五六十人的企業家聚會，下午開會，上午被俞正聲找去。俞講了三句話，一是「你們再也不要支持王功權了」；第二句是「王功權是甚麼性質的問題呢？是拿錢支持反黨集團」。第三句是「無論王功權的企業本身有沒有毛病，這次我們都要把他搞下來」。

不是王功權害怕中共，而是中共害怕王功權。法學家蕭瀚在《紐約時報》中文網撰文指出：「官方表現出極大的恐懼，他們擔心像王功權這樣的商人給公民社會的生長與發展提供物質資助，擔心王功權所具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將影響一大批商人從此站起來，從而衝垮他們多年來依靠抽掉經濟來源苦心經營的反公民社會堤壩，於是，他們對王功權下手是完全符合邏輯的。」所以，對王功權的抓捕，是當局傳達給每一個「潛在的王功權」的紅色警報。

抓捕王功權，官方需要下比當初抓捕劉曉波還要大的決心。經過多年的封鎖與冷凍，劉曉波被捕時的影響力，僅僅局限於「一小撮」異議人士當中——至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影響力發酵若干倍，那是後話了；而王功權是常常在公共媒體上露面的商人，在企業家群體中享有良好的聲譽，對王功權下手必然引發更大的震動和連鎖反應。所以，抓捕王功權不是公安部長或政法委書記下的命令，必定經過習近平乃至政治局常委會的首肯。抓捕王功權，是習近平政權向正在迅猛發展的公民社會開戰的標誌性事件。公民社會強一分，中共的獨裁體制自然就弱一分，習近平不願坐視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於是，習近平悍然向王功權伸出毒手。

許志永、王功權被捕，是中國公民運動的頓挫。儘管如此，拓展公民社會是中國未來唯一的出路。一個只有奴才和暴民的社會不可能實現和平轉型。今日之中國，宛如魚游於鼎沸之中、燕棲于危巢之內，暴戾之氣，

上上下下衝撞與激蕩。官方日漸暴露出警察國家之真面目，結合錦衣衛、克格勃和蓋世太保的傳統，從現實世界到網絡之中，「保龍一族」無所不在；民間悲情與怨恨齊飛，楊佳與艾未未被奉為關公式的「武聖人」。夾在兩者中間的，正是許志永、王功權等理性、溫和、非暴力的主張者。許志永參與浙江錢雲會案的獨立調查工作，得出的結論與某些激進人士所期待的並不一致，立即就被唾沫淹沒，甚至被扣上官府走狗和五毛的帽子——他們的處境何其尷尬。

在此種情境之中，做孫文易，做梁啟超難；做楊佳和艾未未易，做劉曉波和王功權難。當滿清政權追殺梁啟超這樣的溫和派時，孫文就揭竿而起了；同樣，當中共政權抓捕劉曉波和王功權時，暴力革命的前景就昭然若揭了。

滿清和國民黨政府的崩潰都是因為以商人為敵

習近平雖然有一頂博士帽子，卻是名不副實的假博士。他腹中空空、不學無術，沒有讀過中國近代史——如果他對中國近代史稍稍瞭解一二，就不會貿然對王功權下手。因為，滿清和國民黨政府的崩潰，其重要原因都是以商人為敵。

晚清的中國，在列強面前屢戰屢敗，逐漸意識到船堅炮利背後是工業和商業的力量。於是，興辦招商局、電話局、開煤礦、修鐵路，催生了近代的商人階層。中國儒家傳統中對商人的蔑視，由此發生巨大翻轉。然而，商人與帝國之間的矛盾日漸尖銳：商人需要的是契約、法治、保護私有財產的政府等良好的外部環境，但帝國仍然把商人當作予取予奪的奴才——連你的身家性命都是我的，你的工廠、店鋪和土地當然也是我的。

小商人唯利是圖，大商人憂國憂民，官場的急劇腐敗與實業救國的願景漸行漸遠，使得本來抵觸革命的商人群體漸漸與革命合流。辛亥革

命是由新軍、會黨、基督徒和商人四大群體共同發動的。其中，商人提供的經濟資助至關重要。滿清的顯貴們以為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和玩弄商人，殊不知商人卻為他們挖掘了墳墓。中國商業史研究者吳比在《革命與生意》一書中，探討了辛亥革命中的商業與商人的命運：張靜江投資國民黨，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筆投資，可以說，沒有張靜江就沒有孫文與蔣介石；而李石曾無心插柳，資助一群熱血青年留學法國，卻在巴黎孕育了中國人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革命未嘗不是商人的一筆生意？

辛亥革命之後，有過一個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法國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一九一一至一九三七）》一書中指出：「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資產階級自覺地投身於社會活動，顯示出它有能力組建自己的代表協會，確定審議和協商程式，在整個市民社會基礎上建立自治機構。在實現經濟現代化這一目標上的廣泛的一致，體現出一種充滿活力的自發精神，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富有實效的成果。」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黃金時代的出現，居然是因為政府的無能和缺位。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像西方的政府那樣成為商業貿易和實業的支持者和推動者。

當國民黨的權力鞏固之後，便對民族資產階級展開壓制和歸併。國民黨政權腐敗不堪的官僚機構和國家主義的統制型經濟政策，使得本來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下落不明」。抗戰軍興，商人和企業家們基於民族大義，拋棄前嫌，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如盧作孚幫助東部工業之西遷功不可沒。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的腐敗不可遏止，經濟政策顧此失彼，致使城市經濟由蕭條而崩潰，國民黨政權因此喪失民心，進而失去政權。蔣介石因為得到江浙商人集團的支持，戰勝黨內黨外的挑戰者，成為獨一無二的領袖；蔣介石也因為失去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援，兵敗如山倒，其敗，非戰之罪也。

做徐明，還是做王功權？

毛時代，商人和企業家階層被掃蕩殆盡。鄧小平施行「修正主義」路線之後，才又出現商人和企業家群體。一九七九年，訪問中國的法國學者白吉爾，與身兼共產黨高級官員和資本家兩種似乎矛盾的身份的榮毅仁交談之後，發出先知般的預言：「國家與國家期望通過合作而加以利用的社會精英之間那種模稜兩可的關係，已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乍暖還寒的八十年代，民營企業新發於硯、步履蹣跚。「六四」屠殺之後經過短暫的頓挫，九十年代又絕處逢生。江澤民時代，民營企業的發展環境相對寬鬆，一時有佔據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勢頭；胡錦濤時代，又回頭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民營企業不能享受基本的國民待遇，像是忍辱偷生的私生子。到了習近平時代，低人權、高耗能、重污染的「中國模式」走到了盡頭，習近平遂惡向膽邊生，要拿民營企業開刀祭旗了。

最先感覺到陰風颼颼、不寒而慄的商人們，大多數選擇公開宣誓效忠：「聯想」的柳傳志刻意強調，企業家不要關心政治事務；「阿里巴巴」的馬雲高調讚揚，鄧小平「六四」殺人是艱難而正確的決定；差點混成共產黨中央委員的梁穩根，其「三一重工」儘管受到國企打壓，仍然甜言蜜語地說，我的財富全都是黨的。潘石屹在電視上結結巴巴地表示，微薄大V要有自律；王石遠赴哈佛遊學，暫避風頭；宗慶后遭神秘襲擊，其女兒接受訪問時說，考慮將資產外移。

看似多種選擇，擺在商人們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如同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猶豫不決的丹麥王子的天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中國商人也無法回避此一追問「做徐明，還是做王功權」？

在審判薄熙來的世紀大戲中，同為階下囚的徐明，出庭作證的時候，仍然在薄熙來面前抬不起頭。薄熙來連珠炮式的追問，讓徐明難以招架。這就是「一日為奴，終身為奴」的烙印。在薄熙來眼裏，徐明是奴才，是他私人的錢袋子，哪配得上當「污點證人」？而徐明從溫家投向薄家，



早就犯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大忌，縱然乘坐私人飛機來來去去，也不過是主人「倡優蓄之」的管家而已。

同樣是失去自由，徐明跌入地獄的最底層，不再有翻身的機會。王功權則以失去自由的代價，成為中國心靈最自由的商人。商業史研究者吳比感歎說，商人的腰永遠是彎的，向時代，向權力，也向逝去的流風與回雪。然而，王功權的腰卻挺起來，如蕭瀚所說：「無論王功權事件最終結果如何，他將不僅通過身陷囹圄為自己獲得自由，也為當代中國商人指出了一條直立行走的新道路。」我相信，還會有更多商人效仿王功權，不僅為自己、為下一代，也為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作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臨終前的疑問「這個世界會變好嗎」，也許要由商人群體作出擲地有聲的回答。

一九六一年，胡適手書楊萬里的詩《桂源鋪》，送給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的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今天，我也把這首詩送給獄中的王功權。為民主自由而風雨兼程的雷震已名垂青史，草菅人命的獨夫民賊蔣介石則臭不可聞；同樣的道理，當王功權和許志永再度攜手、引領中國社會走向光明而公義之時，亦是習近平的喪鐘響起之日。

「康師傅」下架，暴力維穩不改

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奸偽斯熾，
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何恃！

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

「康師傅下架」的消息，從中共十八之後盛傳了一年多，終於剝繭抽絲、水落石出了一部分。「政法沙皇」周永康坐享金山銀山、安度晚年的美夢成了泡影，中共內部自江澤民時代形成的「刑不上常委」的默契被打破——但這並不能說明中共在民主化上有絲毫的進步。

習近平搞掉周永康，比金正恩搞掉張成澤困難多了——張成澤瞬間被「犬決」、屍骨無存；習近平搞掉周永康，卻比馬英九搞掉王金平容易多了——王金平仍然保有國民黨黨籍和國會議長身份，馬英九只能望洋興歎。所以，習近平不要做馬英九，而要學金三世。

從常識出發就能窺破酷吏的真面目

周永康絕對不是當上常委以後才變成壞人的。我是第一個公開揭露周永康的人——早在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就在香港《開放》雜誌撰文披露，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打壓新聞自由和屠殺藏人的種種惡行。該文名為《四川官僚的冷血》，收入我後來由開放雜誌社出版的《拒絕謊言》一書。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日，《成都商報》刊登了記者陳清撰寫的蓬溪縣縣委副書記趙從容駕車撞死百姓逃逸報道。在這篇報道上方，是名為《省委書記領跑新世紀》的官樣文章，周永康領跑元旦越野跑的大幅照片赫然在目。周永康看到報紙後勃然大怒，當即給省委宣傳部寫信，指示處理這一「越軌」事件。在其批示中，有這樣一句話：「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裡，也不會有如此給政府抹黑的新聞自由。」於是，記者陳清被毫不留情地掃地出門。

我在文章的最後評論說：「四川是西部第一大省，它的第一把手周永康，在諸多封疆大吏中地位突出，據說有望成為下一屆中央政府的副總理。然而，這樣一名高級領導人，就其精神結構和價值立場來看，依然還停留在遠古專制社會。」雖然那時我並未料到周永康很快升任公安部長、政治局委員乃至分管政法口的常委，但此人的兇狠殘暴已初露端倪。

我也是較早撰文批評薄熙來的獨立知識分子。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寫了《薄熙來的神話》一文，後來也收入《拒絕謊言》一書。我揭露表現了在大連市長任上偽造的種種政績，嘲諷薄熙來到北大演講時北大學子眾星捧月的醜態。那時，我以直覺判斷，薄熙來絕非善類。

跟周永康一道垮臺的李東生，我也是第一個對其公開點名批評。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我撰寫《抓住「冰點」事件的幕後黑手李東生》一文，後收入香港田園書局出版的《致帝國的悼詞》一書。李東生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親自強迫《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停刊。

我在文章中考證了李東生的飛黃騰達之路：「李東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歷頗值玩味，其人生軌跡比之《紅與黑》的主人公于連更為曲折：七十年代初，因一表人才被選為黨主席華國鋒家中的警衛。這個聰明伶俐的小夥子利用業餘時間自學攝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被領導看中，兼作攝影師。……雖然不久華主席垮臺了，小李子卻謀得到中央電視臺當記者的美差。」之後，李東生一路攀升，成了中宣部手拿剪刀的高級新聞審查官。我呼籲人們記錄下此人的惡行：「每一個媒體被處罰、

每一本書被查禁，各個環節的作惡者究竟是哪些人，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都要被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抓住李東生的黑手，抓住更多的黑手，從此刻做起。」那時，我也沒有料到李東生日後會為周永康拉皮條，成了周的高級馬仔，進而從宣傳口調任公安部門，從新聞自由的殺手成了在鎮壓異己第一線的劊子手。

沒過多少年，這群酷吏一個接一個地自我引爆了。有朋友問我，你怎麼能預見到他們可恥的下場？我回答說：我不是先知，我並沒有先見之明，我只是從常識出發，判斷中共政權以及為之服務的每一個幫凶的邪惡程度。「六四」屠殺之後，這個政權當中不再有青天，而盛產暴君與酷吏。我不會像某些異議團體和人士那樣，只反某個暴君而不反整個體制，在溫家寶上臺時對其熱情讚美，在習近平登基時對其山呼萬歲，仍然是奴性入骨、人格殘缺。在我看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暴君，周恩來、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等奸相，羅瑞卿、康生、周永康、孟建柱等酷吏，乃是一丘之貉。醬缸之中，豈有香餠餠？

哪一個特務頭子最後有好下場？

當時，我的批評文章「出口轉內銷」，心胸狹窄的周永康看到後對我恨之人骨。我每次回老家，四川當局必定派遣特務跟蹤、騷擾，就連在成都請我吃飯的友人，很多都被當地國保約談，國保恐嚇他們不得繼續跟我來往。

有朋友對我說，既然四川是你的老家，周永康在四川是一個頗指氣使的土皇帝，你又何必得罪他？識時務者為俊傑，人家《南方週末》從不批評廣東本省的事務，才能生存下來。我回答說，說真話是我一生不會放棄的使命，如果事事都考慮利益得失，又何必選擇做一個獨立知識分子，乾脆跟我的某些大學同學那樣，去當「南書房行走」得了。

物換星移，數年之後，周永康成了黨國領導人，由荼毒四川進而荼

毒全國。他是中國的蓋世太保頭子，統帥數百萬武警和警察，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生殺予奪、隨心所欲。而我依然是一介書生，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裡有半點的安全可言？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頭套綁架到北京郊區的一個秘密地點，徹夜施加酷刑，幾乎被凌虐致死。審問我的那個秘密警察頭子唾沫橫飛地宣稱：「最高當局已經制訂了一張兩百人的名單，一聲令下，一夜之間就可以把你們統統活埋。」那次事件，是胡溫默許、周永康下令、李東生策劃的。

那一次對壘，周永康似乎呼風喚雨、大獲全勝；而我似乎螻蟻撼樹、命懸一線。再以後，我攜全家從中國出走，在自由的美國繼續著述，一邊寫成批評中共政權魁首胡錦濤、習近平的評論集，曝光中共統治的核心究竟有多麼黑暗；一邊為亦師亦友的劉曉波作傳，並研究英美的清教徒傳統與宗教信仰自由，為未來的中國尋求一條光明之路。

如今，周永康成了習近平上臺後樹立權威的祭品，失去自由、承受羞辱、癱若爛泥；而我在美國享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暢快淋漓地「我手寫我心」，一年寫作上百萬字，像投槍和匕首一樣扔向中共。我與周永康的境遇，可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今中外，那些作惡多端的特務頭子從來都沒有好下場。古代中國有執掌錦衣衛、東西廠的太監魏忠賢被新皇帝崇禎賜死在流放途中，德國有黨衛軍頭目希姆萊在被捕後咬破牙齒中藏的毒膠囊自盡，蘇聯有克格勃頭子貝利亞被同僚推翻並秘密槍決。當他們死去時，淒淒惶惶，滿身屎尿，毫無尊嚴，比一隻蟑螂還不如。

周永康、薄熙來、王立軍、李東生們不會料到自己會有哀哭切齒的這一天。明代戲劇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寫道：「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聖經中說：「有權勢的人如火絨，他的工作如火星，都要一同焚毀，無人撲滅。」這個結局其實早已註定。我唯一感興趣的細節是

這些曾經權勢熏天、不可一世的人物，在秦城監獄再度聚首時，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起打一圈麻將，還是怒目而視、拳打腳踢、咬作一團？

與公民社會為敵就是自掘墳墓

不過，周永康的倒掉，並不意味著中共的獨裁體制就會發生逆轉。周永康被「請君入甕」，也並不能消除民眾對中共的腐敗和苛政的痛恨。因為，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實行的，是沒有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在政法和安全系統實行的，是沒有周永康的「暴力維穩」。習近平執政之後，抓人、關人、打人、殺人，比之胡溫時代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剛剛進入二零一四年，習近平就殺氣騰騰地露出「刀把子」：許志永等倡導的「新公民運動」遭到比五年前劉曉波倡導的「零八憲章運動」更為嚴酷的打壓。昔日，面對提出具體的民主化綱領的「零八憲章運動」，謹小慎微的胡錦濤只下令抓捕劉曉波一個人，採取所謂「擒賊先擒王」的策略，盡量避免事態擴大，而並未將所有的參與簽名者斬盡殺絕；如今，面對立場更加溫和的、甚至標榜「非政治性」和「非對抗性」的「新公民運動」，心狠手辣的習近平卻張開密不透風的羅網，先後在全國各地抓捕數十人，廣泛使用酷刑、羞辱和連坐手段，頗有毛澤東當年「寧可錯殺千人，不可放過一個」的氣勢洶洶。

對「新公民運動」的鎮壓，意味著中共當局單方面關閉了與民間社會對話和協商的管道。當民間溫和派全軍覆沒之後，激進的反抗力量將風起雲湧。劉曉波和許志永被關進了監獄，殺雞儆猴的伎倆已經不能奏效，已經甦醒的公民社會不會就此俯首貼耳。在未來的某個時間節點上，無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中國人，將像「二次革命」中的烏克蘭的民眾那樣，走上街頭與國家暴力機器直接對壘，並奪取輝煌的勝利。烏克蘭人民走上街頭，並不是因為餐桌上沒有麵包了，而是顯示出他們脫離專制的東方（俄國）而融入自由的西方（歐盟）的勇氣和決心。

此種勇氣和決心必然重現於中國民眾身上。

從夏俊峰案到薛福順案，中國民間社會的憤怒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民間關注組」從全國各地奔赴那些不公義的事件發生的地方，讓當地的維穩力量窮於應付。越來越多的民眾戰勝了恐懼，正如有網友所說：「一個人站出來他們把你抓走暴打一頓；十個人站出來他們把你關押；一百人站出來他們只能買張火車票把你送走還管飯；一千人站出來他們開始卻步觀望；一萬人站出來他們就會默默地褪去制服加入你。」而習近平渾然不知活火山即將爆發。周永康的接班人、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稱頌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是指導新形勢下政法工作的綱領性文獻」。孟建柱總結習近平的新觀點為「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一夜之間，中國似乎回到奧威爾筆下那陰鬱肅殺的「一九八四」。學者冉雲飛在推特上諷刺說：「一九八四的加強版來了：戰爭即和平，奴役即自由，無知即力量，維穩即維權，等額即選舉。」孟建柱說的當然不是他的個人看法，而是對習近平講話的引伸，他就是要做新一代的酷吏。既然習近平一心要學習毛澤東，他的身邊哪裡少得了康生式的人物呢？

沒有酷吏，獨裁者就無法威嚇萬民；沒有獨裁者，酷吏就沒有服侍的對象。每個獨裁者與他們重用的酷吏，都如同學生兄弟一般，心有靈犀、翩翩起舞。習近平和周永康都是自由的敵人，他們之間的纏鬥並無是非善惡可言——就像毛澤東與林彪的翻臉，不過是狗咬狗。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沃爾科戈諾夫指出：「斯大林在不斷滿足但又無法徹底滿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時，犯下了史無前例的反對自由的罪行：他不讓人們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歷史的深淵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同樣的深淺，但是死者跌落的回聲必定成為善或惡的呼喚和證明。薄熙來如是，周永康如是，江澤民如是，胡錦濤如是，溫家寶如是，習近平亦如是。

附 錄

做一個持自己政見的公民

——余杰、陳小平對話錄

陳小平：一九八五年北大學潮風雲人物，「八九」民運時中國政法大學的「三劍客」之一。六四屠殺之後被捕入獄，後流亡美國。北大和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憲法學專家。

陳小平：恭喜你成為第一個獲得西方大獎——「公民勇氣獎」——的華人。中國很多人都知道索爾仁尼琴，但不知道這個獎是他倡議建立的。據我瞭解，這個獎是給「在冷血和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公民顯示出來的非暴力勇氣。相對於戰爭時表現出來的勇氣，授予該獎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人類良知英雄的關注，特別是倡導在良好社會中的公民勇氣。」這樣看來，這個獎不是獎給作家的，也不是獎給人權活動家的。為什麼這個獎會落在你的頭上呢？

余杰：公民勇氣獎是受英國思想家柏克的啟發而設立的，柏克說過：「惡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地作惡，原因就是好人都保持沉默。」設立該獎的特雷恩先生是美國資深的投資家和作家，當年蘇俄作家索爾仁尼琴流亡美國時，得到了特雷恩的諸多幫助，他們結為莫逆之交。後來，他們一起設立了這個獎。在索爾仁尼琴去世前幾年，還親自擔任董事會的成

員，參與評選工作。這個獎曾經頒發給北韓、古巴、俄羅斯等許多獨裁國家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知識份子和活動家。對我來說，這個獎的意義和價值高於純文學的獎項。

就在我們全家去紐約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四歲半的兒子小光益問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到美國後，很喜歡美國的幼稚園，因為幼稚園的老師敞開讓他們玩耍，而不像中國的幼稚園那樣，小朋友得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他在幼稚園裡認識了好多朋友，其中一個好朋友的爸爸是消防員。所以，消防員是他心目中最勇敢的人，他的夢想就是長大了以後當消防員，幫助別人救火。當他得知我獲獎的事情之後，就好奇地問我：「爸爸，你天天在電腦前寫作，又沒有去救火，你又不勇敢，為什麼你會得到這個勇敢的獎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兒子的問題。我想，也許要等兒子長大以後，我才能把我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包括我們全家為什麼離開中國而來到美國。那個時候，他也許就能理解，在中國，當一個說真話的作家，確實需要勇氣，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

為了說真話，我付出了「一畢業就失業」的代價，沒有工作過一天，沒有拿過「公家」單位一分錢的薪水；為了說真話，我的著作被查禁，甚至被焚燒，還連累妻子多次失去工作；為了說真話，我被中共當局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到昏死過去，毆打我的秘密警察（國保）揚言說：「你的文章對黨國的危害甚於一支軍隊，只要上級下令，我們馬上將你活埋。」

在美國，批評總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媒體上每天都是各種各樣責罵總統的報導和評論，政府官員本來就是給公眾指指點點、冷嘲熱諷的，如果受不了，就不要擔任公職；但是，在中國，政府官員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批評了溫家寶和胡錦濤，幾乎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民眾包括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都將我看作是「不可救藥的傻瓜」或「害群之馬」，你為什麼偏要去招惹老

虎呢？你寫文章為何不含蓄一點呢？被老虎咬，還不是你自找的？活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奴在心者」的想法。其實，我所做的，不就是踐行公民的基本權利嗎？這個國家太需要現代公民意識了。我們的公民權利，不是靠某個青天大老爺大發善心賞賜給我們，而是要靠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去爭取。在爭取的過程中，當然需要付出代價，當然需要勇氣的支撐。

做一個說真話的作家，是我從少年時代起就作出的選擇，走到今天，我絕不後悔。當然，正如劉曉波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那樣，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文字獄的受害者，我也期盼著，在未來自由民主的中國，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作家，都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都能自由自在地說真話，而不是以「莫言」來自保。

另外，設立公民勇氣獎的特雷恩基金會，是美國的一個保守主義立場的基金會，他們的理念偏向於柏克的傳統，即強調個人主義、公民責任感、反對大政府和福利國家的古典自由主義。在中國具有批判性的知識份子群體中，大部分都持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而少有英美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我想，他們將這個獎項頒發給我，不僅因為我以公民的勇氣對抗中共暴政，還因為我的作品和思想中一以貫之的是英美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理念。

陳小平：你從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一九九八年文學類「十大好書」之一；還研究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有數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小說和學術著作。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稱你為文化學者。但自二零零零年北大中文系畢業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幹了一天就被失業後，你的文章好像就不那麼文學和文化了。例如，你最近這些年的作品，如《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劉曉波傳》，你能說這種變化如何發生的？是不是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如果沒有「被失業」事件，你今天在哪裡？現在在做什麼？你會寫這些作品嗎？

余杰：這些年來，我日漸遠離「狹義的「文學」領域。我的寫作始終有三支筆：第一，是抒情的、柔和的散文和小說，如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香草山》；第二，是嚴謹的、冷靜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如研究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知識份子精神變遷的學術論文集《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份子的心靈史》；第三，是銳利的、激情的政治評論，如你提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和《河蟹大帝胡錦濤》等直接點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名字的政治評論集。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是多面手，有不可歸類的豐富性。在寫作中，我願意嘗試不同的文體、不同的領域，接受各式各樣的挑戰。

最近這幾年來，政論變成我寫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我的八成以上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寫作政論。這是我個人的生存處境和中國的大環境的雙重影響。

從個人境遇而言，二零零零年，我碩士一畢業就失業，當時是中宣部長丁關根直接打電話給我要去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命令他們單方面撕毀跟我簽訂的工作合同。於是，我還沒有去報到，他們就告訴我說，你不要來了。當時，對我造成了相當的壓力和衝擊。後來，我逐漸適應了當一名自食其力的「不自由撰稿人」，完全靠寫作維持生活。二零零五年左右，當我在國內的發表和出版空間被完全剝奪之後，又轉戰海外媒體，文章大部分在港臺和北美的報刊和網站發表。

十多年之後，回頭想想，正因為我身處體制之外，才與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聯接上，才不受名利、職稱的束縛，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如果當時我真的進了現代文學館，儘管不會從根本上轉變立場，但單位會給我安排一些無關痛癢的、也許我並不喜歡的研究題目，將我拖累和限制在官方的學術體系之中，慢慢消磨我的鬥志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我未必不會像如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體制內學者那樣，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拿一些不痛不癢的學問來敷衍塞責，漠視民間疾苦，回避社會公義。如果這樣看的話，那次由於強權的干預而失去工作，堪稱「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我曾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與丁關根相遇，我會主動跟他打招呼，「感謝」他打出的那個電話。不過，「盯緊、關緊、跟緊」的丁關根在二零一二年死掉了，我沒有機會向他表達「謝意」了。

其次，從中國的社會背景看，這幾年大環境越來越惡劣，法治倒退、腐敗橫行、道德墮落，身邊的朋友一個個因言獲罪進監獄，在這種外部環境下，我能安靜平和地研究歷史或寫作純文學嗎？當你身邊的朋友受到暴政的戕害時，你能保持沉默嗎？我只能不斷地發出聲音來。

為了發出聲音來，我就必須對原有的知識結構作很大調整。我發現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置存在嚴重問題，即便是在北大中文系，念書念到碩士、博士，卻不具備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方面的常識。北大中文系是左派的搖籃，新左派、老左派、毛派，無奇不有，甚至還有孔慶東這樣的「三媽教授」。博士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常識，只能說明教育的失敗。這些年來，我天天都在「惡補」，比如，我閱讀的書籍，純文學的少了，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學科的多了。我離開文學越來越遠，越來越不關心被閹割的中國當代文學，也很少寫純文學性的作品。我寫的更多的，是魯迅所說的「匕首」、「投槍」式的作品。

我也直接點名批評中共最高領導人，從毛、鄧、江、胡以下，個個都不放過。這也讓我在國內的生存處境愈發惡化，警察的騷擾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德國那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他人生活》中作為主人公的作家的生活。在官方眼中，我與他們的對立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雖然我不把他們當敵人，但他們不由分說地將我當敵人。他們擁有數百萬軍警憲特，還怕什麼呢？我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罷了。他們容不下像我和劉曉波這樣的拿筆的人，到頭來跟他們對壘的就會是那些拿刀拿槍的人了。

陳小平：在來到美國之前，你從書房走出，廣泛介入中國大陸的各種人權活動，你自己也說，你是「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最近十

年以來，劉曉波所從事的人權活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你還是一個廣泛社會議題的時政批評家，這是不是意味著，你還把自己當作定位於一個公共知識份子？或者你自己說的「異議知識份子」？

余杰：這十多年來，劉曉波從事的絕大多數的人權活動，我都有參與。另外，我還從事諸多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

我更願意用「持自己政見者」這個自我定位。因為，所謂「異議分子」，「異」從何而來？其標準就是當局的立場，跟當局的立場不一樣，才是「異議」。但我從不以官方的立場為標準，跟官方一樣或不一樣，對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在每個問題上都發出獨立的、真實的聲音來。我不認為我的每個觀點、每篇文章都是正確的，但這些文章和觀點都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不會隱瞞任何觀點，即便某個觀點讓我成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這也是我從劉曉波身上學到的最大的優點之一。他從來都是直來直往，不會用文章去討好誰，明知一些觀點會觸犯眾怒，他仍然會「我口說我心」地表達出來，比如「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哪個世故的知識份子敢說出來呢？

至於「公共知識份子」，這個詞語在中國已經變成了貶義詞，因為很多「公共知識份子」都成為官的幫忙和幫閒、商的幫忙和幫閒以及大眾的幫忙和幫閒。我承認自己具有相當的公共性，但我對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將公共認同作為目標來追求保持警惕。換言之，我要讓自己處於某種「隔離」狀態，才不至於被「民意」左右。不當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閒容易，不當大眾的幫忙和幫閒難。如今，中國的民粹主義思潮逐漸興起，這是我深以為警惕的。

這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當我受到當局的殘酷迫害的時候，我原來的老師和同學，幾乎沒有人願意跟我保持聯繫和來往，他們不願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我理解他們的苦衷和擔心。很多同學都當上了政府官員、媒體負責人、大學教授，算是這個社會裡的「成功人士」。而我呢？用

使徒保羅的話來說，是「渣滓中的渣滓」。昔日在宿舍裡慷慨議論天下事的青春時代，一去不復返。我跟他們已然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但是，這種孤獨並不能阻止我往前走。這是我命定要走的路。用陳獨秀的話來說，是做「終身的反對派」。這就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的使命所在。

陳小平：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你說你追隨劉曉波走上了一條少有人走的異議知識份子道路，這起碼是你畢業離開北大之後發生的人生故事；而在這之前，你已經被錢理群教授說成是「精神界戰士」了，與「異議知識份子」有了神通。在中國高校，雖然北大一直生產各種反體制的「精神界戰士」，但畢竟鳳毛麟角，也許北大是你成為「精神界戰士」的催化劑之一，但我想北大肯定不是唯一原因，還有其它原因嗎？

余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共同的情結：「六四」。雖然我比「六四」那代學生年輕好幾歲，「六四」的時候我才初中畢業，身在成都郊區的小縣城，並沒有親身參與這場民主運動，但「六四」確實成為我的「成年禮」。我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晚上都悄悄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廣播，知道了屠殺的真相。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北大，承接北大民主自由的傳統。那是我精神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我們那個小縣城裡，每年差不多一千名高中畢業生參加高考的，大約只有一兩個人能考上北大。我成了其中的幸運兒。然而，當我一九九二年考入北大的時候，卻發現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北大陷入政治高壓與經濟誘惑雙重壓力之下，偌大的校園，幾乎安放不下一張書桌。

那時，在北大的課堂上很難聽到真知灼見，敢言的教授要麼被趕下講臺，要麼變得謹言慎行。不過，我找到了一處世外桃源：那就是北大圖書館的「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小小的閱覽室，平常很少有人來看書，也許大家都不願讀豎排版的繁體字吧。我卻在裡面找到若干禁書，如臺灣早期黨外運動的歷史、台港學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全新敘述等等，

讓我豁然開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也由此建立。

然後，我就開始了寫作，這些作品我名之曰「抽屜文學」，我知道它們難於發表，只能被鎖進抽屜。我自己編輯和復印了少許出來，在師友之間傳播，後來越傳越廣。幸運的是，經過錢理群教授的推薦，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出版問世，並被視為八十年代民主自由思想在九十年代薪火相傳的標誌。可以說，我的成名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本書安慰了許多在黑暗中求索的年輕人的心靈。那時，一年間我就收到了幾千封的讀者來信。

《火與冰》是一本隨想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以片段式的文體來表達的，當時是受到尼采的《權力意志》、巴斯卡的《思想錄》和《世說新語》的啟發。長的片段，可以長到兩三千字，可以獨立成為一篇文章；短的片段，也就一兩百字，當然以短的居多。當今天推特、臉書和微博成為人們喜愛的交流工具乃至形成一種獨特的輿論力量的時候，我才恍然發現，十多年前，我不就在嘗試這種推特體和微博體的表達嗎？

陳小平：翻看你的作品目錄，自二零零八年《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開始，你的作品內容開始「宗教化」，這似乎是你繼二零零零年成為獨立作家之後的又一個轉型，為什麼你的生活和作品裡會出現主耶穌呢？

余杰：我是在二零零三年聖誕前夕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需求。因為民主自由無法成為一種終極性的信仰，我看到許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最終傷痕累累，甚至跟他們反對的對象「精神同構」，用一句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用共產黨的方式來反對共產黨」，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結果。

二零零一年，當我妻子成為基督徒之後，在我家中有了一個小小的查經班，最初只有六個人，三對夫婦，這就是後來方舟教會的雛形。那時，

雖然我還不是基督徒，但出於對妻子的愛，很支持這個活動，作為主人，也積極為大家端茶遞水。這是一個學習謙卑的過程，學習愛身邊的活生生的人並且為他們服務的過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以知識份子的方式在文章中表達對遠方的人的抽象的愛。經過這個過程之後，上帝讓我謙卑順服、認罪悔改，並揀選了我這個罪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在其中有過很多的掙扎和反復。也許，未來我會寫一本關於自己的信仰之旅的書，跟大家分享這段心路歷程，用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作見證」。

基督信仰是愛與公義平衡的信仰，很多華人教會在真理的理解上有偏差，只講愛不講公義，讓基督信仰失去了它的批評性和活力。對我來說，有了基督信仰，我更有了挑戰黑暗和傳播光明的勇氣，對受苦者的愛和憐憫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批判也更加尖銳和鋒利。我記得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曾在一篇文章中評論說：「當代三位名馳兩岸以至海外華區的余姓才人，余光中教授於人權法治較佳的港臺數十年，不會有足夠表現『大勇』的機會。余秋雨暴得大名，剛愎傲滿，錯過了許多『自勝者強』、表現大勇的機會。唯有最年輕的余杰，英銳剛正，斥奸邪，罵暴君，不只表現對國族文化最真摯深沉的大愛，更從基督教的終極關懷與超越價值中，取得精神資源，表現了『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的大勇。」他對我的評價，我擔當不起。不過，基督信仰對我的生命和寫作確實極其重要，是「點石成金」的意義。

基督信仰也讓我的學術思路進入一片新天新地。我重讀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進而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出路。如今，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呈現爆炸性增長的趨勢，為基督教兩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家庭教會，是中國最大的 NGO 組織，他們以一種新的生活模式昭示了中國的未來的路向。中國如同一艘大船，正處在驚濤駭浪的「出三峽」的過程之中，基本價值的缺席如同大船沒有指南針一樣危險；所以，我認為，信仰重建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前提和保障。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基督信仰、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主義

的價值觀。我最近的幾本書中都有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種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思考。

就道德倫理層面而言，中國目前的道德沉淪堪稱兩千年之最低點，比如醫生和教師這兩種人的基本職業倫理的全然喪失，讓中國如同人間地獄。另一方面，許多反對權力的「鬥士」罔顧道德倫理準則，甚至以挑戰基本道德倫理為榮，如艾未未之流，集體淫亂、包養二奶、有私生子，且目空一切、自以為神，在個人品質的層面跟他們反對的貪官並無二致。這是非常可怕的一種現象。但是，這個群體中的許多人，因為有反對共產黨的光榮，別人不敢對他們有所批評。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讓人警醒的事實：中國的變革不僅是制度的變革，更是文化和精神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宗教信仰約束氾濫的個人欲望，來重建一個有秩序、有公義、有慈愛的社會。

陳小平：有一種看法是，你盯住溫家寶不放，說溫為「影帝」，放過鉗制輿論的李長春和破壞法制、鐵腕鎮壓異見人士、維權民眾和信仰團體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搞不懂你到底為誰鼓勁，為誰出力。你如何回應這種批評呢？

余杰：這樣的思路是荒唐的甚至危險的，這是一種「權力中心主義」的思路，將知識份子對權力的批判誤解成對權力的謀求。對我來說，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第一位的，我批評誰，或不批評誰，跟權力無關，這是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作為知識份子，作為基督徒，我考慮的中心議題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我從不考慮我的批評能在權力運作中扮演何種角色。

某些自以為可以影響權力運作的人，常常異想天開地說，他們批評某些黨內保守派，支援某些黨內改革派，這樣就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了。且不說共產黨內不存在所謂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分野，在我看來，一九八九年之後，黨內改革派便全軍覆沒，從此黨內只有既得利益階層，而不再

有黨內改革派，少數有改革傾向的黨內人士都是早已退休、失去權力的老人，如李銳等人；即便存在一個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干卿何事？知識份子應當從事社會批判、理論建設等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天天夢想如何與權力結盟。

具體到對溫家寶的評價，首先，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作為一個公民就不能批評溫家寶呢？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能享受外在於批評的權利，即便是真正的、行動上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也是可以批評的，何況溫這個口頭上的改革派？

溫家寶家族擁有巨額財富的事實被《紐約時報》曝光之後，包括擔任中國人權主席多年的劉青和當年「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都認為，溫是否貪腐不是最重要的，溫畢竟是體制內口頭支持政改的「好人」，體制內還有更為邪惡的勢力，應當團結溫這支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對付更邪惡的集團。他們的看法讓我莫名驚詫：難道策略的考量比事實更重要嗎？

由此，我聯想到北京的計程車司機，他們天天都在高談闊論中南海的秘密，好像剛剛參加完政治局會議一樣。然而，他們卻連讓每月被迫交給公司的「份錢」降低一百塊都做不到或不敢去做。於是，他們只好去關心那些「遠在天邊」的事情，聊以自慰。這是一個多大的諷刺啊。這個例子說明，權力對中國人的異化到了何種地步。

其次，我對胡溫的批評，難道就意味著對周永康、李長春、薄熙來的支持嗎？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余世存所說的「類人孩」的思路，讓人哭笑不得。

在十多年以前，當薄熙來還是大連市長、周永康還是四川省委書記的時候，我就在香港媒體撰文揭露他們的種種惡行。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蔡詠梅女士說，我對周永康的批評，是她看到的最早批評周永康的文字。當周永康成為政法系統頭子之後，我對他的批評更多。可以說，我對共產黨政權的批判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從毛澤東、周恩來、鄧小

平到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一個也不放過。那些溫家寶的粉絲說我批評溫家寶是幫助周永康，何其可笑。這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在中國，公民人格的形成尚任重而道遠。

我認為，中共已經蛻變成鐵板一塊既得利益集團，其內部不存在變革的力量和健康的部分，所以我批評中共所有的當權者。當然，你可以選擇支持和迷信溫家寶，這是你的權利，但你不能惡意地看待對溫家寶的批評，你不能去剝奪別人批評溫家寶的言論自由。我在香港出版《影帝》一書的時候，居然有所謂的開明派人士打電話給香港的出版社，施加種種壓力阻止此書出版，甚至給我冠以「破壞溫家寶的改革大業」的罪名。這就是他們對待不一致的觀點的態度。這跟中宣部的惡行有何差異？他們掌權之後，還不是一樣專制者？如今，《紐約時報》的報導，都被「陰謀論」給淹沒了。可見，民間的思維方式也被黨文化所毒化到了何種地步。

陳小平：你比較喜歡直言快語，享受你的言論自由，但這也因此讓你不少次成為爭議人物。其中之一是，你在《開放》上那篇文章「莫將罪犯當英雄」，抨擊楊佳殺人。你說：「當殺人者被某些自以為大義凜然的作家、學者和律師譽為大俠和英雄並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援的時候，一個『前法西斯時代』的『民意場』正在迅速形成。」楊佳殺的是穿制服的警察，不是平民，顯然他暴力的對象是經過選擇和考慮的。你既然認為「今天中國的掌權者已然病入膏肓」，為什麼不承認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

余杰：這場爭論涉及到如何看待非暴力抗爭和暴力抗爭這一核心問題。這個議題在中國轉型過程中非常重要。

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但發生在公權擴張、民權萎縮、貧富懸殊、司法不彰、民怨沸騰的中國，就成了一起具有標誌性的社會事件。楊佳案，讓人們從各個角度，看到中國

與憲政制度的差距。

在我的《劉曉波傳》一書中有專章論及我和劉曉波對此事的看法，我們堅持反抗暴政的非暴力原則，這導致我們受到很多批評。在論述楊佳案件時，劉曉波指出：該案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社會的平衡性斷裂的標誌之一。無論從客觀效果還是就價值立場而言，「楊佳式的復仇」對中國社會轉型都有害無益。「如果暴力反抗是個人復仇的主動施暴，其結果是雙方的生命代價，那就是沒有贏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談不上正義。」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與法學界前輩江平的看法是一致的。江平說：「你楊佳受到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洩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洩私憤，殺了六個無辜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在一次演講中，江平陳述這一觀點之後，有個青年學生威脅說，如果手中有雞蛋，會立即用雞蛋砸他。江平連來自共產黨的威逼利誘都不怕，又怎麼會怕被庸眾的雞蛋「砸」呢？我在北京的一個 NGO 組織「傳知行」演講的時候，當場也有人站起來反駁我，讚揚楊佳是英雄。

但是，我認為，楊佳的殺戮惡化了民間生態。劉曉波在文章中指出，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個體性的殺戮，非但不能震懾那些作惡的警察，反而會引發當局更加瘋狂的鎮壓。「如果楊佳襲警的發生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發生。而獨裁政權的應對只能是政府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劉曉波看重的是一種健康、理性的社會生態的培育，而非瞬間的「快意恩仇」，但他的這番良苦的用心，很難為被激情和仇恨左右的被侮辱者和被傷害者所理解。

面對網上的一片叫好之聲，劉曉波反問說：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否「罪有應得」？是不是所有穿警服的人都「死有餘辜」？他認為：「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難道對生命的珍重還

要區分警民，難道僅僅因為警察的身份被殺就是活該？即便被殺警察中可能有迫害過楊佳的人，也是罪不當誅。」雖然這些年來劉曉波本人是警察濫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認為，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無辜者，不能因為他們從事警察這一職業，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行兇的對象。且不說他們並非傷害過楊佳的那幾個警察，即便就是那幾個作惡的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程式對其行為調查、審判和追究——當然，目前來看，暫時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人可以立即啟動「個人執法」，並施行「私刑」。

我更對頌揚楊佳殺人行為的民粹主義言論充滿憂慮，當民間被「原始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對象達成「精神同構」，這是最擔憂的情形。我在討論德國魏瑪共和國末期社會思潮的文章中，也論及楊佳事件，我批評那種為楊佳的屠殺行為叫好的「民意」跟希特勒上臺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土壤」有相似之處。這個說法後來被人刻意扭曲成我說楊佳是法西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長期以來引發暴力傾向的，是「貧窮、剝奪、忽視和羞辱」，「義憤」為「報復」行為打下伏筆。以此而論，楊佳以死相爭的決絕不無可憫之處。但是，在那些高聲為楊佳叫好的聲音當中，有一種從義和團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烏合之眾」的氣味。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呼應與合流，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的思潮和現象。許多知識份子也許能抗拒金錢的誘惑，卻難於抗拒名聲的誘惑——尤其是在民間的名聲。一旦批判民粹主義、批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就有可能損害這種民間的聲望。

陳小平：你說與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和戰友，你認為中國政府差點讓你為寫作和出版這本書付出生命的代價。從新聞報導中看到，你在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前一天，被綁架和毒打，他們還威脅活埋你，你能解釋一下，各種各樣

批評中國政府的書和文章每天都在出版，為什麼他們格外恐懼你的這本書？

余杰：为什么中共掌权者格外害怕《劉曉波傳》的出版呢？

我想，他們不願更多中國人和西方人瞭解劉曉波的生平與思想，他們企圖讓劉曉波在監獄裡被遺忘。劉曉波是目前中國唯一可以將民間力量整合起來的象徵性人物，他若成為中國的曼德拉，中共剩下的日子就屈指可數了。

任何一個獨裁政權，越到其統治末期，其暴力機器便越處於失控狀態，除了對潛在的挑戰者露出猙獰的牙齒，內部的傾軋也會無所不用其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北京當局命令秘密警察對我使用酷刑折磨，是因為劉曉波的獲獎讓最高當局惱羞成怒，他們需要找人發洩，而我是劉曉波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我便成了一個最佳的發洩對象。另外，我是在國內極少數敢於直接點名胡溫等最高領導人的作家，當局也試圖通過對我的施暴讓其他人噤若寒蟬。

此後，在二零一一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中，這種肉體折磨更是廣泛使用在維權人士身上。很多人遭遇的酷刑已經到了駭人聽聞、罄竹難書的地步。這個政權也到了只剩下暴力來維持的階段。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情勢的日漸惡化，暴力還會得到廣泛的使用。看看超過軍費的維穩費用，看看無所不在的「國保」隊伍就知道了。

二零一二年薄熙來事件爆發，以及圍繞十八大卡位發生的一些內鬥，讓人眼花繚亂。中共內鬥的血腥和殘酷，又嶄露出「文革」時期的苗頭來。無論是胡溫還是習李，都是「文革」的孩子，都是在黨文化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用研究「文革」問題的學者王友琴的話來說：「追究根源，摧毀了當代中國人的正義觀念的根源，還是「文革」。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鬥爭」、被監禁、被打傷，這是對社會正義的絕大冒犯和損毀。」與明代末年一樣，如今的中國社會瀰漫著濃厚的暴戾之氣，中共當權者的知識結構和精神結構，都加劇了這種

暴戾之氣。這是我對中國未來最大的擔憂。

陳小平：在多個場合聽到，你打算繼續為劉曉波發聲，讓更多人知道和支持劉曉波，除了你到白宮參加抗議要求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準備建立聲援劉曉波的網站之外，出版《劉曉波傳》英文版和將之拍電影之外，你還準備做些什麼？我看你在白宮參加抗議時是一個人，這當然需要勇氣，但如果聲援劉曉波，你一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你在這方面有什麼打算呢？

余杰：我到美國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此前兩年就著手寫作的《劉曉波傳》。夜以繼日地又用了近半年時間，終於脫稿。二零一二年六月和九月，分別在香港和臺灣出版。這本書是我近年來最重要的一本書，不是說我寫得好，而是傳主很重要。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劉曉波的傳記。這本書提供了諸多關於劉曉波的第一手資料以及第一次披露的生活細節，並對劉曉波的精神世界和學術思想有深入的梳理和探討，是瞭解劉曉波的一本必讀書和入門書。

二零一二年春天，習近平首次訪美時，我舉起劉曉波的照片到白宮門口去抗議。這樣做並不需要太大的勇氣，我沒有去天安門抗議，真正危險的是去天安門抗議。我希望美國政府和美國民眾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唯一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關在監獄裡的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中國政權的本質。美國不能只跟中國做生意，而忽視中國嚴重的人權問題。美國需要雷根那樣的政治家，對極權主義勇敢地說「不」。另一方面，海內外的中國人及華人，也應當更多關注劉曉波，為劉曉波的自由發聲。

雖然我到了美國，但我不會忘記劉曉波和劉霞仍然沒有自由的艱難處境。回想過去十年來跟他們夫婦的交往，一幕幕場景歷歷在目，讓我黯然淚下。為劉曉波夫婦奔走呼籲是我義不容辭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今後若干年生活的一大重心。當然，我希望更多朋友都來關心劉曉波和劉

震的處境。我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正在與朋友們一起籌劃成立「劉曉波之友會」，以此為平臺推動相關活動。這個鬆散的組織沒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和綱領，目標很簡單，就是推動劉曉波以及其他的政治犯、良心犯早日獲得自由，以及傳播和普及劉曉波的文章及思想。儘管劉曉波已經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我發現，在美國，他的知名度遠不如曼德拉和昂山素季，還有待提高，這需要朋友們共同努力。

我們剛剛開始「劉曉波之友會」的工作，我逐漸接觸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既有九零後的年輕留學生，也有八十多歲的老人，還有香港、臺灣背景的、並未直接受到共產政權傷害的人士，他們都願意為劉曉波出力，為「劉曉波之友會」做義工。前賢說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清清楚楚，不是中共當局用每年七千億的維穩費用就能扭轉的。這也讓我對未來抱有樂觀之期待。

在這方面，我計劃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劉曉波有上千萬字的作品尚未整理出版。我們將整理出版劉曉波的文集，推動英文和其他語種的翻譯和出版。我們將策劃劉曉波的圖片展，以及劉曉波的妻子、畫家和攝影家劉霞的攝影和油畫作品展覽。我們將策劃拍攝劉曉波的紀錄片。我們將設立劉曉波的官網，使之成為關於劉曉波的最完整的資料庫和網上博物館，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後，以此為基礎在北京建立劉曉波文獻中心（就像曼德拉文獻中心那樣）。

劉曉波被捕入獄已經五年，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在家三年多。劉霞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狀態，她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身體狀況堪憂。劉曉波夫婦的遭遇，是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的標誌之一。納粹德國、蘇聯、共產黨統治的波蘭、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和軍政權的緬甸，都曾迫害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共產黨中國那樣，將這種殘酷的迫害廣泛延伸到其親人和朋友身上。中共在國內對人權的踐踏，也將危害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侵蝕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中共的獨裁統治已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承認，

中國的民主轉型不可避免。作為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持續二十多年為中國人權事業奮鬥的知識份子，作為非暴力的價值和「我沒有敵人」的精神的倡導者，作為惟一身處中國本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必將在這一變革中發揮關鍵作用。

幫助劉曉波，就是參與中國的和平轉型，就是為中國的未來盡一分心力。我也呼籲廣大國內同胞和海外華人，以及國際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和關注全球聲援劉曉波的活動。

陳小平：你已經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帶著妻子、兒子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來到了美國這片自由土地，美國政府也給予了你政治避難，雖然認定「我們必將在北京重逢」，但你認為在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的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方面都不樂觀，估計有那麼一個不定期的時間裡，你不會回中國，而是在美國當一名流亡作家，相應地，你在美國有新的創作和人生事業的籌畫嗎？

余杰：我對短期內回到中國不作樂觀的預測。習近平正在帶領中國走向一條危險的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他選擇的甚至不是次壞的那種，而是最壞的那種。中國還將經歷極為深重的苦難。這是不以我們善良的願望為轉移的。「六四」之後的許多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包括劉賓雁，當時甚至準確地預測說，中共政權至多兩三年就會崩潰，他們中的許多人連行李都不願打開，認為迅速就能回國。結果，中共生命力之強悍超過任何人的想像。

我深知，中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它手頭上還有據說是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更何況中國民眾的奴性早已深入骨髓。我相信這場抗爭如同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一樣漫長，我對在美國「安居樂業」也早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我不願使用「流亡」這個詞語形容目前的狀況，而願意用稍微中性的說法，即「出走」。對我來說，「流亡」這個詞過於負面，過於悲情。

我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湯瑪斯·曼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教授對那些遊說他回去「看看」的人所說的那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

我不太需要一種群體性的認同。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烈的鄉土觀念，相反有一種世界公民的觀念。到北京念書之後，我對各類同鄉會不感興趣。我在四川生活了十八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八年，但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歸屬感。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美麗小鎮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城市化浪潮中蕩然無存，而北京更是一座以權力為中心的冷酷無情的城市，我在四川和北京都是異鄉人。這一次離開，即便是長久的離開，對我而言，也並非一個太過痛苦的決定。作為一名作家，在中國寫作和在美國寫作，都是一樣的，更何況在互聯網時代，我在海外反倒可以自由地獲得資訊，對中國的脈動的把握也許更為精準。

在一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我的寫作一個保持良好的狀態。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再也不用擔心電腦被秘密警察抄走。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感覺真好。華裔作家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這樣一個比喻：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自由的國度，精神上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飛鳥，在天空中飛翔；其實，他們是風箏，飛得再高，線還是被共產黨拉在手上。我希望自己不是風箏，而是自由翱翔的飛鳥。聖經中有一個比喻，我很喜歡——「如鷹展翅上騰」。我願以此與海外的朋友們共勉。

關於以後的寫作和事業的規劃，可以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一是研究香港、臺灣問題，以及背後的統獨議題、聯邦和邦聯制度等，希望凸現「人權高於主權」之價值觀，打破兩千年「大一統」之觀念。二是繼續幾年前就開始的關於基督徒公共人物的訪談，探討基督信仰與公共參與之關係，希望未來幾年每年出版一本該系列的人物訪談。此前已經在臺灣出版了《一生一世的仰望》、《我有翅膀如鴿子》和《萬縷神恩

眷此生》、《大地上的麥子》四本，以後第五本、第六本會持續寫下去。三是從事英美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方面的研究，希望為中國未來找到一條突圍的路徑。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加爾文神學、清教徒傳統和保守主義的政治觀的結合，一定能在中國結出文明的碩果。四是編輯和研究劉曉波的著述，持續為劉曉波呼籲，使他和妻子早日獲得自由。

我對未來抱有樂觀的期待。我很喜愛的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說過的一句話：「亡出於獨裁的人只能夠流向民主。……對於一個流亡作家來說，選擇這條道路在很多方面都像是重歸故里——某個理想一路激勵著他，而向著那一理想之所在，他又走近了一步。」

陳小平：讀了你們的爱情故事，很羨慕你們的浪漫。記得你妻子嫁給你之前說過：「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不管是宮殿還是貧民窟，我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條件——身邊有一個真愛一輩子的人。」十二年前，她辭去香港公司的工作，到北京找你投奔愛情。在與你一同被軟禁和羞辱時，從未猶豫和退縮；美國這個地方可以讓愛情免于恐懼，但不少中國來的新移民的爱情要經受新一輪磨難，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余杰：在美國成為新移民的一員，必定要經歷很多的挑戰甚至挫折。對此我有充分的心裡準備。我看到過很多流亡者家庭、婚姻的破裂，我不把這種情況單純看作是環境的變化、移民所受之文化衝擊的結果。我認為，這只能表明他們的家庭、婚姻之中原來就潛伏著危機，只是在一個臨界點上被觸發出來罷了。

在家庭和婚姻的問題上，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認為大部分的問題都出在男方身上。中國的男性是世界上最差勁的男性。很多在外邊高言大志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在家裡，在妻子面前，宛如兇神惡煞的暴君。我呢，雖然在文章中筆鋒銳利，但在家中卻是「好男人」。我一直說，我們先不要說去救世界，先要好好經營好家庭，做好丈夫、父親的角色。如果沒有美滿的家庭生活，其他的功名利祿都免談。

我在家中是大廚，我常常自豪地說，我是一手拿筆，一手拿鏟。用

一個時髦的詞語說，我是「宅男」，在家寫作，可以數天足不出戶。在寫作累了時，就在廚房忙碌，這是我的一大快樂。看到回家的妻子和兒子開心地吃到我做的熱氣騰騰的飯菜，是我最開心的時刻。我建議丈夫們不妨嘗試嘗試著提高廚藝，廚房是改善家庭關係最好的地方。

還有就是要有一顆平常心。很多人在中國的時候可能有某方面的成就，到了美國，一切歸零，重新開始，心理上就產生很大落差。還有一些中國人喜歡熱鬧，喜歡中國的呼朋引伴、燈紅酒綠；到了美國，發現沒有那麼多娛樂，感到很失落和很寂寞。對我而言，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一向喜歡過安靜恬淡的生活，在北京時，我就居住在五環外的遠郊，一個星期都不出社區大門，也很少「進城」湊熱鬧。到了美國，我選擇居住在美國的清教徒傳統保存較為完整的維吉尼亞的小鎮，而不是紐約、三藩市、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

另一方面，我們一家人從北京的家庭教會到美國這邊的華人教會，很快融入一個新的大家庭。我們得到了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很多的幫助和關愛，使我們很快就適應了在美國的新生活。目前，我們全家都很享受在美國的生活，也相信我們能戰勝種種挑戰。

對於過去、現在和未來，我都充滿了感恩之心。伊格納蒂夫為思想家伯林寫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許多人在流亡生活的條件下，就是靠壓抑某一部分身份要素才生存下來的。可是他什麼也不抑制，讓內心的所有訴求都得到回應，這就形成了一種自由主義的稟賦，這種稟賦也許就像他的著作一樣，是一種重要的遺產。」我願意分享伯林的這一寶貴的遺產，這也是我所追求的目標。

存謙卑的心與天安門母親風雨兼程

——在華盛頓紀念「六四」二十三周年集會上的發言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幾天以前我跟「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師通過電話，她讓我向所有關切「六四」二十三周年紀念活動的朋友們轉達她的感謝和問候。

站在這裡紀念「六四」，我感到悲喜交集。對於我個人來說，在過去的幾年裡，每逢「六四」快要來臨的時候，我要麼被非法軟禁在家，要麼被強迫去外地「旅遊」，不能去探望天安門母親，更不能去屠殺的現場為死難者獻上一束小小的白花。只有到了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才能有公開紀念「六四」、譴責暴政的機會。這是多大的一個諷刺啊。

「六四」之後二十多年來矢志不渝地捍衛歷史真相、揭露中共以暴力和謊言維持權力的獨立知識份子劉曉波，仍然被關押在監獄之中，最近沒有任何消息傳出。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以無罪之身，一直處於被非法軟禁的狀態。敢於如此殘酷對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獨裁政權，全球獨此一家，別無分店。遺憾的是，西方民主國家並未對中共施加足夠的壓力，與狼共舞，必然引火焚身。

幾天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重要成員、「六四」死難者軋愛國的父

親軋偉林遽然自縊身亡。軋偉林生前為核工業部二院食品部退休職工，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天安門母親群體與他聯繫上後，他們夫婦義無反顧地積極參加了各項抗爭活動。即使多次受到警方的威嚇、監控，也從不退縮。然而，長期的悲痛和壓抑，終於導致他的絕望。天安門母親群體在聲明中指出：「身為一介平民，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死來抗爭政府當局的殘忍與無道，真是舊怨未了又添新孽。」

以上事實本身足以說明，從「六四」屠殺直到今天，中共政權的本質並沒有發生絲毫的變化，對即將接班的習李政權抱有任何希望，都是緣木求魚、自取其辱。如今在臺上的中共權貴們，沒有一個人具備解決「六四」問題的魄力和勇氣、誠意與善意。

正如劉曉波一本專著的名字《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所揭示的，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包括「六四」正名，不是祈求統治者的恩賜，而是每一個有良知的公民一以貫之的抗爭。這個過程是漫長而艱苦的，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若以諾貝爾和平獎而論，中國僅有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兩位諾獎得主是不夠的。讓我們以謙卑的心，繼續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爭取諾貝爾和平獎。

在劉曉波的諾獎頒獎演說中，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回顧了諾委會是參與南非的和平轉型進程的歷史：「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向南非人士頒發過四項和平獎。所有四位得主都親臨奧斯陸。但一九六零年亞伯特·盧圖利和一九八四年圖圖大主教的獲獎，都引起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強烈不滿。直到一九九三年納爾遜·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榮獲和平獎，才終於博得了雷鳴般的掌聲。」昨天的南非，就是今天的中國。黑暗不會永遠繼續下去，只要我們存有對光明的期望。

如果以南非的歷史為參照，作為中等國家的南非，需要四名諾獎得主的合力，才能順利實現和平轉型；那麼，「船大掉頭難」的中國，和平轉型的過程將更為艱巨與漫長，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四名諾獎得主，

甚至是更多的諾獎得主。

目前，中國已經有了兩名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和劉曉波，但他們仍然勢單力薄。在劉曉波之後，還應當有更多中國人獲此殊榮。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共同形成一種群星璀璨、互相護持的格局，一起力挽狂瀾，以達成未來中國之民主自由。

作為「六四」的倖存者，劉曉波從未想過主動爭取獲獎，而是一直懷著一顆懺悔的心，推動天安門母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丁子霖老師回憶說，就在劉曉波被捕前一天，他們夫婦還到醫院看望兩位老人，並提及繼續推動天安門母親獲得諾獎的事宜。政論家胡平也回憶說，在被捕前幾天，劉曉波特意致電給他，希望他轉告中國人權和全美學自聯等組織，繼續推動天安門母親獲獎的工作。

繼劉曉波之後，二零一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三名非洲及中東女性：賴比瑞亞總統瑟利夫（Ellen Sirleaf）、作家格鮑伊（Leymah Gbowee）和葉門女記者卡曼（Tawakkul Karman）。頒獎詞稱讚三人「以非暴力抗爭形式，改善女性在各自地區的安全，並爭取女性全面參與建立地區和平工作的權利」。這是和平獎一百一十年以來，女性得獎數目最多的一次。

放眼世界範圍，與這三位女性同樣偉大的，是以丁子霖老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個群體代表了「六四」死難者家屬，代表了苦難深重的中國重生的希望。在道德崩潰、民意渙散的今天，天安門母親身上的道義力量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多年來，她們倡導的真相與和解理念，是中國由專制社會轉型為民主社會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精神資源。諾獎最為看重人權與和平兩大價值，這兩大價值在天安門母親的身上都獲得了最大的交集。

光陰荏苒，二十三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我從十六歲的少年人步入了中年，而天安門母親群體大都進入七、八十歲的高齡。近年來，已有多名天安門難屬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沒能等到正義

的來臨。因此，時不我待，推動天安門母親獲獎的工作具有相當的緊迫性。

如果在中國的變革來臨之前，全球華人以及所有關注人權議題的人士，促使天安門母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那就是繼劉曉波獲獎之後，災難頻仍的中國迎來的最美好消息；同時，也是對「六四」死難者最大的慰藉，他們可以死而瞑目了。

美國偉大的自由戰士麥克亞瑟將軍說過：「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天安門母親們也是如此，那些離開世界的母親們，她們並沒有死去，而是到了天堂中與孩子們相聚。在那裡，父母與孩子和睦同居，深深擁抱，處處是鮮花和微笑，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天安門母親並不孤獨。在三藩市，劉賢斌和張前進等天安門一代學生的女兒們，雖然只有十多歲，卻自己籌辦了紀念「六四」的露天音樂會；還有一群八零後、九零後的中國留學生，日前也以真名致信中共最高領導人，倡言解決「六四」問題、啟動政治改革。中國有智慧、也有勇氣的年輕一代，已經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讓我們與偉大的母親站在一起，並將她們的精神傳承下去。

謝謝大家。

牛犢可以頂開橡樹

——在紐約「公民勇氣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

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非常榮幸地站在這裡跟大家講話。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晚上，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同時，我被中國共產黨的秘密警察綁架到北京郊外，持續數小時的酷刑折磨，讓我昏死過去，被送到醫院搶救，險些不治。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時刻，我仍然相信：即便我死去，作為一個努力說真話的作家，我的文字會保存下來，會傳播出去。如此，我雖死猶生。正是這樣的信念，讓我戰勝了秘密警察咆哮著的威脅——「我們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挖個坑，把你活埋掉，全世界不會有人知道。」

同樣的信念，也存在於索爾仁尼琴心中。索爾仁尼琴在他的自傳中回顧了歷史上那些對抗強權的作家們的悲慘命運：「對於為真理而憂心如焚的作家們來說，過去和現在生活都從來沒有輕鬆過（將來也不會！）：有的人被誹謗困擾，有的人死於決鬥，有的人家庭生活破裂，有的人破產落魄處於難以擺脫的貧困之中，還有的人被關進瘋人院，老死獄中。」儘管如此，索爾仁尼琴仍然堅信：「我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的，我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於會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見不到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將會覺醒。」

在那個時代，大多數的蘇聯問題專家都認為，蘇聯將會長期存在下去，甚至會變得越來越強大，取得冷戰的優勢。當被蘇聯當局驅逐到美國的索爾仁尼琴宣稱蘇聯必將崩潰、他在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國的時候，人們都嘲笑他，說他在做白日夢。一名流亡者，能戰勝一個大帝國嗎？螞蟥能戰勝大象嗎？那時候，西方世界的人們被蘇聯龐大的軍隊和先進武器嚇壞了，以至於雷根總統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呼籲「柏林牆倒下」的時候，許多人都批評他說，這是一種魯莽的挑釁，會招致蘇聯可怕的報復。

然而，蘇聯以超乎協和客機的速度走向了崩潰。索爾仁尼琴和雷根都親眼目睹了他們先知般的預言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

今天，基於同樣的信念，我站在這裡。當我在這裡宣稱中共的暴政必然滅亡的時候，也許有更多的人表示異議。

從中共一建立的時候起，西方就對它充滿了天真的幻想，認為它不是蘇聯斯大林式的共產黨，四十年代的延安被西方媒體和知識份子描述成中國最民主的地方。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毛澤東掀起一系列殘酷政治迫害運動，導致接近一億中國人悲慘地死去。但是，依然還有那麼多對資本主義不滿的西方知識份子，把中國看作是美國和蘇聯之外真正的世外桃源，比如法國作家薩特。還有遵循現實主義原則政客，向毛澤東拋出了橄欖枝，比如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基辛格。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的血跡未幹，中共為了維持其政權，開始了畸形的經濟改革，一步步地將中國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廉價商品的加工廠。由於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西方跨國公司蜂擁而至，賺錢總是比人權重要。從花旗銀行的董事到哈佛大學的教授，都成了「中國模式」的熱情吹鼓手。

然而，共產黨就是共產黨，萬變不離其宗，謊言和暴力是與生俱來的遺傳基因。正如柏林奧運會不能掩飾納粹的本質，北京奧運會也不能掩飾中共的本質。表面上看，沃爾瑪貨架上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讓美

國的普通消費者都得到了好處。但長遠來看，這些產品的誕生過程，充斥著對人權的踐踏、對環境的污染和對能源的浪費。與中國的這種和人權脫鉤的貿易關係，將極大地侵蝕西方賴以生存的自由市場經濟、法治和民主的基本價值。

讓我驚訝的是，當我來到美國幾個月之後，我以為擺脫了中共的宣傳機器，結果我錯了。我在自己訂閱的厚厚的《華盛頓郵報》中，赫然發現一疊報紙是《中國觀察》，它的印刷和編排方式跟《華盛頓郵報》其他版面一模一樣，只是有很小的一行字說明：「這些版面的內容不是由《華盛頓郵報》提供的，而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供的。」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付了多少錢給《華盛頓郵報》，但我收到這樣的宣傳品，讓我深受傷害。納粹德國和蘇聯絕對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中共卻輕而易舉地做到了。在幾大版的《中國觀察》當中，有關於西藏的僧侶擁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報導，有一張身穿袈裟的僧侶正在微笑著用蘋果手機上網的美麗照片。然而，就在同一時刻，絕望地以自焚抗議中共暴政的藏人已超過五十人。當年，一名南越和尚的自焚抗議，讓西方世界為之震驚，並讓美國政府改變了對吳庭琰政權的支持。可是，如今，五十位藏人的自焚，卻像石頭緩緩落入水中，沒有激起一點的波瀾。這是什麼原因呢？

作為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我常常感到我們比當年的索爾仁尼琴們更加孤單。中共比蘇聯更有錢，更狡猾，似乎變成了一頭不再興風作浪的龍。所以，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在西方根本得不到足夠的重視。但是，孤單不是我停止戰鬥的理由，還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我去揭示，還有更多被迫害的同胞等待我去聲援。我自己遠遠不是一個勇敢者，當我看到「公民勇氣獎」歷屆得主的事蹟的時候，我願意謙卑地向他們致敬；我自己遠遠不是一個勇敢者，我的那些最勇敢的同胞，大都身處監獄中，比如我的良師益友劉曉波。當我意識到他們的存在的時候，我就感到自己並不孤單。

我之所以成為一個努力說真話的作家，是因為「六四」屠殺讓我與殺人的政權徹底決裂。十年以後，當我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結識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在「六四」那天晚上罹難的兒子蔣捷連，只比我年長一歲。見到我，她就想起她的孩子來。是的，如果那時我在北京，而不是在偏遠的西部的小鎮，那天晚上死去的孩子就有可能包括我在內。那麼，既然我已經死過了一次，還有什麼可以畏懼的呢？正如聖經中保羅所說，那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你不要怕他！

索爾仁尼琴將《牛犢頂橡樹》作為他的自傳的名字，是的，我們只是小小的牛犢，但我們可以頂倒千年的橡樹。中國也有一個與之相似的成語叫「精衛填海」——那隻名叫精衛的小鳥，每天銜一塊小石頭扔到大海中，終將把浩瀚的大海填平。是的，我們沒有武器，沒有金錢，沒有權力，但我們擁有對自由的信念，正如雷根總統所說：「朝自由民主邁進，會將共產主義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她與我一同被軟禁和羞辱，卻從未猶豫和退縮。感謝特雷恩先生和特雷恩基金會，選擇我作為「公民勇氣獎」的第一個中國獲獎人。感謝「公民勇氣獎」的倡議者索爾仁尼琴，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堂中注視著我們，支援我們繼續他的「牛犢頂橡樹」的事業。也感謝在座的各位，你們的到來讓我更深切地體會到，自由的事業是不分國界和種族的，是全人類的事業。當自由的鐘聲在中國的大地上響起的時候，我們必將在北京重逢。

謝謝大家。

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

——我所認識的姚文田

我的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終於在香港和臺灣上市了，原本計劃出版這本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先生卻仍然被關押在深圳的監獄之中。

此時此刻，回想起與姚文田先生長達七年的合作與友情，不禁感慨萬千。

在二零零五年之前，我在中國內地還能發表部分作品，卻感覺到當局的文網越發嚴密。有多位報刊和出版社的總編、編輯因我的文章惹禍上身，遭到撤職乃至開除。我心中頗感內疚——雖然罪不在我，而在於「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中共當局，我本人也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我總覺得是自己連累了別人。中共建政之後，中國的媒體無一例外都是「黨營」的，稍有良知者，若供職於其中，必有「痛不欲生」之感，即便不是因為我的文章，他們也會因為其他文章或報道被掃地出門。有一位在《人民日報》副刊工作的北大中文系學長，就因不堪忍受常年在謊言中的生活，而選擇了自殺身亡。

如劉曉波所說，真正的自由人，即便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也要假裝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國度，以一種無拘無束的、「獨與天地相往來」的心態寫作。這也是我追求的寫作狀態，直到我被中宣部宣佈徹底封殺、國保警察整日在我家門口梭巡，仍然無怨無悔。與劉曉波一樣，我除了

一支筆以外手無寸鐵，卻成了當權者眼中罪不可赦的「國家的敵人」。

接下來，我的文字只能在香港、臺灣和北美的一些華文媒體發表，我不由自主地「隱形」了，不折不扣地是「祖國的異鄉人」。人還沒有流亡，文字就已經流亡了。

二零零六年，國際筆會在香港召開亞太作家筆會，我作為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參與此會，結識了剛剛開張晨鐘書局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

那時，獨立中文筆會編輯了兩本文選，一本是會員文選，一本是獄中作家文選，會長劉曉波委託晨鐘書局出版這兩本書，並叮囑我到香港時與姚先生商討有關事項。

姚先生趕到會場，我們在一個角落談話。他告訴我，他是一名退休工程師，經常應邀去學校去講化工方面的課程，不過，他的興趣在於出版人文、政治方面的書籍。所以，跟朋友一起創立了晨鐘書局。

姚文田是「六四」學生領袖姚勇戰的父親，他告訴我，兒子到美國之後，成家立業，養育三個孩子，非常不容易，無暇繼續參與民主運動；但作為父親的他，從「六四」以來，對於中國實現民主的夢想，一直念茲在茲，在香港這個擁有出版自由的地方從事出版事業，是他實現這個夢想的方式之一。所謂「晨鐘」，就是要讓民主的鐘聲響徹神州大地。

姚文田是四川人，說一口川味十足的普通話。一身舊西服，腳下的皮鞋已磨得失去了光澤，不像是一般講究穿着、衣冠楚楚的香港人，倒像是我們老家都縣城裡不修邊幅、節儉樸素的中學老師。我們遂一見如故。

作為普通工薪族的姚先生，個人並無雄厚的資金投入出版之中，他與作者一般採取「互助出版」的合作方式。出版成本由作者出資，比如排版費、封面設計費、印刷費等，他則承擔編輯、印刷和發行等各項事務。最後，書能賣掉多少，收到的款項，除了他收取相當微薄的編輯費和管理費之外，全都歸作者所有。姚先生說，如果作者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可以自己指定印數，如果全都能賣掉，作者不僅能收回投資，而且其受益將遠遠大於某個固定的版稅額。

我對這種合作方式很感興趣，第二年，籌到了一筆資金，便將《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中國教育的歧路》和《白頭鷹與大紅龍：美中關係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等三本新書交由姚先生出版。我請朋友設計好封面，姚先生仔細編輯和校對書稿，那時我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我們之間的電郵和電話一直不斷。很快，三本書完成上市了，雖然不是十分暢銷，在以後兩三年間，第一版的兩三千冊都賣完了，有的還加印了。

那幾年，我還擁有往返於北京、香港之間的自由，每年都有一兩次到香港開會的機會。每次到香港，都會與姚先生見面。我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以及教會和民間社團演講，姚先生都會用行李箱拉着一箱子書過來，等我講完之後，向聽眾介紹這些書籍。他已接近七十高齡，卻像搬運工一樣拖着沉重的書籍上坡下坎，到達會場時常常滿頭大汗。說實話，打完折以後，賣二、三十本書根本賺不到多少錢，還不夠他來回的交通費，可他就這樣來去匆匆、樂此不疲。作為編輯，他大概算是我的書稿的第一讀者，他說，這些文章和觀點應當被更多讀者知曉，多一個人看到，就能多打動一顆心靈。

香港回歸之後，新聞出版自由表面上看沒有太大變化，中共沒有在香港特區政府裡面設立宣傳部。但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變化悄悄發生了：很多大出版社和連鎖書店，或者被中資所滲透和控制，或者為了開拓內地市場而自覺揣摩北京的喜好，一步步地走向「自我約束」。它們通常會把像我寫的這種直截了當、鋒芒畢露的批判中共的著作拒之於門外。於是，像姚先生的這種「微型出版社」，就成了專門出版這類「禁書」的、在夾縫中生存的「野草」。

大概是二零零九年，我又到香港訪問，恰逢香港書展。姚先生和田園書店的黃老版邀我去書展現場簽名售書。書展主辦方當然不會為我這

樣的作者舉行演講和簽售活動，我們只能在田園書店的展臺前的一個小角落，擺開晨鐘為我出版的幾本書。倒是有幾位從內地趕來的讀者找我簽名，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少有香港本地人對這些書籍有興趣。

從會場出來，姚先生說要請我吃飯。我知道他在經濟上並不寬裕，艱難地維持晨鐘書局，有些書明知賠本也要出，故而不太願讓他破費。我就說，那我們去吃大排檔吧。於是，姚先生、孟浪和我一起去一家大排檔，邊吃邊聊。姚先生談起他出版的每一本書，無不娓娓道來，簡直比作者本人還要「敝帚自珍」。他對書籍的熱情、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堅持，讓我感佩不已。

這些年來，我接觸過的兩岸三地的出版人不在少數，有那種像血吸蟲一樣壓搾作者的奸商，也有某些居高臨下的前輩。姚先生的年紀比我的父親還大，他卻與我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漸漸地，晨鐘書局在中國獨立知識分子群中有了相當的美譽度。張博樹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王天成的《大轉型》、夏明的《政治維納斯》、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張伯笠的《逃亡者》等重量級著作，先後都在晨鐘書局出版。有時候，我跟姚先生通電話或寫電郵，他萬分喜悅地告訴我，最近又收到了某某人的某某書稿，此書稿充滿真知灼見，是中國走向民主的催化劑。他編輯和校對書稿，常常廢寢忘食，甚至兒子邀請他到美國探親的機會都放棄了。

二零零九年聖誕節，劉曉波被判十一年重刑。我將劉曉波被捕后我撰寫的關於劉曉波的評論文章彙集成《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一書，由晨鐘書局出版。第二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傳出之後，我迅速增補了一批新文章，更名為《劉曉波打敗胡錦濤》，由晨鐘書局換了封面再版。此書剛一出版，我即失去了自由，然後是被秘密警察綁架和遭受酷刑。

二零一二年，我從中國出走。抵達美國之後，又有兩本新書《河蟹大帝胡錦濤》和《解毒國民教育：通往心靈自由的》委託姚先生出版。

前者的出版過程頗多曲折，中共當局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姚先生的電郵被植入病毒，整部電腦陷入癱瘓，不得不公開譴責來歷不明對駭客。而我更是受到中共發出的暗殺威脅，「江南案」似乎要在我身上重演。在此情形之下，我們仍然咬牙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使之成為一篇胡錦濤本人無法拒絕的墓誌銘。

二零一三年夏，我與姚先生又開始商議三本新書的出版。一本是我的成名作《火與冰》，我希望出版一個香港版的「足本」。一本是剛整理完畢的《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第三本則是我正在撰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

姚先生將《火與冰》排版完成，並將打印出來的二校稿郵寄給我。此書的封面設計也完成了。十月十八日，姚先生發來電郵，並傳來合約。次日，我將《火與冰》的三校勘誤表發了過去。但是，此後我再也無法聯繫上他，電郵和電話突然都不通了。直到一個月以後，我才得知姚先生在內地失去了自由。

中共當局以卑劣的手段誘捕了姚文田先生。姚勇戰在一份聲明中披露了一個可恥的細節：姚先生剛一入關，十多名警察便猛撲過來，其中一名海關人員欣喜若狂地說：「我們終於釣到你這條大魚了！」

但是，中共當局無法阻止《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出版——除非中共用荷槍實彈的軍隊關閉香港、臺灣以及全世界的華文出版社。我想，這本書的出版，既是對處在逼迫與困厄中的姚先生最大的慰藉，也是索爾仁尼琴所說的「牛犢頂橡樹」式的抗爭的一部分。

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為自由而戰。姚文田老先生選擇的戰場是出版界。他先後出版了三十多本書，大部分都「叫好不叫座」，沒有一本成為超級暢銷書。但是，他是出版界的成功者，因為他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讓貌似強大的中共如坐針氈。

姚文田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移居香港，本來可以在香港過平靜而快樂的退休生活，甚至可以去美國與兒孫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他

毅然選擇了出版異議人士的著作，作為人生的「第二春」。他就像搬家的螞蟻一樣，忙忙碌碌地、自得其樂地搬運自由思想。他知道，多出一本書，就能多解救一群在幽暗中迷途的百姓。美國思想家安·蘭德說過：「没有一个独裁者可以单凭武力长治久安，人们主要是被精神武器所奴役的。」姚文田的出版事業與晨鐘書局的作者們的寫作事業一樣，是一場與極權主義的武力統治和精神奴役之間的持久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就是我所敬重的姚文田先生。在二零一四年中國新年的第一天，我寫下這篇關於姚文田先生的文字，以此作為《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壓卷之作。因為，在人類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習近平是一塊被歷史唾棄的攔路石，姚文田則是一盞引導人們前行的、徹夜不滅的火把。孰重孰輕，不言自明。

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弗吉尼亞威廉王子郡群櫻堂

《中國教父習近平》是余杰繼《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之後「獨裁者三部曲」之「終結篇」。二〇〇九年，余杰不畏北京當局的「活埋」威脅，在香港出版極具爭議性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創下香港有史以來政論類著作的最高銷量。

二〇一二年，余杰抵達美國之後半年，在中共製造「新版江南案」的威脅下，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批判中共體制下暴政與暴君之惡性循環。

二〇一三年秋，余杰與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商議出版新作《中國教父習近平》，隨即姚文田在深圳被中國警方誘捕，迄今仍身陷黑獄。為香港回歸以來「新聞出版自由第一案」。此案在國際媒體上廣為報導。

習近平欣賞美國經典黑幫電影《教父》並從中汲取權謀術，執政後將胡錦濤時代的「集體總統制」改為「元首集權制」，由「三位一體」（國家主席、黨總書記、軍委主席）搖身一變為「五權合一」（增加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故而余杰名之曰「中國教父」。

作者梳理習近平的家世、教育背景、文化基因和仕途履歷，揭示知青一代執政依托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其標榜的「中國夢」宛如納粹「第三帝國夢」之翻版。書中將習近平的性情、語言、思想與俄國「新沙皇」普京、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明朝萬曆皇帝、清朝雍正皇帝以及末代攝政王載灃一一比較、歸為同類，同時指出習近平不會成為台灣的蔣經國、南非的德克勒克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中外人士不能以習近平為改革偶像，而應像劉曉波那樣堅信「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讀者將讀到一份對習近平毫不保留的負面報告。這部書的名字受習近平一句話的啟發，習近平曾說自己年輕時看過電影《教父》，那是一部由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執導的描寫紐約黑幫老大及其家族的著名影片。余杰把習近平描寫成一位受一種危險組合驅動的強盜政客，這個組合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感以及威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的衝動。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

今後數年，習近平無疑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中國人眼中，他選擇的似乎是普京強人政治的道路，而不是戈爾巴喬夫民主改革之路。余杰獨具慧眼，對習近平的心態和價值觀有深刻的探討，從而分析他的政策綱領以及其局限。對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這是一本不會令你失望的書。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真普選聯盟召集人，前香港公民黨秘書長）**鄭宇碩**

豐富的文學和社會學想像力使得作家余杰見微知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習近平和他執政的本質。對許多盼望中共主動改革、鍾情習李新政的良善中國人來說，余杰的這部著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

余杰長年觀察及分析習近平，深具洞察力，故他對習近平的評論是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的。余杰希望《中國教父習近平》是他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的終結篇，但一日中共專政的局面不變，余杰可能還要為這個系列繼續寫下去。

（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

ISBN 978-962793433-2



9 789627 934332

定價：港幣138 美金35

056 1403

Popular